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见第五章）。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在注（7）中还补充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这里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

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末，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阐述理论史的本书第四卷将更详细地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因此，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它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也就有所变化。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

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

至于各种中间形式，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在这些中间形式中，剩余劳动不是用直接强制的办法从生产者那里榨取的，生产者也没有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资本在这里还没有直接支配劳动过程。在那些用古老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独立生产者的身旁，有高利贷者或商人，有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他们象寄生虫似地吮吸着这些独立生产者。这种剥削形式在一个社会内占统治地位，就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剥削形式又可以成为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例如中世纪末期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正如现代家庭劳动的例子所表明的，某些中间形式还会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在某些地方再现出来，虽然它的样子完全改变了。

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只要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就够了，例如，只要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就够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正是表现为大工业的特有的产物。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现在它作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那些产业部门为它所占领，也就是说，它扩大作用范围；第二，已经受它支配的产业部门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不断发生革命。

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上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到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末，我们就会碰到这样的抉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

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1)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1a)绝不应该象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

(1) “资本家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6页)“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第14页)

(1a) 据最近统计，仅在地球上已经考查过的地区内，至少还居住着400万吃人的人。

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2）并且，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较。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狄奥多洛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一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 20 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3）

（2）“在美洲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那里，几乎一切都属于劳动者，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归劳动所有；在英国，工人也许从来没有得到 $\frac{2}{3}$ 。”《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第 72、73 页。

（3）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 1 卷第 80 章。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个体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从事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在其他事情方面的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¹⁸²。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4）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

（4）“因为前者〈自然富源〉非常富饶非常有利，它使人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相反，后者则要求人细心、好学、技巧熟练和有政治才能。”（《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们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伦敦商人托马斯·曼著，他的儿子约翰·曼现在为了公共利益将本书出版，1669年伦敦版第181、182页）“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投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出产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纳·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0页）

埃及⁽⁵⁾、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⁶⁾

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⁷⁾，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

⁽⁵⁾ 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等级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二至点是尼罗河水每年开始上涨的时刻，埃及人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观察它……他们必须确定这个回归年，以便安排农事。因此，他们必须向天空探索它的回转的明显标志。”（居维叶《论地球的灾变》，埃费尔编，1863年巴黎版第141页）

⁽⁶⁾ 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866年的那次饥荒在孟加拉省奥里萨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就够了。

⁽⁷⁾ “没有两个国家能够以等量的劳动耗费而同样丰富地提供数目相等的必要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重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因为在寒冷的地方，人们不仅需要较多的衣服，而且土地也必需耕作得更好。”（《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9页）这部划时代的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瑟夫·马西。休漠就是从这部著作中得出他的利息理论的。

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⁸⁾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

“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棵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 300 磅，有时可采得 500 磅至 600 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⁹⁾

假定东亚的这样的面包采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 12 小时。良好的自然条件直接给予他的，是许多闲暇时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如果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诚实的人为了占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也许每周就得劳动 6 天。良好的自然条件并不说明，为什么他现在每周要劳动 6 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 5 天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

(8) “任何劳动都必须〈看来，这也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留有一些剩余量。”（蒲鲁东 183）

(9) 弗·沙乌《土地、植物和人》1854 年莱比锡第 2 版第 148 页。

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还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的人的陈腐遁辞，郑重其事地宣称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对此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穆勒说：

“利润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的东西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多。”

这不过是旧话重提；但是穆勒还想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

“或者换句话说，资本提供利润的原因在于，食物、衣服、原料和劳动资料等存在的时间比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里，穆勒把劳动时间的持续与劳动产品的持续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看法，面包业主永远不可能从他的雇佣工人那里取得同机器制造业主相同的利润，因为面包业主的产品只能持续一天，而机器制造业主的产品却能持续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如果鸟巢存在的时间不比造巢所需的时间长，鸟只好不要巢了。

这一基本真理一旦确立，穆勒就来确立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之处了：

“因此，我们看到，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如果没有职业的区分，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

在这里，交换、买和卖这些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被说成是纯粹偶然的事情；并且没有劳动力的买和卖，利润依然存在！

他接下去又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工人所生产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额的 20%，那末不论商品价格的水平如何，利润总是 20%。”

从一方面看，这是绝妙的同义反复，因为既然工人为自己的资本家生产了 20% 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工人工资总额之比自然是 20:100。但另一方面，说利润“总是 20%”却是完全错误的。它必然总是小于 20%，因为利润要按预付资本的总额来计算。例如，假设资本家预付了 500 镑，其中 400 镑预付在生产资料上，100 镑预付在工资上。假定剩余价值率照上面所说是 20%，那末利润率则是 20:500，即 4%，而不是 20%。

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的：

“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到处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

把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状态看作到处存在的状态，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穆勒很乐于承认，“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①。事情正好相反。

^① 马克思在 1878 年 11 月 28 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建议把这一段改正如下：

“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的。他说：‘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一切地方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编者注

“如果工人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维持这段时间生活所必需的资料，他就可以在完工后再去领他的工资，甚至他的全部工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资本家了，因为他把资本投入企业，提供了经营企业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同样可以说，一个不仅为自己预付生活资料，而且为自己预付劳动资料的工人实际上是自己的雇佣工人。或者说，只为自己服劳役而不为主人服劳役的美国农民是他自己的奴隶。

穆勒在这样清楚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甚至在它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在它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他说：

“甚至在前一场合〈即资本家预付雇佣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我们也可以用同一观点来考察工人〈即把他看作资本家〉。”“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劳动的，所以他好象是把其中的差额〈?〉预付给他的企业主……”(9a)

实际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预付给资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时间结束时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使工人成了资本家！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象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

(9a) 散见约·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68年伦敦版第252—253页。——〈以上各段是按照《资本论》法文版翻译过来的。——弗·恩·〉

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应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变化的是这个量的价值。还有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一个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男劳动力和女劳动力，成年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的自然差别。这些不同劳动力的使用（这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费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造成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是撇开这两个因素的。^(9b)

我们假定：1. 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2. 劳动力的价格有时可能比它的价值高，但从不比它的价值低。

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看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决于三种情况：1. 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2. 正常的劳动强度，或劳动的内含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3. 最后，

^(9b) 第281页^①所研究的情形，在这里自然也被撇开了。（第3版注。——弗·恩·）

① 见本卷第352—353页。——编者注

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显然，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或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变，其他两个因素可变；或者两个因素不变，一个因素可变；最后，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变化。这些因素同时变化时，又因为变化的大小和方向可以不同，组合也就更加多种多样了。下面只谈谈几种最主要的组合。

I. 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 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在这个假定下，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个规律决定的：

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例如为 6 先令，虽然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以致 6 先令的价值会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商品上面。

第二，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是一个不变量，例如 6 先令。这个不变量等于剩余价值加劳动力价值（这个价值由工人以等价来补偿）之和。不言而喻，在一个不变量的两个部分当中，一个部分不减少，另一个部分就不能增加。剩余价值不由 3 先令降低到

2先令，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反过来，劳动力的价值不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剩余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或比例量的同时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不可能同时提高或同时降低。

其次，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就不能降低，从而剩余价值就不能提高。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以前需要6小时生产的生活资料量用4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反过来，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使以前只用6小时就能生产的生活资料量要用8小时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

李嘉图在表述这个规律时忽略了一点：虽然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的变化是以劳动力的价值量或必要劳动量的相反的变化为前提的，但决不能由此推论说，这些量是按照同一比例变化的。它们会以相同的量增加或减少。但是价值产品或工作日的各部分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变化以前的原来的划分。假定劳动力价值为4先令，或必要劳动时间为8小时，剩余价值为2先令，或剩余劳动为4小时；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力价值降低到3先令，或必要劳动降低到6小时，那末剩余价值就提高到3先令，或剩余劳动提高到6小时。一方增加的量和另一方减少的量都是2小时或1先令。但是量的相对的变化在两方面是不一样的。劳动力的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即降低了 $\frac{1}{4}$ 或

25%，剩余价值则由 2 先令提高到 3 先令，即提高 $\frac{1}{2}$ 或 50%。由此可见，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变化所引起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工作日中原来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如果那部分原来较小，比例就较大，原来较大，比例就较小。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的减少或增加的结果，而绝不是这种减少或增加的原因。⁽¹⁰⁾

因为工作日是一个不变量，并表现为不变的价值量，因为剩余价值量的每一变化都有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又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很清楚，在这些条件下，剩余价值量的任何变化都是由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而引起的。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现在，我们又得出，它们的相对量，如果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

按照第三个规律，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价值的变动为前提的。剩余价值量变化的界限是由劳动力价值的新的界限决定的。但是，即使在情况允许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各种中间的变动。例如，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价值由 4 先令降低到 3 先令，或者必要劳动时

(10) 麦克库洛赫也对这第三个规律作了荒谬的补充：如果取消资本家历来必须缴纳的捐税，那末劳动力价值不降低，剩余价值也能提高。这些捐税的取消绝不会改变产业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它所改变的，只是产业资本家装进自己腰包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或要同第三者分享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所以它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因此，麦克库洛赫所谓的例外情况只能证明他对规则的误解。在他把李嘉图庸俗化时，正象让·巴·萨伊把亚·斯密庸俗化时一样，常常发生这种不幸。

间由 8 小时降低到 6 小时，而劳动力的价格还是可以只降低到 3 先令 8 便士，3 先令 6 便士，3 先令 2 便士等等，因而剩余价值只提高到 3 先令 4 便士，3 先令 6 便士，3 先令 10 便士等等。下降以 3 先令为最低界限，但下降程度要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两者的力量对比。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量。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量可以同时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间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如果劳动力原来的价值是 3 先令，必要劳动时间是 6 小时，而剩余价值也是 3 先令，剩余劳动也是 6 小时，那末，在工作日的划分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会保持不变。不过它们现在都表现为数量增加一倍、但按比例变得便宜了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格虽然不变，但是它现在提高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上。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但没有下降到由劳动力的新价值所决定的最低界限，即 $1\frac{1}{2}$ 先令，而是下降到 2 先令 10 便士，2 先令 6 便士等等，那末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量。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¹¹⁾

李嘉图第一个严密地表述了上述三个规律。他的阐述中的缺

(11) “当工业生产率发生变化，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产品增多或减少时，工资的比例部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这个部分所代表的量不变；或者这个量发生变化，但工资的比例部分不变。”（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第 67 页）

点是：1. 他把这些规律所适用的各种特殊条件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所当然的、普遍的和唯一的条件。他不认识工作日长度的变化，也不认识劳动强度的变化，因此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率自然就成了唯一可变的因素。2. 同其他一切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从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去进行研究。这一点在更大的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分析。因此，他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规律同利润率的各种规律直接混为一谈。上面已经说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而剩余价值率则是剩余价值同这个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假定资本(C)为500镑，分在原料、劳动资料等(c)上共400镑，分在工资(v)上为100镑；再假定剩余价值(m)=100镑。这样，剩余价值率为 $\frac{m}{v} = \frac{100\text{镑}}{100\text{镑}} = 100\%$ ，而利润率 $\frac{m}{C} = \frac{100\text{镑}}{500\text{镑}} = 20\%$ 。此外，很显然，利润率还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率不发生任何影响的一些情况。以后在本书第三卷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

II. 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 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

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价格总额也就增大，但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一价值总额不过表现在增大的产品总量上。可见，如果劳动时数不变，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象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例如，强度较大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不象普通强度的十二小时工作日那样，表现为 6 先令，而是表现为 7 先令、8 先令等等。显然，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 6 先令增加到 8 先令，那末这个价值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如果价值产品由 6 先令提高到 8 先令，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由 3 先令增加到 4 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格虽然提高，但不一定要超过它的价值。相反地，在劳动力价格提高时，劳动力价格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①。当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的损耗时总是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撇开一时的例外情况不说，只有在有关的产业部门的产品加入工人的日常消费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才能引起劳动力价值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剩余价值量的变化。这种限制

^① 第 4 版中是：劳动力的价值还可能降低。——编者注

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不论劳动量在外延上还是在内含上发生变化，劳动的价值产品量总要相应地随着变化，不管这个价值借以体现的物品有怎样的性质。

如果一切产业部门的劳动强度都同时相等地提高，新的提高了的强度就成为普通的社会的正常强度，因而不再被算作外延量。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会使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的应用上有所变化。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小的工作日，表现为更大的货币额。⁽¹²⁾

III. 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 不变，工作日可变

工作日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它可以缩短或延长。

1. 在假定的条件下，即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时，工作日的缩短不会使劳动力价值，从而不会使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但是它会缩小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随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下降，它的相对量，即它同劳动力价值的不变量相比的量也就下降。资本家只有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才能避免损失。

一切反对缩短工作日的陈词滥调，都认定这种现象是在这里

(12)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得到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 60 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 72 至 80 小时的工作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 年 10 月 31 日》第 65 页）通过法令进一步缩短大陆各工厂的工作日，是缩小大陆和英国的劳动时间的差距的最有效手段。

所假设的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然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在工作日缩短以前或紧随着工作日缩短以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会发生变化。⁽¹³⁾

2. 工作日的延长：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 6 小时，或劳动力价值是 3 先令，剩余劳动也是 6 小时，剩余价值是 3 先令。那末，整个工作日就是 12 小时，并表现为 6 先令的价值产品。如果工作日延长 2 小时，劳动力价格不变，那末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就随同它的绝对量一同增加。虽然劳动力价值按其绝对量来说没有变化，但就其相对量来说却降低了。在第 I 节所假设的条件下，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不发生变化，它的相对量就不可能变化。相反地，在这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的结果。

因为工作日借以表现的价值产品随着工作日的延长而增加，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等量地或不等量地增长。这种同时增长可以发生在下述两种场合：工作日绝对延长，或者工作日没有绝对延长，但是劳动强度增加了。

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力的价格尽管名义上不变，甚至有所提高，还是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我们记得，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化来计算的。⁽¹⁴⁾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

(13) “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施行，暴露出……存在着各种补偿的情况。”（《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10 月 31 日》第 7 页）

(14) “人在 24 小时内所耗费的劳动量，可以从研究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来大致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能表明动力已经消耗的情况。”（格罗夫《论物理力的相互关系》[第 308、309 页]）

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件就遭到破坏。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约的量了。

IV. 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 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很明显，在这里可能有许多种组合。可能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不变，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在同一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变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以致它们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消。其实，根据 I, II, III 节所作的解释来分析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不困难。只要顺次地把其中一个因素视为可变，把其他因素视为不变，就会得到任何一种可能的组合的结果。因此在下面我们只简单地谈谈两种重要的情况。

1. 劳动生产力降低，同时工作日延长：

这里所谈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是指这样一些劳动部门，它们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由于土壤肥力下降以及农产品相应涨价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就是一个例子。假定工作日是 12 小时，它的价值产品是 6 先令，其中一半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另一半形成剩余价值。因此，工作日划分为 6 小时必要劳动和 6 小时剩余劳动。假定由于农产品的涨价，劳动力的价值由 3 先令提高到 4 先令，因而必要劳动时间由 6 小时增加到 8 小时。如果工作日

不变，剩余劳动就会从 6 小时减少到 4 小时，剩余价值就会从 3 先令降低到 2 先令。如果工作日延长 2 小时，即从 12 小时延长到 14 小时，那末剩余劳动仍然是 6 小时，剩余价值仍然是 3 先令，但是剩余价值量同由必要劳动计量的劳动力价值相比较却下降了。如果工作日延长 4 小时，即由 12 小时延长到 16 小时，那末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量，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量不会改变。但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由 3 先令增加到 4 先令，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由 6 个劳动小时增加到 8 个劳动小时，即增加 $\frac{1}{3}$ 或 $33\frac{1}{3}\%$ 。可见，在劳动生产力降低和工作日同时延长的情况下，即使剩余价值的比例量降低，它的绝对量仍可保持不变；即使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它的比例量仍可保持不变；并且，工作日延长到一定的程度时，剩余价值的比例量和绝对量都可能增加。

在 1799 年到 1815 年期间，英国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名义工资的提高，虽然用生活资料表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威斯特和李嘉图由此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引起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结论，并且把这个仅仅存在于他们幻想之中的假定当作出发点，来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的量的关系进行重要的分析。但是在当时，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强制延长，剩余价值也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了。这正是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获得了公认时期⁽¹⁵⁾，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资本加速增长，另一方面

(15) “谷物和劳动很少会完全齐头并进，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它们就不能再互相分离。劳动阶级在物价上涨时期作出的异乎寻常的努力，引起工资下降，这种下降在证词〈1814—1815 年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的证词〉中已经得到证实。这种努力对个人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并确能促使资本增长。但是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希望这种努力永远不变地坚持下去。作为权宜之计，这种努力是十分值得赞扬的；如果这种努力永远坚持下去，其结果就和一个国家的居民在饮食上濒于绝境

需要救济的赤贫也加速增长。(16)

2. 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时工作日缩短：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因此，它们都能缩短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工作日的绝对最低界限，总是由工作日的这个必要的但能缩减的部分形成。如果整个工作日缩小到这个必要的部分，那末剩余劳动就消失了，这在资本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

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工作日就越能缩短；而工作日越是缩短，劳动强度就越能增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还随同

差不多。”（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8页注）当李嘉图等人不顾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作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是马尔萨斯为之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剥削，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特别是在战争的需求和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消失的时候。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16) “战争期间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的更加努力，也许还在于这个阶级的更加贫困。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事劳动；原来的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增加生产。”（《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年伦敦版第248页）

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单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

$$\text{I.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可变资本}} \left(\frac{m}{v} \right)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劳动力价值}}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text{II.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工作日}}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产品价值}} = \frac{\text{剩余产品}}{\text{总产品}}$$

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假地被表现出来的。假定工作日为 12 小时。根据我们前面例子

① 马克思在他校订过的法文版里，给这第一个公式加了括号，并指出，这是“因为剩余劳动的概念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里表述得不清楚”。——编者注

的其他各项假设，在这里，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就表现为如下的比率：

$$\frac{6 \text{ 小时剩余劳动}}{6 \text{ 小时必要劳动}} = \frac{3 \text{ 先令剩余价值}}{3 \text{ 先令可变资本}} = 100\%$$

但是，根据公式Ⅱ，我们却得出：

$$\frac{6 \text{ 小时剩余劳动}}{12 \text{ 小时工作日}} = \frac{3 \text{ 先令剩余价值}}{6 \text{ 先令价值产品}} = 50\%$$

这两个派生的公式实际上表示工作日或其价值产品按怎样的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如果把这些公式看作资本自行增殖程度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虚假的规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绝不能达到100%。(17) 因为剩余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始终只能是价值产品的一个部分，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价

(17) 例如，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关于这一著作，我以后还要谈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第3版补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然而洛贝尔图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书信的发表，使马克思的上述赞许不能不打一个相当的折扣。书信中说：“不仅要把资本从劳动中拯救出来，而且要把它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或国家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种薪俸的形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但薪俸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它过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也应该这样来击退…… 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代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洛贝尔图斯第48封信)——洛贝尔图斯在《社会问题书简》里的真正大胆的进攻完全为这些陈旧平庸的思想所淹没了。——弗·恩·)

值产品。二者必须相等，才能达到 $\frac{100}{100}$ 的比率。剩余劳动要看掉整个工作日（这里指一周劳动或一年劳动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劳动就必须减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也就消失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工作日}}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价值产品}}$ 这个比率永远不能达到 $\frac{100}{100}$ 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 $\frac{100+x}{100}$ 。但剩余价值率或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拿路易·德·拉维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品⁽¹⁸⁾或其价值的 $\frac{1}{4}$ ，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 $\frac{3}{4}$ ，不管这个赃物以后还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依照这个例子，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3:1，剥削率是300%。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方法，由于公式Ⅱ的应用而固定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进行比较。如果只着眼于价值产品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已经物化在价值产品中的工作日总是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价值产品的两部分——这种表现方式其实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它的意义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即掩盖了可变资本与活劳动力的交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代替的是一种协作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资本家在这种协作关系中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¹⁹⁾。

(18) 不言而喻，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所投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路易·德·拉维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

(19)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

但是，公式Ⅱ在任何时候都能再转化成公式Ⅰ。例如，如果我们知道 $\frac{6\text{ 小时剩余劳动}}{12\text{ 小时工作日}}$ ，则必要劳动时间 = 12 小时工作日减掉 6 小时剩余劳动，并得出：

$$\frac{6\text{ 小时剩余劳动}}{6\text{ 小时必要劳动}} = \frac{100}{100}$$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是：

$$\text{III.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劳动力价值}}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 \frac{\text{无酬劳动}}{\text{有酬劳动}}$$

$\frac{\text{无酬劳动}}{\text{有酬劳动}}$ 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象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 $\frac{\text{无酬劳动}}{\text{有酬劳动}}$ 这个公式只是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事情就好象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²⁰⁾ 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把它们胡说成是自由的协作形式，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例如，亚·德·拉波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作精神》(1818年巴黎版)中就是这样做的。美国人亨·凯里有时甚至把这种戏法应用于奴隶制度的关系，也收到相同的效果。

(20)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 11 页)。

因此，资本不仅象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第六篇 工 资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做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物化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末，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中包含的 12 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21)

(21) “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翻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

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22)

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 6 先令的货币价值。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 12 小时劳动获得 6 先令。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他没有为他的劳动的购买者生产剩余价值，这 6 先令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会消失，然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出卖他的劳动，而他的劳动也才成为雇佣劳动。或者工人在 12 小时劳动中获得的少于 6 先令，就是说，少于 12 小时劳动。12 小时劳动同 10 小时劳动、6 小时劳动等等相交换。不等量的这种相等，不仅消灭了价值规定。这种自我消灭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当作规律来

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或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呢绒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是由生产用呢绒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 50、51 页〕

（22）“如果你们把劳动叫做商品，那末它也还是不同于一般商品。后者最初为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和同时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按照适当的比例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来，或者不如说，劳动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 75、76 页〕

阐明或表述。(23)

从劳动分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一形式上的区别而引出较多量劳动同较少量劳动相交换，这是徒劳无益的。(24)既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所以这种做法就更加荒谬了。假定一个商品代表 6 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 3 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末，连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会降低一半。现在，这个商品所代表的只是 3 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原先 6 小时社会必要劳动了。可见，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物化形式。

实际上，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所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能再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25)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象说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

(23)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末……一定量的劳动就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的。”（爱·吉·威克菲尔德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35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230、231 页）

(24) “必须同意〈‘社会契约论’的又一翻版〉，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完成的劳动相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必须多于前者〈工人〉。”（西蒙（即西斯蒙第）《论商业财富》1803 年日内瓦版第 1 卷第 37 页）

(25) “劳动，即价值的唯一尺度……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 186 页）

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²⁶⁾

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个范畴，然后提出问题：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象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这个价格才真正是应当分析的对象。或者我们拿市场价格在一个较长时期（比如说一年）内的波动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上下的波动会互相抵消，而得出一个中等的平均量，一个不变量。这个平均量和围绕着这个平均量发生的互相抵消的偏离，自然是由不同的东西决定的。这个支配着和调节着劳动的偶然市场价格的价格，

(26) 相反地，把这些用语说成是单纯的诗人的破格权，这只能说明分析的无能。蒲鲁东说：“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针对这种说法我指出，“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34、35页¹⁸⁴）把价值了解为什么也不是，当然方便多了。这样，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东西都包括到这个范畴中去。例如，让·巴·萨伊就是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答：“物之所值。”“价格”是什么？答：“以货币表现的物的价值。”为什么“土地的劳动……具有价值？因为人们赋予它一个价格”。这就是说，价值是物之所值，而土地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用货币表现了”它的价值。总之，这是理解事物“因何”和“为何”问题的非常简便的方法。

即劳动的“必要价格”(重农学派)或“自然价格”(亚当·斯密)，也象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只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劳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通过劳动的偶然价格进到劳动的价值。然后认为，这一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但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即用来生产或再生产工人本身的费用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不自觉地代替了原来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在谈到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时，只是兜圈子，没有前进一步。可见，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样。人们研究了劳动的市场价格同它的所谓价值之间的区别，研究了这种价值同利润率、同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关系等等，但从来没有发现，分析的进程不仅已从劳动的市场价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价值，而且又把这个劳动价值本身化为劳动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结果，毫无批判地采用“劳动的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等等范畴，把它们当作所考察的价值关系的最后的、适当的用语，结果就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替庸俗经济学的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理论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

现在，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它的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工人的一定的寿命来计算的，而同工人的一定的寿命相适应的是一定长度的工作日。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 12 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先令，而这 3 先令是体现了 6 个劳动小时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工人获得了 3

先令，他就获得了他的在 12 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如果劳动力的这个日价值当作日劳动的价值来表现，那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公式：12 小时的劳动有 3 先令价值。这样一来，劳动力的价值就决定劳动的价值，或者用货币来表现，就决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那末劳动的价格也就会同它的所谓价值相偏离。

既然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那末不言而喻，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价值产品，因为资本家总是使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在上述例子中，在 12 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是 3 先令，为了再生产这一价值，劳动力需要执行职能 6 小时。可是劳动力的价值产品是 6 先令，因为劳动力实际上执行职能 12 小时，而劳动力的价值产品不是由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来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一看就是荒谬的结果：创造 6 先令价值的劳动有 3 先令价值。⁽²⁷⁾

其次，我们看到，体现工作日的有酬部分即 6 小时劳动的 3 先令价值，表现为包含 6 小时无酬劳动在内的整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或价格。于是，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奴隶劳动下，连奴隶只是用来补偿他本身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即

(27)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40 页¹⁸⁵。我曾在那指出，在考察资本时应当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

他实际上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现为好象是为主人的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²⁸⁾ 相反地，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

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

如果说世界历史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揭开了工资的秘密，那末相反地，要了解这种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买者付出一定量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物品。在这里，法的意识至多只认识物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法律上对等的公式中：“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

其次，因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量，所以“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种用语，似乎并不比“棉花的价值”、“棉花的价格”这种用语更不合理。况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

(28) 伦敦一家天真到愚蠢程度的自由贸易派机关报《晨星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再以人类所能有的义愤断言，“南部同盟”¹⁸⁶ 的黑人完全是白白地劳动的。最好请它把这种黑人的一天的费用同例如伦敦东头的自由工人的一天的费用比较一下。

的劳动以后被支付报酬的。而货币充当支付手段，是在事后才实现所提供的物品的价值或价格的，在这里就是实现所提供的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最后，工人提供给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不是他的劳动力，而是劳动力的职能，即一定的有用劳动，裁缝劳动，鞋匠劳动，纺纱劳动等等。至于这种劳动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价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种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区别的属性，这一点却是普通意识所不能领会的。

让我们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来看，他以 12 小时劳动获得 6 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比如说 3 先令，对他说来，他的 12 小时劳动实际上是 3 先令的购买手段。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可以随着他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从 3 先令提高到 4 先令或降低到 2 先令。或者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它的价格可以因供求关系的变化，从 3 先令提高到 4 先令或降低到 2 先令。但是不管怎样，他付出的始终是 12 个劳动小时。因此，在他看来，他所获得的等价物的量的任何变化，都必然表现为他的 12 个劳动小时的价值或价格的变化。由于这种情况，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亚·斯密⁽²⁹⁾就反过来得出一个错误的论断：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虽然生活资料的价值会变化，因而对工人来说，同一个工作日会表现为较多或较少的货币。

另一方面我们拿资本家来说。他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因此，他实际上所关心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他力图尽可能便宜地购买一切商品，并且总是把低于价值购买和高于价值出售

(29) 亚·斯密只是在谈到计件工资时，才偶然地隐约提到工作日的变化。

这一纯粹欺诈行为说成是他的利润的来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他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末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不会转化为资本。

此外，工资的实际运动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证明被支付的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它的职能即劳动本身的价值。这些现象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工资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租用机器一周的费用比租用一天要贵，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机器的价值，而是机器功能的价值。第二，执行同一职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资间存在着个人的差别。这种个人的差别在奴隶制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奴隶制度下，劳动力本身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出卖的，这种差别没有引起任何幻觉。区别只是在于：劳动力因超过平均水平而获得的利益或因低于平均水平而遭到的损失，在奴隶制度下落到奴隶主身上，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则落到工人自己身上，因为在后一种场合，劳动力是由工人自己出卖的，而在前一种场合，是由第三者出卖的。

总之，“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

工资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情况从那些过分注重材料而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这里要简单地说明一下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形式。

我们记得，劳动力总是按一定时期来出卖的。因此，直接表现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转化形式，就是“计时工资”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资等等。

首先应当指出，在第十五章叙述过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的规律，只须改变一下形式，就转化为工资规律。同样，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由这个价值转变成的生活资料的量之间的区别，现在则表现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区别。在本质形式上已经阐明的事情，再在表现形式上重复一遍，那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说明计时工资的若干特点。

工人靠日劳动、周劳动等等得到的货币额⁽³⁰⁾，形成他的名义的即按价值计算的工资额。但是很明显，依照工作日的长短，即依

(30) 这里总是假定货币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

照工人每天所提供的劳动量，同样的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可以代表极不相同的劳动价格，也就是说，可以代表对同量劳动所支付的极不相同的货币额。⁽³¹⁾因而，在考察计时工资时必须再把工资总额，即日工资、周工资等等的总额和劳动价格区别开来。但怎样得出这个价格，即一定量劳动的货币价值呢？劳动力的日平均价值除以平均工作日的小时数，就得出平均的劳动价格。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即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工作日为12小时，那末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 $\frac{3\text{先令}}{12} = 3\text{便士}$ 。这样得出的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劳动价格的单位尺度。

由此可见，即使劳动价格不断下降，日工资、周工资等等仍然可以保持不变。例如，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末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 $3\frac{3}{5}\text{便士}$ ；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3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 $2\frac{2}{5}\text{便士}$ 。虽然如此，日工资或周工资仍旧不变。反之，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甚至下降，日工资或周工资也可以增加。例如，一个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末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 $3\frac{3}{5}\text{便士}$ 。如果由于工作量增加，工人按照原来的劳动价格劳动12小时，那末他的日工资就增加到3先令 $7\frac{1}{5}\text{便士}$ ，而劳动价格没有变化。如果不是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而是增加劳动的内含量，那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³²⁾因此，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提高的同时，

(31) “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页）威斯特是《论资本用于土地》（牛津大学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1815年伦敦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匿名著作的作者。

(32) “工资决定于劳动价格和完成的劳动量……工资的增加不一定包含着劳

劳动价格可以不变或下降。这也适用于工人家庭的收入，只要家长提供的劳动量是靠家庭成员的劳动而增加的。因此，存在着不减少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而降低劳动价格的各种方法。(33)

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末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末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即 1 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劳动力的日价值除以普通工作日的小时数所得之商。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 12 小时，而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先令，即 6 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这种情况下，1 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 3 便士，它的价值产品是 6 便士。如果工人现在一天就业不足 12 小时（或者一周不足 6 天），比如说只有 8 小时或 6 小时，那末按这个劳动价格计算，他只

动价格的提高。在劳动时间较长和劳动较紧张的情况下，工资可以大大增加，而劳动价格却可以保持不变。”（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 年伦敦版第 67、68 和 112 页）不过关于“劳动价格”是怎样决定的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威斯特却用陈词滥调搪塞过去了。

(33) 十八世纪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狂热的辩护士、我们多次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把问题阐述得很混乱：“由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是劳动的量，而不是劳动的价格（他把劳动价格理解为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如果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你们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劳动的量…… 工厂主们知道，除了改变劳动价格的名义数额以外，还有各种提高或降低劳动价格的方法”（《论手工业和商业》第 48 和 61 页）。纳·威·西尼耳在他的《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 年伦敦版）中不加引号地利用了威斯特的著作，比如他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工资的数量”（第 15 页）。这就是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他所得到的东西，即工资的名义数额，而不是他所给予的东西，即劳动的量！

能得到 2 先令或 $1\frac{1}{2}$ 先令的日工资。⁽³⁴⁾ 因为根据假定，工人要生产出一个只是和他的劳动力价值相适应的日工资，一天必须平均劳动 6 小时，又因为根据同一假定，他在每小时内只有一半时间是为自己劳动，而另一半时间是为资本家劳动，所以很清楚，如果他就业不足 12 小时，他就不能挣得 6 小时的价值产品。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过度劳动的破坏性后果，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工人由于就业不足所遭受的苦难的源泉。

如果小时工资是用下述办法来确定的，即资本家不承担支付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义务，而只是愿意雇用工人多少劳动小时就支付多少小时的报酬，那末，资本家就能使工人就业的时间少于原先作为计算小时工资或劳动价格的计量单位的基础的那个时间。因为这种计量单位是由 $\frac{\text{劳动力的日价值}}{\text{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 这个比率确定的，所以，一旦工作日不再包含一定的小时数，这种计量单位自然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联系就被消除了。现在资本家不让工人做满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能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他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人任何相应的补偿。因此，伦敦建筑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强制实行这种小时工资的企图，发动了一次完全合理的暴动（1860 年）。法律对工

(34) 这种异常的就业不足的影响是和法律强制普遍缩短工作日的影响完全不同的。前者与工作日的绝对长度无关，它可以在 15 小时工作日上发生，同样也可以在 6 小时工作日上发生。正常的劳动价格，在第一种场合是按照工人平均每天劳动 15 小时来计算的，在第二种场合，是按照他平均每天劳动 6 小时来计算的。因此，如果他在第一种场合只就业 $7\frac{1}{2}$ 小时，在第二种场合只就业 3 小时，那末结果就会相同。

作目的限制结束了这种不正当的作法，不过，这种限制当然没有消灭由于机器的竞争、由于所使用的工人在质量上的改变以及局部的和普遍的危机而产生的就业不足的现象。

在日工资或周工资增加的情形下，劳动价格可以在名义上保持不变，甚至降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只要劳动价格或劳动小时的价格不变，而工作日超出它的普通长度，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 $\frac{\text{劳动力的日价值}}{\text{工作日}}$ 这一分数中，如果分母增大，分子就会更快地增大。由于劳动力的损耗，劳动力的价值会同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一起增加，而且前者增加的比例比后者更快。因此，在计时工资占统治地位而劳动时间又不受法律限制的许多产业部门中，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把达到一定点（比如满 10 小时）的工作日当作是正常的（«normal working day» [“正常的工作日”]，«the day's work» [“日劳动”]，«the regular hours of work» [“正规的劳动时间”]）。超过这个界限的劳动时间形成额外时间，并且以小时为计量单位付以额外报酬，虽然额外报酬往往低得可怜。⁽³⁵⁾ 正常工作日在这一些是作为实际工作日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就全年来说，实际工作日往往比正常工作日要长。⁽³⁶⁾ 在英国各种产业部门中，在工作日的延长超出一定正常界限时，劳动价格的增长造成了这

(35) “额外时间的报酬率（在花边制造业中）非常低，每小时 $\frac{1}{2}$ 便士等等，以致同它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力所造成巨大损害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不仅如此，这样挣得的一点点额外报酬往往又不得不耗费在额外的饮食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2 号报告》第 XVI 页第 117 号）

(36) 例如，在壁纸印刷业中，在工厂法最近实行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劳动，连吃饭的间歇时间也没有，结果 10 个半小时的日工到下午 4 点半就完了，此后就全是额外时间，这种时间很少在下午 6 点以前结束，因此，实际上我们终年都在做额外时间的工作。”（斯密先生的证词，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1 号报告》第 125 页）

样一种情况：所谓正常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很低，这就迫使那些想挣得足够工资的工人在额外时间去做报酬较高的工作。⁽³⁷⁾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快意的事情。⁽³⁸⁾

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³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通过 1839 年到 1859 年二十年间的比较观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观察，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厂中，工资提高了，而在每天工作 14 到 15 小时的工厂中，工资下降了。⁽⁴⁰⁾

(37) 例如，在苏格兰的漂白业中就是这样。“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这种行业<在 1862 年工厂法实行以前>是按额外时间的制度经营的，即把 10 小时当作正常的工作日。在这段时间内每人得到 1 先令 2 便士。但是每天还有 3 或 4 小时额外时间，每小时的报酬是 3 便士。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只在正常时间内劳动的人，只能挣得 8 先令的周工资。不在额外时间做工，工资是不够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4 月 30 日》第 10 页）这种“额外时间的额外报酬，是工人无力抗拒的一种诱惑”（《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4 月 30 日》第 5 页）。伦敦西蒂的书籍装订业雇用了许多 14、15 岁的少女，而且还订有学徒合同，规定了一定的劳动小时。尽管如此，在每月的最后一周，她们还是要同较年长的男工混杂在一起，一直劳动到夜半 10、11、12 点，甚至到 1 点。“业主以额外工资和一顿丰富的夜餐钱来引诱她们”，这顿夜餐，她们是在附近的酒馆中吃的。在这些“年青的永生者”中间因此产生了十分放荡的行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5 号报告》第 44 页第 191 号），不过这些行为，由于她们除了其他书籍外还装订了大量的圣经和宗教书籍而得到了补偿。

(38)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4 月 30 日》第 5 页。在 1860 年大罢工和同盟敬业中，伦敦建筑工人对事态作了完全正确的判断，他们声明，只有在下述两个条件下才愿意接受小时工资：1. 在规定劳动小时价格的同时，也要规定以 9 小时或 10 小时为正常工作日，而且 10 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要高于 9 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2. 超过正常工作日的每一小时都是额外时间，要相应地付给较高的报酬。

(39) “此外，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通常劳动时间长的地方，工资就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10 月 31 日》第 9 页）“只能挣得饥饿工资的劳动大多是过长的。”（《公共卫生。第 6 号报告。1863 年》第 15 页）

(4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 年 4 月 30 日》第 31、32 页。

从“在劳动价格已定时，日工资或周工资决定于所提供的劳动量”这一规律中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价格越低，工人为了保证得到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资而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41)

但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反过来又会引起劳动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下降。

劳动价格由劳动力的日价值来决定这个事实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补偿，单是工作日的延长就会降低劳动价格。但是那些使资本家能够长期延长工作日的情况，最初使他能够，最后则迫使他也在名义上降低劳动价格，以致劳动时数增加了，但总价格即日工资或周工资反而下降了。这里只要指出两种情况就够了。如果一个人完成一个半人或两个人的工作，那末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不变，劳动的供给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42) 但是这种对异常的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无酬劳动量的支配权，很快就会成为资本家本身之间的竞争

(41) 例如，英国手工制钉业工人，由于劳动价格低廉，每天要劳动 15 小时才能挣得极可怜的周工资。“他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要干许多小时，才能挣得 11 便士或 1 先令，而且从中还要扣除 $2\frac{1}{2}$ 到 3 便士，以补偿工具的磨损、燃料的耗费和铁屑的耗损。”(《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3 号报告》第 136 页第 671 号) 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女工只能挣得 5 先令的周工资(同上，第 137 页第 674 号)。

(42) 例如，一个工厂工人如果拒绝象通常那样干较多的时数，“他很快就会被任何一个不论干多长时间都愿意的工人所代替，这样他就会失业”(《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10 月 31 日》，证词第 39 页第 58 号)。“如果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利润率通常会提高……因为这种追加的劳动供给，压低了劳动的价格。”(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 年伦敦版第 15 页)

手段。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是由劳动价格构成的。劳动价格的无酬部分不需要计算在商品价格内。它可以赠送给商品购买者。这是竞争促成的第一步。竞争迫使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异常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异常低廉的商品出售价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最初是偶然的，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从此成为劳动时间过长而工资极低的不变基础，而原先它却是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只是指出这一运动，因为分析竞争不是这里要做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听一下资本家本人的自白。

“在北明翰，业主之间的竞争是这样激烈，以致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不得不以雇主的身分做我们平素感到可耻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多赚钱，而只是让公众从中得到好处。”(43)

我们记得伦敦有两种面包房老板，一种是按全价出售面包，另一种是低于正常价格出售面包。“全价出售者”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指责他们的竞争者说：

“他们能够存在，首先就是靠欺骗公众〈商品掺假〉，其次是靠从工人身上榨取 18 小时的劳动而支付 12 小时的工资…… 工人的无酬劳动是用来进行竞争的手段…… 面包业主之间的竞争是夜间劳动难以废除的原因。低价出售者低于成本价格（它随着面粉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出售面包，但他并没有受到损失，因为他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劳动。如果我从工人那里只取得 12 小时劳动，而我的邻居却取得 18 或 20 小时劳动，那末，他必然会在出售价格上把我击败。如果工人能坚持要求支付额外时间的报酬，这种手法立刻就会完蛋…… 低价出售者雇用的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少年和其他人，他们被迫满足于几乎任何一种他们所能得到的工资。”(44)

(4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3 号报告》，证词第 66 页第 22 号。

(44)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 年伦敦版第 LII 页

这种诉苦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它表明：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的只是生产关系的假象。资本家不知道，劳动的正常价格也包含着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并且正是这种无酬劳动是他的利润的正常源泉。剩余劳动时间这个范畴对他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剩余劳动时间包含在正常的工作日之内，而后者在他看来已经在日工资中支付了。但是，额外时间，即工作日超过与普通的劳动价格相适应的界限的延长部分，对他来说却是存在的。为了对付他的低价出售的竞争者，他甚至主张对这种额外时间支付额外报酬。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这种额外报酬，和普通的劳动小时的价格一样，也包含着无酬劳动。例如，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一个小时价格是3便士，即 $\frac{1}{2}$ 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一个额外劳动小时的价格是4便士，即 $\frac{2}{3}$ 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第一种场合，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 $\frac{1}{2}$ 个劳动小时，在第二种场合，无偿地占有了 $\frac{1}{3}$ 个劳动小时。

和同一报告，证词第479、359、27号。不过，全价出售者，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而且象他们的代言人贝奈特本人所承认的，也让他们的工人“在晚上11点钟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干活，并且往往延长到第二天晚上7点钟”（同上，第22页）。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

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乍一看来，似乎工人出卖的使用价值不是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即活的劳动，而是已经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似乎这种劳动的价格不是象计时工资那样，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分数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者的工作效率来决定的。(45)

首先，两种工资形式在同一些行业中同时并存的事实，剧烈地动摇着对这种假象的信念。例如：

“伦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在他们那里是例外。相反地，各地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是例外。伦敦港口的造船工人拿计件工资，英国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则拿计时工资。”(46)

(45) “计件劳动制度标志着工人史上的一个时代；它是介于受资本家意志支配的普通短工的地位和不久的将来有希望一身兼任手工业者和资本家的合作手工业者之间的阶段。计件工人虽然靠企业主的资本从事劳动，实际上是自己的雇主。”（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2、53页）我引用这本小册子，是因为它是一切早已陈腐的辩护滥调的真正臭水坑。就是这位瓦茨先生，以前曾热中于欧文主义，并在1842年发表过另外一本小册子《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在那里，他说财产就是掠夺。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6) 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页。

在伦敦，同一些马具工场中，就同一种劳动来说，往往对法国人支付计件工资，对英国人支付计时工资。在普遍实行计件工资的真正工厂中，个别劳动职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能按件计算，因而按计时工资来支付。⁽⁴⁷⁾ 不过很清楚，工资支付形式的区别丝毫没有改变工资的本质，虽然其中一种形式可以比另一种形式更有利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假定普通工作日为 12 小时，其中 6 小时是有酬的，6 小时是无酬的。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假定是 6 先令，从而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是 6 便士。假定经验表明，一个具有平均劳动强度和技能，因而在生产一种物品时实际上只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人，在 12 小时内提供 24 件产品，不管它们是一个个可分离的产品，还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制品的可以分别计量的部分。这样，这 24 件产品的价值，扣除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为 6 先令，每件产品的价值为 3 便士。工人每件得 $1\frac{1}{2}$ 便士，所以 12 小时得 3 先令。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不管是假定工人 6 小时为自己劳动，6 小时为资本家劳动，还是假定他每小时一半为自己劳动，一半为资本家劳动，都是没有区别的；同样在这里，不管是说每一件

(47)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这两种工资形式的同时并存多么有利于工厂主进行欺诈：“一个工厂雇了 400 个人，其中一半是拿计件工资的，劳动时间长一些对他们有直接利益。另外 200 人是按日支付报酬的，他们劳动的时间与计件工人一样长，但是他们的额外劳动时间得不到任何报酬…… 这 200 个人每天在半小时内多干的活，就等于 1 个人在 50 小时内或一个人在一周期劳动的 $\frac{5}{6}$ 的时间内所干的活，这对于企业主有明显的好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 年 10 月 31 日》第 9 页）“额外劳动仍旧非常盛行。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法律本身就提供了保障，使这种现象不致被揭发出来而受到惩处。在以前许多报告中，我一再指出……所有那些不是领取计件工资而是领取周工资的工人受到怎样不公平的待遇。”（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 年 4 月 30 日》第 8、9 页）

产品一半是有酬的，一半是无酬的，还是说12件产品的价格只是补偿劳动力的价值，而另外12件产品体现为剩余价值，也是没有区别的。

计件工资的形式同计时工资的形式一样是不合理的。例如，两件商品，扣除其中耗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值6便士，而工人由此得到3便士的价格。计件工资实际上不直接表现价值关系。在这里，不是一件商品的价值由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相反地，工人耗费的劳动是由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件数来计量。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劳动由劳动的直接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则由在一定时间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的数量来计量。⁽⁴⁸⁾劳动时间本身的价格最终决定于这个等式：日劳动价值=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计件工资的特点。

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

计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只有体现在一个预先规定的并由经验确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时间，才被看作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当作这种劳动时间来支付报酬。因此，在伦敦较大的裁缝工场中，把某件产品，例如一件背心等等，叫作一小时或半小时等等，每小时付给6便士。从实践

(48) “工资有两种计算方法，或者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或者是按劳动产品来计算。”（《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第32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热·加尔涅。

中知道，一小时的平均产品是多少。在做时装、改衣服等等时，雇主和工人之间常常会为某件产品是否等于一小时等等发生争执，最后还是要由经验来解决。在伦敦的家具制造厂等部门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⁴⁹⁾

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在这里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那末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计件工资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说的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也形成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后一种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寄生者的中间盘剥即包工制（sub-leasing of labour）更容易实行。中间人的利润完全来自资本家支付的劳动价格和中间人实际付给工人的那部分劳动价格之间的差额。⁽⁵⁰⁾ 在英国，这种制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 «sweating-system»（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在手工工场是组长，在矿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以便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⁵¹⁾

(49) “交给他〈纺纱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重量的有一定精细程度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酬。如果产品的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应完成的最低限度，他就会被解雇，就会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第316、317页）

(50) “如果一件劳动产品要经过许多人的手，他们都要从中分取利润，而只有最后一双手才从事劳动，那末女工最后得到的报酬就微乎其微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LXX页第424号）

(51) 甚至辩护士瓦茨也说：“如果在一项工作中所有被雇用的人都成为合同的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51a) 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⁵²⁾ 这就会引起那种在研究计时工资时已经指出过的反作用，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降。

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除少数例外，通常是对同样的职能支付同样多的工资；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虽然劳动时间的价格是由一定量的产品来计量的，但日工资或周工资却因工人的个人差别而变化，因为某一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只提供最低限额的产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数额的产品，第三个工人则提供超过平均数

参加者，每个人都量力而为，而不是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他的同伴去从事过度劳动，那末这会是计件工资制的一个重大改进。”（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3页）关于这个制度的害处，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66页第22号，第11页第124号，第XI页第13、53、59号等等。

^(51a) 这种自然的结果往往人为地得到助长。例如，伦敦的机器制造业中惯用的诡计是：“资本家挑选一名特别强壮和灵巧的人做一定数量工人的头头。每到一个季度或其他期限就付给他以追加工资，条件是他拼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领取普通工资的同伴也跟着拼命地干……”这不用进一步解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要抱怨说，“工联限制活动，限制卓越的技能和劳动力”。（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23页）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工人和工联书记，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话过于夸张。但是请看一看，比如说，约·查·摩尔顿的“受人推崇的”农业百科全书吧，在“工人”一条里，这个方法是当作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向租地农场主们推荐的。

⁽⁵²⁾ “所有拿计件工资的人……由于劳动超过法定界限而获得利益。这种从事额外时间的劳动的愿望，在织布女工和络纱女工中间尤为常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这种计件工资制对资本家非常有利……它直接促使少年陶工在四、五年内从事过长的额外劳动，而得到的却是按低价支付的计件工资。这是引起陶工身体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XIII页）

额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⁵³⁾当然，这绝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一，就整个工场来说，个人的差别会互相抵消，所以，整个工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会提供一个平均的产品量，而支付的总工资也是本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工资和剩余价值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因为各个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同他们各自的工资相适应的。但是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种计件工资根据长期的传统已经固定下来，因而特别难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会破例地把计件工资强行改成计时工资。例如，1860年考文垂织带工人大罢工就是由此引起的。⁽⁵⁴⁾最后，计件工资是

(53) “如果在某个行业劳动是按单价计件支付报酬……那末各个工人的工资在数量上就会有很大差别……但就日工资来说，通常都有一个统一的数额……雇主和工人都把这个数额看作是该行业的中等工人的标准工资。”（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17页）

(54) “手工业帮工的劳动，是按日或按件规定的……从事每种手艺的工人一天能完成多少工作，业主大体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们往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付给工人报酬；这样，即使没有监督，这些帮工为了切身利益也会尽量劳动。”（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85页和第202页。第1版于1755年出版）可见，魁奈、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和亚·斯密曾充分利用过的康替龙，在这里已经把计件工资看作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在康替龙著作的法文版的扉页上注明系译自英文，但是该书的英文版《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菲力浦·康替龙著，选自一位已故的伦敦西蒂商人的手稿）不仅出版日期较晚（1759年），而且按其内容来说，也表明是后来的修订版。例如，在法文版中还没有提到休谟，而在英文版中，配第的名字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英文版在理论上的价值比较小，但是其中关于英

上一章叙述的计时制的主要支柱。(55)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虽然计件工资绝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十四世纪，它就已经与计时工资一起正式列入英法两国的劳工法中，但是只是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才得到比较广阔的活动场所。在大工业的狂飙时期，特别是从1797年至1815年，计件工资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的手段。我们从蓝皮书《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1813年至1814年议会会期)和《上院委员会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报告》(1814年至1815年会期)中，可以找到有关当时工资变动的十分重要的材料。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自从反雅各宾战争开始以来劳动价格不断下降的证明文件。例如，在织布业中计件工资下降得很厉害，尽管工作日已经大大延长，但日工资仍旧低于以前的水平。

“织布工人的实际收入比从前大为减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优越性以前是很大的，而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实上，熟练劳动和普通劳动的工资间的差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小得多。”(56)

随着计件工资的实行而增加的劳动强度和长度，对农业无产

国贸易、贵金属贸易等等的各种专门材料，却是法文版所没有的。因此，英文版扉页上注明的本书“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加以改编”等字样，看来并不完全是当时所流行的虚构手法。¹⁸⁷

(55)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工场雇用的工人远远超过工作上的实际需要吗？雇主雇用工人往往是为了期待某种无法预料的、有时甚至完全是想象的工作。既然雇主支付计件工资，所以他说他并不冒任何风险，因为一切时间上的损失完全由没有活干的人承担。”(昂·格里哥瓦尔《布鲁塞尔违警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第9页)

(56)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1815年伦敦版第48页。

阶级毫无好处，这从一本维护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利益的书中摘录出来的下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农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周工资约为 12 先令；虽然可以假定，一个人在采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由于劳动有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多挣 1 先令或许 2 先令，但是在计算他的总收入时就会发现，他在一年中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抵销了这一增加部分……一般说来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人的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着一定的比例，所以有两个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区的救济而维持一家的生活。”(57)

当时马尔萨斯就议会公布的事事实说过：

“我承认，我看到计件工资的广泛采用，感到不愉快。在较长的时期内每天从事 12 或 14 小时实在繁重的劳动，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58)

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内，一般都采用计件工资，因为在这里，资本只能从强度方面扩大工作日。(59)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同一产品量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也会改变。于是计件工资也会改变，因为计件工资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价格表现。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说，12 小时内生产出 24 件产品，12 小时的价值产品是 6 先令，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先令，一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 3 便士，每件产品的工资是 $1\frac{1}{2}$ 便士。每件产品吸收了 $\frac{1}{2}$ 个劳动小时。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同一个工作日现在提供的产品不是 24 件，而是 48 件，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的条件下，

(57) 《大不列颠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抗辩》1814 年伦敦版第 4、5 页。

(58) 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 年伦敦版〔第 49 页注〕。

(59) “拿计件工资的工人，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 $\frac{4}{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 年 4 月 30 日》第 9 页）

计件工资就会由 $1\frac{1}{2}$ 便士降低到 $\frac{3}{4}$ 便士，因为现在每件产品所代表的已经不是 $\frac{1}{2}$ 个劳动小时，而只是 $\frac{1}{4}$ 个劳动小时。 $24 \times 1\frac{1}{2}$ 便士 = 3 先令，同样 $48 \times \frac{3}{4}$ 便士 = 3 先令。换句话说，计件工资的下降是与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件数的增加成比例的⁽⁶⁰⁾，从而，是与耗费在同一件产品上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成比例的。计件工资的这种变动虽然纯粹是名义上的，但也会引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经常不断的斗争：或者是因为资本家以此为借口来实际降低劳动的价格，或者是因为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是因为工人当真看待计件工资的假象，认为被支付的是他的产品，而不是他的劳动力，因此反对在商品的出售价格没有相应地降低的情况下降低工资。

“工人仔细地注视着原料的价格和制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够准确地估计他们的雇主的利润。”⁽⁶¹⁾

资本有权拒绝这种要求，认为这是对雇佣劳动的性质的粗暴歪曲。⁽⁶²⁾ 它痛斥这种要对产业进步课税的狂妄企图，并且断然宣

(60) “他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准确计算好了的，靠这种机器完成的劳动的报酬，随着这种机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虽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尤尔《工厂哲学》第317页）可是尤尔自己又把后面那句辩护的话否定了。他承认，例如在走锭精纺机加长的时候，这种加长就会引起追加劳动。可见，劳动不是按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程度减少。其次，“由于这种加长，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 $\frac{1}{5}$ 。这样一来，纺纱工完成的工作将不能按从前的工资率付给报酬，但是由于他的工资率不是减少 $\frac{1}{5}$ ，于是这种改良也就提高了工人在一定数量劳动小时中的货币工资”。但是，但是“上述情况需要有一个限制条件……纺纱工必须从自己的追加收入6便士中拿出一部分来付给追加的未成年的助手，此外，还有一部分成年工人被挤掉了”（同上，第320、321页），这一事实决不能说明工资有提高的趋势。

(61)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和伦敦版第178页。

(62) 在1861年10月26日伦敦的《旗帜报》上，载有一篇关于约翰·布莱特公司

称劳动生产率与工人毫不相干。(63)

诉讼案的报告。该公司向罗契得尔治安法官“控告地毯业工联代表，说他们进行恐吓。布莱特公司的股东采用了一种新机器，用以前生产 160 码地毯所需的时间和劳动(1)，现在可以生产 240 码。工人对于企业主因投资于机器改良而获得的利润没有任何参与分配的权利。因此，公司老板提议把每码的工资从 $1\frac{1}{2}$ 便士降低到 1 便士，这样，工人以同量劳动所得的收入仍和以前完全一样。这只是名义上的降低。关于这件事，据说事先没有老实地告诉工人”。

(63)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力图分享改良机器所带来的利润！〈多么可怕啊！〉…… 他们因为劳动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对产业改良课税。”(《论工会》1834 年伦敦新版第 42 页)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第十五章，我们考察了可以引起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或相对量(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量)发生变化的种种组合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借以实现的生活资料量，又可以发生与这一价格的变动无关⁽⁶⁴⁾或不同的运动。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把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换成外在的工资形式，那里的一切规律就会转化为工资运动的规律。在这一运动中表现为各种变动着的组合的情况，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会表现为国民工资的同时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即使作最肤浅的比较，首先也要求把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平均日工资化为长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对日工资作了这样换算以后，还必须把计时工资换算为计件工资，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内含量的尺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

(64) “因为用工资能买到更多更便宜的物品，就说工资〈这里指工资的货币表现〉提高了，这是不正确的。”(大卫·布坎南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14年版第1卷第417页)

动，在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64a) 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

^(64a) 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

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65)

1833年工厂委员会委员约·伍·考威尔，曾对纺纱业作了仔细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

“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大陆高，但是对于工厂主说来，实际上比大陆低。”(尤尔《工厂哲学》第314页)

英国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在1866年10月31日的工厂报告中，根据同大陆各国比较的统计材料指出，大陆的劳动，尽管工资较低，劳动时间也长得多，但是同产品相比较，还是比英国贵。奥登堡一家棉纺织厂的一位英国经理说，那里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星期六也不例外，而当地工人即使在英国监工的监视下在这个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也比英国工人在10小时内提供的产品少，要是在德国监工的监视下，那还要少得多。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在许多场合低50%，但是同机器相比的工人数却要比英国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门达5:3。雷德格雷夫先生提供了有关俄国棉纺织厂的非常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一位不久前还在俄国工厂任职的英国经理提供给他的。在这块充满种种

(65) 詹姆斯·安德森在同亚·斯密论战时说过：“同样应当指出，虽然在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便宜的贫国中，劳动价格表面上通常较低，其实在那里，劳动价格实际上大都比其他国家高。因为工人每日获得的工资，虽然是劳动的表面价格，但是并不代表劳动的实际价格。实际价格是已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企业主实际上花去的费用。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虽然谷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贫国通常比在富国低得多……按日计酬的劳动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贱得多……而按件计酬的劳动一般在英格兰较贱。”(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第350、351页)——相反地，工资的低廉又引起劳动的昂贵。“劳动在爱尔兰比在英格兰贵……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皇家铁道委员会记录》1867年第2074号)

丑事的俄国土地上，英国工厂幼年时期的那些陈旧的骇人听闻的现象还非常盛行。管理人当然都是英国人，因为当地的俄国资本家不会管理工厂。尽管工人从事过度劳动，夜以继日地干活，而报酬却微乎其微，但是俄国的工业品仍然只有在禁止外国货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站住脚。最后，我还要举出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一张关于欧洲各国每个工厂和每个纺纱工人的平均纱锭数的比较表。雷德格雷夫先生本人指出，这些数字是他几年以前收集的，从那时以来，英国工厂的规模和每个工人的纱锭数都扩大了。但是他假定，所列举的大陆国家也有了同样程度的进步，因此这些数字材料仍然有比较的价值。

每个工厂的平均纱锭数

英 格 兰	12 600
瑞 士	8 000
奥 地 利	7 000
萨 克 森	4 500
比 利 时	4 000
法 国	1 500
普 鲁 士	1 500

每个工人的平均纱锭数

法 国	14
俄 国	28
普 鲁 士	37
巴伐利 亚	46
奥 地 利	49
比 利 时	50
萨 克 森	50

德意志各小邦.....	55
瑞 士.....	55
大不列颠.....	74

雷德格雷夫先生说：

“这一比较对大不列颠是不利的，除了别的原因以外，特别是因为在大不列颠，有许多工厂是兼营机器织布业和纺纱业的，而在计算时，连一个织工也没有除去。相反地，外国工厂大多只经营纺纱业。如果能够拿同样的情况进行精确比较，我就可以从我的管区中举出许多棉纺厂，在这些工厂里，只要一个男工和两个女助手就能看管几台共有 2 200 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每天生产出重 220 磅、长 400 哩的棉纱。”（散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 年 10 月 31 日》第 31—37 页）

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些公司在东欧和亚洲承包过铁路建筑工程，它们除了使用当地工人外，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英国工人。它们迫于实际的需要，就不得不考虑劳动强度的国民差异，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受到任何损失。它们根据经验知道，即使工资水平多少同中等劳动强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劳动的相对价格（同产品相比较的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变动的。

亨·凯里在他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论工资率》⁽⁶⁶⁾ 中企图证明，不同的国民工资同各国工作日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以便从这种国际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即使凯里没有象往常那样把毫无批判地、表面地拼凑起来的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最妙的是，他并不认为，事物实际上是同理论上所说的一样。正是

⁽⁶⁶⁾ 《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

国家的干涉歪曲了这种自然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计算国民工资时，似乎必须把工资中以税收的形式归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是归工人自身所有的。凯里先生难道不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这种“国家费用”不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果实”吗？这样的推论对这样的人说来是十分相称的：他起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自由的、和谐的作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可是后来他发现，英国对世界市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中产生的），使国家干涉即通过国家来保护那些“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就是使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成为必要。其次他发现，李嘉图等人用来表述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的产物，相反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实对立倒是李嘉图等人的理论的结果！最后，他发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只有一个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装博学的人（尽管他相信保护关税的异端邪说），才配成为一位名叫巴师夏的人和现代自由贸易派其他一切乐观主义者的和谐智慧的秘密源泉。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就是包含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接着，这些商品必须再投入流通领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为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通过同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就形成资本流通。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下面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要在第二卷里进行。

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

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来研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场；既不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作所有参加分赃的人的代表。总之，我们首先抽象地来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此外，只要积累在进行，资本家就是在出售所生产的商品，并把出售商品所取得的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其次，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丝毫也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以及使它成为积累要素的那些必要条件。不管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给别人剩余价值的比例如何，他总是最先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们在说明积累时假定的情况，也就是积累进行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运动模糊了积累过程的基本形式。因此，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构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

第二十一章 简 单 再 生 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由于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 100 镑预付

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 20 镑剩余价值，那末，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¹⁾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这种重复或连续性，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产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经济学家的公式 II，这个公式把工资表现为产品本身的一部分。⁽²⁾

(1) “消费别人劳动产品的富人，只有通过交换行为〈购买商品〉才能获得这种产品。因此，他们似乎很快就会花光自己的准备金……但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财富获得了一种通过别人劳动而再生产出来的力量…… 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动，每年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来源于资本的收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 1 卷第 81、82 页）

(2) “工资和利润一样，都应该看成成品的一部分。”（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 142 页）“产品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属于工人。”（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1823 年巴黎版第 33、34 页）

这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再生产的产品中不断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当然，资本家用货币把这个商品价值支付给工人。但这些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他以前的一部分产品就再转化为货币。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他们用来领取由工人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物化劳动预付给工人。⁽³⁾以徭役农民为例。比如说，他每周3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3天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他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而这一劳动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为换取他的劳动而预付的支

(3) “当资本用于预付给工人的工资时，它丝毫不增加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
(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22页)

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劳动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农民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搜为已有，那末，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 6 天，3 天为自己，3 天为现在变为雇主的过去的地主。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要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仍要进入再生产。但是，既然徭役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徭役农民和过去一样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预付给徭役农民的资本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⁴⁾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4a)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

(4) “工人的生活资料由资本家预付给工人地方，在地球上还不到四分之一。”（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 年哈特福版第 36 页）

(4a) “manufacturer（即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雇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费什么，因为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增大的价值中又被创造出来。”（亚·斯密《国富论》第 2 篇第 3 章第 355 页）

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 1 000 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 200 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五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 = 5×200 ，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 1 000 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末，在生产过程重复十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 $10 \times 100 = 1 000$ 。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别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末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末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所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所有者。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象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量，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⁵⁾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

(5) “这就是生产消费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中所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42页）可是詹姆斯·穆勒并没有说明这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

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⁶⁾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就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者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时，有些场合已经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但是，这表现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无关的无谓消耗。⁽⁷⁾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阶

(6) “确实，一种工场手工业最初采用时，会使许多贫民得到工作；但他们依然贫穷，而且这种工场手工业的继续经营又会造成更多的贫民。”《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第19页“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31页

(7) 要是罗西真正识破“生产消费”的秘密，他就不会在这一点上如此夸夸其谈了。

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⁸⁾

(8) “南美洲矿工每天的劳动（也许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劳动），就是把重180—200磅的矿石从450呎深的地下背到地面上来，但他们只靠面包和豆子过活；他们宁愿只吃面包，但他们的雇主发现他们光吃面包不可能干这样的重活，所以把他们当作牛马，强迫他们吃豆子；豆子含磷酸钙比面包多得多。”（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94页注）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使工人阶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⁹⁾ 假使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消费资料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末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¹⁰⁾ 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别人财富的力量。⁽¹¹⁾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在它不断使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不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工人的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虚构来保

(9)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38页及以下各页。

(10) “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

(11) “唯一真正的生产消费，就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而对财富的消费或破坏（他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消耗）…… 工人……对于使用他的人、对于国家是生产的消费者，但严格说来，对自己本身就不是生产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版第30页）

持的。

从前，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的法律来实现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例如在 1815 年以前，英国曾以严厉的刑罚来禁止机器工人向国外迁移。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¹²⁾ 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作属于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每当危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大家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把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抛向街头。于是从工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出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当时《泰晤士报》(1863 年 3 月 24 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艾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下院被恰当地称为“工厂主宣言”。⁽¹³⁾ 我们在这里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些地方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可能有人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 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 雇主<即棉纺织厂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 如果靠公共基金实行移民，他就有权提出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12) “人们可以说储存起来和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 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资本也可以完成。”(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 12、13 页)

(13) “这封信可以看作工厂主宣言。”(1863 年 4 月 27 日弗兰德在下院会议上就棉荒提出的议案)

这个波特尔接着谈到，棉纺织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的规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 1860 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 $\frac{5}{13}$ ，它如何经过几年后，会由于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 6 便士输入足够数量的棉花”而再行扩展。他继续说：

“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 于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 12 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14）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

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勃。¹⁸⁸

“…… 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 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 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如降低 $\frac{1}{3}$ ，或 5 百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 小租地农场主、比较优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

（14） 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 4 篇第 188 注第 389 页^①）：“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现在我们听到，这种机器可以在 12 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现在我们听到，这种劳动和技巧在 30 年中无法替换）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 6 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

① 见本卷第 464 页。——编者注

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行5—6百万公债；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救济者的道德标准…… 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由于实行大规模的造成国内空虚的移民，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

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现有数量中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报》在回答这位大厂主时写道：

“艾·波特尔先生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以致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因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尽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疯狂地胡闹。正如波特尔先生所说，再生产工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手里有机械师和货币，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超过我们任何时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 波特尔先生谈到过

一年、两年或三年工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或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迁移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 50 万工人和他们的 70 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这是必然会得出的——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15)

《泰晤士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益智游戏。“强大的舆论”实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工人被制止迁往国外。(16) 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他们仍然是“郎卡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17) 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扔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

(15) 1863 年 3 月 24 日《泰晤士报》。

(16) 议会没有为移民批准一个铜板的经费，只是颁布法令，责成市政当局把工人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或不付给标准工资而对他们进行剥削。相反，三年后，当牛痘流行的时候，议会甚至粗暴地破坏议会体统，立即批准数百万来补偿百万富翁地主们的损失；他们的租地农场主显然由于肉价上涨而未曾遭受损失。土地所有者在 1866 年议会开会时的野兽般的吼叫表明，即使不是印度教徒也可以礼拜撒巴拉神牛，即使不是丘必特也可以变成牛。

(17) “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工厂主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 1 卷第 91 页)。

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¹⁸⁾，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¹⁹⁾。

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²⁰⁾

(18) 德勒穆郡存在着这种隶属地位的农村粗野形式。有几个郡，当地的条件不能保证租地农场主对农业短工的当然所有权，德勒穆郡就是其中的一个。采矿业使农业短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这些地方，租地农场主打破惯例，只承租筑有工人小屋的土地。小屋租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这些小屋叫做“农业工人房舍”。工人要租这些小屋必须完成一定的封建义务，租赁契约就叫做《bondage》〔“依附关系”〕，按照这种束缚工人的契约，例如工人在外地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他的女儿或其他人代他工作。工人本人叫 bondsman，即依附农。这种关系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明，工人的个人消费是为资本的消费或生产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依附农的粪便都成了他的利欲熏心的主子的一项额外收入…… 租地农场主除了自己的厕所以外，不许邻近有别的厕所，而且不容许对这方面的领主权有任何侵犯。”（《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88页）

(19) 我们记得，在儿童劳动等方面，甚至连卖身的形式也不存在。

(20) “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新莱茵报》1849年4月7日第266号¹⁸⁹）用这个标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是1847年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¹⁹⁰就这个题目发表的演说的一部分；文章的登载由于二月革命而中断。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 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 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²¹⁾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 10 000 镑的资本，其中 $\frac{4}{5}$ 用于棉花、机器等等，其余 $\frac{1}{5}$ 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 240 000 镑，价值为 12 000 镑。如果剩余价值率为 100%，剩余价值就包含在 40 000 磅棉纱的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 $\frac{1}{6}$ ，价值 2 000 镑。这 2 000 镑价值将由出售而实现。2 000 镑的价值额就是 2 000 镑的价值额。从这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一点，表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21) “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作资本使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卡泽诺夫出版，第 11 页)“收入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 年伦敦第 2 版第 320 页)

因此，纱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 2 000 镑货币变成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得预付其中的 $\frac{4}{5}$ 去购买棉花等物， $\frac{1}{5}$ 去购买新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 2 000 镑新资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 400 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就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变成货币，那末资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则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这二者都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产品，而这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这些商品，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市场，正象其他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也就是说，已经存在于由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总资本在一年中转化成的各种物品的总额中了，而每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相应部分。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实现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交换，使它们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能改变产品的本性。可见，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绝不取决于流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但这种剩余产品究竟是由什么

构成的呢？也许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这样，剩余价值就会被挥霍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21a）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就业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¹⁹¹的说法，变成螺旋形了。（21b）

（21a） 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化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相反。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21b） 西斯蒙第对积累的分析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太满足于“收入转变为资本”这句话，而没有深究这个行为的物质条件。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¹⁹²等等的老故事。10 000 镑原有资本带来 2 000 镑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 2 000 镑资本又带来 400 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变成了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 80 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同原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起来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 10 000 镑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过所有者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21c)，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

2 000 镑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余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部分来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那还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

(21c) “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 1 卷第 109 页）

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末后者首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作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末，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²²⁾ 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

第一个追加资本 2 000 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 10 000 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资本 400 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 2 000 镑的预先积累，400 镑就是这 2 000 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已经积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还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

(22) “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已经创造了资本。”（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110 页）

实际价值进行的；那末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²³⁾

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象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

(23) 资本家对别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唯一的所有权”（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8页，但是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

一点。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规律进行的。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律上也归他所有。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些生产资料；但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新产品的价值还包含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这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付给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因而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末，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这一规律甚至从来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

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尽管这样，这种转化仍然有以下

的结果：

1. 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
2. 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
3. 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的周期反复。货币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转化为资本。因此，规律并没有遭到违反，相反地，只是得到不断发生作用的机会。

“好多次连续发生的交换行为，不过使最后一次成为最初一次的代表。”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0页)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简单再生产足以使这种最初的活动具有一种同把它当作孤立过程来考察时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间，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获得新的分配权；另一部分人<资本家>则通过最初劳动已经预先取得了永久的分配权。”(同上，第110、111页)

大家知道，劳动领域并不是长子继承权创造奇迹的唯一领域。

如果简单再生产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为积累所代替，事情也还是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只消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币，以此表现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资本家把剩余价值预付在生产上，完全象他最初进入市场的那一天一样，是从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的。至于这一次他的基金是由他的工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这一事实，和问题绝对无关。如果工人B是用工人A所

生产的剩余价值来雇用的，那末，第一，A 提供这种剩余价值时，资本家对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合理价格，分文也没有少给；第二，这一交易同工人 B 毫无关系。B 所要求的而且有权要求的，是资本家把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付给他。

“双方都有利，因为对工人来说，他在劳动前〈应当说：在他自己的劳动带来成果前〉就预先得到他的劳动〈应当说：别的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果实；对雇主来说，这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应当说：他生产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 1 卷第 135 页）

诚然，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不断更新的过程，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末，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期满而告结束。要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这同以前的契约完全无关，在这里同一买者和同一卖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其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由于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

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²⁴⁾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全部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所以，政治经济学一般都把资本说成是“用来重新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²⁵⁾（转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收入），

(24) 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

(25) “资本就是用来获取利润的积累起来的财富。”（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262 页]）“资本……就是由收入中节约下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查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 年哈特福版第 16 页）

或把资本家说成是“剩余产品的占有者”⁽²⁶⁾。这种看法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全部现存的资本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²⁷⁾

2. 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 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在进一步探讨积累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某些规定以前，我们必须清除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含糊观点。

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对他不能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样，他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购买的劳动，也不起生产劳动的作用。资本家没有通过购买这种商品和劳动，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相反地，把它作为收入消费掉或花费掉了。旧贵族的思想，如黑格尔正确地指出的，主张“消费现存的东西”¹⁹³，特别是讲究个人侍奉的豪华，以示阔绰，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宣布积累资本是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不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让他们带来的东西超过他们耗费的东西，那就不能积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

(26) “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第4页])

(27) “资本加上储蓄资本的每部分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51年7月19日)

斗争，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²⁸⁾，以为积累财富就是使财富现有的实物形式免遭破坏，也就是不被消费掉，或者说，把财富从流通中救出来。其实，把货币贮藏起来不加入流通，同把货币作为资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两回事，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28a)大量商品的积累是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的结果。⁽²⁹⁾诚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把下面这两种现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费基金中积累的供慢慢消费的财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后一现象，我们在分析流通过程时还要略微谈到。

因此，古典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过程的特点是，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由非生产工人消费，这一点是对的。但它的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斯密使人们形成一种流行的看法，把积累仅仅看成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者说，把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仅仅看成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例如，我们可以听听李嘉图的说法：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如果认为资本可以由于

(28) “现代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作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做法的狭隘和无效不说，储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这个用法是从储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储蓄所维持的各种不同劳动的实际差别为基础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8、39页)

(28a) 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

(29) “资本积累……交换停滞……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第104页)

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30)

李嘉图和一切以后的经济学家追随亚·斯密一再重复地说：“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了。其实，剩余价值和原预付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被资本家消费了。它通过自己的职能——劳动——去消费生产资料。同时，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货币，转化为不是由“生产劳动”而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亚·斯密根据自己根本错误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谬结论：虽然每一个资本分成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但社会资本只分解为可变资本，或者说，只用来支付工资。例如，一个呢绒厂主把2000镑转化为资本。他把这些货币的一部分用来雇织工，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毛纱和织毛机等等。而把毛纱和织毛机卖给他的人，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劳动，依此类推，直到2000镑完全用于支付工资，或者这2000镑所代表的全部产品都由生产工人消费掉。我们看到，这个论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们推来推去的“依此类推”这几个字。事实上，亚当·斯密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31)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总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容易理

(30)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163页注。

(31) 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一书¹⁹⁴，但从未发现他前辈这种错误的分析，这种错误分析即使以资产阶级的眼光，从纯粹科学的观点来看，也极需加以纠正。他到处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记下他的老师们的混乱思想。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转化为工资”。

解的。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而困难就在这里开始。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人们的视线，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篇中，我将对实际的联系进行分析。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¹⁹⁵中，首次试图对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生产的形式画出一幅图画。(32)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

3. 剩余价值分为资本 和收入。节欲论

在前一章里，我们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只是看作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基金，在这一章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把它只是看作积累基金。但是，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前者，也不仅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

(32) 亚·斯密对再生产过程从而对积累的说明，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比他的前辈特别是重农学派有所进步，甚至有决定性的退步。同本文中所提到的他的错觉有关的是他遗留给政治经济学的极其荒谬的教条：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构成，也就是仅仅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从这个基础出发，至少有施托尔希幼稚地承认：“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注）。宣称商品价格不可能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这是多么妙的经济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篇和第三卷第七篇更详细地谈到。

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³³⁾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

在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中，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但这种分割是由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来进行的。因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至于他所征收的贡物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象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¹⁹⁶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

(33) 读者会注意到，收入一词有双重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期地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入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我保留了这一双重意义，因为它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用语相一致。

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通过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记在资本的借方一样。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³⁴⁾

(34) 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更新但是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很清楚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货币而崇拜他们…… 凡是吸尽、抢劫和盗窃别人营养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大罪（杀多少，由他决定）。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末，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 小偷带上镣铐，大盗却腰缠万贯，身著丝绸…… 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都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 披上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 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怪物，象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付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 既然对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刑和斩首…… 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①具有“人的同情感”¹⁹⁷，而且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把禁欲主义的热望嘲笑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自己职能的罪恶，是“节制”积累，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放弃”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¹⁹⁸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象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多少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象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 1795 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① “亚当”在这里也有欲望、情欲的意思。——译者注

他们特别是靠盘剥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而大发横财，那些父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象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

“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象过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因为象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 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人〈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而扩大了经营。在 1690 年以前，在工业中能赚到 3 000—4 000 镑资本的人可能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家已经积累了货币，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 6 便士一杯果汁酒和 1 便士一包烟。直到 1758 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³⁵⁾。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¹⁹⁹ “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³⁶⁾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

(35) 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 年伦敦版第[181]、182 页及以下各页[188]。

(36) 亚·斯密《国富论》第 2 卷第 3 章[第 367 页]。

使命。它对财富分娩的痛苦从来不迷惑⁽³⁷⁾，但对历史必然性悲叹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它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的历史职能。为了使资本家的内心摆脱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间的不幸的冲突，马尔萨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³⁸⁾。那些早就变得享乐成性和善于交际的资本家先生们不由得大叫起来。他们的代言人之一，一个李嘉图派叫道：马尔萨斯先生鼓吹高额地租、高额税收等等，难道是为了让非生产消费者来不断地刺激工业家！诚然，口号所标榜的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但是，

“这个过程与其说会促进生产，不如说会阻碍生产。而且让一部分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只是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尽管从后者的性格来说，如果强迫他们去做，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³⁹⁾。

尽管他认为靠吸掉工业资本家汤里的油水这种办法来刺激工业资本家去积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觉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也不隐瞒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

(37) 甚至让·巴·萨伊也说：“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²⁰⁰ “罗马的无产者几乎完全靠社会过活……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靠夺取无产者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过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4页）

(38)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19,320页。

(39)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67页。

“工人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拿走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消费〈工人的消费〉减少会产生‘过剩现象’〈市场商品充斥，生产过剩〉，那我只能回答说：过剩现象是高额利润的同义语。”⁽⁴⁰⁾

关于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应该怎样在工业资本家和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进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积累这种学究气的争论，遇到七月革命就平息下去了。此后不久，城市无产阶级在里昂敲起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峡此岸在传播欧文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在纳骚·威·西尼耳于曼彻斯特发现资本的利润（包括利息）是无酬的“最后第十二个劳动小时”的产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个发现。他庄严地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⁴¹⁾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训说：“野蛮人

(40)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59页。

(41)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09页。在旧古典学派的追随者看来，这也未免太狂妄了。“西尼耳先生用劳动和节欲这两个词来代替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词…… 节欲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利润的来源不是节欲，而是用于生产的资本的使用。”（约翰·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130页）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面同意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同时又接受西尼耳的“节欲报酬论”。他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

第2版补注：庸俗经济学家从来也不会作这种简单的思考：人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作他的相反行动的“节欲”。吃饭是绝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闲逸的节欲，闲逸是劳动的节欲等等。这些先生们应当想一想斯宾诺莎的话：规定即否定²⁰¹。

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这就向我们说明，在早期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资料如何和为何没有资本家的“节欲”也被制造出来了。“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⁴²⁾，也就是越要求那些以占有别人劳动及其产品为业的人实行节欲。从此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就如数转化成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个时期用以发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⁴³⁾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也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掉，这就是资本家在掠夺自己的欲望。⁽⁴⁴⁾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够了，世界之所以能生存，无非全靠这个在毗湿奴神前的现代赎罪者资本家的自我修行。不仅是积累，就是单纯的“保存资本也要求不断地努力克服把资本吃光用尽的诱惑”⁽⁴⁵⁾。所以很明显，单是人道就要求把资本家从殉道和诱惑中解救出来，其办法同不久前乔治亚州的奴隶主所采取的一样，后者通过废除奴隶制而摆脱了这样一种

(42)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第342页。

(43) “如果不打算获得追加价值，谁……也不会把例如自己的小麦种在地里一年，或把自己的葡萄酒藏在窖里好多年，而会立即把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消费掉。”
(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阿·波特尔编，1841年纽约版第133页²⁰²)

(44) “资本家如果不把自己生产资料的价值转化为消费品或奢侈品供自己消费，而把生产资料贷给工人，就是节制。”(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第36页)用“贷给”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有效手法，把受工业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工人，与那些向借贷资本家借款的工业资本家本身混为一谈。

(45) 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第20页。

左右为难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产品消耗在香槟酒上，还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转化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⁴⁶⁾几年前去世的、继马尔萨斯之后在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理查·琼斯，曾用两大事实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因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农，所以他们的产品、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来不具有“从别人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从而要经过一个预先的积累过程的基金的形式”⁽⁴⁷⁾。另一方面，在旧制度被英国统治破坏最小的省份，非农业工人由豪门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农产品以贡物或地租形式流到这些豪门手中。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为豪门所消费，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们转化为奢侈品及其他消费品，而剩下的一部分则形成自己占有劳动工具的工人的工资。在这里，虽然没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士、“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常进行。

(46) “最有助于国民资本进步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处于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是截然不同的…… 在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 当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积累的源泉就相当重要了。”（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16, 21 页）

(47) 同上，第 36 页及以下各页。〈第 4 版注：这一定是错了，这句话没有找到出处。——弗·恩·²¹〉

4. 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 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 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 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假定 80% 资本化，20% 被消费掉，那末，积累的资本是 2 400 镑还是 1 200 镑，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额是 3 000 镑还是 1 500 镑。可见，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况也影响着积累的量。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情况再作一次总括的说明，但是只限于它们在积累方面会提供新观点的范围。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⁴⁸⁾ 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

(48) “李嘉图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即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假如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末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 74 页）

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约·斯·穆勒说：

“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⁴⁹⁾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不断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个十八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灵魂深处的秘密。⁽⁵⁰⁾例如，他天真地说：

“如果我们的穷人（称呼工人的术语）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 我们只要想想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⁵¹⁾

(49) 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0,91页。

(50)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页。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所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煎熬，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1867年2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尔希延）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

(51)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46页。

他还引用了北安普顿郡的一个工厂主的文章，这位工厂主仰天悲鸣：

“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52)。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说道：“而且他们喝的只是白水或清淡饮料。因此他们实际上花的钱极少……这种状况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这种状况，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53)

二十年后，一位名列贵族的美国骗子本杰明·汤普逊（又称朗福德伯爵）遵循着同一博爱主义的路线，使上帝和人都大为满意。他的《论文集》可以说是一本食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样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请看这位令人惊异的“哲学家”的一张特别成功的菜单：

“大麦 5 磅，玉米 5 磅，青鱼 3 便士，盐 1 便士，醋 1 便士，胡椒和白菜 2 便士，总计 $20\frac{3}{4}$ 便士，可以做成供 64 个人喝的汤，如果粮食的价格中常，汤的费用还可以降低到每人合 $\frac{1}{4}$ 便士。”(54)

(52) 北安普顿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

(53)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 年伦敦版第 70、71 页。第 3 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议员斯特普耳倾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末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1873 年 9 月 3 日《泰晤士报》——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

(54) 本杰明·汤普逊《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294 页。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掺假使汤普逊的理想也成为多余的了。⁽⁵⁵⁾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以教区救济金的形式付给不足的部分。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的道勃雷们在利用“法律”来规定工资率时的丑态：

“1795年，当地主们在规定斯宾诺姆兰德地方的工资的时候，他们已用过午餐，但是他们显然认为工人是无须用午餐的……他们决定：当一个8磅11盎斯重的面包卖1先令的时候，每人每周的工资应为3先令，在这种面包价格上涨，而没有达到1先令5便士之前，工资可以适当增加。一旦超过了这一价格，工资则应按比例地减少，直到这种面包的价格达到2先令为止，这时每人的食量应比以前减少 $\frac{1}{5}$ 。”⁽⁵⁶⁾

《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一书中，竭力向贫民习艺所的主管人推荐朗福德的乞丐汤，并且以责备的口吻提醒英格兰的工人说：“在苏格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生活得很舒适”（同上，第1卷第2篇第2章第503页）。在十九世纪也有过类似的“提示”。例如：“英格兰的农业工人不愿吃掺有杂粮的混合面粉。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有这种偏见。”（医学博士查理·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69页）可是这位帕里也哀叹，现在（1815年）英格兰工人的境况比伊登时代（1797年）差多了。

（55）从最近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生活资料掺假的报告可以看到，在英国，甚至药物的掺假也不是例外的现象，而成为一种通例。例如，把从伦敦34家药房买来的鸦片样品进行化验，发现其中31种掺有罂粟头、面粉、树胶、粘土和沙等物，而且许多样品连一个吗啡原子也没有。

（56）格·耳·纽纳姆（律师）《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第20页注。

1814 年，有一位大租地农场主，治安推事，贫民院主管，工资调整人阿·贝奈特在上院调查委员会上被质问：

“一天劳动的价值和教区给工人的救济金之间是否有某种比例？”他回答说：“有的，每个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过名义工资，补足到每人一加仑面包（8 磅 11 盎斯）和每人 3 便士…… 我们认为一个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仑面包就足以维持生活了；3 便士则用来买衣服；如果教区愿意发给衣服，这 3 便士就可以不发了。这种办法不仅在威尔特郡西部一带普遍采用，我想全国也在普遍采用。”⁽⁵⁷⁾

当时有一位资产阶级著作家喊道：

“这样，租地农场主们在若干年内就把自己同胞中的这个可敬的阶级贬低了，竟然迫使他们以贫民习艺所作为栖身之所…… 租地农场主甚至阻碍工人最必要的消费基金的积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⁵⁸⁾

目前，直接掠夺工人必要的消费基金对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对于资本的积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已经由所谓家庭劳动（参看第十三章第八节 d）的例子说明了。在本篇中我们还要举出更多的事实。

虽然在一切工业部门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足够供一定数量（这由企业规模决定）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总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假定某一工厂有 100 个工人，每人劳动 8 小时，共 800 个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想使这个劳动小时数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 50 个工人，但这

(57) 《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词》第 19、20 页。

(58) 查·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第 77、69 页。地主老爷们不仅“补偿了”他们以英国的名义所进行的反雅各宾战争中的损失，而且还大发横财。“在 18 年中，他们的地租增加了 1 倍、2 倍、3 倍，个别的甚至增加了 5 倍。”（同上，第 100、101 页）

样一来，他不仅要在工资上预付新的资本，而且要在劳动资料上预付新的资本。不过他也可以使原有的 100 个工人不是劳动 8 小时而是劳动 12 小时，这样，现有的劳动资料就足够使用了，只是损耗得快一些罢了。可见，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即积累的实体。

在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等。这里的不变资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资料组成，它们能很容易地容纳增加了的劳动量（如工人日夜换班）。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同所使用的劳动成正比地增加。在这里，正象生产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由于劳动力具有伸缩性，即使不预先增加不变资本，积累的领域也能扩大。

在农业中，不预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扩大耕地。但是，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末，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数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量，不必预付新的劳动资料，也可以提高肥力。这又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无需新资本的介入，也会成为扩大积累的直接源泉。

最后，在本来意义的工业中，任何追加的劳动消耗都要求相应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劳动资料的消耗。因为采掘工业和农业给加工工业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劳动资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业和农业无需追加资本就能生产的追加产

品，对于加工工业也是有利的。

总的结论是：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体现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积累基金的相对量甚至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而同时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资本家享用的消费品仍和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样，同一可变资本价值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同一不变资本价值可以体现在更多的生产资料上，即体现在更多的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上，从而会提供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说，提供更多的吸收劳动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资本的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不仅再生产的规模在物质上扩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比追加资本的价值增长得更快。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

本发生反作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是由劳动资料如机器等等构成的，这些劳动资料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会被消费掉，因而被再生产出来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但是，这些劳动资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说，达到了它的生产职能的终点。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处在周期的再生产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的阶段。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了（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等就为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开现有的劳动资料在细节上的不断改进不说，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在一年当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其中由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一年再生产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这里对追加资本和已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几乎同时发生影响。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正象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末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一个几百倍大的旧价值总额使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这些旧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产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弗·恩格斯告诉我们：“在 1782 年，〈英国〉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⁵⁹⁾ 在机器形式中物化的劳动自然没有直接创造出任何一个人，但是它使为数不多的工人通过追加相对少的活劳动，就能不仅把羊毛生产地消费掉，加进新的价值，而且还能以毛纱等等的形式保存它的旧价值。同时，它又提供了羊毛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和刺激。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活劳动的自然恩惠。因此，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规模和价值的增长，从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积累的增长，劳动在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并使其永

(5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 20 页 203。

久化。⁽⁶⁰⁾劳动的这种自然能力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象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表现为资本的不断自行增殖一样。劳动的一切力量都显现为资本的力量，正象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显现为货币的形式一样。

随着资本的增长，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在增大。换句话说，劳动资料如建筑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具的价值量和物质量都会增加，这些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里，在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中，用自己的整体执行职能，或者说，为达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务，而它们本身却是逐渐

(60) 古典经济学由于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了不完全的分析，所以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再生产的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在李嘉图那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例如他说：不管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百万人在工厂里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在他们的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已定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一点不会妨碍下面的事实，即在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一百万人会把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料量转化为产品，因而会把极不相同的价值量保存在他们的产品中，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产品价值。而李嘉图在作某些结论时把这一情况忽视了。顺便提一下，李嘉图妄图用上述例子向让·巴·萨伊阐明使用价值（在这里他把它叫做 wealth，即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萨伊回答说：“李嘉图说，应用较好的方法，一百万人可以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财富，而并不生产更多的价值。李嘉图提出的这一难题，只要我们把生产看作（也必须看作）一种交换，即人们为了取得产品而在其中提供自己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服务的那种交换，就能迎刃而解了。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生产服务才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产品……因此……在名为生产的那种交换中，我们的生产服务所产生的有用物的量越多，我们就越富，我们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让·巴·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68、169页）萨伊想要说明的“难题”（这种“难题”对他来说是存在的，对李嘉图来说并不存在）如下：为什么在使用价值的量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时，使用价值的价值不会增加？回答是：只要我们把使用价值叫作交换价值，这个难题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联系的东西。

损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越是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也就是说，它们越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末，它们就越是象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

因为过去劳动总是装扮成资本，也就是说，A、B、C等人的劳动的被人所有总是装扮成非劳动者X的自己所有，所以资产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劳动的功绩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利息、利润等

因此，我们把生产称为劳动和生产资料同产品的“交换”，同时十分清楚，生产提供的使用价值越多，所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多。换句话说，一个工作日给织袜厂主生产的使用价值例如袜子越多，工厂主也就越富有袜子。但是萨伊先生突然想起，随着袜子“量的增加”，袜子的“价格”（它当然与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就会下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生产者）按照他们在产品上花去的费用出售产品”。但如果资本家按照他在商品上所花的成本价格出售这些商品，那末利润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不要紧。萨伊解释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人用从前换一双袜子的同一等价物，现在可以换两双。他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想反驳的李嘉图的论点。经过了这样一番苦思之后，他洋洋得意地对马尔萨斯说道：“先生，这是个有充分根据的学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学说，便无从解决政治经济学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财富代表价值，但在产品价值下降时，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更为富有。”（《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第170页）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哈特福讲授这种学说，就像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110页）

等)。(61)于是，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就象奴隶主不能把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身分分开来考虑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胡说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产资料和它们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开来考虑。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们的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越是开动得有力。

5. 所谓劳动基金

我们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已经知道，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可伸缩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其次我们知道，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本的有伸缩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

(61) 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

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在这里，我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切会使同量资本发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条件完全撇开不说。因为我们只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前提，是以社会生产过程的纯粹自然发生的形式为前提，所以我们把一切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也撇开不说。古典经济学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过这种偏见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边沁手里，即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谈的圣哲手里，才确立为教条。⁽⁶²⁾ 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象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能制造出来。⁽⁶³⁾ 按照他的教条，生产过程的最普通的现象，如生产过程的突然扩张和收缩，甚至积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

(62) 参看耶·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厄·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册第2章。

(63) 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利斯提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洋洋得意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于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波尔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²⁰⁴，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

的。(64) 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成社会财富中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社会财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是没有一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是没有一定的，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根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65)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

(64) “政治经济学家们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一种划一力量的和以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唯一要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多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加，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加，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增加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58、70页)贝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判这个教条。

(65) 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2篇第1章第3节〕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义反复，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来说明。他说：

“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⁶⁶⁾就是它的劳动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货币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行了。”⁽⁶⁷⁾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法。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⁶⁸⁾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⁶⁹⁾

(66) 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亚·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性，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二卷第二篇还要更详细地谈到。

(67) 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120页。

(68) 同上，第122、123页。

(69) 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²⁰⁵，这些移民大部分不是工人。其中租地农民的儿子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追加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 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 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彼此间具有多少不

同的构成。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以下要谈的归根到底只是这种构成。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末，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求，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十五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

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70)

古典经济学十分懂得这个原理，以致象前面已经说过的，亚·斯密、李嘉图等人甚至错误地把积累同剩余产品中整个资本化的部分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转化成追加的雇佣工人混为一谈。还在1696年，约翰·贝勒斯就说过：

“假设某人有10万英亩土地，有10万镑货币和10万头牲畜，而没有一个工人，那末这个富人自己还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变富，所以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71)

同样，贝尔纳德·德·孟德维尔在十八世纪初也曾说过：

“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

(70)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²⁰⁶。——“在群众受压迫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31页）“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贝歇尔对这种人的称呼）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原始森林中的病弱的无产者”是罗雪尔的奇妙的幻想。原始森林人是原始森林的所有主，他象猩猩一样毫不客气地把原始森林看作自己的财产。可见，他不是无产者，只有在原始森林剥削他，而不是他剥削原始森林时，他才是无产者。至于说到他的健康状况，那末，不仅完全可以同现代无产者的健康状况相比，而且也可以同患梅毒的和患瘰疬病的“可尊敬的人士”的健康状况相比。不过，威廉·罗雪尔先生所说的原始森林，大概是指他的家乡律内堡的荒野吧。

(71) 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页。

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 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变得垂头丧气，或者变得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 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此外，他们还是补充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⁷²⁾

孟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的机构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从属关系，他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

(72) 贝·德·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附注第212、213、328页——“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 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⁷³⁾。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 对穷人适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则应当对于为他们劳动的人拥有充分的影响和权威…… 每一个懂得人类天性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从属关系是工人自身安乐所必需的”⁽⁷⁴⁾。

顺便提一下，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摩·伊登爵士在十八世纪有过某些重要的成就。⁽⁷⁵⁾

(73) 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²⁰⁷ 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

(74) 伊登《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第1卷第1篇第1章第1，2页和序言第XX页。

(75) 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希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点新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马尔萨斯发现的，而只是被他据为己有的。——顺便提一下，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牧师，但他曾立过修道士终身不婚的誓言。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剑桥大学的特待校友资格的条件之一。“本会会员不得结婚。一旦娶妻，即不再为会员。”(《剑桥大学委员会报告》第172页)这种情况使马尔萨斯区别于其他新教牧师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其他新教牧师

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适和宽松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

抛弃了天主教关于教士终身不婚的圣诫，并且力言“滋生繁殖”是他们特殊的圣经使命，以致到处为人口的增殖作出极不体面的贡献，而同时却又向工人宣讲“人口原理”。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上拙劣地仿造出来的原罪，亚当的苹果，“迫不及待的情欲”，唐森牧师风趣地称之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障碍”——这个微妙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由新教神学或不如说新教教会的老爷们所垄断。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论者都是新教牧师。例如：布吕克纳，他1767年在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一书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而该书的思想是由魁奈同自己的学生老米拉波对这一题目的一次短暂争论所提供的，后来就是华莱士牧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至于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师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谈了。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象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象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萨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象配第、巴尔本、孟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一位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牧师塔克尔先生，还曾为他自己研究钱财而进行过辩解。后来，正是随着“人口原理”的出现，新教牧师的丧钟敲响了。把人口看作财富的基础，并且和亚当·斯密一样是牧师们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配第，似乎预料到了这些拙劣的干涉，因此说道：“教士最守苦行时，宗教最繁荣，正如在律师饿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样”。配第劝告新教的牧师们，如果你们不愿再追随使徒保罗，不愿终身不婚来“禁欲”，“至少不要生出多于现有牧师俸禄所能吸收的牧师，也就是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2 000 份牧师俸禄的时候，要是生出24 000个牧师，那是不明智的，因为12 000个无以为生的人总要设法自谋生计。为此他们走向民间，向人们游说：那12 000个受俸牧师在毒害人们的灵魂，使这些灵魂饿死，把他们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升入天国。除了这样做而外，难道还能有什么

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²⁰⁵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这里，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

别的更容易谋生的方法吗？”（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57页）亚当·斯密对当时新教牧师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在《给法学博士亚·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1784年牛津第4版）这一著作中，诺里奇的高教会派主教霍恩博士责难亚·斯密，因为斯密在一封致斯特兰先生的公开信中要使自己的“朋友大卫（即休谟）不朽”，因为斯密向公众讲述，“休谟在他临终的床上以读疏善的作品和玩惠斯特牌而自娱”，甚至胆敢写道：“无论在休谟生前或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类天性的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全智全德的人”。这位主教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把一个不可救药地反对一切叫作宗教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甚至要使宗教这个名称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和品行，向我们描绘成全智全德的，您这样做合适吗？”（同上，第8页）“但是，热爱真理的朋友们，不要气馁，无神论是长久不了的。”（第17页）亚当·斯密“抱着残忍的恶意，要在全国宣扬无神论（就是通过他的《道德情操论》）……博士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诡计！您想得倒好，但是这一次却失算了。您想用大卫·休谟先生的例子来使我们相信，无神论对于意志沮丧的人来说是唯一的兴奋剂，是对付死亡恐怖的唯一的解毒剂……您去笑那废墟中的巴比伦吧！去祝贺那无情的恶魔法老吧！”（同上，第21、22页）在亚·斯密的学生中，一个正统派在亚·斯密死后写道：“斯密对休谟的友谊妨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相信休谟的每一句话。即使休谟对他说，月亮是一块绿色的干酪，他也会相信。所以，休谟说没有上帝，没有奇迹，他也同样相信……斯密在政治原则上接近于共和主义。”（詹姆斯·安德森《蜜蜂》1791—1793年爱丁堡版，共十八卷，第3卷第166、165页）托·查默斯牧师曾怀疑，亚·斯密捏造出“非生产工人”这个范畴纯粹是出于恶意，是专门用来影射新教牧师的，虽然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福的劳动。

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作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⁷⁶⁾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撇开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不说，——亚当·斯密也早就指出过，在这种冲突中，一般说来雇主始终是雇主，——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亚·斯密说过，

“即使利润下降，资本还是能增长，甚至增长得比以前还要快…… 利润小的大资本，一般也比利润大的小资本增长得快”（《国富论》第1卷第189页）。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统治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

(76) 第2版注：“但是，不论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他们就业的界限是一致的，那就是雇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榨取利润。如果工资率过高，使雇主的利润降低到平均利润以下，那末，雇主就会不再雇用他们，或者只有在他们答应降低工资的条件下才会继续雇用他们。”（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

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见，在第一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减缓引起资本的过剩，相反地，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在第二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加速引起资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或者不如说使劳动力价格过高。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同样，在工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而在繁荣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降低。所谓通货学派⁸⁴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太多；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少^①。他们的无知和对事实的完全误解⁽⁷⁷⁾，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可以与之媲美，这些经济学家把积累的上述现象说成是：在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少，在另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多。

作为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

(77) 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²⁰⁸。

① 第3版和第4版中是：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太少；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多。——编者注

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决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量，即资本量和工人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末，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一定点，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别的样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77a)

(77a) “如果回头来看看我们在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末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部第2编第5、6页）杜能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却十分幼稚。

2. 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按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见解，引起工资提高的，既不是社会财富的现有量，也不是已经取得的资本量，而仅仅是积累的不断增长和它的增长速度。（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8章）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亚·斯密说：

“引起工资提高的原因，即资本的增长，也促使劳动生产能力提高，使较少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²⁰⁹

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分散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这些生产资料起着双重作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例如，由于有了工场手工业分工和采用了机器，同一时间内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进入劳动过程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量增大了。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

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机器、役畜、矿物质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以建筑物、炼铁炉、运输工具等形式积聚起来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这样。但是，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

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生产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例如，有一笔资本，按百分比计算，起初 50% 投在生产资料上，50% 投在劳动力上。后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80% 投在生产资料上，20% 投在劳动力上，等等。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象前面已经说明的），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不过，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或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例如，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 $\frac{7}{8}$ ，可变资本占 $\frac{1}{8}$ ，而在十八世纪初不变资本占 $\frac{1}{2}$ ，可变资本占 $\frac{1}{2}$ ，但是，目前一定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却比十八世纪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

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也相对地减小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同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量和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随着后一个差额的增长，前一个差额也增长，但是增长的程度较小。

然而，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假定资本价值起初分为 50% 的不变资本和 50% 的可变资本，后来分为 80% 的不变资本和 20% 的可变资本。如果原有资本在此期间从例如 6 000 镑增加到 18 000 镑，那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也要增加 $\frac{1}{5}$ 。这个可变部分原来是 3 000 镑，现在是 3 600 镑。但是，要使劳动的需求提高 20%，以前只需资本增加 20% 就够了，现在则要求原有资本增加为三倍。

在第四篇中已经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分散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己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地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

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已经有这种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叫作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点就行了。但是，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加速资本积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各单个资本，从而生产资料的积聚，会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而

增长。同时，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权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这种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社会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这一过程和前一过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范围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

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简单地提一些事实就够了。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

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因此，现在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和积聚特别不同的地方，因为积聚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而已。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

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77b)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集中是通过强制的道路进行吞并，——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

不过很明显，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

(77b) 《第4版注：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弗·恩·》

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今天已经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

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见第 22 章第 1 节），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要从头到尾地更新，要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来，在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

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3.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 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

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而实现的。(77c)

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因为简单的积累即总资本的绝对扩大，伴随有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追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因此，随着积累的进程，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假定原来是1:1，后来会变成2:1、3:1、4:1、5:1、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总价值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不是 $\frac{1}{2}$ ，而是递减为 $\frac{1}{3}$ 、 $\frac{1}{4}$ 、 $\frac{1}{5}$ 、 $\frac{1}{6}$ 、 $\frac{1}{8}$ 等等，转化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 $\frac{2}{3}$ 、 $\frac{3}{4}$ 、 $\frac{4}{5}$ 、 $\frac{5}{6}$ 、 $\frac{7}{8}$ 等等。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积累表现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的那种间歇时间缩短了。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源泉，也就是成为

(77c) 第3版注：在马克思的自用本上，此处作了如下的边注：“为了以后备考，这里应当指出：如果扩大只是量上的扩大，那末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和较小资本的利润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如果量的扩大引起了质的变化，那末，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同时提高”。——弗·恩。

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源泉。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象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时而它的积累运动引起周期的变化，时而这个运动的各个因素同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在某些部门，由于单纯的积聚^①，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而资本的绝对量没有增长；在有些部门，资本的绝对增长同它的可变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劳动力的绝对减少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门，资本时而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持续增长，并按照它增长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劳动力，时而有机构发生变化，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缩小；在一切部门中，资本可变部分的增长，从而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总是同过剩人口的激烈波动，同过剩人口的暂时产生结合在一起，而不管这种产生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较明显的形式，还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这个不大明显但作用相同的形式。⁽⁷⁸⁾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

(78)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表明：

全体从事农业的人员（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园丁、牧人等等都包括在内）1851年为2 011 447人，1861年为1 924 110人，减少87 337人。毛织厂——1851年为102 714人，1861年为79 242人；丝织厂——1851年为111 940人，1861年为101 678人；印染工人——1851年为12 098人，1861年为12 556人，虽然生产大为扩

① 第3版中是：集中。——编者注

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泉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⁷⁹⁾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

大，但人数增加很少，这就意味着就业工人人数相对地大为减少。制帽工人——1851年为15 957人，1861年为13 814人；草帽及便帽工人——1851年为20 393人，1861年为18 176人；麦芽工人——1851年为10 566人，1861年为10 677人；蜡烛工人——1851年为4 949人，1861年为4 686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煤气灯的增多。制梳工人——1851年为2 038人，1861年为1 478人；锯木工人——1851年为30 552人，1861年为31 647人，由于锯木机的推广，人数增加很少；制钉工人——1851年为26 940人，1861年为26 130人，人数减少是由于机器的竞争；锡矿和铜矿工人——1851年为31 360人，1861年为32 041人。相反，棉纺织业——1851年为371 777人，1861年为456 646人；煤矿——1851年为183 389人，1861年为246 613人。“一般说来，1851年以来，工人人数的增加在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地采用机器的部门最为显著。”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35—39页)

(79) 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个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曾经被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感觉到，但是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在这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

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伸缩性和绝对财富——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伸缩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还因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条件，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规模最迅速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

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他说：“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末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一点也不现实。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流动资本的份额则是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 如果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也不会使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16、17页）“使国家纯收入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从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会相对地减少”（同上，第480页注）。“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可以不依赖于资本总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随着资本本身越来越雄厚，就业规模的大波动以及大贫困变得越来越频繁。”（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第12页）“〈对劳动的〉需求的提高……并不是同总资本的积累成比例的…… 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用于再生的国民资本的每次增加，对工人状况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90、91页）

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不管那时资本积累的增进同现代相比是多么缓慢，它还是碰到了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这些限制只有通过以后将要谈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

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①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末，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曾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又任英国殖民部官员的赫·梅里威耳说：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就会感到劳动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畅销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⁸⁰⁾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

(80) 赫·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卷第146页。

① 在作者校订过的法文版中，这里插入了下面这段话：“但是，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侵占了新大陆、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编者注

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他说：

“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待结婚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按人口的性质来说，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经过 16 年或 18 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多；一个国家的劳动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是经常有的。”(81)

政治经济学这样把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个老处女的姿态，通过自己“最理想的人”资本家的嘴，对那些因自己创造了追加资本而被抛向街头的“过剩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我们工厂主增大你们借以生存的资本，为你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而你们必须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们的人数同生存资料相适应”(82)。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

然而，可变资本在它所指挥的工人人数不变或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也会增长。如果单个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因而得到更多的工资，——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劳

(81)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215、319、320 页。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依靠西斯蒙第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剩，实在是三个极美妙的怪物！参看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 107 页及以下各页²¹⁰。

(82) 哈里埃特·马提诺《曼彻斯特的罢工》1832 年版第 101 页。

动量的增加慢，——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的增长是劳动增加的指数，而不是就业工人增加的指数。每一个资本家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支出会随着所推动的劳动量成比例地增长，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增长则要慢得多。生产规模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具有决定意义。它的力量随资本积累一同增长。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积累的原因，又是积累的结果——使资本家能够通过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在支出同样多的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其次，我们还知道，资本家越来越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买到更多的劳动力。

所以，在积累的进程中，一方面，较大的可变资本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可变资本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如果说生产资料在扩大自己的规模和作用的同时，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成为工人的就业手段，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又会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变化：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

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⁸³⁾，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这个因素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么重要，可以拿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英国“节约”劳动的技术手段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末，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

(83) 甚至在 1863 年棉荒时期，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在其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对过度劳动也提出了强烈的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十二至十三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活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作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末，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10 月 31 日》第 8 页）——《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以其惯有的不会弄错的资产阶级本能，来理解相对过剩人口对就业工人影响。“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劳动量变得不足时，工人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的；但是这帮家伙的心思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来，终日游惰，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论手工业和商业》第 27、28 页）他是说，这帮家伙要求提高工资。

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对于这个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劳动的供求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因而不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而是相反，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教条。按照这个教条，工资因资本的积累而提高。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相对不足时为止。工资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资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渐减少，以致资本同工人人口比较又相对过剩了，或者象另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工资的降低和对工人剥削的相应提高，会重新加速积累，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工人阶级的增长。这样一来，就又出现劳动供不应求、工资提高等等情况。这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运动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

1849年至1859年间，在谷物价格下降的同时，英国农业地区出现了实际考察起来只是名义上的工资提高。例如，周工资在威

尔特郡由 7 先令提高到 8 先令，在多尔塞特郡由 7 先令或 8 先令提高到 9 先令，等等。这是农业过剩人口空前外流的结果，而人口外流是由战争的需要²¹¹ 和铁路工程、工厂、矿山等部门的大规模扩展引起的。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周工资是 20 先令，提高到 22 先令，就是提高 10%；但如果周工资只有 7 先令，提高到 9 先令，那就是提高 $28\frac{4}{7}\%$ ，这就耸人听闻了。不管怎样，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⁸⁴⁾。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象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繁殖，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了，过剩的比例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了。同以前相比，现在投入农业的“资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这样一来，对劳动的需求不仅相对地下降，而且绝对地下降了。

经济学的上述虚构，把调节工资的一般变动或调节工人阶级即总劳动力和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例如，由于市场情况良好，某一生产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本纷纷涌来，这样，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工人吸引到这个有利的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该生产部门的现象不

(84) 1860 年 1 月 21 日《经济学家》。

仅停止，甚至还会发生流出现象。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家就以为看到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人数“在何处以及如何”绝对增长，而随着工人人数的绝对增长，工资“在何处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实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资本变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资部门之间分配的现象。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这里正好应该回过来谈一下经济学辩护论者的一大业绩。我们记得，由于采用新机器或扩大旧机器，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束缚”资本并从而“游离”工人的活动，而经济学辩护士却相反地把这种活动说成是为工人游离资本。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地评价辩护士的厚颜无耻。其实，被游离出来的，不仅有直接被机器排挤的工人，而且还有他们的代替者和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实行一般扩大时通常会吸收的追加人员。现在他们全被“游离”出来，并且每一笔希望执行职能的新资本都能支配他们。不管这种资本吸引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另一些工人，只要这笔资本刚好足以从市场上雇走被机器抛到市场上的那么多工人，那末对劳动的总需求的影响就等于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少，过剩的人数就会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多，劳动总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过等于就业的人超过“被游离的人”的那个差额。可见，寻求投资场所的追加资本本来会激起的劳动总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场合都会按照工人被机器抛向街头的程度而受到抵消。因此，这也就是

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而辩护士们就把这叫作对于被排挤的工人在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种补偿！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造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因此，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别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也就越是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只要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会同它的庸俗的桑科·判札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

4. 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末，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的说来，就业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无论在真正的工厂中，还是在一切使用机器或者甚至仅仅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场中，都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长得快，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

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⁸⁵⁾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李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 38 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 17 岁。在利物浦，前者是 35 岁，后者是 15 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85a)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长就需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成员迅速耗损，但是它的人数不断增大。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不适用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

⁽⁸⁵⁾ 1866 年下半年，伦敦有 8 万到 9 万工人失业，而同时期的工厂报告却说：“说需求总是恰好在必需的时候引起供给，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拿劳动来说，就不是这样，去年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 年 10 月 31 日》第 81 页）。

^(85a) 当时的北明翰市长（现任 1883 年商务大臣。——弗·恩·）约·张伯伦 1875 年 1 月 14 日在北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业。)(86)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

(86) 根据 1861 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781 座城市有居民 10 960 998 人，而乡村和农村教区只有居民 9 105 226 人…… 在 1851 年的人口调查中列有 580 座城市，它们的人口同它们周围的农业地区的人口大致相等。可是，在以后的 10 年中，农业地区的人口只增加 50 万人，而 580 座城市的人口却增加了 1 554 067 人。农村教区的人口增加 6.5%，而城市人口增加 17.3%。增长率的差额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的。人口增长总额中有 $\frac{3}{4}$ 属于城市”（《人口调查》第 3 卷第 11、12 页）。

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87)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令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者、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①。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

(87) “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²¹²)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甫看来，这甚至是上帝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货币论》第4卷第78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9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末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

① “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译者注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①。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的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

^① 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译者注

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¹²³。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说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对抗性质⁽⁸⁸⁾，虽然他们把它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那些尽管部分地相类似但本质上不同的现象混同起来。

十八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士奥特斯，把

(88)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²¹³）

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

“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劳动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等等。(89)

在奥特斯之后大约过了 10 年，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

所以，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个特别在穷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经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90)

(89) 扎·奥特斯《国民经济学》，六卷集，1774 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文集》现代部分，第 21 卷第 6、9、22、25 等页。奥特斯在该书第 32 页上写道：“我不想提出对人民幸福无用的制度，我只研究人民不幸的原因。”

(90) 《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即牧师约·唐森先生）著，1786 年版，1817 年伦敦再版，第 15、39、41 页。这位“高雅的”牧师的上述著作和他的《西班牙游记》，马尔萨斯经常整页整页地加以抄袭，而唐森自己的大部分学说却是从约·斯图亚特爵士那里抄袭来的，不过加以歪曲了而已。例如斯图亚特说：“这里，在奴隶制度下，

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关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的法律。施托尔希说：

“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性……”(91)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说：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费这个财富，那末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如果人们〈即非工人〉必须象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工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末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 在今天，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 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92)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

有一种使人〈为了非劳动者〉勤勉劳动的暴力方法…… 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别人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了非劳动者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²¹⁴，他这样说，但并没有因此就象这位大腹便便的牧师那样做出结论：雇佣工人应当经常挨饿。相反地，他希望增加雇佣工人的需要，并希望他们需要量的增加能刺激他们去为“比较高雅的人们”劳动。

(91) 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223页。

(9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9, 80, 85页。

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93)

5. 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 1846—1866 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象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 1846 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又远远超过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1811—1821	1.533%
1821—1831	1.446%
1831—1841	1.326%
1841—1851	1.216%
1851—1861	1.141%

(93)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 231 页。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1864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50.47%（平均每年增长4.58%）⁽⁹⁴⁾，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1853—1864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 $3\frac{5}{12}\%$ ，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⁹⁵⁾：

	1853年到1864年 收入增加	每年增加
房屋.....	38.60%	3.50%
采石场.....	84.76%	7.70%
矿山.....	68.85%	6.26%
铸铁厂.....	39.92%	3.63%
渔场.....	57.37%	5.21%
煤气厂.....	126.02%	11.45%
铁路.....	83.29%	7.57%

如果把1853—1864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1857年期间每年增加1.73%，1857—1861年期间每年增加2.74%，1861—1864年期间每年增加9.30%。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年为307 068 898镑，1859年为328 127 416镑，1862年为351 745 241镑，1863年为359 142 897镑，1864年为362 462 279镑，1865年为385 530 020镑。⁽⁹⁶⁾

(94)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

(95) 同上。

(96) 这些数字用来作比较是足以说明问题的，但是绝对地看来，则是虚假的，因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10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年到1861年,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31 583个减少到26 567个,也就是说,有5 016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⁹⁷⁾ 1815年到1825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万镑的,但是从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从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份。⁽⁹⁸⁾ 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年为95 844 222镑,1865年为105 435 787镑⁽⁹⁹⁾,纳税的人数1864年在居民总数23 891 009人中是308 416人,1865年在居民总数24 127 003人中是332 431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为每年也许有1亿镑的收入被“隐瞒”了。国内税务委员在每一次报告中都要对这种一贯的欺瞒,特别是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欺瞒抱怨不已。例如:“某股份公司呈报应纳税的利润是6 000镑,而税务员估算为88 000镑,结果还是按后面这个数目纳了税。另一家公司呈报的是19万镑,但后来被迫承认,实际数目是25万镑。”(《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第42页)

(97) 《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29页。约翰·布莱特断言,英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50个地主,苏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2个地主。这一说法从未有人反驳过。

(98)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第17页。

(99) 这是纯收入,即已扣除了法定的免税额。

	到1864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		到1865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	
	利润收入(镑)	人 数	利润收入(镑)	人 数
总 收 入	95 844 222	308 416	105 435 787	332 431
其 中	57 028 290	22 334	64 554 297	24 075
其 中	36 415 225	3 619	42 535 576	4 021
其 中	22 809 781	822	27 555 313	973
其 中	8 744 762	91	11 077 238	107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 年为 61 453 079 吨，价值 16 113 267 镑，1864 年为 92 787 873 吨，价值 23 197 968 镑；生铁产量，1855 年为 3 218 154 吨，价值 8 045 385 镑，1864 年为 4 767 951 吨，价值 11 919 877 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 年为 8 054 哩，投入资本 286 068 794 镑，1864 年为 12 789 哩，投入资本 425 719 613 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 年为 268 210 145 镑，1865 年为 489 923 285 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¹⁰⁰⁾：

1847 年	58 842 377 镑
1849 年	63 596 052 镑
1856 年	115 826 948 镑
1860 年	135 842 817 镑
1865 年	165 862 402 镑
1866 年	188 917 563 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¹⁷⁷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100) 现在，1867 年 3 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英国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过剩了。1866 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 5%，1867 年由于类似的过程，普雷斯顿发生了 2 万人的罢工。（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弗·恩·）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101)。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102)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103)。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 年 3 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 1851—1853 年 3 年间上涨了 20%。在随后的 3 年中，即 1863—1865 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

(101) 《人口调查》1863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11 页。

(102) 格莱斯顿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的演说。(1843 年 2 月 14 日《泰晤士报》。2 月 13 日《汉萨德》)

(103) 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4 月 17 日《晨星报》。

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104) 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105)。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106)

(104) 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6部分）》1866年伦敦版第260—273页。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

(105) 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汉萨德》上的文字是这样写的：“而且，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多半是为生存而挣扎。”英国的一位作家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²¹⁵。

〔引自亨·罗伊〕《兑换理论》1864年伦敦版第135页)

(106)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67、82页。至于说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¹⁰⁷⁾，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 369人，1856年是877 767人，1865年是971 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 079 382人和1 014 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完全相同的“应时文学”喧闹一时的

(107) 英格兰总是包括威尔士；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王国包括以上三个地方和爱尔兰。

伪善呼叫。²¹⁶不过，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¹⁰⁸⁾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了。

(b) 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 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¹⁰⁸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 900克冷碳素，180克冷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 300克冷碳素，200克冷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 $\frac{1}{9}$ 。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 600克冷碳素和1 330克冷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 211克冷，氮素是1 295克冷。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

(108) 亚·斯密有时还把 workhouse〔贫民习艺所〕一词同 manufactory〔手工工场〕一词等同起来。例如，他在论分工那一章的开头写道：“在各种劳动部门就业的人，往往可以被集合在同一工场〔workhouse〕里。”²¹⁷这件事以特别的方式说明了亚·斯密以来的进步。

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 $\frac{1}{5}$ 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 $\frac{1}{3}$ 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109）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110）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111）（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对比。（112）

(109)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页。

(110) 同上，第17页。

(111) 同上，第13页。

(112) 同上，附录第232页。

男 女 两 性	每周平均的 碳素量(克冷)	每周平均的 氮素量(克冷)
五种城市生产部门	28 876	1 192
郎卡郡失业的工厂工人	29 211	1 295
郎卡郡工人应得的最低限量 (按男女人数相等计算)	28 600	1 330

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 $\frac{60}{125}$ 完全得不到啤酒，28% 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 7 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 $24\frac{3}{4}$ 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 $7\frac{3}{4}$ 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 $11\frac{1}{4}$ 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 9.9 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 4 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 11 盎斯；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 8 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 5 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 $7\frac{1}{4}$ 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 $18\frac{1}{4}$ 盎斯；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 13.6 盎斯。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 2 先令 $2\frac{1}{2}$ 便士，女缝工 2 先令 7 便士，皮手套工人 2 先令 $9\frac{1}{2}$ 便士，制鞋工人 2 先令 $7\frac{3}{4}$ 便士，织袜工人 2 先令 $6\frac{1}{4}$ 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 1 先令 $8\frac{1}{2}$ 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¹¹³⁾

(113) 《公共卫生。第 6 号报告。1863 年》1864 年伦敦版第 232、233 页。

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末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这真令人痛苦，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以使工人维持生活……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114)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

(114)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4,15页。

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¹¹⁵⁾，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

(115) “任何情况都不象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死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

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兽而不象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116)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宜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 20 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 1 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 20 年前糟糕得多。”(117) “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118)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119)

(116) 《公共卫生。第 8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14 页注。

(117) 同上，第 89 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寻事，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 56 页)

(118) 同上，第 62 页。

(119) 《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 年》。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象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120)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

“不久前，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家庭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121)。

贫民习艺所已经有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近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从中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哩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 581 人，而且还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

(120) 《公共卫生。第 8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91 页。

(121) 同上，第 88 页。

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122)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 10 万人口的城市。只有 5 个城市超过 5 万人。而现在，超过 5 万人的城市已有 28 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方让空气自由流通。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123)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

(122) 《公共卫生。第 8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89 页。

(123) 同上，第 56 页。

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34 000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新堡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124)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便士涨到了3先令。汉特医生说：

“太恩河畔新堡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125)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或者，有时市政官员终于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象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象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布莱得弗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1861年那里还有1 751栋没有住人

(124)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9页。

(125) 同上，第50页。

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自然，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¹²⁶⁾，

(126) 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 122 号	1 间房	16 人
拉姆利街 13 号	1 间房	11 人
鲍威尔街 41 号	1 间房	11 人
波特兰街 112 号	1 间房	10 人
哈迪街 17 号	1 间房	10 人
北街 18 号	1 间房	16 人
北街 17 号	1 间房	13 人
魏曼街 19 号	1 间房	8 个成年人
乔威特街 56 号	1 间房	12 人
乔治街 150 号	1 间房	3 家
莱福场马丽门 11 号	1 间房	11 人
马歇尔街 28 号	1 间房	10 人
马歇尔街 49 号	3 间房	3 家
乔治街 128 号	1 间房	18 人
乔治街 130 号	1 间房	16 人
爱德华街 4 号	1 间房	17 人
[乔治街 49 号]	1 间房	2 家】
约克街 34 号	1 间房	2 家
咸饼街	2 间房	26 人

地 下 室

瑞琴特广场	1 个地下室	8 人
爱克街	1 个地下室	7 人
罗伯茨街 33 号	1 个地下室	7 人
普腊特后街（炼铜场）	1 个地下室	7 人
埃本尼泽街 27 号	1 个地下室	6 人

(《公共卫生。第 8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111 页)

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莱得弗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布莱得弗德的贫民诊所医生贝尔在他 1865 年 9 月 5 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一个 1 500 立方呎的地下室里住着 10 个人…… 在文辛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 223 栋房子住着 1 450 人，可是只有 435 个床铺和 36 个厕所…… 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 3.3 人，有些甚至睡 4—6 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面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127)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尔。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重。”(128)

(c) 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

(127) 《公共卫生。第 8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114 页。

(128) 同上，第 50 页。

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¹²⁹⁾ 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 1 个、2 个或 3 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 2 先令、3 先令或 4 先令。⁽¹³⁰⁾ 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 年 9 月，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诺克斯教区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大约 12 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留伊斯海姆到汤布里季的铁路工程开始了。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窗前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 7 月底，他再

(129) 《公共卫生。第 7 号报告》1865 年伦敦版第 18 页。

(130) 同上，第 165 页。

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9月9日凯尔桑医生向我报告说，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的病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131)。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132)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

(131)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注。恰佩尔-恩-列-弗利特联合教区的济贫所监督向中央注册局局长¹⁷⁷报告说：“在达夫霍斯，在小山似的石灰渣堆上挖了许多小窑洞。这些洞穴就是雇来修筑铁路的掘土工人和其他工人的住处。这些洞穴狭窄、潮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厕所。除了在顶上凿一个小孔兼作烟囱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花十分猖獗，已经<在这些穴居人之中>造成几起死亡。”(同上，注2)

(132) 第460页及以下各页^①所引述的详细材料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

^① 见本卷第542—549页。——编者注

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诸森伯兰和德勒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建筑地段很狭小，却胡乱盖了许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 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驻扎。”(133)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 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 所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 这个词和 *bondage* [依附]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 12 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某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134)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

(133) 《公共卫生。第 7 号报告》1865 年伦敦版第 180, 182 页。

(134) 同上，第 515, 517 页。

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 21 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造起象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地主就会马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 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象样的住宅的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 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个工业移民团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135）

(d) 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 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

（135）《公共卫生。第 7 号报告》1865 年伦敦版第 16 页。

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期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1867年3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¹³⁶⁾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现在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福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 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 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

(136) “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 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画，上面写着以下值得注意的字句：‘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 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1789年事变的不祥之兆…… 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1867年1月20日《雷诺新闻》）

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象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 5 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 3 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 7 000 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 6 个月或 8 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拉尔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 27 周的铁匠。我看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 3 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 26 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 5 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点地增加到 20 英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 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

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 19 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 1866 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中心。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 4 万人……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 4 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1867 年 4 月 5 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

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郎56生丁,妇女是89生丁,男孩是56生丁,女孩是55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1 068法郎……我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1日的工资额	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	1.56法郎	468法郎
母亲	0.89法郎	267法郎
儿子	0.56法郎	168法郎
女儿	0.55法郎	165法郎
	合计	1 068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和不足额如下:

	支出额	不足额
水兵的营养.....	1 828 法郎	760 法郎
士兵的营养.....	1 473 法郎	405 法郎
囚犯的营养.....	1 112 法郎	44 法郎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1847—1849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63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13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一旦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贫民名册。”(137)

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协会呼吁书：佛来米人，前进！》1860年布鲁塞尔版第12页）全比利时共有93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9万户，共45万人；城乡下层中产阶级家庭39万户，共195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45万户，共225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在这45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

(137) 杜克佩西奥《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第151、154、155、156页。

20万户以上！

(e) 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察家，我们从他关于1771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业工人同他们十四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¹³⁸⁾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1777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40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处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¹³⁹⁾

(138) 詹姆斯·爱·撒·罗杰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0页。这部著作是辛勤劳动的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头两卷只包括1259—1400年时期。第二卷全是统计资料。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

(139)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5、11页。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 1737 年到 1777 年几乎降低了 $\frac{1}{4}$ 即 25%。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140)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 1770 年至 1780 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 年至 1771 年是 90 品脱，到伊登时代（1797 年）已经只有 65 品脱，而到 1808 年时则只剩下 60 品脱了。(141)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及其行政机关在 1795 年和 1814 年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糊口的

(140) 理查·普莱斯《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 年伦敦第 6 版第 2 卷第 158、159 页。作者在第 159 页上指出：“现在一个工作的名义价格不过比 1514 年提高 3 倍，或者最多不过提高 4 倍。可是现在谷物价格却涨了 6 倍，肉类和衣服的价格涨了将近 14 倍。因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现在的劳动价格同生活费用相比较，看来大概还抵不上过去的一半。”

(141) 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 年伦敦版第 26 页。关于十八世纪末的情况，参看伊登《贫民的状况》一书。

名义数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1795年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6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个5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4便士。⁽¹⁴²⁾可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 $\frac{1}{4}$ 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¹⁴³⁾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1830年斯温暴动²¹⁸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象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¹⁴⁴⁾。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

(142) 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80页。

(143) 同上，第213页。

(144) 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2页。

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145)

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¹⁴⁶⁾列举了布兰福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²¹⁹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

(145) 《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47页。

(146) 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45年3月29日第290页。

儿童 人数	全家 人口	男 子 周 工 资		儿 童 周 工 资		全 家 每 周 收 入		每 房 周 租		扣 除 房 租 后 每 周 净 收 入		平 均 每 人 每 周 收 入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先 令	便 士
村 庄 一													
2	4	3	—	—	—	8	—	2	—	6	—	1	6
3	5	8	—	—	—	8	—	1	6	6	6	1	3½
2	4	8	—	—	—	8	—	1	—	7	—	1	9
2	4	8	—	—	—	8	—	1	—	7	—	1	9
6	8	7	—	1	6	10	6	2	—	8	6	1	¾
3	5	7	—	2	—	7	—	1	4	5	8	1	1½
村 庄 二													
6	8	7	—	1	6	10	—	1	6	8	6	1	¾
6	8	7	—	1	6	7	—	1	3½	5	8½	—	8½
8	10	7	—	—	—	7	—	1	3½	5	8½	—	7
4	6	7	—	—	—	7	—	1	6½	5	5½	—	11
3	5	7	—	—	—	7	—	1	6½	5	5½	1	1
村 庄 三													
4	6	7	—	—	—	7	—	1	—	6	—	1	—
3	5	7	—	2	—	11	6	—	10	8	—	2	1½
0	2	5	—	2	6	5	—	1	—	4	—	2	—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¹⁴⁷⁾，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

(147) 为此目的，土地贵族自己从国库中贷给自己一笔低利资金(当然是通过议会)，而租地农场主却必须以双倍的利息偿还给这班贵族。

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¹⁴⁸⁾ 同时，从 1846 年到 1865 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 464 119 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 1851 年的 1 241 269 人减少到 1861 年的 1 163 217 人。⁽¹⁴⁹⁾ 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¹⁷⁷有理由说：“1801 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¹⁵⁰⁾。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

(148) 中等租地农场主的减少特别可以从下列各栏人口调查情况中看出：“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一句话，就是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自己家庭的成员。这些栏的总人数 1851 年为 216 851 人，到 1861 年就只有 176 151 人了。从 1851 年到 1871 年，英格兰 20 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 900 多个，50—75 英亩的租地农场由 8 253 个减到 6 370 个，所有 100 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相反，在这 20 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却增加了，300—500 英亩的租地农场由 7 771 个增加到 8 410 个，500 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 2 755 个增加到 3 914 个，1 000 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 492 个增加到 582 个。

(149) 牧羊人总数由 12 517 人增加到 25 559 人。

(150) 《186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 年伦敦版第 36 页。

们 1770 年到 1780 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¹⁵¹⁾ 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¹⁵²⁾…… 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¹⁵³⁾。“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¹⁵⁴⁾

1863 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中。其中写道：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¹⁵⁵⁾ 而“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业工人的一半”⁽¹⁵⁶⁾。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

(151) 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 年牛津版第 1 卷第 693 页。“农民又成了农奴。”(同上，第 10 页)罗杰斯先生属于自由学派，他是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私人朋友，因此绝不是“过去时代的赞颂者”²²⁰。

(152) 《公共卫生。第 7 号报告》1865 年伦敦版第 242 页。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房屋出租者一听说工人挣得多一些就提高房租，而租地农场主一看到“工人的妻子找到工作”就降低工人的工资(同上)。

(153) 同上，第 135 页。

(154) 同上，第 134 页。

(155)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 年伦敦版第 42 页第 50 号。

(156) 同上，第 77 页。《大法官备忘录》。

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 5056 号)“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 5057 号)“你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第 3047 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 3048 号)(157) 其中还写道：“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158)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每周营养量(158a)

(单位：盎斯)

	含氮成分	无氮成分	矿物质	合计
波特兰监狱的犯人	28.95	150.06	4.68	183.69
皇家海军水兵	29.63	152.91	4.52	187.06
士 兵	25.55	114.49	3.94	143.98
马车制造工人	24.53	162.06	4.23	190.82
排字工人	21.24	100.83	3.12	125.19
农业工人	17.73	118.06	3.29	139.08

1863 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都已经知道了。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157)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 年伦敦版第 2 卷证词。

(158) 同上，第 1 卷附录第 280 页。

(158a) 同上，第 274—275 页。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大，因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159)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的总数由 1851 年的 288 277 人减少到 1861 年的 204 962 人。斯密斯医生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会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挣几个钱补贴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160)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161)

(单位：克冷)

	碳 素	氮 素
英格兰……	40 673	1 594
威尔士……	48 354	2 031
苏格兰……	48 980	2 348
爱尔兰……	43 366	2 434

(159) 《公共卫生。第 6 号报告。1863 年》第 238、249、261、262 页。

(160) 同上，第 262 页。

(161) 同上，第 17 页。英格兰农业工人得到的牛奶量只等于爱尔兰农业工人的 $\frac{1}{4}$ ，面包量只等于 $\frac{1}{2}$ 。十九世纪初，阿·杨格在他的《爱尔兰游记》中就指出，爱尔兰工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些。理由很简单：贫穷的爱尔兰租地农场主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场主要人道得多。至于说到威尔士，正文中引用的资料不适用于它的西南地区。“当地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癫痫病等等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贫困造成的。当地农业工人一天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并且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够找到，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

的生活费大约为 5 便士，在许多地区，租地农场主（他自己也很拮据）付给的还要少些。大量的葱花麦面汤或燕麦粥，加上一片干得象桃心木一样硬、几乎不值得费很大的劲去消化的咸肉，或者加上一小块油脂当作调味品，这就是农业工人日复一日的午餐……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这些工人来说，不过是在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下用廉价的棉织品代替了结实的家庭手织棉布，用‘名义上的’茶代替了浓烈的饮料…… 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粘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粘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束束蓬松的湿草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有些曾在夜间不得不在这类小屋里呆过几小时的助产医生们描绘说，他们的双脚曾怎样陷在泥泞里，他们曾经怎样不得不在墙上挖一个小洞（这很容易办到！）来吸点新鲜空气。各阶层的大量证人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身体孱弱，常常患癫痫病，在这方面确实不乏证据…… 卡马登郡和卡尔迪根郡的教区官吏的报告也清楚地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这就是白痴病的流行。下面再谈谈气候情况。在威尔士全境，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刮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了暴雨，受侵袭的主要是丘陵地带的山坡。树木稀少，只在有遮挡的地方才能见到，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全被大风刮倒了。小屋都蜷缩在山脚下，往往是在山沟里或者石坑里，只有最小的羊和本地的牛才能在这种牧场上生活…… 年青人都跑到格勒莫冈郡和蒙默思郡的东部矿区去了…… 卡马登郡是培养矿工的学校和他们的残废院…… 人口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尔迪根郡：

	1851 年	1861 年
男人………	45 155	44 446
女人………	52 459	52 955
	97 614	97 401。”

（汉特医生的报告，散见《公共卫生。第 7 号报告。1864 年》1865 年伦敦版第 498—502 页）

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毫无办法可想，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象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象雨露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这就是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162) 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 大地主们(163)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能够象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调查，在最近 10 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兰的 821 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无法定居的人〈即无法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1861 年居民人数虽然比 1851

(162) 1865 年这项法律有了某些改进。但是人们从经验中很快就知道，这种修补是无济于事的。

(163) 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close villages（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open villages（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

年增加了 $5\frac{1}{3}\%$ ，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 $4\frac{1}{2}\%$ ……汉特医生说，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游赏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164)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许从3哩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收容下来。在那些正走向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从来不加修缮，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收容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3—4哩远。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6—8哩路，而这好象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英格兰农业工人就硬塞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怕的特点(165)……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

(164) 这种游赏村庄华而不实，如同叶卡特林娜二世巡游克里木时所看到的村庄一样。近来，连牧羊人往往也被赶出这些村庄了。例如，在哈尔伯勒市场附近有一个占地将近500英亩的牧羊场，这里只需要一个男劳力。以前，为了减少在这个辽阔的草原——莱斯特和北安普顿的美丽的牧场上进行长途跋涉，牧羊人通常可以在农场上得到一所小屋。而现在每周付给他13先令住宿费，他必须到很远的开放村庄去找住处了。

(165) “工人住宅〈在开放村庄里，这些住宅当然总是挤得满满的〉通常都是盖成一排一排的，后墙紧挨着建筑投机家声称属于他的小块地皮的边缘。因此这些住宅只有从正面才能透进阳光和空气。”(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5页)“在农村中，啤酒酒店老板或小店主往往同时就是房屋出租者。在这种情况下

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166)这也许是一座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虐待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

下，农业工人除了租地农场主外，又有了这第二个主人。他同时还必须是这个主人的顾客。农业工人每周收入 10 先令，除每年付房租 4 镑外，还得按小店主随意规定的價格向他购买一点茶叶、糖、面粉、肥皂、蜡烛和啤酒。”(同上，第 132 页)这些开放村庄实际上成了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的“流放地”。许多小屋是不折不扣的旅店，附近地区的一切流氓都在那里出进。村民和他的家庭虽然在最污浊的环境中也往往能惊人地保持纯朴正直的品格，但是在这种地方也不免要堕落下去。显贵的夏洛克们在谈到建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也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这自然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非开放村庄和游赏村庄”乃是“开放村庄”的发源地，并且没有后者前者也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开放村庄中的小地主，绝大部分农业工人就得在他们劳动的田庄的树下过夜了。”(同上，第 135 页)“开放村庄”和“非开放村庄”的制度，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和整个东部地区非常流行。

(166) “房屋出租者〈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直接或者间接地靠别人的劳动致富，他每周给这个人 10 先令工资，然后每年再从这个穷鬼身上榨取 4 镑或 5 镑房租。这种房子在公开市场上连 20 镑也不值，但是由于地主的权力却保持着人为的价格，地主会说：‘要末住我的房子，要末滚你的蛋，没有我的证明，看你到哪里去找住处……’如果有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想到铁路上去铺轨或者到采石场去干活，同样的权力又会对他说：‘要末拿这样的低工资给我干下去，要末在提出声明后过一个星期就滚蛋，有猪你也弄走，往后看你从你的菜园里长的马铃薯中能搞到什么’。如果地主 〈或租地农场主〉觉得还是采取别的办法更有利，这时他往往就抬高房租，以作为对工人辞工的惩罚。”(同上，第 132 页)

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总是用几乎一成不变的词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再三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定会使人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167)…… 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白金汉郡温格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弗来的年轻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9人中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格，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10个人。几星期以前这个房间曾住过13个儿童’。(168)

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座小屋中，2195座小屋

(167) “新婚夫妇对于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成年弟妹不会有什么好影响；虽然不一定要记下实例，但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说法：血亲通奸使妇女招致极大痛苦，甚至常常死亡。”（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7页）有个曾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过多年侦探的农村警官，在谈到他们村的姑娘时说：“她们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这样道德败坏，这样放荡不羁和厚颜无耻，这是我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侦探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们象猪一般地生活，小伙子和大姑娘，母亲和父亲，统统睡在一个房间里。”（《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附录第77页第155号）

(168) 敬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9—14页。

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 930 座小屋有 2 间卧室，250 座小屋有 2 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 12 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1. 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卧室大约长 12 呎、宽 10 呎，还有许多比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 5 呎 6 吋的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 3 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理查逊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象行屈膝礼的女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象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 17 座房屋中，只 4 座有卧室一间以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 3 个大人和 3 个孩子，另一座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 6 个孩子，如此等等。

登顿：房租昂贵，4 镑至 5 镑，男子每周工资 10 先令。他们都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 6 个大人和 4 个孩子的卧室，房租是 3 镑 10 先令。登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 15 呎，宽 10 呎，租金 3 镑。在调查过的 14 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两间卧室。村前不远有一座房屋，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 9 吋。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3 个大人和 5 个小孩挤做一团。登顿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联合教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2. 伯克郡

宾汉姆：1864年6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4个孩子。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个孩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是很难实行隔离的，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H家的房租每周1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8便士(每周)；长14呎6吋，宽7呎，厨房高6呎；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的。

3. 白金汉郡：

在1000英亩土地上有30座小屋，大约住着130—140人。布莱敦哈姆教区占地1000英亩，1851年有36座房屋，住着84个男人和54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1861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有98人，女子87人，10年间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而房屋却减少了一座。

温兹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大，因为极不象样的小屋每周也要付1先令或1先令3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20%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4哩路，有人问他能

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象我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兹洛附近的廷克尔斯-恩特，一间卧室长 11 呎，宽 9 呎，最高处 6 呎 5 吋，住着 4 个大人和 5 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 11 呎 7 吋，宽 9 呎，高 5 呎 10 吋，住着 6 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 1 先令 4 便士到 2 先令。在调查过的 16 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 10 先令的收入。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 4 呎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房子倒有许多自然的通风口。

4. 铁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8—9 个人硬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 6 个大人各带着 1—2 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

5. 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 22 个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面积为 3 443 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1851 年有房屋 145 座，到 1861 年只剩了 110 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

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莱斯教区，1851年252人住在61座房屋里，而到1861年，262人却挤在49座房屋里。在面积为1 827英亩的巴西耳登教区，1851年157人住35座房屋，10年以后，180人却只住27座房屋。在总面积为8 449英亩的芬格林格霍、南芬桥、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1851年1 392人住316座房屋，到1861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1 473人却只住249座房屋。

6. 赫勒弗德郡：

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3磅或4磅的租金出租这些小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9先令！

7. 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1851年有房屋87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1 720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19座小屋。居民1831年452人，1851年382人，1861年341人。调查过的14座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其中一座小屋住着一对夫妇，3个成年儿子、1个成年姑娘、4个小孩，共计10人。另一座住着3个大人、6个小孩。有一个房间长12呎10吋，宽12呎2吋，高6呎9吋，住着8个人；连房内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130立方呎。在这14间卧室内，共住着34个大人和33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frac{1}{4}$ 英亩)10或12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粪便的

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8. 林肯郡：

兰格托弗特：在莱特的房屋中住着1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5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12呎2吋，宽9呎5吋。房屋总面积长21呎3吋，宽9呎5吋。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1先令3便士。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6哩远，他每天来回要走12哩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下面是兰格托弗特教区12座房屋的统计资料，这些房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共住着38个大人和36个小孩。

兰格托弗特的12座房屋

房屋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房屋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1	1	3	5	8	1	1	3	3	6
1	1	4	3	7	1	1	3	2	5
1	1	4	4	8	1	1	2	0	2
1	1	5	4	9	1	1	2	3	5
1	1	2	2	4	1	1	3	3	6
1	1	5	3	8	1	1	2	4	6

9. 肯特郡：

肯宁顿，1859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卫生调查。他发现，在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却没有建造新的。

在一个地区有 4 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 4 个房间，其大小如下：

厨房.....	9呎 5吋 × 8呎 11吋 × 6呎 6吋
洗濯间.....	8呎 6吋 × 4呎 6吋 × 6呎 6吋
卧室.....	8呎 5吋 × 5呎 10吋 × 6呎 3吋
卧室.....	8呎 3吋 × 8呎 4吋 × 6呎 3吋

10. 北安普顿郡：

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路尔：这 3 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 20—30 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栽种的谷物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 2—3 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一边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the parson and gentlefolks seem frit to death at them»* (168a)。

弗路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对夫妇和 4、5 或 6 个孩子，或者是住着 3 个大人和 5 个孩子，或者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 6 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 8 个大人和 9 个大人。

11. 威尔特郡：

斯特腊顿：调查过 31 座房屋，其中 8 座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个教区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 1 先令 3 便士，住

(168a) “牧师和贵族好象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着4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了还算象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12. 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1851年到1861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4.2人增加到4.6人。

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500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之类能特别吸引人的东西，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在巴德西，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

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¹⁶⁹⁾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¹⁷⁰⁾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

(169) “农业工人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因为地主有权要求他从事强制劳动，就象国家对待士兵一样。他的劳动，也象士兵的劳动一样，得不到按市场价格支付的报酬。象士兵一样，他也是在年幼无知、只熟悉本行职业和本乡本土的时候就被人抓去的。他必须早婚并遵守各种居住法，就象士兵必须应征入伍并遵守军法一样。”(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2页)有时也例外地有某个软心肠的地主对他一手造成的荒凉景象感到惋惜。例如莱斯特伯爵在人们向他祝贺胡卡姆城堡落成的时候就说：“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领地上是非常郁闷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子外，再看不到别的房子。我成了巨人城堡中的巨人，把我所有的邻居都吃光了。”

(170) 近几十年来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和把“过剩的”农村人口赶往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里，在“过剩”人口的发源地，居住条件和其他条件也同样越来越坏。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真实“农业无产阶级”，请参看前面引过的科兰的《政治经济学》和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第88页及以下各页²²¹)。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71.14%。最近5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早在1846年，比埃尔·杜邦就在自己的《工人之歌》中写道：

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171)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定昂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培德福德和拉特兰德各郡的个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来是些沼泽，或者象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 400—1 000 英亩的租地农场上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 100 英亩（1 英亩 = 40.49 公亩或 1.584 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

“穿破衣，住洞窟，
屋檐底下，垃圾堆里找栖身处，
猫头鹰，小扒手，这些黑夜之友啊，
齐来和我们同住。”

(17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6 号报告，也就是最后一次报告，于 1867 年 3 月底公布，专门谈农业中的帮伙制度。

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我的租地占地 320 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172)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 10 人至 40 或 50 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13—18 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 13 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6—13 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飘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胆识和才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173)，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起干活来，正象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拼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 6—8 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

(17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6 号报告》，证词第 37 页第 173 号。

(173) 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 500 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

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 5、6 哩有时甚至 7 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左右各由一个剽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²²² 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174)①}，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并且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

(174) “卢德弗德郡有半数少女让帮伙制度毁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6 号报告》，附录第 6 页第 32 号）

①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淫乱罪恶之城，见圣经《创世记》。——译者注

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¹⁷⁵⁾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¹⁷⁶⁾或地主⁽¹⁷⁷⁾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¹⁷⁸⁾，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¹⁷⁹⁾林肯郡等地的

(175) “最近几年来，这种制度异常流行。在某些地区，这种制度刚实行不久，在另一些实行较久的地区，就有更多和更年幼的儿童被卷到帮伙里面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79页第174号)

(176) “小租地农场主不使用帮伙。”“贫瘠的土地上不使用帮伙，只有每英亩能提供2镑至2镑10先令地租的土地上才使用帮伙。”(同上，第17页和第14页)

(177) 有一位地主感到地租收入对他太合胃口了，他愤然地对调查委员会说，一切喧扰的产生只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名称不好。如果不叫“帮伙”，而叫“少年工农业合作自立协会”，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178) 一个当过帮头的人说：“帮伙劳动比任何其他劳动都便宜，这就是人们所以使用它的原因。”(同上，第17页第14号)一个租地农场主说：“帮伙制度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无疑是便宜的，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最有害的。”(同上，第16页第3号)

(179) “毫无疑问，现在由帮伙中的儿童干的许多活过去都是由男子和妇女干的。在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现在失业的男子比以前更多了。”(同上，第43页第202号)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农业地区，特别是产粮区，由于农民移居国外以及铁路使他们便于流往大城市，劳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个“我”是某个大地主在农村的代理人)认为儿童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80页第180号)。英格兰农业地区的劳力问题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人口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从而使农业工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

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¹⁸⁰⁾

(f) 爱 尔 兰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 222 664人，1851年减少到6 623 985人，1861年减少到5 850 309人，1866年减少到5 500 000人，即几乎减少到1801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

(180) 前面我曾引用过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说明儿童死亡率时顺便谈到了帮伙制度，这个报告一直是报刊从而是英国公众所不知道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麇集在林肯郡的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国教会的牧师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制度在他们的庄园内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上流报刊则大谈特谈农村居民的极端堕落，他们竟肯把亲生儿女卖身为奴！其实，农村居民处在“显贵们”把他们紧紧束缚住的那种万恶的条件下，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吃掉，也不足为奇。真正值得惊奇的，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好品德。官方报告的起草人证明，甚至在帮伙制度盛行的地区，父母们对这种制度也非常反感。“在我们收集的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证明，如果有一项强制法律能够使父母们抵制他们经常遇到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多半会感激不尽。教区官吏或者雇主们经常用解雇威胁他们，强迫他们把孩子送去劳动，而不是送去上学……时间上和精力上造成种种浪费，农民全家由于过度的无益的劳累而含辛茹苦，父母们眼看自己的子女由于小屋居住过挤或者帮伙制度的恶劣影响而道德败坏，——所有这一切在劳苦的穷人的心中会引起怎样的感触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用不着详加叙述。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许多痛苦的处境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是绝不会表示赞同的，但是他们无力反抗这种处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XX页第82号；第XXIII页第96号）

始的，此后不到 20 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 $\frac{5}{16}$ 以上。⁽¹⁸¹⁾ 1851 年 5 月到 1865 年 7 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 1 591 487 人，而在 1861 年到 1865 年最近 5 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 500 000 人以上。住宅从 1851 年到 1861 年减少了 52 990 座。从 1851 年到 1861 年，15—30 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 61 000 个，30 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 109 000 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 120 000 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 15 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量总的来说也减少了。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 1861 年到 1865 年这 5 年就够了。这 5 年间，有 500 000 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 330 000 以上（见 A 表）。

A 表 牲畜头数⁽¹⁸²⁾

年份	马		牛		
	总数	减少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619 811	—	3 606 374	—	—
1861	614 232	5 579	3 471 688	134 686	—
1862	602 894	11 338	3 254 890	216 798	—
1863	579 978	22 916	3 144 231	110 659	—
1864	562 158	17 820	3 262 294	—	118 063
1865	547 867	14 291	3 493 414	—	231 120

(181) 爱尔兰的人口：1801 年 5 319 867 人，1811 年 6 084 996 人，1821 年 6 869 544 人，1831 年 7 828 347 人，1841 年 8 222 664 人。

(182) 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一些，结果看起来更加糟糕。例如，1865 年有羊 3 688 742 只，而 1856 年是 3 694 294 只；1865 年有猪 1 299 893 头，而 1858 年是 1 409 883 头。

年份	羊			猪		
	总数	减少	增加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3 542 080	—	—	1 271 072	—	—
1861	3 556 050	—	13 970	1 102 042	169 030	—
1862	3 456 132	99 918	—	1 154 324	—	52 282
1863	3 308 204	147 928	—	1 067 458	86 866	—
1864	3 366 941	—	58 737	1 058 480	8 978	—
1865	3 688 742	—	321 801	1 299 893	—	241 413

根据上表可得出如下结果：

马	牛	羊	猪
绝对减少	绝对减少	绝对增加	绝对增加
71 944	112 960	146 662	28 821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中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厚皮菜、甜菜、白菜、胡萝卜、美洲防风、小豌豆等等。

B 表 耕地和草地(即牧场)的面积的增减情况

(单位：英亩)

年份	谷物地	蔬菜地		草地和三叶草地		亚麻地		耕地及畜牧地总面积	
	减少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1861	15 701	36 974	—	47 969	—	—	—	19 271	81 373
1862	72 734	74 785	—	—	6 623	—	—	2 055	138 841
1863	144 719	19 353	—	—	7 724	—	—	63 922	92 431
1864	122 437	2 317	—	—	47 486	—	—	87 761	—
1865	72 450	—	25 421	—	68 970	50 159	—	28 218	—
1861—65	428 041	103 013	—	—	82 834	—	—	122 850	330 370

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 470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 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 667夸特，其中小麦减少48 999夸特，燕麦减少166 605夸特，大麦减少29 892夸特，等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446 398吨，等等（见C表）。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应当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C和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入。

D表 应纳所得税的收入(184)

(单位：镑)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A项						
地租	12 893 829	13 003 554	13 398 938	13 494 091	13 470 700	13 801 616
B项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	2 765 387	2 773 644	2 937 899	2 938 823	2 930 874	2 946 072
D项						
工业等利润	4 891 652	4 836 203	4 858 800	4 846 497	4 546 147	4 850 199
A至E						
各项合计	22 962 885	22 998 394	23 597 574	23 658 631	23 236 298	23 930 340

(184)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

C表 耕地面积、每英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减(1865年和1864年比较表)(183)

产 品	耕 地 英 亩 数		1865 年 的 增 减 情 况		每英亩产量		1865 年 的 增 减 情 况		总 产 量		1865 年 的 增 减 情 况	
	1864	1865	+	-	1864	1865	+	-	1864	1865	+	-
小 燕麦	276 483	266 989	-	9 494	13.3	(吨)	(吨)	0.3	873 782	826 783	(夸特)	48 999
大 华 尔 麦	1 814 886	1 745 228	-	69 658	12.1	12.3	0.2	-	7 826 332	7 659 727	-	166 605
黑 麦	172 700	177 102	4 402	-	15.9	14.9	-	1.0	761 909	732 017	-	29 892
麦 麦	8 894	10 091	1 197	-	16.4	14.8	-	1.6	15 160	13 939	-	1 171
马铃薯	1 039 724	1 066 260	26 536	-	8.5	10.4	1.9	-	12 680	18 364	5 684	-
芜 菱	337 355	334 212	-	3 143	10.3	9.9	-	0.5	4 312 388	3 865 990	(吨)	446 398
厚 皮 菜	14 073	14 389	316	-	10.5	13.3	2.8	-	3 467 059	3 301 683	-	165 976
白 菜	31 821	33 622	1 801	-	9.3	10.4	1.1	-	147 284	191 937	44 653	-
亚 麻	301 693	251 433	-	50 260	34.2*	25.2*	-	9.0*	297 375	350 252	52 877	-
干 草	1 609 569	1 678 493	68 924	-	1.6	1.8	0.2	-	64 506	39 561	-	24 945
*	单位为吨(1吨合 14 磅)											

* 单位为吨(1吨合 14 磅)

(183) 本文中的数字是按《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年每郡每年种植某些农作物的亩数和牲畜头数概况》(1860年都柏林版)以及以后各年的统计和《爱尔兰农业统计。1866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7年都柏林版)的材料汇编的。我们知道，这些统计资料是每年向议会提出的官方统计资料。

第2版补注：官方统计表明，1872年的耕地面积比1871年减少134 915英亩。芫菁、厚皮菜等菜类种植面积“增加”了；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是：小麦减少16 000英亩，燕麦减少14 000英亩，大麦和黑麦减少4 000英亩，马铃薯减少66 632英亩，亚麻减少34 667英亩，草地、三叶草地、小白菜和油菜籽播种面积减少30 000英亩。小麦种植面积在最近5年中逐年减少的情况下：1868年为285 000英亩，1869年为280 000英亩，1870年为259 000英亩，1871年为244 000英亩，1872年为228 000英亩。按概算计算，1872年马增加2 600匹，牛增加80 000头，羊增加68 600只，猪减少236 000头。

从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58%。下表表明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E表 爱尔兰的D项利润收入(60镑以上者)(185)

	1 8 6 4 年		1 8 6 5 年	
	镑	分配人数	镑	分配人数
年总收入.....	4 368 610	17 467	4 669 979	18 081
60镑以上100镑以下的年收入.....	238 726	5 015	222 575	4 703
年总收入中.....	1 979 066	11 321	2 028 571	12 184
年总收入中尚余.....	2 150 818	1 131	2 418 833	1 194
其中.....	1 073 906	1 010	1 097 927	1 044
	1 076 912	121	1 320 906	150
	430 535	95	584 458	122
	646 377	26	736 448	28
	262 819	3	274 528	3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也象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废止耕种，使农产品大大减少⁽¹⁸⁶⁾，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

(185) D项中年总收入的数字同前表不符，因为已经做了法律许可的一定扣除。

(186) 每英亩的产量相对地说减少了，但我们切不要忘记，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资料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

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变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 20 年来，特别是最近 10 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别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鼠疫¹¹⁹ 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

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186a)

爱尔兰 1846 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186b)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 1846 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步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 C 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

(186a) 因为爱尔兰被看作“人口原理”的乐土，所以托·萨德勒在发表他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之前，先出版了他的名著，《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 年伦敦第 2 版)。在该书中，他比较了各省的统计资料以及每一省里各郡的统计资料，并证明，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并不象马尔萨斯所设想的那样同人口成正比，而是同人口成反比。

(186b) 1851—1874 年期间，移居国外的总人数达 2 325 922 人。

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 100 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 $\frac{8}{10}$ 。^(186c)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 1861 年到 1866 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 表内 60—100 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 年）^(186d)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

^(186c) 第 2 版注：根据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 年版）一书中的一个统计表：100 英亩以下的农场占有土地的 94.6%，100 英亩以上者占有 5.4%。

^(186d)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 年都柏林版，并参看《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的征询》1861 年 3 月 8 日。

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 20 年来已经提高了 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 6—9 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为例证。

每人每周的平均生活费

日期	食	衣	合计
1848 年 9 月 29 日到 1849 年 9 月 29 日	1 先令 $3\frac{1}{4}$ 便士	3 便士	1 先令 $6\frac{1}{4}$ 便士
1868 年 9 月 29 日到 1869 年 9 月 29 日	2 先令 $7\frac{1}{4}$ 便士	6 便士	3 先令 $1\frac{1}{4}$ 便士

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187)

(187)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 年都柏林版第 29、1 页。

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187a)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187a)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

^(187a)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12页。

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内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187b)。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187c)，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187d) 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187e)；“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187f)；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187g)。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

(187b)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5页。

(187c) 同上，第27页。

(187d) 同上，第26页。

(187e) 同上，第1页。

(187f) 同上，第32页。

(187g) 同上，第25页。

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187h)。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 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187i)

这就难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

(187h)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 年都柏林版第 30 页。

(187i) 同上，第 21, 13 页。

林^① 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唯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上下工以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两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188）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

（188）《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96页。

① 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²²³

我们从E表可以看出，1864年，3个谋利者从总利润4 368 610镑中只捞去262 819镑，而1865年，同是这3位大“禁欲家”就从总利润4 669 979镑中捞去274 528镑；1864年，26个谋利者得到646 377镑，1865年，28个谋利者得到736 448镑；1864年，121个谋利者得到1 076 912镑，1865年，150个谋利者得到1 320 906镑；1864年，1 131个谋利者得到2 150 818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的一半，1865年，1 194个谋利者得到2 418 833镑，超过全年总利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庞大数额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国的治国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该排出30多万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是要求再放30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200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艾林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200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不难提出的。

1864年爱尔兰租地农场的数目和面积

(单位: 英亩)

1 1英亩以下 的租地农场	2 1—5英亩 的租地农场	3 6—15英亩 的租地农场	4 16—30英亩 的租地农场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48 653 25 394	82 037 288 916	176 368 1 836 310	136 578 3 051 343

5 31—50英亩 的租地农场	6 51—100英亩 的租地农场	7 100英亩以上 的租地农场	8 总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71 961 2 906 274	54 247 3 983 880	31 927 8 227 807	20 319 924(188a)

1851年到1861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前三类1英亩以下至15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被消灭。结果就产生了307 058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4口人，总人数就是1 228 232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的 $\frac{1}{4}$ 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921 174人移居国外。16至100英亩的4、5、6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788 761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1 709 532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350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是个穷国，而贫穷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

(188a) 总面积包括泥沼地和荒地。

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188b)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象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着，而爱尔兰人则在美洲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着。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社社员²²⁴ 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海上的老女皇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²²⁵

(188b) 在本书第三卷论述土地所有权的那一章，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稀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82页)中提到：“G博士中肯地指出：我们有了一个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地主和克尔特族小租地农民之间的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 它〈这场战争〉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1815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入谷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这种独占权突然消失了。即使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爱尔兰的耕地变成牧场、租地农庄积聚和小农被驱逐。1815—1846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起这种论调。只有像拉维涅那样“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1. 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

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末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神圣的义务。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

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贫行会的控制，摆脱贫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

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¹⁸⁹⁾

2. 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¹⁹⁰⁾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

(189) 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在这里，农奴在获得某种土地时效权之前，就已经得到解放。因此，解放立即使他们变成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又在大部分还是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找到了现成的新主人。在十五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²²⁶ 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190) “用自己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当

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得四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¹⁹¹⁾ 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¹⁹²⁾ 因此，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后分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

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 至少有 16 万个土地所有者靠耕种自己的小块 Freehold（自由地）*（Freehold 是完全自由支配的财产）*为生，他们连同家属在内要占总人口的 $\frac{1}{7}$ 以上。这些小土地所有者的平均收入…… 估计为 60—70 镑。根据计算，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多于租种别人土地的人。”（马考莱《英国史》1854 年伦敦第 10 版第 1 卷第 333—334 页）——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还有 $\frac{4}{5}$ 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同上，第 413 页）——我所以引用马考莱的话，是因为他作为系统的历史伪造者，是要尽量“砍掉”这类事实的。

（191） 决不要忘记，甚至农奴，不仅是他们宅旁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负有纳税义务的所有者），而且是公有地的共有者。“那里（在西里西亚）的农民是农奴。”但是，这些农奴占有公有地。“直到今天还无法使西里西亚人分割公有地，而在诺伊马尔克，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是非常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分割。”（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125、126 页）

（192） 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牺牲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

这些情况，加上代表十五世纪特点的城市繁荣，就使大法官福特斯居在其《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一书中十分雄辩地描述过的人民财富能够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情况是排斥资本财富的。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²²⁷）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哈里逊在其著作《英国概述》（载于霍林舍德的编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对小农的剥夺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写道：“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毁。哈里逊说：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 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保留下来，这类情况我也能谈一些。”

这些老的编年史的作者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

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影响。把大法官福特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困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说道：

“这时〈1489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场〈牧羊场等〉；定期租地、终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农靠年度租地生活）变成了领地。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会、什一税也衰落…… 国王和当时的议会为医治这一弊端表现出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 他们采取措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形成。”

1489年亨利七世颁布的第19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2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新规定这条法律。其中谈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规定重建那些荒废了的农场，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例等等。1533年的一项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拥有24 000只羊，于是限定不得超过2 000只。⁽¹⁹³⁾但是，人民的抱怨和从亨利七世以来150年内相继颁布的禁止剥夺小租地农民和农民的法律，都同

(193) 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乌托邦》，罗宾逊译，阿尔伯编，1869年伦敦版第41页）。

样毫无效果。它们毫无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经不自觉地透露给我们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 29 节中写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它们就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193a）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 4 英亩土地，并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1627 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丰特米尔的罗吉尔·克罗克在丰特米尔的领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时，还因没有拨出 4 英亩土地作为小屋的永久附属物而被判罪；1638 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还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监督旧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关于 4 英亩土地的法律的实施；克伦威尔还禁止在伦敦周围 4 哩的地区内修建未附有 4 英亩土地的房屋。在十

（193a） 培根说明了自由的富裕农民和优秀的步兵之间的联系。“保持足够的租地，以保证强壮的男子不致贫困，使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牢牢地掌握在自耕农，即处于贵族和茅舍贫农、雇农之间的中等地位的人的手里，这对维持王国的威力和风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有权威的军事专家一致认为……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但是，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步兵，就需要不是在奴役或贫穷中而是在自由和小康的状况下成长的人。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上流人士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村居民和庄稼人却是他们的单纯的劳动者或雇农，却是茅舍贫农，即有栖身之处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支优秀的骑兵，但决不会有—支坚忍卓绝的步兵……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居民实际上都是由贵族和贫穷的农民组成……因此，它们只好雇用瑞士等国的人来当自己的步兵营的士兵，结果形成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人口众多，但士兵很少。”（《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文转载自 1719 年肯尼特《英国》，1870 年伦敦版第 308 页）

八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1—2英亩土地，他还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点点土地，就是很幸运的了。汉特医生说：

“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亩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¹⁹⁴⁾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过来。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¹⁹⁵⁾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巡视英国之后叫喊说：“穷人到处受苦难。”²²⁸在她执政的第四十三年，终于不得不通过征收济贫税而正式承认有需要救济的贫民。

“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说明起草该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惯例，未附有任何说明性的序言就把该法律公布了。”⁽¹⁹⁶⁾

查理一世十六年颁布的第4号法令宣布这项法律是永久性的，事实上只是在1834年，这项法律才获得新的更严格的形式

(194) 汉特医生《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4页。——⁴〈旧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现在看来对于工人是太多了，甚至能使他们变成小租地农民。”（乔治·罗伯茨《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第184页）

(195) “贫民享有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权利是由旧法令明文规定的。”（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第2卷第804、805页）

(196) 威廉·科贝特《新教改革史》第471节。

式。(197)宗教改革的这些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响。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198)

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马考莱也承

(197) 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出新教的“精神”。在英格兰南部，若干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租地农场主聚首集议，拟就了关于正确解释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十个问题。他们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皇家律师斯尼格（后来在詹姆斯一世时曾任法官）对这十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九个问题是：本教区某些富有的租地农场主想出了一个能排除法令执行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的巧妙计划。他们建议在本教区设立一座监狱。每个贫民如不愿被投入上述监狱，就不予救济。其次，应当通知邻近居民，如果有人打算租赁这个教区的贫民，他可以在一定的日子，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愿出的最低价格。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认为，邻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愿劳动，但又没有财产或信用，以便获得租地或船舶来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这种人经过开导，可以对教区作一些很有益的事情。如果贫民在雇主的保护下死亡，那就罪在雇主，因为教区对这些贫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我们耽心，现行法令不会允许实施这类英明措施，但你们要知道，本郡及邻郡的所有其他的自由农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来敦促他们的下院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允许监禁贫民和强迫贫民劳动，从而使任何拒绝受监禁的人都无权要求救济。我们希望，这样能使贫民不致要求救济。”（罗·布莱基《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84、85页）——苏格兰农奴制的废除要比英格兰迟几百年。1698年索耳通的弗列特切尔还在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苏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20万。我，一个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能提出的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农奴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没有能力独立谋生的人变为奴隶。”伊登在《贫民的状况》第1卷第1章第60、61页上说：“农民的自由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开始…… 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伊登和苏格兰的那位“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的错误只在于：不是农奴制的废除，而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才使农民成为无产者，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在法兰西，剥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1566年的穆兰敕令和1656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

(198) 罗杰斯先生当时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却在他所著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一书的序言中强调宗教改革使人民群众贫困化。

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弃妾的乡村牧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约在 1750 年，自耕农消灭了⁽¹⁹⁹⁾，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这种掠夺在大陆各处都是不经过立法手续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对国家的贡赋，以对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实行定居法。只要把情况相应地改变一下，它们对英国农民的影响，就同鞑靼人波利斯·戈东诺夫的命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一样²²⁹。

“光荣革命”²³⁰ 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²⁰⁰⁾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

(199) 《关于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 年伊普斯维奇版第 4 页。甚至大租地制度的狂热的维护者，《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 年伦敦版第 139 页)的作者[约·阿伯思诺特]也说，“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隶农好多少。”

(200) 下面的记载表明了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1695 年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被赠送给奥克尼夫人，这是国王的宠幸和夫人影响的公开证明……奥克尼夫人的可爱的效劳想必就是淫秽的嘴唇的效劳。”(英国博物馆斯隆收集的第 4224 号原稿，原稿的标题是：《萨默斯、哈里法克斯、牛津、秘书维农等人给施鲁兹贝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国王威廉、桑德兰等人的性格和行为》。里面充满了秘闻。)

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²⁰¹⁾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²⁰²⁾ 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样正确，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自己的经济堡垒即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从寡头政府手中夺回王室土地（从 1604 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进行）。

公有地——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制度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 150 年而毫无效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

(201) “王室土地的非法让渡（一部分通过变卖，一部分通过赠送）是英国历史上可耻的一章……是对国家的一个大欺骗。”（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 年伦敦版第 129、130 页）——《关于现代英国大土地所有者如何占有土地的详细材料，见〔恩·赫·伊文思〕《我们的旧贵族》，一个位高任重者著，1879 年伦敦版。——弗·恩·》

(202) 参看艾·伯克的关于培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小册子²³¹。“自由主义的山雀”约翰·罗素爵士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

法。(203) 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这种狡黠的辩护词否定了，因为他要求“为公有地的圈围制定一般性的议会法令”，即承认要把公有地变成私有地必须由议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对被剥夺的贫苦者给予“赔偿”。(204)

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205) 或商人租地农场(206) 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

但是，十八世纪的人还不象十九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手边的大量材料中只摘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

(203) “租地农场主禁止茅舍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茅舍贫农处于贫困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租地农场主用这种方法夺取对公有地的一切权利。”《圈围荒地的后果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年伦敦版第75页)

(204) 伊登《贫民的状况》序言[第 XVII、XIX 页]。

(205) «Capital farms.» 《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1767 年伦敦版第 19、20 页)

(206) «Merchant-farms.» 《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 年伦敦版第 111 页
注)这部匿名佳作的作者是牧师纳萨涅尔·福斯特。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有 24 个平均占 50—150 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被合并为 3 个租地农场了。”(207) “在北安普顿郡和林肯郡，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 50 英亩，而过去曾经耕种过 1 500 英亩…… 过去的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方，100 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 8 所或 10 所…… 在大多数不过 15 年或 20 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4—5 个富有的畜牧行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 20—30 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户人家。”(208)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圈地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减少……甚至象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209)

普莱斯博士说：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末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

(207) 托马斯·莱特《论大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79 年版第 2—3 页。

(208) 散见牧师阿丁顿《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 年伦敦版第 37—43 页。

(209) 理·普莱斯博士《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155、156 页。请读一读福斯特、阿丁顿、肯特、普莱斯和詹姆斯·安德森的论著，并把它们同麦克库洛赫在他的书目汇编《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 年伦敦版) 中穷极无聊的献媚的饶舌比较一下吧。

“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也许加多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扩大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210)

他把圈地的总的结果概括如下：

“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了。”(211)

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对农业工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伊登自己就说，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说，他们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

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一位圈地卫护者，普莱斯博士的反对者的意见。

(210) 理·普莱斯博士《评继承支付》第2卷第147、148页。

(211) 同上，第159、160页。这使我们想起了古罗马。“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大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相信这些土地不会再被夺去，因此，把邻近贫民的土地也购买下来，部分是取得贫民的同意，部分是用暴力夺得，于是，他们不再是耕种零星的土地，而是耕种大片的土地。这时他们使用奴隶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由民要服兵役，因而不能替他们劳动。拥有奴隶所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还因为奴隶不服兵役，可以没有阻碍地繁殖和有许多孩子。这样一来，强者占有了一切财富，全境到处都是奴隶。而意大利人则由于贫困、赋税和兵役的折磨而逐渐减少了。当和平时期到来时，他们还要遭到完全无事可做的痛苦，因为富人占有土地，并且用奴隶而不用自由民来耕种。”(阿庇安《罗马内战》第1卷第7页)这里说的是李奇尼乌斯法²³²颁布以前的时代的情况。兵役大大加速了罗马平民的没落，它也是查理大帝大力促使自由的德意志农民变成依附农和农奴的主要手段。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作出人口减少的结论，这是不对的……如果小农转变成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末，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变的农民当然不在此列〉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212)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²³³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称心如意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2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 511 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

(212) [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地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124、129页。下面这句话与此相类似，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市寻找职业；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利]《国家的危险》1843年伦敦第2版第XIV页）。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 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意，我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那里，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者的特殊形式。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由克兰^①组成，每一克兰是该克兰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兰的代表，即克兰的首领或“大人”，只是这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就象英国女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样。英国政府虽然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大人”之间的内部战争，制止了他们对苏格兰低地的不断侵袭，但是克兰首领们丝毫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劫掠行径；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变成私有财产权，由于遭到克兰成员的反抗，他们就决定公开使用暴力把克兰成员驱逐出去。纽曼教授说：

“英国国王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213)

(213) 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32页。

① 即氏族。——译者注

在苏格兰，这种革命是在王位觊觎者的拥护者进行了最后一次武装暴动²³⁴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²¹⁴⁾和詹姆斯·安德森⁽²¹⁵⁾的著作中看到这一革命的最初阶段。在十八世纪，还禁止从土地上被赶走的盖尔人²³⁶移居外国，以便用暴力把他们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业城市去。⁽²¹⁶⁾至于十九世纪盛行的方法⁽²¹⁷⁾，在这里以萨特伦德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郡——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减少到15 000人——变为牧场。从1814年到1820年，这15 000

(214) 斯图亚特说：“这些土地的地租〈他错误地把这个经济范畴用于塔克斯编²³⁵向克兰首领交纳的贡税〉与土地的面积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你把租地农场所养活的人数拿来比较，也许你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块土地所养活的人数，是最富饶地区的同等价值的土地所养活的人数的十倍。”（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章第104页）

(215) 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

(216) 1860年，被暴力剥夺的人在各种虚伪的许诺下被运往加拿大。有些人逃往山里和邻近的小岛。警察在后面追赶，他们便同警察格斗，然后逃走了。

(217) 亚·斯密的注释者布坎南在1814年写道：“在高地一带旧的所有权状况日益被暴力破坏…… 地主不顾世袭租佃者〈这一范畴在这里也用错了〉而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这个人是个改良家，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在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赶走…… 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大卫·布坎南《论亚·斯密的国富论》1814年爱丁堡版第4卷第144页）“苏格兰的贵族象拔除野草那样剥夺农民的家庭，象印第安人对野兽巢穴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 一个人只能换到一只羊的毛或一条羊腿，甚至更贱…… 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的时候，曾经商议要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主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方案。”（乔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1818年伦敦版第215、216页）

个居民，大约 3 000 户，陆续地被驱逐和消灭了。他们的村庄全都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执行任务，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 794 000 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区大约 6 000 英亩的土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 2 英亩。这 6 000 英亩土地以前一直是荒地，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 2 先令 6 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洒鲜血的克兰成员。她把从克兰那里夺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 29 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住一户人家，他们大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 1825 年，15 000 个盖尔人已经被 131 000 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图靠捕鱼为生。他们成了两栖动物，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话来说，他们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218)

但是，诚实的盖尔人由于他们对克兰“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须更加含辛茹苦。鱼的气味传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们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图的东西，于是把沿海地区租给伦敦

(218) 当现在的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的时候，——在南北战争时期，她和其他贵妇人一样，明达地忘记了这种同情，当时所有“高贵的”英国人的心都是同情奴隶主的，——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描述了萨特伦德的奴隶的状况²³⁷。(凯里在 1853 年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的《奴隶贸易》一书的第 202、203 页上引用了我的文章的一部分。) 我的文章被一家苏格兰报纸转载，并且引起了该报和萨特伦德的献媚者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

的大鱼商。盖尔人又一次被驱逐了。(219)

最后,一部分牧羊场又变成了狩猎场。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象家畜,肥得象伦敦的市议员一样。所以,苏格兰是这种“高贵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1848年萨默斯写道:

“在苏格兰高地,森林面积大大扩大了。在盖克的一边,可以看见格伦菲希新森林,在另一边,是阿德佛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条线上,布拉克山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树造林了。从东到西,从阿贝丁附近到欧班峭壁,现在都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林带,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洛赫-阿尔恰格、格连加里、格伦莫里斯顿等新森林出现…… 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变为牧羊场……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 鹿林(219a)和人民不能并存。总有一方要让位。如果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当中,狩猎场的数目和规模象过去二十五年那样增长,那末盖尔人就会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绝迹了。苏格兰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间进行的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出于时髦,贵族的欲望,打猎的爱好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做鹿的交易只是为了牟取利润。因为事实是,把一块山地辟为狩猎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把它变为牧羊场有利得多…… 对于爱好打猎而寻找狩猎场的人说来,出价高低只受自己钱袋大小的限制…… 苏格兰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诺曼人国王的政策给英格兰带来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人却被赶到越来越窄的圈子里去了…… 人民的自由接二连三地被夺去…… 压迫日甚一日。清扫和驱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被当作固定的原则,当作农业上的必要,由地主们来实行;这一过程静静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219) 关于这种鱼类买卖的有趣材料,我们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公文集。新辑》中看到。——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前面引述过的遗著中把“萨特伦德郡采取的这种办法说成是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次‘清扫’”(《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1868年伦敦版[第282页])。

(219a) 在苏格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人们把羊群从秃山赶走,把鹿群赶上秃山,并称此为“鹿林”。因此,连造林也谈不上!

素地进行着。”(220)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220) 散见罗伯特·萨默斯《苏格兰高地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版第12—28页。这些信最初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把1847年盖尔人遭到的饥荒说成是由于他们人口过剩。无论如何，盖尔人“压迫着”他们的食物。——“清扫领地”或者象德国所说的《Bauernlegen》在三十年战争后在德国特别盛行，1790年还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引起了农民起义。它在德国东部尤为流行。在普鲁士的大部分省里，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次保证了农民的所有权。他占领了西里西亚以后，强迫地主重建农舍、仓库等等，供给农户牲畜和农具。他的军队需要士兵，他的国库需要纳税人。但农民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混乱的财政制度下和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混合统治下，究竟过着怎样愉快的生活，这可以从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米拉波的叙述中看出：“亚麻是德国北部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但可惜，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防止贫困的手段，而不是走向幸福生活的途径。直接税、徭役以及各种强制性服役使德国农民破产，此外他们还要为他们所买的一切东西交纳间接税……而使他们彻底毁灭的是：他们不敢在他们愿意的地方，以他们愿意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也不敢从那些能够以较低廉的价格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原因慢慢地但必然地使他们毁灭，如果不纺纱，他们就无法到期交纳直接税；纺纱成了他们的补助的来源，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妻子、儿女、男女仆人甚至他们自己从事有利的工作。但是，即使有了这种补助来源，生活还是可怜极了！夏天，他们象犯人一样从事耕作和收获的劳动，9点睡觉，2点就要起床，这样才能把活干完；冬天，他们本来需要有较长时期的休息来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他们为了交纳税款而出售产品，他们就缺少谷物来做面包和种子了。因此，只好以纺纱来填补这种不足……而且要十分勤奋地纺。因此，农民在冬天要到半夜或1点才睡觉，而早晨5点或6点就要起床，或者在晚上9点睡觉，2点起床；除了星期日，他们一辈子天天都是这样。这种过度的不眠和劳动使人憔悴；因此农村里的男女比城市里的男女要衰老得快”（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3卷第212页及以下各页）。

第2版补注：1866年3月，在罗伯特·萨默斯的上述著作发表了18年以后，莱

3. 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 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

昂·里维教授在艺术协会¹⁵⁰作了一个关于牧羊场变成鹿林的报告，他叙述了苏格兰高地荒芜状态的加剧。他说：“减少人口，把土地变为牧羊场，是不花费代价便能获得收入的最方便的手段…… 鹿林代替牧羊场已经成为苏格兰高地的普遍的变化。现在是野兽赶走了羊群，就象从前为了给羊群腾出地盘而把人赶走一样…… 从福尔法尔郡的达尔豪西伯爵领地一直到约翰·奥格罗兹都是森林。其中〈在这些森林中〉很多已住有狐狸、野猫、黄鼠狼、白鼬、伶鼬和山兔；近来那里还出现了兔、松鼠和鼠。在苏格兰的统计中被当作特别富饶和广阔的牧场的大片土地，现在既不耕作，也不改良，只是供少数人在每年一个短时期内狩猎之用。”

1866年6月2日出版的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写道：“一家苏格兰报纸在上周载有这样的消息：‘萨特伦德郡的最好的牧羊场之一，在不久前租约期满时，还曾有人出价年租1200镑，然而现在已变成了鹿林！’就象当时诺曼征服者……为造新林曾毁掉了36个村庄一样…… 这种封建本能现在又出现了…… 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提尔特的野草是佩特郡最富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曾是巴登诺克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拉克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地面积，比整个佩特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出，这种荒野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林的土地可以养活15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 $\frac{1}{30}$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强制性的荒芜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 所有这些猎场都完全是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样。这种人为的荒野或荒地应当用立法的断然手段来加以铲除。”

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

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器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

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 S 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 24 岁为止，女的当到 20 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²²¹⁾ 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 1572 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 14 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 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 13 号法令和 1597 年的法令。^(221a)

(221)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 年版) 的作者说：“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时期，英国人确实似乎非常认真地奖励工场手工业和使用贫民。这一点可以从规定一切流浪者都要打上烙印这条值得注意的法令中看出来。”(第 5 页)

(221a) 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第 41、42 页]中说：“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囊括几千英亩土地，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作流浪者，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这些被迫行窃的贫穷的难民中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有 72 000 名大小盗贼被处死”(霍林舍德《英国概述》第 1 卷第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²³⁸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23号法令时才被废除。

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十七世纪中叶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流浪者王国。在路易十六初期（1777年7月13日的敕令）还规定，16岁至60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1537年10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1614年3月19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1号告示，1649年6月25日联合省的公告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

186页）。在伊丽莎白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都要绞死300或400人”（斯特莱普《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年第2版第2卷）。这位斯特莱普还说，在索美塞特郡，仅仅一年中就有40人被处死，35人被打上烙印，37人遭鞭打和183个“不可救药的恶棍”被释放。但是他说：“由于治安法官的疏忽大意和人民的愚昧同情，这个巨大的被控者人数还不到实际犯罪人数的 $\frac{1}{5}$ 。”他又说：“英格兰其他郡的情形并不比索美塞特郡好，许多郡的情况甚至更糟。”

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会上是接近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而迅速增加，而雇佣劳动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变成资本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工人的消费基金。

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工人，而在其发展中一直与工人为敌的关于雇佣劳动的立法⁽²²²⁾，在英国开始于 1349 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

(222) 亚·斯密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与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²³⁹ 兰盖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²⁰⁷

法。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 1350 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长工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 8 章第 5 节）已经讲过了。

劳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地说：

“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险。”⁽²²³⁾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 18 条和第 19 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一天。1360 年的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十四世纪起到 1825 年废除禁止结社法¹⁷⁵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349 年的劳工法和以后的一切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纪，工人的状况十分恶化。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

(223) [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一个律师著，1850 年伦敦版第 206 页。他挖苦地补充说：“我们总是准备为雇主效劳；难道就不能为雇工做一点事吗？”

工资实际上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还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第3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²²⁴⁾ 乔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二世八年，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2先令 $7\frac{1}{2}$ 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68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1796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1799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和1661年及1671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

(224) 从詹姆斯一世二年颁布的第6号法令的一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某些织布业主以治安法官的身份在自己的工场内正式规定了工资率。——在德国，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对人口稀少地区的地主来说，缺乏仆人和工人是十分麻烦的。所有村民都禁止把自己的房间租给独身男女；凡遇到这种租房人，必须报告当局，如果他们不愿当仆人，那末，即使他们靠其他工作，靠替农民做短工或从事货币和粮食买卖为生，也要被关进监狱。”《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第1章第125条)在整整一百年中，各君主的命令中不断地强烈责骂那些不服从苛刻条件，不满法定工资的恶劣而蛮横的无赖汉；每个地主都禁止付给高于行政区规定的工资。但是，战后仆人的处境有时比一百年后还要好；1652年在西里西亚，仆人每周还可以吃到两次肉，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那里的某些地方，仆人每年只能吃到三次肉。而战后的工资也比以后几个世纪都要高。”(古·弗莱塔格)

事情来说明。在这里，四百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 1796 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 1813 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 1825 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 1859 年才消失。最后，1871 年 6 月 29 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²⁴⁰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五百年来，

英国议会一直卑鄙无耻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对工人的永久的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 1791 年 6 月 14 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 500 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²²⁵⁾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²⁴¹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²²⁶⁾

(225) 这个法律的第一条说：“取缔同一等级或同一职业的市民的各种联合组织，是法国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因此禁止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恢复这种联合组织。”第四条说：“同一职业、手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一致拒绝从事手艺或劳动或为了按一定报酬才从事手艺或劳动而彼此协商或协议，那末这种协商和协议……应视为违反宪法，侵犯自由和人权……”从而，和旧劳工法中的规定完全一样，应视为国事罪。（《巴黎革命》1791 年巴黎版第 3 卷第 523 页）

(226) 散见毕舍和卢-拉维涅《议会史》第 10 卷第 193—195 页。

4.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君主和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要问：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说到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而是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籽、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十五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富裕起来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十六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

速度使农村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227)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 99 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228)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

(227) 哈里逊在自己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 4 镑地租都很困难的租地农场主，现在要交 40 镑、50 镑、100 镑，但是他们在租约满期时，如果手里没有积存 6—7 年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

(228) 关于十六世纪货币贬值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可以参看《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绅士威·斯·著（1581 年伦敦版）。由于这一著作采取对话形式，人们在很长时期内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写的，直到 1751 年还用他的名字出过新版。它的作者是威廉·斯泰福。书中的一个地方，骑士有如下的推论：

骑士：“您，我的邻居农民，您，商人先生，您，善良的铜匠，以及其他的手工业者们，你们都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一切物品比以前贵多少，你们也可以把你们出卖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提高多少。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高价格出卖，以抵偿我们在购买物品时所受的损失。”在另一个地方，骑士问博士：“请告诉我，您指的是哪种人？首先，您认为哪些人不会受到损失？”博士：“我指的是所有靠买卖为生的人，因为他们以高价买进，也以高价卖出。”骑士：“其次，您认为哪种人会得利呢？”博士：“是所有按旧租金租赁由自己耕种的租地或农场的人，因为他们按旧价格支付，按新价格出售，就是说，他们为土地支付极少的钱，而以高价出售土地的一切产品……”骑士：“您认为，哪种人会受到比这些人得到的利益还要大的损失？”博士：“那就是所有贵族、绅士以及其他一切靠固定地租或薪金过活，不亲自耕种自己土地，或不做买卖的人。”

此，在十六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²²⁹⁾

5. 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 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业史²⁴²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

(229) 在法国，中世纪初期替封建主管理和征收租税的管家，不久就成为实业家，他用勒索、欺骗等办法，变成了资本家。这些管家有时自己就是显贵。例如：“这个账单是伯桑松的城堡主人，骑士雅克·德·托雷斯就其应当支付的 1359 年 12 月 25 日至 1360 年 12 月 28 日的地租，交给勃艮第公爵和伯爵在第戎的管账先生的。”（阿列克西斯·蒙泰《关于各科历史手稿的研究》第 234、235 页）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了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大小商人吸去了营业的精华；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大的封建领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农场，那是在对农村居民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十四世纪出现了租地农场——fermes 或 terriers。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远远超过 10 万个。它们以货币或实物支付产品的十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作为地租。terriers 根据土地价值和面积的大小分为封地、次封地 (fiefs, arrière-fiefs) 等等，而土地的面积有时只有几阿尔潘。所有这些 terriers 对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享有某种程度的裁判权；这种裁判权有四等。农村居民在所有这些小暴君下受到压迫，是可以理解的。蒙泰说，当时法国有 16 万个法庭，而现在连治安法庭在内有 4 000 个就足够了。

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²³⁰⁾，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²³¹⁾，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的则变成了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亚麻纺织厂，“被游离出来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为自己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体现为无数农民家庭的额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体现为交给普鲁士国王的赋税。现在，它体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以前分

(230) 见他的《对自然哲学的认识》1838年巴黎版。

(231) 这一点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强调的²⁴³。

散在农村，现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营里了。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变成了指挥他们⁽²³²⁾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农场一样，看不出是由许多小生产单位联合而成的，是通过剥夺许多独立小生产者而成的。但是，不带偏见的考察是不会受迷惑的。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做 *manufactures réunies*，即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米拉波说：

“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做联合手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工场，几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只有它们才是国民财富的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 联合工场使一两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享不到企业主得到的好处。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场中没有人发财致富，但许多工人过着优裕的生活…… 勤劳节俭的工人人数将会增加，因为他们将会认识到，正当的生活和劳动，是根本改善自己状况而不是稍许提高工资的手段；稍许提高工资对于将来决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能使工人勉强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点。通常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单个分散的手工工场，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场。”⁽²³³⁾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

(232) 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们的报酬，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服务的荣幸。”（让·雅·卢梭《论政治经济学》[1760年日内瓦版第70页]）

(233) 散见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3卷第20—109页。米拉波认为，分散的工场比“联合的”工场更经济，生产力更高，并把后者只是看作由政府人为地培养出来的温室植物。当时大陆上大部分手工工场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²³⁴⁾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

(234) “一个工人家庭在它从事的各种劳动的间歇，通过自己的辛劳 不知不觉地把二十磅羊毛变为全家一年的衣着，这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它把羊毛拿到市场，送进工厂，然后送到经纪人手里，然后再送到商人手里，那末就可以看到频繁的商业活动，所用的名义资本要比羊毛的价值大二十倍…… 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为了维持不幸的工厂人口、寄生的商人阶级和虚假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而受人剥削。”（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20页）

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²³⁵⁾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不同的时代，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²³⁶⁾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²³⁷⁾

(235) 克伦威尔时代是一个例外。在实行共和制期间，英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从他们在都铎王朝时代所陷入的那种衰落状态中恢复过来。

(236) 塔克特知道，随着机器的采用，大羊毛工业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从农村或家庭工业的消灭中产生出来了。（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39—144页）“犁和轭为神所发明，而由英雄使用——难道织机、纱锭和纺车的由来就没有这么高贵吗？你们把纺车和犁分开，把纱锭和轭分开，结果产生了工厂和贫民院、信贷和恐慌，产生了两种敌对的国民，即农业国民和商业国民。”（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22页）但凯里出来了，他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地责备英国，说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变成纯农业国，而英国则成为它们的工厂主。他断言，土耳其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英国〉从来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把犁和织机、锤和耙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奴隶贸易》第125页）。在他看来，乌尔卡尔特本人就是毁灭土耳其的罪魁之一，因为乌尔卡尔特曾在土耳其为英国的利益鼓吹过自由贸易。但是最妙不过的是，凯里（附带说一下，他是俄国的大奴仆）竟想利用保护关税制来阻止这个分离过程，其实它只会加速这个过程。

(237) 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穆勒、罗杰斯、高德文·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象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一样，向英国的土地贵族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

6. 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²³⁸⁾资本家不是象租地农场主那样逐渐地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十五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现在，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 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而产生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事…… 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²³⁹⁾

(238) 这里所用的“工业”是和“农业”相对而言。就“范畴”的意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

(239) 《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第98、99页。这一匿名著作的作者是托·霍吉斯金。

作者应该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²⁴⁰⁾ 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

(240) 甚至在1794年，里子城的小织布业者还派代表请求议会制定法律，禁止任何一个商人成为工厂主。（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

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241)

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242)。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登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

“例如，孟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迫和家人分离。”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节省”支付 21 875 镑贿款，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 1750 年有 8 万多居民，而到 1811 年只有 8 000 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⁷⁶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

(241) 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 年伦敦版第 9 页。关于对奴隶的待遇，在沙尔·孔德的《立法论》(1837 年布鲁塞尔第 3 版) 中收集了很多材料。要想知道资产者在其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地方，把自己和工人变成了什么，就必须仔细研究这部著作。

(242) 前爪哇岛副总督托马斯·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爪哇史》1817 年伦敦版 [第 2 卷第 CXC、CXCI 页]。

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华伦·哈斯廷斯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 4 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宾恩的人，宾恩又在当天以 6 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 1757 年到 1766 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 600 万镑！在 1769 年到 1770 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243)

在象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 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 40 镑；1720 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 100 镑；1744 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 12 岁以上男子的头

(243) 1866 年仅奥里萨一个邦就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尽管如此，有人仍力图以高价把粮食卖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借此来充实印度的国库。

盖皮得新币 100 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 105 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 50 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 50 镑！数十年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曾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 1648 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²⁴⁴。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 1648 年就已经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

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243a)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

^(243a) 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

现、抵押货物、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死伪造银行券者。至于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样的影响，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可以证明。（243b）

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十八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

（243b）“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第4卷第33页）

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²⁴⁵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达布耳德等许多著作家错误地要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各国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成为谋利者的奴仆，就不仅要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强制地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以后，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原因呢？只要看看 18 000 万国债就够了！”⁽²⁴⁴⁾

(244) 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 6 卷第 101 页。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象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人的。尽管弗·摩·伊登爵士对于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他所处时代即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这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²⁴⁵⁾

菲尔登写道：

“在得比郡、诺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7岁到13、14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来监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结

⁽²⁴⁵⁾ 伊登《贫民的状况》第2卷第1章第421页。

果必然是残酷虐待…… 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 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 得比郡、诺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²⁴⁶⁾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巨大胜利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²⁴⁶，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

(246) 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第5、6页。关于工厂制度的早期的丑恶，见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第219页，以及吉斯伯恩《论大不列颠上层和中层社会阶级人们的义务》1795年版第2卷。——由于蒸汽机使工厂从农村有瀑布的地方搬到城市中心，“喜欢禁欲”的谋利者现在随手就可以找到童工，而不必用强力从贫民习艺所索取奴隶了。——当罗·皮尔爵士（“诡辩大臣”的父亲）于1815年提出保护儿童法案时，弗·霍纳（金条委员会的杰出人物，李嘉图的密友）在下院说：“大家都知道，有一帮工厂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作为一个破产者的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两年前（1813年）皇家法院受理一件令人愤慨的案子。这是一件关于一批儿童的案子。伦敦一个教区把这批儿童交给一个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又把他们转让给另一个工厂主。最后，一些慈善家发现这些儿童处于绝对饥饿的状态。作为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还知道另一个更令人愤慨的案件。几年前，伦敦某一教区和郎卡郡一个工厂主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主每购买20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

获得了到 1743 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 4 800 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得；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 1795 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 年 15 艘，1751 年 53 艘，1760 年 74 艘，1770 年 96 艘，1792 年 132 艘。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247)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248) 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

(247) 1790 年，奴隶与自由民在英属西印度是 10 比 1，在法属西印度是 14 比 1，在荷属西印度是 23 比 1。（亨利·布鲁姆《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1803 年爱丁堡版第 2 卷第 74 页）

(248) “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意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同“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掠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到政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约·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评价“可憎的政治伪君子”艾德蒙·伯克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憎的政治伪善”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象在美洲动乱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

这种苦难²⁴⁷。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²⁴⁹，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²⁵⁰

7.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

“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艾·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31、32页）。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怪乎他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在塔克尔牧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位艾德蒙·伯克在他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好的描述。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盛行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

(249) 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第265页]。

(250)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²⁴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

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251)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

(251) “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们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相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434页)

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252)

(252) “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11、9页²⁴⁹)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²⁵³⁾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

(253)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此外，这里还包括那些由于消灭了奴隶制而完全改变了关系的旧种植殖民地在内。

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象松软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²⁵⁴⁾，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²⁵⁵⁾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把这称为 «systematic colonization»(系统的殖民)。

首先，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²⁵⁶⁾他向我们

(254) 威克菲尔德关于殖民地本质的少许卓见，全都由老米拉波、重农主义者以及更早以前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提出过了。

(255) 后来，这种制度在国际竞争中成了一种暂时的必要。但不论它的动机如何，后果都是一样的。

(256)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

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 5 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① 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 3 000 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²⁵⁷⁾。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理解威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威克菲尔德就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

威克菲尔德说：

“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

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 1849 年 4 月 7 日《新莱茵报》第 266 号²⁵⁰）

(257)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 2 卷第 33 页。

① 澳洲的旧称。——译者注

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258)

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那末，旧欧洲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这种积累从亚当时代起就被人类当作自己生存的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259)。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但是，但是：

“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怀疑的…… 在英国……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260)

的确，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连威克菲尔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到圣多明哥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没有从西班牙得到一个工人。但是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上述那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

(258)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7页。

(259) 同上，第18页。

(260) 同上，第42、43、44页。

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261)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262)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263)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264)

(261)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262) “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的，而且必须是能够变为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同上，第125页)

(263)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47页。

(264) 同上，第21—22页。

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场所”呢？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威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

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265)。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 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266)

工人绝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大部分的劳动。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劳动市场上变成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267)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难怪乎威克菲尔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里威耳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所以在那里渴望有一种较便宜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件的阶级…… 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建立起来。(268)

(265)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16页。

(266)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31页。

(267)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268) 散见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第2卷第235—314页。甚至温和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庸俗经济学家莫利纳里也说：“在奴隶制已经消灭、但没有相应数量的自由劳动来代替强制劳动的殖民地，我们看到了和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相反的现象。我们看到，普通的工人剥削工业业主，他们要求企业主给的工资大大超过产品中应归他们所有的合法部分。因为种植园主出售砂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弥补工资的提高，所以对这一超额部分，最初不得不用他的利润来弥补，后来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本身来弥补。许多种植园主就是这样破产的，另一些种植园主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破产，而关闭了自己的企业…… 毫无疑问，与其看着整代的人毁灭，还不如看着资本

照威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²⁶⁹⁾ 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使用的状态。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威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话，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停滞下来并且沉淀下“过剩”工人。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只要我们能确实掌握这些移民的劳动，我们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只要我们有保证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们。”⁽²⁷⁰⁾

在威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洲分散的农民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

积累毁灭（莫利纳里先生多么慷慨！），但如果二者都不毁灭，岂不更好吗？”（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第51、52页）莫利纳里先生啊，莫利纳里先生！如果在欧洲“企业主”可以减少工人的合法部分，而在西印度工人可以减少企业主的合法部分，那末，十诫，摩西和先知们¹⁹⁹，以及供求规律又都成了什么呢！请问你所承认的欧洲资本家每天没有支付的这个“合法部分”，又是什么呢？在对面，在殖民地那里，工人竟“头脑简单”到“剥削”起资本家来了，因此，莫利纳里先生很想在那里用警察手段来把其他场合会自动发生作用的供求规律纳入正轨。

⁽²⁶⁹⁾ 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2页。

⁽²⁷⁰⁾ 同上，第191—192页。

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人，而

“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 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所以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271)。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变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272)，成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那个因土地按雇佣工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⁸⁴。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威克菲尔德洋洋得意地喊道：

“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任何

(271) 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47、246页。

(272) “你们还说，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所以能找到工作，为自己弄到收入，是由于土地和资本的占有……恰恰相反，所以会有这种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正是由于土地的个人占有…… 你们把一个人置于真空中，你们就夺去了他的空气。你们夺取土地，也就是这样…… 这就是说，你们把他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所以他只能按照你们的意志生活。”（散见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267—271页）

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因此，所有移入的工人都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这就将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²⁷³⁾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必须高到“使工人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能变成独立的农民”⁽²⁷⁴⁾。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无非是工人为能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婉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资本家老爷创造“资本”，使资本家老爷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须牺牲自己，使政府能为他原来的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和皮尔银行法²⁵¹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压迫的加重，使威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向西部去的移民浪潮来不及把人们冲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在那里，资本

(273) 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92页。

(274) 同上，第45页。

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被威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的、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法，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一切，特别在澳洲⁽²⁷⁵⁾，产生了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洲劳动市场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草市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275) 澳洲一成为它自己的立法者，当然就要制定有利于移民的法律，但英国过去滥送土地的做法，成了一种障碍。“1862年新土地法的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移民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公共土地大臣加·达菲《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1862年伦敦版〔第3页〕）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1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四十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页）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研究经济文献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进行的最初的研究反映在以下这些著作里：《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1848—1849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事件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他才继续进行这一研究。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当时的经济，因为英国当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艺学和农业化学的问题。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马克思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产生了恶果——他身患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8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看来是未来《资本论》的草稿。1857年11月，马克思拟定了他的著作的计

划，后来又对该计划作了详细的和重要的修改。他把这部批判各种经济范畴的著作分为六册：

(1)资本(包括一些导言性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b)资本的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又分为三章：(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三章后来成了全部著作分为三卷《资本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史和社会主义史打算成为另一部著作的对象。

同时马克思决定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马克思为第一分册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出版。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二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里重新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篇幅巨大的手稿，到1863年年中才完成。手稿共二十三本，约二百印张，标题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同。这一手稿的绝大部分(第VI—XV本和第XVIII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构成《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在头五本以及部分地在第XIX—XXIII本中，叙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阐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学说，并涉及了一系列其他问题。第XIX本和第XX本，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用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史资料，对资本主义工业中机器的使用作了十分详细的经济分析。第XXI—XXIII

本阐述同《资本论》各卷（包括第二卷）有关的各种问题。第 XVI 本和第 XVII 本专门阐述第三卷的问题。因此，1861—1863 年手稿多少都触及了所有四卷《资本论》的问题。

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依照他过去分为三部分写的《资本一般》这一篇所拟定的计划来安排全书的结构。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 1866 年 10 月 13 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也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

为此，马克思继续致力于自己的著作，特别是致力于 1861—1863 年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接着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 1863 年 8 月至 1865 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 年 1 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而在第一版中，是在第一章《商品和货币》中加以叙述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 年 9 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一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二版（1872 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 1872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对 1872—1875 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作了相当大的加工和校订。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

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他的工作。马克思的极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做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出版），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版（1883年）和第四版（1890年）。此外，在马克思已逝世而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曾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下列各种版本：三个伦敦版英文本（1888、1889和1891年），三个纽约版英文本（1887、1889和1890年），巴黎版法文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丹麦文本（1885年），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1886年），都灵版意大利文本（1886年），莱比锡版波兰文本（1884—1889年），阿姆斯特丹版荷兰文本（1894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不完全的版本。

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时（1890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现在全世界都根据德文第四版再版和翻译这部著作。——第7页。

- 2 指《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再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一篇。——第7页。
- 3 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一书的第三章。——第7页。
- 4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 8、296 页。

- 5 蓝皮书 (*Blue Books*) 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第 12、542 页。
- 6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 ——套用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第 13 页。
- 7 济·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 年维也纳版 (S. Mayer. «Die sociale Frage in Wien. Studie eines «Arbeitgebers»». Wien, 1871)。——第 15 页。
- 8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 (1890 年) 中，这篇跋的头四段被删掉。本版把它全文刊印。——第 15 页。
-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1 页。——第 16 页。
- 10 反谷物法同盟是 1838 年由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的。为了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盟争取废除了为迎合土地贵族而实行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1815 年实行的谷物法规定，在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 80 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 年对这个法律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1828 年实行了调节制，按照这个制度，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相反，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同盟争取废除谷物法，确立自由贸易，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贸易自由的口号被同盟广泛利用于蛊惑性的宣传，说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谷物法于 1846 年被废除。——第 17 页。
- 11 指约·狄慈根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 年汉堡版》，载于《民主周报》1868 年第 31、34、35 和 36 号。1869—1876 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第 18 页。

- 12 这里指 1867—1883 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在 1868 年 11—12 月的第 3 期上发表了一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别尔提。——第 19 页。
- 13 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 年基辅版第 170 页(Н. Зибер. «Теория ценности и капитала Д. Рикардо в связи с позднейшим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и разъяснениями». Киев, 1871, стр. 170.)。——第 19 页。
- 14 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у Карла Маркса»)一文。——第 20 页。
-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8—10 页。——第 20 页。
- 16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第 24 页。
- 17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 1872 年至 1875 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的。——第 30 页。
- 18 “新三分之二”是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第 31 页。
- 19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第 34 页。
- 20 “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导致了 1861—1865 年的南北战争。——第 37, 317, 468 页。
- 21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第 39, 656 页。
- 22 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攻击他故意捏造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攻击，恩格斯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部著作于 1891 年在汉堡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107—213 页)。——第 39 页。
- 2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14 页。——第 40 页。

- 24 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时是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41页。
- 25 恩格斯套用了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说的一句话。这个福斯泰夫曾讲述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五十个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第43页。
- 2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页。——第47页。
- 27 套用了赛·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二部第一首中的一句话。——第49页。
- 2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页。——第53页。
- 29 见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两卷集，1831年伦敦版(W. Jacob.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31)。——第53页。
- 3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3—25页及以下各页。——第55页。
- 31 [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47页([W. Petty.]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 p. 47)。——第57页。
- 32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场。——第61页。
- 33 “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这时他便说了这句话。——第67页。

- 34 这里马克思引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科马赫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 载于伊曼努尔·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第99、100页 («Aristotelis opera ex recensione Immanuelis Bekkeri». Tomus IX. Oxonii, 1837, p.99, 100)。——第74页。
- 35 伦巴特街——伦敦的金融中心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第76页。
- 36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7—134页)。——第84页。
- 37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84页。
- 38 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出现了一个极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当时欧洲国家的贵族热中于降神术,特别是桌子灵运动。而这时,在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88页。
- 3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4页。——第92页。
- 40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第21页 («On Protection to Agriculture». Fourth edition. London, 1822, p. 21) 上提到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庭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住宅区。——第93页。
- 4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51页。——第93页。
- 4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2页。——第95页。
- 43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96页。
- 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3—154页。——第98页。
- 4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页。——第99页。
- 46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三幕第三场。——第100页。

- 47 兰第市场——巴黎近郊的一个大集市，从十二世纪至十九世纪每年都举办。——第 102 页。
- 48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 104 页。
- 49 《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圣经《约翰启示录》）。写于一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作魔鬼的化身。这里引用的是第十七章和第十三章。——第 105 页。
- 5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76 页及以下各页。——第 105 页。
- 51 印加国是保存着很多原始社会残余的奴隶占有制国家。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基础是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的氏族公社或村社（Aylla）。印加国的繁盛时期，是从十五世纪末一直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被西班牙占领和完全消灭为止。当时它曾扩展到今日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第 106 页。
- 5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45 页。——第 107 页。
- 53 罗马法全书——拉丁文 Digesta，即汇编。它是罗马民法法典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收集了罗马法学家著作的残篇。它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罗马法全书是在 533 年查士丁尼帝执政时发表的。——第 109 页。
- 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73 页及以下各页。——第 112 页。
- 55 [威·爱·帕里]《开辟大西洋太平洋西北航线航行日志；航行在威廉·爱德华·帕里命令下，1819—1820 年由皇家“赫克拉”和“格赖珀”两轮进行》1821 年伦敦版 ([W. E. Parry.] «Journal of a Voyage for the Discovery of a North-West Passage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19—20, in His Majesty's Ships Hecla and Griper, under the Orders of William Edward Parry». London, 1821)。——第 113 页。

- 5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6页及以下各页。——第114页。
- 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5、66页。——第115页。
- 58 在古代神话里，人类历史分成五个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五个时代中最初两个时代。在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们无忧无虑，只是在后面几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个即最后一个时代——黑铁时代——充满了不平、暴行和屠杀。关于这五个时代的传说，在希腊的叙事诗人海西阿德以及罗马抒情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作品中都有记述。——第117页。
- 59 指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解散了苏格兰的议会，两国间存在的一切经济上的障碍也消除了。——第118页。
- 6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4—65页。——第119页。
- 6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6页及以下各页。——第119页。
- 62 马克思引自圣热罗尼莫《给叶夫斯托希亚的信——论童贞的保持》。——第121页。
- 63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二十四首歌。——第122页。
- 6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9页。——第124页。
- 65 “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The course of true love never does run smooth*）——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第126页。
- 66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iecta membra poetae*）——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四首。——第126、380、403、516页。
- 67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杜邦·德·奈穆尔的著作《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Maximes du docteur Quesnay, ou Résumé de ses principes d'économie sociale*），载于《重农学派》，附

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392页(《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 Daire. Partie I, Paris, 1846. p. 392.。)——第127页。

- 68 货币没有臭味(*non olet*)——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6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第129页。
- 6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6—88页。——第133页。
- 7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8页。——第143页。
- 7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9—156、159页及以下各页。——第144页。
- 72 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0页(A. H. Mü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Theil II, Berlin, 1809, S. 280)。——第145页。
- 73 文字游戏:英语«sovereign»一词既有“君主、帝王”的意思,又是一英镑金币的名称。——第147页。
- 74 比·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213页(P. Boisguillebert. «Le détail de la France».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43, p. 213)。——第150页。
- 75 德·狄德罗《一七六七年的沙龙》。——第154页。
- 76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第154、820页。

- 77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 1864 年 2 月 8 日的质问》(«East India (Bullion).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8 February 1864»)。——第 154 页。
- 7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30 页。——第 157 页。
- 7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36—137 页。——第 159 页。
- 80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 年》1691 年伦敦版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72». London, 1691) 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Verbum Sapienti»)。——第 162、166、302 页。
- 8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46—147 页。——第 163 页。
- 8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58 页及以下各页。——第 164 页。
- 83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 年伦敦修订第 4 版 («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 Notes». The Fourth Edition, Corrected. London, 1811)。——第 164 页。
- 84 “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1844 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72—176 页)。——第 164、680 页。
- 8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610 页。——第 173 页。

- 86 指法国研究院，它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第 186 页。
- 8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606 页。——第 186 页。
- 88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Hic Rhodus, hic salta!*)——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转义是：就在这里证明你有什么本领罢！——第 189 页。
- 89 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59 年 1 月，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历山大鲁·库扎先后被选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国君。由于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的合并，为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后，库扎于 1864 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反动的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第 191、265 页。
- 90 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15 年圣彼得堡版第 1 卷第 288 页(H. Storc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Tome I, St.-Pétersbourg, 1815, p. 288)。——第 206 页。
- 91 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 年巴黎版第 14 页 (A. Cherbuliez. «Richesse ou pauvreté. Exposition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e la distribution actuell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Paris, 1841, p. 14)。——第 206 页。
- 9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6 页。——第 218 页。
- 93 “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中的一句话。——第 220 页。

- 94 “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Tout pour le mie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第 221、841 页。
- 95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第 221 页。
- 96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 1 卷第 155—156 行。——第 242 页。
- 97 修昔的底斯是著名古希腊历史学家，马克思把威廉·罗雪尔讽刺地叫做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第一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在引用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时表示：“象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我的著作有益于……”等等。——第 244 页。
- 98 指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哥特谢德。哥特谢德在文学上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新的文学潮流表现出异常的偏执。因此，他的名字成了文学上傲慢与迟钝的同义语。——第 244 页。
- 99 威·杰科布《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惠特布雷德的一封信》1815 年伦敦版第 33 页（W. Jacob. «A Letter to S. Whitbread, being a Sequel to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Required by British Agriculture». London, 1815, p. 33）。——第 246 页。
- 100 指 1833 年的工厂法。关于这个法律，见本卷第 307—310 页。——第 251 页。
- 101 锡利亚信徒（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宣传关于耶稣再生和在地球上建立公正、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 255 页。
- 102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 年伦敦版第 406 页（A.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5, p. 406)。——第 255 页。

- 103 小先令派 (*Little shilling men*) 或北明翰派, 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特殊学派。这一学派的追随者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 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北明翰派的代表托马斯·阿特伍德和马提阿斯·阿特伍德两兄弟、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单位含金量的方案, 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 “小先令派”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 实施他们的方针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并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但是, 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 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 也就是说, 给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72—73 页)。——第 260 页。
- 104 “组织规程”(*< Règlement organique >*) 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结束后, 俄军占领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 1831 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 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 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 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 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 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 废除国内关税, 实行贸易自由, 司法和行政分立等。——第 266 页。
- 105 德莱登《公鸡和狐狸》。——第 270 页。
- 106 枢密院 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 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 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

- 第 273、438、509、718 页。
- 10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492—494 页。——第 273 页。
- 108 又是克里斯平 (*Ecce iterum Crispinus*) ——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篇就是这样开始的，这篇诗（在第一部分中）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官臣克里斯平。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第 276 页。
- 109 埃利亚派——公元前六世纪末一五世纪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最重要的代表有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埃利亚派企图证明，运动和现象的多样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想象中。——第 278 页。
- 110 大陪审团是 1933 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拔十二到二十三个“善良的和诚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查，并对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的问题作出决定。——第 280 页。
- 1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496—498 页。——第 283 页。
- 112 马克思指他对托马斯·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00—312 页）。——第 285 页。
- 113 威·斯特兰吉《健康的七要素》1864 年伦敦版第 84 页 (W. Strange, «The Seven Sources of Health», London, 1864, p. 84)。——第 287 页。
- 114 “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Britons never, never shall be slaves!»*）——英国国歌《统治吧，不列颠》中的一句歌词。——第 293 页。
- 115 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的一座建筑物，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集会的地方。——第 294 页。
- 116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国债剧增，危及国家。——第 299 页。
- 117 歌德《给祖莱卡》。——第 300 页。

- 118 “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出自圣经的一个故事，现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据传说，饥饿的以扫正是用这一代价把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卖给了自己的弟弟雅各。——第 301 页。
- 119 鼠疫猖獗——1347 年至 1350 年西欧鼠疫流行。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二千五百万，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 301、770 页。
- 120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 1 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 1833 年 6 月 28 日刊印，第 53 页（*«Factories Inquiry Commission. 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8 June 1833»*, p. 53）。——第 309 页。
- 121 “危险在于迟缓”（*«Periculum in mora»*）——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Ab urbe condita»*）第 38 卷第 25 章第 13 节。——第 310 页。
- 122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 1832 年 8 月 8 日刊印（*«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n the «Bill to regulate the Labour of Children in the Mills and Factor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8 August 1832»*）。——第 310 页。
- 123 札格纳特是印度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 311、708 页。
- 124 指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它是 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第 312 页。

- 125 反谷物法同盟(见注 10) 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 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 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 工人们将得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big loaf»)。而且, 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第 312、499 页。
- 126 国民公会委员——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国民公会(1792—1795 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 在各省和军队中派驻拥有特许全权的代表。国民公会委员就是对这些代表的称呼。——第 315 页。
- 127 嫌疑犯处治法 (*loi des suspects*) 是 1858 年 2 月 19 日在法国由立法团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法皇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 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 或者驱逐出一切法国领土。——第 316 页。
- 128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第 318、319 页。
- 129 十表法 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最古老的立法文献“十二铜表法”的最初方案。这一法律维护私有制, 它规定凡无法偿还债务者应被剥夺自由, 降为奴隶或碎尸分身。——第 319 页。
- 130 这一臆说, 见法国历史学家兰盖的著作《民法论, 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5 册第 20 章 («Théorie des loix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Tome II, Londres, 1767, livre V, chapitre XX)。——第 319 页。
- 131 德国哲学家道梅尔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古代的秘密》(«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hums») 中证明, 最初的基督徒在圣餐时吃人肉。——第 319 页。
- 132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 在这个社会里, 人在一个工作日里从事几种劳动, 也就是说, 工作日将由若干“短时工作”(«courtes séances») 组成, 每一项工作不超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根据傅立叶的意见, 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 连最贫

穷的劳动者也能够比从前的任何资本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第 322 页。

13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4 页。——第 323 页。

134 指 1866 年 8 月 20 日至 25 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六十名代表，他们代表六万多名联合在工联中的工人。大会讨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工人的政治活动、合作社、把所有工人联合到工联中等问题。另外，大会决定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全国劳工同盟。——第 333 页。

135 这里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根据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一文拟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13—223 页）。——第 334 页。

13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76 页。——第 335 页。

137 “折磨他们的毒蛇”——套用了海涅的诗《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一句话。——第 335 页。

138 大宪章 (*Magna Charta*)，即自由大宪章 (*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 1215 年由英王“无地约翰”签署的一个历史文件的名称。大宪章是骑士和市民所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国王提出的。它对国主的权力规定了某些限制，保存了一些封建特权，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做了一些让步。马克思在这里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反资本斗争而争得的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第 335 页。

139 多么大的变化啊！（*Quantum mutatus ab illo!*）——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2 卷第 274 行。——第 335 页。

140 “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出自法国海军上将德·帕纳的一封信。也有人认为是达来朗说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没有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第 341 页。

141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说，无知并不是充足的理由。这句话是针对那些对自然抱有僧侣主义目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说的，

他们把“上帝意志”称作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而其唯一的论据就是对其他原因的无知。——第 341 页。

- 142 见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35 年巴黎版第 1—2 卷 (A. Quetelet. «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Tomes I—II, Paris, 1835)。——第 359 页。
- 143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 1 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 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 3 版第 88—89 页 (W. Roscher.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Band I: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Drit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flage. Stuttgart und Augsburg, 1858, S. 88—89)。——第 360 页。
- 144 指罗契得尔城（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下，于 1844 年成立名为公平先驱社的消费合作社，它是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人合作运动的萌芽。——第 368 页。
- 145 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的用语。——第 395 页。
- 14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66 页。——第 395 页。
- 14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68 页。——第 398 页。
- 148 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 494 年举行起义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第 399 页。
- 14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59—168 页。——第 401 页。
- 150 艺术和手工业协会 (*Society of arts and Trades*) 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 1754 年在伦敦成立。该会冠冕堂皇地宣布

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把它称为“艺术和骗术协会”。——第 402、802 页。

- 15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40 年柏林第 2 版第 8 卷第 247 页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Werke, Zweite Auflage, Bd. VIII. Berlin, 1840, S. 247)。——第 402 页。
- 152 《关于幸福的对话》(«Concerning Happiness, A Dialogue») 的作者不是发表《日记和通信集》(«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一书的外交官詹姆斯·哈里斯，而是他的父亲詹姆斯·哈里斯。——第 404 页。
- 153 马克思是根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反对数学家》(«Adversus mathematicos») 第 11 卷第 44 页引证阿基罗卡斯这句话的。——第 404 页。
- 154 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 是指公元前五世纪末期，古雅典三十寡头恐怖制度被推翻，重新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这是雅典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时期。——第 404 页。
- 155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奴隶制国家的理想的典型。这种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自由市民的各等级之间的严格分工。哲学家执行管理职能，军人打仗和保卫市民的生命财产，农民、手工业者为人民生产并提供生活资料。——第 405 页。
- 156 引自安·尤尔《工厂哲学》1835 年伦敦版第 21 页(见注 102)。——第 407 页。
- 157 卡路里机 是根据一般气体体积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制造的机器，与蒸汽机相比，它笨重而且功率低。卡路里机是十九世纪初发明的，但到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第 410、504 页。
- 158 珍妮机 是詹姆斯·哈格里沃斯于 1764—1767 年发明的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第 411 页。
- 159 圣经《申命记》第 25 章。——第 412 页。

- 160 培恩斯《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协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篇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页 (Baynes. «The Cotton Trade. Two Lectures on the above Subject, Delivered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Blackburn Literary, Scientific and Mechanics' Institution». Blackburn—London, 1857, p. 48)。——第426页。
- 16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38、487页。
- 162 席勒《钟之歌》。——第446页。
- 163 从第1版至第4版,这句话是: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32%,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86%。
我们所作的修改的依据是:《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1857年伦敦版第12页。估计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材料。参看马克思《英国工厂制度》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02页)。——第456页。
- 16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71、172页。——第460页。
- 165 引自安·尤尔的著作第22页(见注102)。——第461页。
- 16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4页。——第463页。
- 16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3页。——第463页。
- 16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4—466页。——第465页。
- 169 傅立叶把工厂叫做“温和的监狱”(*les bagnes mitigés*),见《虚伪的、零散的、可恶的、虚假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1835年巴黎版第59页 (*La fausse industrie morcelée, répugnante, mensongère, et l'antidote, l'industrie naturelle, combinée, attrayante, véridique, donnant quadruple produit*). Paris, 1835, p. 59)。——第468页。

- 170 马克思引自塞·朗切洛蒂的著作《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L'Hoggidi overo Gl'ingegni non inferiori a'passati»), 载于约翰·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25—126页(J. Beckmann. «Bey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 Band I, Leipzig, 1786, S. 125—126)。——第469页。
- 171 本表是根据以下三篇总标题为《工厂》(«Factories»)的议会文件的材料编制的:《答可尊敬的下院1856年4月15日的质问》(«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15 April 1856»);《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24 April 1861»);《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12月5日的质问》(«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5 December 1867»)。——第475页。
- 172 《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第10号报告。附证词》1868年伦敦版第63、64页(«Ten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rganization and Rules of Trades Unions and other Associations: together with Minutes of Evidence». London, 1868. p. 63, 64)。——第477页。
- 173 “好话能遮丑”(«*Nominibus mollire licet mala*»)——奥维狄乌斯《爱经》第2卷第657行。——第481页。
- 174 马克思引自议会文件的材料《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2月18日的征询》(«Corn, Grain and Meal. 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18 February 1867»)。——第495页。
- 175 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在下一年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即使在此之后,当局仍然大大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第498、807页。

- 176 马克思指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3年）以后，英国私商加紧侵占中国市场的情况。当时英国私商在英国政府竭力支持下，大量地向中国私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后来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第502页。
- 177 中央注册局局长 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第518、714、730、743页。
- 178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第9页（*<Factories.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24 April 1861>* p. 9）。——第520页。
- 17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9页。——第534页。
- 180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第534页。
- 181 “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Ne sutor ultra crepidam!>*）——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在一个鞋匠批评他的画时所作的回答，这个鞋匠对绘画一窍不通，只能看出所画的鞋的某些毛病。——第535页。
- 182 套用了十八世纪末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列奥波特·施托尔贝格《致自然》一诗中的话。——第561页。
- 183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P. J.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 Paris, 1846, p.73）。——第563页。
- 18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00页。——第588页。
- 18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2页。——第590页。
- 186 指1861—1865年美国南部十一个蓄奴州同盟，该同盟由于奴隶主暴动而成立。暴动者单独成立国家，立旨保存奴隶制并把它扩展到美国整个国土。由于奴隶主在南北战争中遭受失败，这个同盟于1865年就消灭了。——第591页。

- 187 《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一书的作者是理查·康替龙。该书的英文版由理查·康替龙的一个亲属菲力浦·康替龙修订过。——第609页。
- 188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宫廷侍卫长卡尔勃的表现。在第三幕第二场，卡尔勃最初拒绝参与德意志一邦君的宰相所策划的阴谋。这时，宰相就以辞去宰相职位相威胁，因为这样一来卡尔勃的职位就要免除，卡尔勃吓死了，他叫喊说：“那我呢？——您说得倒好，您！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可是我呢——我的上帝！如果殿下免我的职，那我怎么办呢？”——第631页。
- 18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90页。——第634页。
- 190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634页。
- 191 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119页(Simonde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Tome I, Paris, 1819. p.119). ——第637页。
- 192 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叙述了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如何繁衍，终于产生了整个犹太民族。——第638页。
- 19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8卷。——第645页。
- 194 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

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J. S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two volumes)。第一版1843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指出，企图论述“逻辑体系”的约·斯·穆勒，作为经济学家，是肤浅的，没有遵循逻辑分析的起码要求。——第647页。

- 195 “经济表”——重农学派魁奈在《经济表》中第一次制定的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六章，马克思写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篇第十章，以及《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九章上都对经济表作了较详细的说明。——第648页。
- 196 “没有任何日期”，是西里西亚反动大地主利希诺夫斯基于1848年7月25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发言反对波兰独立存在的历史权利时说的一句话。利希诺夫斯基一再说这句话时都用了两个否定词，把«Keinen Datum hat»说成«Keinen Datum *nicht hat*»，这就违反了德语语法规则。因此，他的发言引起哄堂大笑。关于利希诺夫斯基的发言，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15—418页。——第649页。
- 197 席勒的叙事诗《保证》。——第651页。
- 198 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二场(《城门之前》)中的一句话。——第651页。
- 199 据基督教传说，圣经《旧约全书》是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写成的。马克思在这里用“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主要的东西！这是第一诫！——第652、840页。
- 200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26年巴黎第5版第1卷第130—131页(J. B. Sa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Cinquième édition, Tome premier, Paris, 1826, p.130—131)。——第653页。
- 201 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莎的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五十封信)。——

第 654 页。

- 202 这里引自阿·波特尔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 年纽约版（«Political Economy: its Objects, Uses, and Principle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York, 1841）。从导言中可以看出，该书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 1833 年在英国出版的乔·斯克罗普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前十章翻印的（经阿·波特尔修改）。——第 655 页。
- 20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89 页。——第 665 页。
- 204 “没有一天不动笔”（«*nulla dies sine linea*»），这句话据说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所说的，他照例每天不拘多少总要画一点。——第 669 页。
- 205 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第 671、678 页。
- 20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490 页。——第 674 页。
- 207 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236 页。——第 676、806 页。
- 20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70 页及以下各页。——第 680 页。
- 209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 年爱丁堡版第 1 卷第 142 页（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I, Edinburgh, 1814, p. 142）。——第 682 页。
- 2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617—622 页。——第 696 页。
- 211 1849 年至 1859 年间，英国参加了几次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1856

年), 对华战争(1856—1858 年和 1859—1860 年), 以及对波斯战争(1856—1857 年)。此外, 1849 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 在 1857—1859 年派兵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700 页。

- 21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卷第 8 章, 威克菲尔德发行, 1835 年伦敦版第 1 册第 195 页。——第 706 页。
- 21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55—156 页。——第 708 页。
- 214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 年都柏林版第 1 卷第 39、40 页 (J.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Dublin, 1770, p.39, 40)。——第 710 页。
- 215 尼·布瓦洛《讽刺诗集》第八首。——第 716 页。
- 216 指弗·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718 页。
- 217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 年爱丁堡版第 1 卷第 6 页。——第 718 页。
- 218 指 1830 年底到 1831 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 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日益增长引起的。运动得到了一个“斯温”的称号(英文 «swing» 的拼音, 指用手操作的糙粒的敲打部分)。举行暴动的雇农和加入他们队伍的贫苦佃农烧毁了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庄园、庄稼垛和仓库, 打碎了他们的脱谷机。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 对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第 740 页。
- 219 “低教会派”(«Low Church»)是英国国教教会中的一派, 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该派信徒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向带有假仁假义性质的慈善活动。舍夫茨别利伯爵(他就是艾释黎勋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会的“教皇”。——第 741 页。
- 220 贺雷西《诗论》第 173 节。——第 744 页。

- 22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6—223页。——第759页。
- 222 这个说法，见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第5篇第36章补充和第6篇结论。——第762页。
- 223 套用了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第778页。
- 224 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亚社社员组织是在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亚社社员的纲领和活动反映了爱尔兰人民大众对英国殖民奴役的抗议。芬尼亚社社员要求本国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打算借助武装起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但是，他们的密谋活动没有成功。六十年代末芬尼亚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到七十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第780页。
- 225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尝尽了苦难”(«Acerba fata Romanos agunt scelusque fraternae necis»)——贺雷西《抒情诗集》第七首。——第780页。
- 226 所谓世界市场的革命指的是十五世纪末热那亚、威尼斯和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在过境贸易上的作用急剧下降，这是由当时的地理上的大发现造成的，那时发现了古巴、海地、巴哈马群岛、北美大陆、绕过非洲南部通往印度的海路和南美大陆。——第784页。
- 227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52页。——第786页。
- 228 “穷人到处受苦难”(«Pauper ubique jacet»)——出自奥维狄乌斯的著作《节令记》第1卷第218行。——第789页。
- 229 显然是指1597年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统治下(当时俄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波利斯·戈东诺夫)所颁布的关于侦缉逃亡农民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经受不住地主的残酷奴役和欺压而逃跑的农民，要通缉五年并强制遣送给原来的主人。——第791页。

- 230**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 1688 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 1689 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 791 页。
- 231** 指 1796 年在伦敦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尊敬的艾德蒙·伯克就培德福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A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to a Noble Lord, on the Attacks made upon him and his Pension, in the House of Lords, by the Duke of Bedford, and the Earl of Lauderdale, Early in the present Sessions of Parliament*）。——第 792 页。
- 232** 李奇尼乌斯法——公元前 367 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对于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且规定撤销部分债务。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的增长，反映出平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了一定的增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第 795 页。
- 233** 斯多葛派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公元六世纪的一个哲学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主张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 796 页。
- 234** 指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要求拥立所谓的“年轻的王位僭望者”查理·爱德华为英国国王而于 1745—1746 年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同时反映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群众对他们遭受地主剥削以及大规模失去土地的抗议。随着起义被英国正规军镇压，克兰制度在苏格兰高地开始迅速瓦解，农民被逐出土地的现象更加严重了。——第 798 页。
- 235** 塔克斯编，正如马克思自己在《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69—576

页)一文中所解释的,是指克兰制度在苏格兰占统治地位时对直接从属于克兰首领——勒尔德(“大人”)的族长们的称呼。勒尔德把土地“塔克”这一全克兰的财产交给他们照管。他们对勒尔德交纳很少的贡税,以表示承认他的权力。而塔克斯缅又把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仆从。随着克兰制度的瓦解,勒尔德变成了地主,塔克斯缅实质上变成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同时把过去交纳贡税改为交纳地租。——第 798 页。

- 236 盖尔人 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克尔特人的后裔。——第 798 页。
- 237 马克思指的是他自己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载于 1853 年 2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69—576 页)。——第 799 页。
- 238 即决法庭(*Petty Sessions*)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诉讼程序审理小案件。——第 805 页。
- 239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 年爱丁堡版第 1 卷第 237 页。——第 806 页。
- 240 英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禁止“秘密活动”法。该法禁止“一切秘密活动,即使其理由是合法的”。在禁止结社法(见注 175)通过以前和废除以后,工人的组织和阶级斗争都根据禁止“秘密活动”法受到镇压。——第 809 页。
- 241 指 1793 年 6 月至 1794 年 6 月法国雅各宾党专政的政府。——第 810 页。
- 242 亚·安德森《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A.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第一版 1764 年在伦敦出版。——第 813 页。
- 243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 年都柏林版第 1 卷第 1 册第 16 章。——第 814 页。
- 244 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 年耶拿版第 1 卷第 371 页 (G. G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

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 Bd. I, Jena, 1830, S. 371)。——第 822 页。

- 245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大概是英文版的被认为是杨·德·维特的著作《论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西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Aanwysing der heilsame politike Gronden en Maximen van de Republike van Holland en West-Friesland»), 该书 1662 年第一次在来顿发表。现在已经查明, 该书的作者是荷兰经济学家兼企业主彼得·冯·德·霍列(即彼得·德·利亚·库尔), 其中只有两章是杨·德·维特写的。——第 825 页。
- 246 按照阿西恩托条约 规定, 西班牙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授给外国和私人以特权, 把非洲黑奴贩卖到它的美洲属地。——第 827 页。
- 247 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Tantae molis erat*)——引自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1 卷第 33 行。——第 829 页。
- 248 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 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 年巴黎版第 435 页(C. Pecqueur. «Théorie nouvelle d'économie sociale et politique, ou Études sur l'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 Paris, 1842, p. 435)。——第 830 页。
- 24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78—479、476—477 页。——第 832 页。
- 25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86、487 页。——第 835 页。
- 251 指 1844 年的英格兰银行法。1844 年英国政府力图防止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 根据罗·皮尔的创议, 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 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 即银行部和发行部, 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一千四百万英镑。但是, 尽管实行了 1844 年的银行法, 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 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 对货币需要特别感到尖锐, 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 1844 年的法律, 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第 842 页。

人名索引

A

- 阿庇安 (Appian 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代) ——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第 795 页。
- 阿伯思诺特, 约翰 (Arbuthnot, John) ——英国租地农场主, 1773 年在伦敦出版的匿名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所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的作者。——第 342、363、365、791、796 页。
- 阿布德拉的普罗塔哥拉 (Protagoras of Abdera 约公元前 480—411) ——古希腊诡辩学派哲学家, 鼓吹奴隶主民主制的思想家。——第 278 页。
- 阿丁顿, 斯梯芬 (Addington, Stephen 1729—1796) ——英国教士, 写有一些教科书。——第 794 页。
- 阿基罗卡斯 (Archilochus 公元前七世纪) ——古希腊抒情诗人。——第 404 页。
- 阿基米得 (Archimedes 约公元前 287—212) ——伟大的古希腊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第 338 页。
- 阿克莱, 理查 (Arkwright, Richard 1732—1792) ——英国企业家; 占有他人在英国的许多发明专利权。——第 414、419、465、469、535 页。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 ——文艺复兴时期

的意大利最大的诗人, 著有长诗《疯狂的罗兰》。——第 43 页。

- 阿里瓦本, 让 (Arrivabene, Jean 1787—1881) ——意大利政治流亡者, 1847 年布鲁塞尔经济会议的发起人, 经济著作的法译本译者。——第 654 页。
- 阿那卡雪斯 (Anacharsis 约公元前六世纪) ——古代亚细亚民族的哲学家。——第 118 页。

阿泰纳奥斯 (Athenaeus 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 ——古希腊雄辩家和语法学家。——第 118、153 页。

埃弗雷特 (Everet) ——十八世纪英国发明家。——第 469 页。

埃默里 (Emery) ——美国发明家。——第 421 页。

艾金, 约翰 (Aikin, John 1747—1822) ——英国医生, 历史学家和激进派政论家。——第 651、652、819、827、828 页。

艾释华特, 亨利 (Ashworth, Henry 1794—1880) ——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 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议会议员。——第 320、445 页。

艾释黎, 安东尼·库伯, 舍夫茨别利伯爵 (Ashley, Anthony Cooper, Earl of Shaftesbury 1801—1885) ——英国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的首领, 1847 年起为辉格

党人。——第 442、452、741 页。

艾威林, 爱德华(Aveling, Edward 1851—1898)——英国作家,《资本论》第一卷的译者;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来是社会主义同盟盟员;爱琳娜·马克思的丈夫。——第 33 页。

爱德华三世 (Edward III 1312—1377)——英国国王 (1327—1377)。——第 114、301、806 页。

爱德华六世 (Edward VI 1537—1553)——英国国王 (1547—1553)。——第 803 页。

爱尔维修, 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669 页。

安(Anne 1665—1714)——英国女王 (1702—1714)。——第 185、805 页。

安德森, 亚当(Anderson, Adam 约 1692—1765)——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贸易史方面的著作。——第 813、827 页。

安德森, 詹姆斯(Anderson, James 1739—180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详尽研究过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第 553、615、678、794、798、813 页。

安谛巴特洛斯(帖撒罗尼迦城的)——见帖撒罗尼迦城的安谛巴特洛斯。

奥克尼夫人, 伊丽莎白·维勒尔(Orkney, Elizabeth Villiers, Lady 1657—1733)——奥伦治的威廉的情妇。——第 791 页。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Wilhelm III of Oranien 1650—1702)——尼德兰总督 (1672—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791 页。

奥姆斯特德, 弗雷德里克·罗(Olmsted, Frederick Law 1822—1903)——美国园圃建筑规划家,写有关于英国和北美的著作。——第 222 页。

奥普戴克, 乔治(Opdyke, George 1805—1880)——美国企业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186 页。

奥日埃, 马利(Augier, Marie)——法国新闻记者,写有经济问题论文。——第 829 页。

奥特斯, 扎马里亚(Ortes, Giammaria 1713—1790)——意大利经济学家,当时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和独创性的著作的作者。——第 677、709 页。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 43—约公元 17)——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481、789 页。

奥维尔斯顿男爵, 赛米尔·琼斯·劳埃德(Overstone, Samuel Jones Loyd, Baron 1796—1883)——英国银行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 144、164 页。

B

巴顿, 约翰(Barton, John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692、739 页。

巴尔本, 尼古拉(Barbon, Nicholas 1640—169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所谓货币决定说的先驱。——第 47—50、143、149、164、166、677 页。

巴尔扎克, 奥诺莱·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646 页。

- 巴拉德, 爱德华 (Ballard, Edward 1820—1897) ——英国医生, 伦敦卫生视察员。——第 514 页。
-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 (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第 18、76、98、99、218、448、618 页。
- 巴特勒, 赛米尔 (Butler, Samuel 1612—1680) ——英国讽刺诗人, 《休迪布腊斯》一诗的作者。——第 49 页。
- 巴泽多夫, 约翰·伯恩哈特 (Basedow, Johann Bernhard 1723—1790) ——德国教育家。——第 535 页。
- 柏拉图 (Plato 约公元前 427—347)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 自然经济的维护者。——第 404、405 页。
- 拜比吉, 查理 (Babbage, Charles 1792—1871) ——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384、387、413、429、444 页。
- 拜耳斯, 约翰·巴纳德 (Byles, John Barnard 1801—1884) ——英国法学家, 枢密大臣, 托利党人; 写有法律、经济和其他问题的著作。——第 301、807 页。
- 班克斯, 乔治 (Bankes, George 1788—1856) ——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第 741 页。
- 贝尔, 查理 (Bell, Charles 1774—1842) ——苏格兰生理学家和外科医生。——第 310、728 页。
- 贝卡里亚, 切扎雷 (Beccaria, Cesare 1738—1794) ——意大利法学家, 政论家和经济学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第 404 页。
- 贝克, 罗伯特 (Baker, Robert)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英国工厂视察员。——第 333、438、466、490、777 页。
- 贝克尔, 伊曼努尔 (Bekker, Immanuel 1785—1871) ——德国语言学家, 整理并出版了古代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等)的著作。——第 174 页。
- 贝克莱, 乔治 (Berkeley, George 1685—1753) ——英国反动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主教;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 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 货币名目论的代表。——第 372、392 页。
- 贝克曼, 约翰 (Beckmann, John 1739—1811) ——德国资产阶级学者, 写有一些工艺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第 469 页。
- 贝魁尔, 康斯坦丁 (Pecqueur, Constantin 1801—1887) ——法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674、830 页。
- 贝勒斯, 约翰 (Bellers, John 1654—1725) ——英国经济学家; 强调劳动对财富形成的意义; 写有一些空想的社会改革的草案。——第 151、159、166、362、386、468、526、535、674 页。
- 贝利, 赛米尔 (Bailey, Samuel 1791—187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第 63、70、78、100、101、586、670 页。
-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第一国际会员, 1867 年起为国

- 会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第 41 页。
- 比彻-斯托，哈里埃特·伊丽莎白 (Beecher-Stowe, Harriet Elizabeth 1811—1896) ——著名的美国女作家，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第 799 页。
- 比多，日·恩· (Bidaut, J. N. 十九世纪上半叶) ——法国政论家，政府职员。——第 356 页。
- 比泽，弗兰茨 (Biese, Franz 1803—1895) ——德国教育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写有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著作。——第 447 页。
- 毕舍，菲力浦 (Buchez, Philippe 1796—1865)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810 页。
- 边沁，耶利米 (Bentham, Jeremy 1748—1832) ——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第 199、669—670 页。
- 波拿巴，路易 (Bonaparte, Louis) ——见拿破仑第三。
- 波斯耳恩威特，麦拉基 (Postlethwayt, Malachy 1707—1767) ——英国经济学家，《工商业大辞典》的编者。——第 304、305 页。
- 波特尔，阿朗佐 (Potter, Alonzo 1800—1865) ——美国主教，在一些院校教授神学，出版过斯克罗普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第 655 页。
- 波特尔，艾德蒙 (Potter, Edmund) ——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第 328、630—632 页。
- 伯克，艾德蒙 (Burke, Edmund 1729—1797) ——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写有一些经济问题的著作；在活动的初期倾向于自由主义，后来成为反动分子，成为十八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凶恶敌人。——第 233、263、359、792、829 页。
- 伯利克里 (Perikles 约公元前 490—429) ——雅典国家活动家，曾协助巩固奴隶主民主制。——第 404 页。
- 博耳顿，马修 (Boulton, Matthew 1728—1809) ——英国工程师和工业家。——第 426 页。
- 博克斯霍恩，马尔库斯·聚埃里乌斯 (Boxhorn, Marcus Zuerius 1612—1653) ——荷兰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第 469 页。
- 博林布罗克，亨利 (Bolingbroke, Henry 1678—1751) ——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第 824 页。
-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 (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第 150、161 页。
- 布坎南，大卫 (Buchanan, David 1779—1848) ——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追随者和注释者。——第 146、613、798 页。
- 布莱基，罗伯特 (Blakey, Robert 1795—1878) ——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第 790 页。
- 布莱特，约翰 (Bright, John 1811—1889) ——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起是自由党左翼的领袖；多次出任自由党内阁

- 的大臣。——第 17、285、314、611、713、744、817 页。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 ——最著名的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第 307 页。
-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 (Blanqui, Jérôme-Adolphe 1798—1854)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307、374 页。
-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 (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了“劳动货币”论。——第 84 页。
- 布累兹，阿道夫·古斯达夫 (Blaise, Adolphe-Gustave 1811—1886) ——法国经济学家，日罗姆·阿道夫·布朗基的著作发行人。——第 374 页。
- 布林德利，詹姆斯 (Brindley, James 1716—1772) ——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 386 页。
- 布鲁姆，亨利·彼得 (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 ——男爵，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著名活动家，大法官(1830—1834)。——第 828 页。
- 布吕克纳，约翰 (Bruckner, John 1726—1804) ——英国基督教教士，神学家。——第 677 页。
- 布伦坦诺，路约 (Brentano, Lujo 1844—1931)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42—44 页。
- 布罗德赫斯特，约· (Broadhurst, J.)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69 页。
- 布罗迪，本杰明 (Brodie, Benjamin 1783—1862) ——著名的英国外科医生。——第 310 页。
- 布洛克，莫里斯 (Block, Maurice 1816—1901) ——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19 页。
- 布瓦洛，埃蒂耶纳 (Boileau, Étienne 1200—1269) ——巴黎行政长官，《手工业手册》一书编者，该书收集了巴黎手工业行会的章程。——第 533 页。
- 布瓦洛，尼古拉 (Boileau, Nicolas 1636—1711) ——法国诗人和古典主义理论家。——第 718 页。

C

-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约 742—814) ——法兰克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 795 页。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 ——英国国王 (1625—1649)，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788、789 页。
-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 ——英国国王 (1660—1685)。——第 145 页。
- 查理五世 (Karl V 1500—1558)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1519—1556) 和西班牙国王，称查理一世 (1516—1556)。——第 805 页。
- 查理六世 (Karl VI 1685—1740)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1711—1740)。——第 469 页。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622—1660) ——瑞典国王 (1654—1660)。——第 792 页。

查理十一世 (Charles XI 1655—1697)

——瑞典国王 (1660—1697)。——第 792 页。

查默斯, 托马斯 (Chalmers, Thomas 1780—1847) ——英国基督教神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追随者。——第 174、185、677、678 页。

柴尔德, 约瑟亚 (Child, Josiah 1630—1699) ——英国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者, 银行家和商人。——第 108、828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学者, 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 17 页。

D

达布耳德, 托马斯 (Doubleday, Thomas 1790—1870) ——英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第 825 页。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 ——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 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人。——第 379、409 页。

达菲, 查理·加文 (Duffy, Charles Gavan 1816—1903)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1885 年侨居澳大利亚, 曾任某些国家职务。——第 843 页。

达费林侯爵, 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 (Dufferin, Frederick Temple Hamilton-Temple-Blackwood, Marquess of 1826—1902)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自由党人, 爱尔兰大地主, 加拿大总督 (1872—1878), 印度总督 (1884—

1888)。——第 778 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13、121、275 页。

道梅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Daumer, Georg Friedrich 1800—1875) ——德国作家, 写有一些宗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319 页。

德·科, 萨洛蒙 (De Cous, Salomon 1576—1626) ——法国工程师。——第 414 页。

德·昆西, 托马斯 (De Quincey, Thomas 1785—1859) ——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 李嘉图的注释者; 他的著作反映了李嘉图学派的没落和瓦解。——第 434 页。

德·罗别尔提, 叶甫盖尼·瓦连廷诺维奇 (Де-Роберти, Евген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43—1915) ——俄国实证论哲学家,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七十年代成为地方自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后来侨居法国。——第 19 页。

德尔, 欧仁 (Daire, Eugène 1798—1847)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第 49、109、127—129、161、181、349 页。

德莱登, 约翰 (Dryden, John 1631—1700) ——英国诗人和剧作家, 古典主义的代表。——第 270 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 安都昂·路易·克劳德 (Destutt de Tracy, Antoine-Louis-Claude, comte de 1754—1836)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感觉论哲学家; 君主立宪的拥护者。——第 97、179、186、362、364、711 页。

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 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之一; 首相(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第 499 页。

登宁, 托马斯·约瑟夫(Dunning, Thomas Joseph 1799—1873)——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第 603、607、829 页。

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Diodorus of Sicily 公元前 80 左右—29)——古希腊历史学家。——第 163、263、377、406、560 页。

狄慈根, 约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3—1888)——杰出的德国哲学家, 独立地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制革工人。——第 18 页。

狄德罗, 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领袖。——第 154 页。

狄更斯, 查理(Dickens, Charles 1812—1870)——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484 页。

笛福, 丹尼尔(Defoe, Daniel 约 1660—1731)——著名的英国作家和政论家, 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第 93、95、161、321、676 页。

笛卡儿, 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著名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 428 页。

都铎王朝——英国王朝(1485—1603)。——第 817 页。

杜邦, 比埃尔(Dupont, Pierre 1821—

1870)——法国诗人, 他的歌在工人中广为流行。——第 759 页。

杜邦·德·奈穆尔, 比埃尔·赛米尔(Dupont de Nemours, Pierre-Samuel 1739—1817)——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第 127 页。

杜尔哥, 安·罗伯特·雅克(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重农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财政总稽核(1774—1776)。——第 204、349、583 页。

杜克佩西奥, 爱德华(Ducpétiaux, Edouard 1804—1868)——比利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 资产阶级慈善家; 监狱和慈善设施视察员。——第 735、737 页。

杜能, 约翰·亨利希(Thünen, Johann Heinrich 1783—185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研究过农业经济问题。——第 681 页。

E

厄什韦葛, 威廉(Eschwege, Wilhelm 1777—1855)——德国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第 53 页。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 3、30—37、38—44、92、173、186、268、273、283、298、323、335、438、463—465、487、534、665、696、717、832 页。

恩索尔, 乔治(Ensor, George 1769—1843)——英国政论家, 批判过马尔萨斯主义。——第 798 页。

F

法尔, 约翰·理查(Farre, John Richard 1774—1862)——英国医生。——第

- 310 页。
- 范德林特, 杰科布 (Vanderlint, Jacob 死于 1740 年)——英国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的先驱, 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第 143、150、165、304、306、348、368、386、677 页。
- 菲尔登, 约翰 (Fielden, John 1784—1849)——英国工厂主, 资产阶级慈善家, 工厂法的拥护者。——第 442、452、827 页。
- 菲力浦六世 (Philippe VI 1293—1350)——法国国王 (1328—1350)。——第 109 页。
- 菲塞林, 西蒙 (Vissering, Simon 1818—1888)——荷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 550 页。
- 费尔贝恩, 威廉 (Fairbairn, William 1789—1874)——英国工厂主, 工程师和发明家。——第 477 页。
- 费里埃, 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Ferrier, François-Louis-Auguste 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摹仿者, 官员。——第 75—76 页。
-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67 页。
- 丰特雷, 安都昂·路易 (Fontenet, Antoine-Louis)——法国医生, 十九世纪下半叶写有一些公共卫生方面的著作。——第 402 页。
- 弗格森, 亚当 (Ferguson, Adam 1723—1816)——苏格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 143、392、400、401 页。
- 弗莱塔格, 古斯达夫 (Freytag, Gustav 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第 808 页。
- 弗兰德, 威廉 (Ferrand, William)——英国地主, 追随托利党。——第 297、456、457、630 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 (1740—1786)。——第 801、814 页。
- 弗利特伍德, 威廉 (Fleetwood, William 1656—1723)——英国主教, 写有英国价格史方面的著作。——第 302 页。
- 弗列特切尔, 安德鲁 (Fletcher, Andrew 1655—1716)——苏格兰政治活动家, 地主, 主张苏格兰独立。——第 790 页。
- 孚耳阿伯, 约翰 (Faulhaber, Johann 1580—1635)——德国数学家和工程师。——第 414 页。
- 孚赫, 尤利乌斯 (Faucher,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贸易自由的拥护者, 侨居英国, 为《晨星报》的撰稿人, 1861 年回到德国, 进步党人。——第 268、511 页。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221、841 页。
- 福尔邦奈, 弗朗斯瓦·维隆·杜韦尔瑞·德 (Forbonnais, François-Véron-Duverger de 1722—180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 109 页。
- 福尔布斯 (Forbes)——英国发明家。——第 429 页。
- 福塞特, 亨利 (Fawcett, Henry 1833—

188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追随者; 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第 611、671、716、817 页。

福斯特, 纳萨涅尔 (Forster, Nathaniel 1726 左右—1790)——英国教士, 写有一些经济学著作, 维护工人的利益。——第 304、468、561、793、794 页。

福斯特, 威廉·爱德华 (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第 727、728 页。

福特斯居, 约翰 (Fortescue, John 1394—1476)——英国法学家, 写有一些关于英国国家制度问题的著作。——第 786、787 页。

富尔顿, 罗伯特 (Fulton, Robert 1765—1815)——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第一艘轮船的建造者。——第 535 页。

富拉顿, 约翰 (Fullarton, John 1780—184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写有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 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 148、162、165 页。

富兰克林, 本杰明 (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北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 大学者, 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第 65、187、204、363、676 页。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322、421、467、761、762 页。

G

盖斯克尔, 彼得 (Gaskell, Peter)——英国医生, 自由党人,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

资产阶级政论家。——第 477、486 页。
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尔 (Colombo, Christopher 1451—1506)——发现美洲的杰出的航海家; 在西班牙供职, 热那亚人。——第 151 页。

哥特谢德, 约翰·克利斯托夫 (Gottsched, Johann Christoph 1700—1766)——德国作家和批评家, 十八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第 244 页。

歌德, 约翰·沃尔弗冈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84、104、220、221、300、651、778 页。

戈登, 约翰·威廉 (Gordon, John William 1814—1870)——英国军官, 军事工程师, 后为将军, 克里木英军工程长官 (1854—1855)。——第 198 页。

戈东诺夫, 波利斯·费多罗维奇 (Годунов, Борис Федорович 1551 左右—1605)——俄国沙皇 (1598—1605)。——第 791 页。

格莱格, 罗伯特·海德 (Greg, Robert Hyde 1795—1875)——英国大工厂主, 自由党人。——第 323 页。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 40—44、495、715、716、809 页。

格雷, 乔治 (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内务大臣 (1846—1852、1855—1858、1861—1866) 和殖民大臣 (1854—1855)。——第 320、729 页。

格雷，约翰 (Gray, John 1798—1850)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追随者，“劳动货币”论创始人之一。——第 84 页。

格雷，约翰 (Gray, John) ——十八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作家，写有一些关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著作。——第 183 页。

格里哥瓦尔，昂利 (Gregoir, Henri) ——布鲁塞尔印刷工人协会书记，《布鲁塞尔违警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 年出版)一书的作者。——第 609 页。

格林豪，爱德华·赫德勒姆 (Greenhow, Edward Headlam 1814—1888) ——英国内科医生。——第 273、274、326 页。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 (Grove, William Robert 1811—1896) ——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第 575 页。

H

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安 (Maximilian von Habsburg 1832—1867) ——奥地利大公，在意大利的奥国领地总督 (1857—1859)，在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哥时期被宣布为墨西哥傀儡帝国的皇帝 (1864—1867)，被墨西哥爱国者枪毙。——第 191 页。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 (Haller, Carl Ludwig 1768—1854) ——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辩护人。——第 428 页。

哈里斯，詹姆斯 (Harris, James 1709—1780) ——英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国家活动家，议会议员，财政部部务委员 (1763—1765)。——第 404 页。

哈里斯，詹姆斯，马姆兹伯里伯爵

(Harris, James, Earl of Malmesbury 1746—1820) ——英国外交家，曾任驻俄国等国大使。——第 404 页。

哈里逊，威廉 (Harrison, William 1534—1593) ——英国教士，他的一些著作是研究十六世纪英国史的重要史料。——第 786、812 页。

哈姆，威廉 (Hamm, Wilhelm 1820—1880) ——德国农学家，写有一些农业问题的著作。——第 551 页。

哈塞耳，阿瑟·希尔 (Hassall, Arthur Hill 1817—1894) ——英国医生，写有一些主要是关于公共卫生问题的著作。——第 198、277—278 页。

哈斯廷斯，华伦 (Hastings, Warren 1732—1818) ——英属印度的第一任总督 (1774—1785)，残酷的殖民政策的传播者之一，1788 年被控告滥用职权，终因审理伪善而被宣告无罪。——第 821 页。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 335、669 页。

汉密尔顿，威廉 (Hamilton, William 1788—1856) ——苏格兰哲学家，杜格耳德·斯图亚特著作的出版者。——第 356、532 页。

汉森，格奥尔格 (Hanssen, Georg 1809—1894)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史问题的著作。——第 265 页。

汉特，亨利·朱利安 (Hunter, Henry Julian) ——英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工人生活贫困状况的报告。——第 437、722—727、731、732、744、747、749—750、751、758、759、789 页。

豪顿，约翰 (Houghton, John 死于 1705)

- 年)——英国商人,出版一些关于商业、工业和农业问题的著作。——第 468 页。
- 豪威尔(Howell)——英国工厂视察员。——第 255, 269 页。
- 豪伊特,威廉(Howitt, William 1792—1879)——英国作家,写有一些关于基督教历史和其他问题的著作。——第 820 页。
- 荷马(Homer)——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 77, 283, 404 页。
- 赫顿,查理(Hutton, Charles 1737—1823)——英国数学家。——第 409 页。
-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约公元前 540—480)——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 124 页。
- 赫伦施万德,让(Herrenschwand, Jean 1728—1812)——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141 页。
-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查·达尔文的朋友和达尔文学说的普及者。——第 529 页。
-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8, 126, 296, 380, 403, 516, 744, 780 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 20, 24, 57, 109, 191, 203, 292, 342, 402, 645 页。
- 亨利三世(Henri III 1551—1589)——法国国王(1574—1589)。——第 152 页。
-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第 302, 787, 803 页。
-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第 787, 803 页。
- 胡阿雷兹,贝尼托·帕布洛(Juárez, Benito Pablo 1806—1872)——杰出的墨西哥国家活动家,争取本国民族独立的战士,内战(1858—1860)和武装干涉墨西哥(1861—1867)时期的自由党领袖,墨西哥总统(1858—1872)。——第 191 页。
- 华德,约翰(Ward, John)——1843 年伦敦英文版《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初期的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一书的作者。——第 297 页。
- 华莱士,罗伯特(Wallace, Robert 1697—1771)——英国教士和统计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第 391, 676 页。
- 华氏(华伦海特),加布里埃尔·丹尼尔(Fahrenheit, Gabriel Daniel 1686—1736)——物理学家,设计过一种改良温度计。——第 279, 289, 329 页。
- 淮亚特,约翰(Wyatt, John 1700—1766)——英国发明家,曾发明纺纱机。——第 409 页。
- 惠特布雷德,赛米尔(Whitbread, Samuel 1758—1815)——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辉格党人。——第 809 页。
- 霍布豪斯,约翰·凯姆,布罗顿男爵(Hobhouse, John Cam, Baron Broughton 1786—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1831 年的工厂法是在他的倡

- 议下通过的。——第 321 页。
-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 193、395、428、677 页。
- 霍恩, 乔治 (Horne, George 1730—1792) ——英国主教, 写有许多抨击牛顿、休谟、亚·斯密和其他学者的小册子。——第 678 页。
- 霍尔, 克里斯托弗·纽曼 (Hall, Christopher Newman 1816—1902) ——英国教士, 高级僧侣中的代表人物。——第 285 页。
- 霍华德·德·华尔登男爵, 查理·奥加斯特斯·爱里斯 (Howard de Walden, Charles Augustus Ellis, Baron 1799—1868) ——英国外交家。——第 307 页。
- 霍吉斯金, 托马斯 (Hodgskin, Thomas 1787—1869) ——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 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第 377、391、393、587、630、818 页。
- 霍林舍德, 拉斐尔 (Holinshed, Raphael 约死于 1580 年) ——英国历史学家,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从古代到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编年史的作者。——第 805 页。
- 霍纳, 弗兰西斯 (Horner, Francis 1773—1817)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辛格党人, 金条委员会主席 (1810 年), 李嘉图货币理论的拥护者。——第 827 页。
- 霍纳, 莱昂纳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 ——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工厂视察员 (1833—1856), 曾维护工人利益。——第 252、269、308、312、316、320、322、327、439、440、454、467、604 页。
- 霍普金斯, 托马斯 (Hopkins, Thomas) ——十九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257 页。
- J**
- 基尔希曼, 尤利乌斯 (Kirchmann, Julius 1802—1884) ——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 激进主义者,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48), 属中间派左翼。——第 581 页。
- 基谢廖夫, 巴维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Киселе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88—1872)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将军, 俄国驻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行政首脑 (1829—1834)。——第 266 页。
- 吉洛特, 约瑟夫 (Gillott, Joseph 1799—1873) ——英国工厂主, 在北明翰首先实行钢笔尖大 规模生产。——第 505 页。
- 吉斯伯恩, 托马斯 (Gisborne, Thomas 1758—1846) ——英国神学家, 写有一些关于基督教道德问题的著作。——第 827 页。
- 季别尔,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 ——著名的俄国经济学家; 虽然不懂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 却成为俄国最早普及马克思的经济著作的人之一; 主张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宗教改革。——第 19 页。
- 加尔涅, 热尔门 (Garnier, Germain 1754—1821) ——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摹仿者；亚·斯密的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第 401、605 页。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 (Galiani, Ferdinando 1728—1787) ——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批评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同时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做了一些正确的猜测。——第 91、107、108、118、175、180、350、706 页。

加尼耳，沙尔 (Ganilh, Charles 1758—1836)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摹仿者。——第 76、98、197、204、490 页。

加思里，乔治·詹姆斯 (Guthrie, George James 1785—1856) ——英国外科医生。——第 310 页。

杰科布，威廉 (Jacob, William 1762 左右—1851) ——英国商人，写有一些经济著作。——第 53、246 页。

金凯德，约翰 (Kincaid, John 1787—1862) ——英国官吏，1850 年起为苏格兰工厂和监狱视察员。——第 440 页。
居利希，古斯达夫 (Gülich, Gustav 1791—1847)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一些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第 15、822 页。

居维叶，若尔日 (Cuvier, Georges 1769—1832) ——法国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提出了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灾变论。——第 562 页。

K

卡尔利，詹·黎纳尔多 (Carli, Gian Rinaldo 1720—1795) ——意大利学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和谷物贸易的著作，重商主义的反对者。——第 366 页。

卡耳佩珀，托马斯 (Culpeper, Thomas 1573—1662)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者。——第 828 页。

卡莱尔，安多尼 (Carlisle, Anthony 1768—1840) ——英国外科医生。——第 310 页。

卡莱尔，托马斯 (Carlyle, Thomas 1795—1881) ——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从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评英国资产阶级，1848 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死敌；追随托利党。——第 285 页。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陆军和殖民大臣 (1805—1806、1807—1809)，外交大臣 (1812—1822)。——第 469 页。

卡泽诺夫，约翰 (Cazenove, John 十九世纪) ——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第 224、353、571、623、635、654 页。

凯尔恩斯，约翰·埃利奥特 (Cairnes, John Elliot 1823—1875)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第 222、296、369 页。

凯里，亨利·查理 (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 ——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创始人。——第 245、583、617、618、799、817 页。

凯特勒，阿道夫 (Quetelet, Adolphe 1796—1874) ——比利时资产阶级学者；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反科学的反动的“平均个人”论创立者。——第 359 页。

- 坎伯尔, 乔治(Campbell, George 1824—1892) —— 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 写有一些关于印度的著作; 议会议员, 自由党人。—— 第 396 页。
- 康替龙, 菲力浦(Cantillon, Philip) —— 英国经济学家, 1759 年他修订出版了理查·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的英文版本。—— 第 608 页。
- 康替龙, 理查(Cantillon, Richard 1680—1734) —— 英国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的先驱, 商人。—— 第 608、677 页。
- 考夫曼, 伊拉里昂, 伊格纳切维奇(Кауфман, Илларион Игнатьевич 1848—1916) —— 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彼得堡大学教授, 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的著作。—— 第 20—23 页。
- 柯贝特, 托马斯(Corbet, Thomas) —— 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 172、646 页。
- 柯尔培尔, 让·巴蒂斯特(Colbert, Jean-Baptiste 1619—1683) —— 法国国家活动家, 财政总稽核, 奉行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商主义政策。—— 第 343、825 页。
- 柯普, 海尔曼·弗兰茨·摩里茨(Kopp, Hermann Franz Moritz 1817—1892) —— 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学家。—— 第 343 页。
- 科贝特, 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 ——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主张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 第 320、789、823、825 页。
- 科布顿, 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 —— 英国工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领袖之一和反谷物同盟法的创始人之一; 议会议员。—— 第 17、285、314、744 页。
- 科尔崩, 克劳德·昂提姆(Carbon, Claude-Anthime 1808—1891) —— 法国工人, 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 534 页。
- 科兰, 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Colins, Jean-Guillaume-César-Alexandre-Hippolyte 1783—1859) —— 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出生于比利时, 主张由国家来收地租, 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手段。—— 第 674、759、841 页。
- 克劳伦, 亨利希(Clauren, Heinrich 1771—1854) (卡尔·海因 Carl Heun 的笔名) —— 德国作家, 写有一些感伤主义小说。—— 第 251 页。
- 克劳生, 彼得(Claussen, Pieter) —— 比利时发明家, 园编机的改进者。—— 第 409 页。
- 克雷门特, 西蒙(Clement, Simon) —— 英国商人, 匿名著作《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1695 年伦敦版)的作者。—— 第 108 页。
- 克虏伯, 阿尔弗勒德(Krupp, Alfred 1812—1887) —— 德国大工业家, 供应欧洲大多数国家军火的冶金厂厂主。—— 第 428 页。
- 克伦威尔, 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 ——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 第 788、790、817 页。
- 肯尼特, 怀特(Kennet, White 1660—1728) —— 英国主教和历史学家。—— 第 788 页。
- 肯特, 纳萨涅耳(Kent, Nathaniel 1737

- 1810)——英国农学家,写有一些农业方面的著作。——第 794 页。
- 孔德,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1798—1857)——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第 19、369 页。
- 孔德,沙尔(Comte, Charles 1782—1837)——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第 820 页。
-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博诺·德 (Condillac, Étienne-Bonnot de 1715—1780)——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然神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第 181 页。
- 孔多塞,让·安都昂 (Condorcet, Jean-Antoine 1743—1794)——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启蒙运动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吉伦特派,第一个制定了人的理性的不断完善是历史进步源泉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第 676 页。
- 库尔塞尔-塞纳伊,让·古斯达夫 (Courcelle-Seneuil, Jean-Gustave 1813—189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工业企业经济方面和关于信贷、银行问题的著作。——第 260、655 页。
- 库格曼,路德维希 (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德国医生,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4 页。
- 库斯托第,彼得罗 (Custodi, Pietro 1771—1842)——意大利经济学家,因出版十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著作而闻名。——第 56、91、107、109、175、180、404、709 页。
- 库扎,亚历山大鲁 (Cuza, Alexander 1820—1873)——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1859—1866 年为多瑙河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于 1862 年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君主(执政者),称亚历山大·约翰一世;由于反动派的阴谋,他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第 191 页。
- 魁奈,弗朗斯瓦 (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最大的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第 17、127、356、608、648、677 页。
- ## L
- 拉波尔德,亚历山大·路易·约瑟夫 (Laborde, Alexandre-Louis-Joseph 1774—1842)——侯爵,法国考古学家,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第 583 页。
- 拉马志尼,贝尔纳迪诺 (Ramazzini, Bernardino 1633—1714)——意大利医生,综合并整理过职业病统计材料。——第 402 页。
- 拉姆赛,乔治 (Ramsay, 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第 184、188、352、559、622、693 页。
- 拉萨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7、124 页。
- 拉沙特尔,莫里斯 (Lachâtre, Maurice 1814—1900)——法国进步的新闻记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第 26、28、30、34 页。

- 拉斯克尔，爱德华 (Lasker, Eduard 1829—1884) ——德国政治活动家，国会议员，支持俾斯麦反动政策的民族自由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第 41 页。
- 拉维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洛·德 (Lavergne, Louis-Gabriele-Léonce-Guilhaud de 1809—1880)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农业经济方面的著作。——第 551、582、780 页。
- 莱佛尔斯，托马斯·斯坦弗德 (Raffles, Thomas Stamford 1781—1826) ——英国殖民官员，1811—1816 年任爪哇总督，著有《爪哇史》。——第 397、820 页。
- 莱喀古士 (Lycurgus) ——传说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相传他活在公元前 9—8 世纪。——第 465 页。
- 莱特，托马斯 (Wright, Thomas 1711—1786) ——英国自然科学研究者。——第 794 页。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 ——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24 页。
- 莱文斯顿，皮尔西 (Ravenstone, Piercy 死于 1830 年) ——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追随者，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第 470、559 页。
- 赖希，爱德华 (Reich, Eduard 1836—1919) ——德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作。——第 402 页。
-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 (Linguet, 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 ——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反对者，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批判的分析。——第 261、319、371、676、806 页。
- 兰格，赛米尔 (Laing, Samuel 1810—1897)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英国铁路公司某些高级行政职务；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 224、706、722、740 页。
- 朗切洛蒂，塞康多 (Lancellotti, Secondo 1575—1643) ——意大利的修道院院长，考古学家，写有一些历史著作。——第 468 页。
- 勒蒙特，比埃尔·爱德华 (Lemontey, Pierre-Édouard 1762—1826) ——法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立法议会右翼。——第 401 页。
-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 (Redgrave, Alexander) ——英国工厂视察员。——第 298、414、435、441、457、475、491、499、501、599、616、617 页。
- 雷尼奥，埃利阿斯·若尔日·奥利瓦 (Regnault, Elias-Georges-Oliva 1801—1868)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国家官员。——第 267 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 ——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 268、365、424、553、628 页。
- 李嘉图，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16、19、78、93、97、98、101、114、164、189、212、231、257、341、425、430。

- 432, 447, 471, 473, 479, 553, 564, 570, 571, 577, 578, 618, 629, 646, 666, 667, 674, 693, 827 页。
- 李奇尼乌斯(凯尤斯·李奇尼乌斯·斯托洛)(Cajus Licinius Stolo)——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的罗马国家活动家。——第 795 页。
- 李维, 梯特(Livius, Titus 公元前 59—公元 17)——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的作者。——第 310 页。
- 里特比, 亨利(Letheby, Henry 1816—1876)——英国医生和化学家。——第 284 页。
- 里维, 莱昂(Levi, Leone 1821—188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学家。——第 801—802 页。
-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见迈尔西埃(里维埃尔的)。
- 理查逊, 本杰明(Richardson, Benjamin 1828—1896)——英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作。——第 284 页。
- 利希诺夫斯基, 费里克斯(Lichnowski, Felix 1814—1848)——公爵,普鲁士军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1848 年 9 月法兰克福起义时被人民打死。——第 649 页。
- 列沙白里哀, 伊萨克·勒奈·吉(Le Chapelier, Isaac-René-Guy 1754—1794)——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1791 年 6 月 14 日通过的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法的起草者;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由于参与阴谋活动被处死。——第 810 页。
- 列萨日, 阿兰·勒奈(Lesage, Allain-Rene 1668—1747)——法国作家,著名小说《山梯良那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的作者。——第 778 页。
- 列特隆, 吉约姆·弗朗斯瓦(Le Trosne, Guillaume-François 1728—178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重农主义者。——第 49, 52, 109, 119, 131, 135, 139, 165, 180, 183, 186, 236 页。
- 琉善(Lucianus 约 120—180)——古希腊讽刺作家。——第 678 页。
- 卢——见卢·拉维涅, 比埃尔·赛勒斯丹。
- 卢·拉维涅, 比埃尔·赛勒斯丹(Roux-Lavergne, Pierre-Célestin 1802—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810 页。
- 卢阿尔·德·卡尔, 皮·马丽(Rouard de Card, Pie-Marie)——法国神学家。——第 278 页。
- 卢本斯, 彼得(Rubens, Peter 1577—1640)——佛来米大画家。——第 329 页。
- 卢格, 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92, 173, 186 页。
-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 约公元前 99—55)——杰出的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第 242 页。
- 卢梭, 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815 页。
- 鲁瓦, 约瑟夫(Roy, Joseph)——马克思

- 的《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文版译者。——第 29、34 页。
- 路德，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 ——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級思想家；在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 155、218、343、650、822 页。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法国国王 (1643—1715)。——第 161 页。
-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 ——法国国王 (1774—1792)，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805 页。
-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308 页。
- 罗，约翰 (Law, John 1671—1729)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法国财政大臣 (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第 109、677 页。
- 罗伯茨，乔治 (Roberts, George 死于 1860 年)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一些关于英国南部各郡的历史著作。——第 789 页。
- 罗德戴尔，詹姆斯 (Lauderdale, James 1759—1839) ——伯爵，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亚·斯密的理论进行批评。——第 386 页。
- 罗杰斯，詹姆斯·爱得文·撒罗耳德 (Ro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1823—189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英国国民经济史的著作。——第 738、744、790、817 页。
- 罗朗，奥古斯特 (Laurent, Auguste 1807—1853) ——法国化学家。——第 343 页。
-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 (Rogier, Charles-Latour 1800—1885) ——比利时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内政大臣 (1847—1852)。——第 307 页。
- 罗素，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第 792 页。
- 罗西，佩勒格里诺 (Rossi, Pellegrino 1787—1848) ——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久居法国。——第 196、627 页。
- 罗雪尔，威廉 (Roscher, Wilhelm 1817—1894)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 110、181、232、244、256、293、360、403、674 页。
- 罗伊，亨利 (Roy, Henry) ——英国医生和经济学家。——第 159、716 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 (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 581 页。
- 洛克，约翰 (Locke, John 1632—1704) ——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 48、108、119、144、172、428、677 页。

M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 英国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 第 185、239、349、390、553、578、610、623、629、635、644、646、653、654、656、666、670、676、696、709、770 页。
- 马考莱，托马斯·巴宾顿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 ——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 第 303、307、785、790 页。
- 马克思，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 第 1、7、14、15、20—25、26—35、36—44、246 页。
-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Marx-Aveling, Eleanor 1855—1898) —— 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马克思的小女儿，1884 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 第 33、38、43、44 页。
- 马克西米利安——见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安。
- 马提诺，哈里埃特 (Martineau, Harriet 1802—1876) —— 英国资产阶级女作家，马尔萨斯主义的鼓吹者。—— 第 696 页。
- 马西，约瑟夫 (Massie, Joseph 死于 1784 年) ——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 562 页。
- 麦岑，奥古斯特 (Meitzen, August 1822—1910) —— 德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写有一些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土地关系史方面的著作。—— 第 265 页。
- 麦克格莱哥尔，约翰 (MacGregor, John 1797—1857) —— 英国统计学家，自由贸易论者，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和董事之一 (1849—1856)。—— 第 304 页。
-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 第 164、172、175、217、304、357、448、479、484、570、667—668、670、794 页。
- 麦克拉伦，詹姆斯 (Maclarens, James) —— 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流通史的研究者。—— 第 115 页。
- 麦克劳德，亨利·丹宁 (Macleod, Henry Dunning 1821—1902) —— 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 第 76、176 页。
- 迈尔，济格蒙德 (Mayer, Sigmund) —— 维也纳的工厂主。—— 第 15 页。
- 迈尔西埃 (里维埃尔的)，保尔·比埃尔 (Mercier de la Rivière, Paul-Pierre 1720—1793) ——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 第 128、129、150、168、171、179、183 页。
-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 (Meyer, Rudolf Hermann 1839—1899) —— 德国经济学家，俾斯麦的反对者。—— 第 267、581 页。
- 曼，托马斯 (Mun, Thomas 1571—1641) —— 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贸易差额论的创立者，1615 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之一。—— 第 561 页。
-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 (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 —— 著

- 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第 88、265 页。
- 梅里威尔，赫尔曼 (Merivale, Herman 1806—1874)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写有关于殖民原理的著作。—— 第 695、839 页。
- 梅涅尼·阿格利巴 (Menenius Agrippa 死于公元前 493 年) —— 罗马贵族。—— 第 399 页。
- 门德尔森，莫泽斯 (Mendelssohn, Moses 1729—1786) —— 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然神论哲学家。—— 第 24 页。
- 蒙森，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 —— 德国资产阶级古罗马史学家。—— 第 190、194 页。
- 蒙塔郎贝尔，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天主教党的首领。—— 第 515 页。
- 蒙泰，阿芒·阿列克西斯 (Monteil, Amans-Alexis 1769—1850) ——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第 813 页。
- 孟德斯鸠，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 —— 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 第 109、144、676、824 页。
- 孟德维尔，贝尔纳德 (Mandeville, Bernard 1670—1733) —— 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 第 393、674—675、677 页。
- 弥勒，亚当·亨利希 (Müller, Adam Heinrich 1779—1829) —— 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经济学说的反对者。—— 第 145 页。
-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 (Mirabeau, Honoré-Gabriel 1749—1791) ——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利益的代表者。—— 第 523、785、801、815、825 页。
-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 (Mirabeau, Victor-Riqueti, marquis de 1715—1789) ——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奥诺莱·加布里埃尔·米拉波的父亲。—— 第 677、834 页。
- 摩尔顿，约翰·查默斯 (Morton, John Chalmers 1821—1888) —— 英国农学家，写有一些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 第 413、607 页。
- 摩耳斯沃思，威廉 (Molesworth, William 1810—1855) —— 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属于所谓梅费尔激进派)，议会议员，公共工程部长官 (1853—1855) 和殖民大臣 (1855)。—— 第 193 页。
- 莫尔，托马斯 (More, Thomas 1478—1535) —— 英国政治活动家，大法官，人道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 第 677、787、804 页。
- 莫利纳里，古斯达夫 (Molinari, Gustave 1819—1912) —— 比利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 第 181、463、655、840 页。
- 莫兹利，亨利 (Maudslay, Henry 1771—1831) —— 英国设计家和工厂主。—— 第 422 页。
- 默里，休 (Murray, Hugh 1779—1846) —— 英国地理学家。—— 第 378 页。

墨菲，约翰·尼古拉斯 (Murphy, John Nicolas) ——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1870年在伦敦出版的《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一书的著者。—— 第 772 页。

穆尔，赛米尔 (Moore, Samuel 1830 左右—1912) —— 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第 33, 34 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摹仿者。—— 第 17, 18, 144, 154, 408, 479, 553, 564, 566, 647, 654, 658, 670, 817 页。

穆勒，詹姆斯 (Mill, James 1773—1836)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上是边沁的追随者。—— 第 133, 144, 176, 210, 224, 391, 479, 553, 622, 626, 629, 670 页。

N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 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 第 306 页。

奈斯密斯，詹姆斯 (Nasmyth, James 1808—1890) —— 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人。—— 第 423, 454, 477 页。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 (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31) —— 德国的古代史学家。—— 第 263 页。

纽马奇，威廉 (Newmarch, William 1820—1882)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和统计学家。—— 第 328 页。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 (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 —— 英国语言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写有一些关于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著作。—— 第 792, 797 页。

纽曼，赛米尔·菲力浦斯 (Newman, Samuel Philips 1797—1842) —— 美国哲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 182, 234 页。

纽纳姆，格·耳· (Newnham, G. L.) —— 英国律师。—— 第 660, 661 页。

诺思，达德利 (North, Dudley 1641—1691) ——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初期代表人物之一。—— 第 119, 141, 145, 154, 428, 677 页。

O

欧文，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第 93, 112, 332, 442, 530, 550 页。

P

帕里，查理·亨利 (Parry, Charles Henry 1779—1860) —— 英国医生。—— 第 660, 661, 740 页。

帕里，威廉·爱德华 (Parry, William Edward 1790—1855) —— 英国旅行家，北极地带的考察者。—— 第 113 页。

帕里佐，雅克·德奥多 (Parisot, Jacques-Théodore 生于 1783 年) —— 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法文版的译者。—— 第 622 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以该党右派为靠山；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499 页。
- 帕尼尼，卓万尼·弗兰契斯科 (Pagnini, Giovanni Francesco 1715—1789) ——意大利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货币的著作。——第 109 页。
- 帕皮隆，托马斯 (Papillon, Thomas 1623—1702) ——英国商人和政治活动家，东印度公司董事之一，议会议员。——第 108 页。
- 培德福德 (Bedford) ——英国贵族。——第 792 页。
- 培恩斯，约翰 (Baynes, John) ——英国布莱克本市议会议员；1857 年宣读并发表了两篇关于棉花贸易的演说。——第 426、428 页。
-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 (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428、788 页。
- 佩托，赛米尔·摩尔顿 (Peto, Samuel Morton 1809—1889) ——英国企业家，从事铁道建筑；议会议员，自由党人；1866 年企业破产后退出社会活动。——第 262 页。
- 配第，威廉 (Petty, William 1623—1687) ——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第 57、65、98、110、119、142、162、166、302、348、380、386、404、470、608、677、678 页。
- 皮尔，罗伯特 (Peel, Robert 1750—1830) ——英国大工厂主，议会议员，托利党人，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的父亲。——第 827 页。
- 皮尔，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或称皮尔派）的领袖；内务大臣（1822—1827 和 1828—1830），首相（1834—1835 和 1841—1846）；1846 年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第 17、163、260、827、842 页。
- 皮特，威廉（小皮特）(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首相（1783—1801 和 1804—1806）。——第 809 页。
- 皮由兹，菲力浦 (Pusey, Philipp 1799—1855) ——英国政治活动家，地主，托利党人。——第 742 页。
- 品得 (Pindar 约公元前 522—442) ——古希腊诗人，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第 172、459、828 页。
- 品托，伊萨克 (Pinto, Isaac 1715—1787) ——荷兰交易所大投机商，经济学家。——第 172 页。
- 普莱斯，理查 (Price, Richard 1723—1791) ——英国激进派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第 304、739、794、795 页。
- 普罗塔哥拉 ——见阿布德拉的普罗塔哥拉。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84、98、102、463、563、588、644 页。

Q

- 琼斯，理查 (Jones, Richard 1790—1855)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反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衰落和瓦解，同时在一些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 第 39、342、356、365、371、624、644、656、693 页。
- 乔治二世 (George II 1683—1760) —— 英国国王 (1727—1760)。—— 第 52、114、808 页。
-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1738—1820) —— 英国国王 (1760—1820)。—— 第 808 页。

R

-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 (Gerhardt, Charles-Frédéric 1816—1856) —— 杰出的法国化学家。—— 第 343 页。
- 热罗尼莫 —— 见圣热罗尼莫。
- 若弗卢瓦·圣伊雷尔，埃蒂耶纳 (Geoffroy Saint-Hilaire, Étienne 1772—1844) —— 法国大动物学家，进化论者，查·达尔文的先驱之一。—— 第 814 页。

S

- 萨德勒，迈克尔·托马斯 (Sadler, Michael Thomas 1780—1835) —— 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慈善家，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追随托利党。—— 第 740、771 页。
- 萨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比顿 (Sully, Maximilian de Béthune, duc de 1559—1641) ——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顾问。—— 第 677 页。
- 萨默斯，罗伯特 (Somers, Robert 1822—

1891) ——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新闻记者。—— 第 800、801 页。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哈利埃特·伊丽莎白·乔治娜·鲁森-高尓 (Sutherland, Harriet Elisabeth Georgina Leveson-Gower, Duchess 1806—1868) —— 苏格兰大地主，辉格党活动家。—— 第 798、799 页。

萨特伦德伯爵夫人，伊丽莎白·鲁森-高尓，斯泰福侯爵夫人 (Sutherland, Elisabeth Leveson-Gower, Marquise Stafford, Countess 1765—1839) —— 1833 年起为公爵夫人，苏格兰大地主，前者的婆婆。—— 第 798 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 (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 ——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生产三要素”的辩护理论。—— 第 97、133、175、186、218、232、401、425、483、570、588、653、666、667 页。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Sextus Empiricus 公元二世纪) —— 古希腊怀疑论哲学家。—— 第 404 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 (Sébastien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 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 第 99、103、702 页。

桑德斯，罗伯特·约翰 (Saunders, Robert John)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工厂视察员。—— 第 323、334、442 页。

桑顿，威廉·托马斯 (Thornton, William Thomas 1813—1880)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追随者。—— 第 194、299、787 页。

色诺芬 (Xenophon 约公元前 430—354) ——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

- 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
——第 405 页。
- 莎士比亚，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43、61、100—101、126、152、304、318、319、534、750、812 页。
- 沙乌，华金·弗雷德里克 (Schouw, Joakim Frederik 1789—1852) ——丹麦学者，植物学家。——第 563 页。
- 善人约翰二世 (Jean II le Bon 1319—1364) ——法国国王 (1350—1364)。——第 807 页。
-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 (Cherbuliez, Antoine-Elisée 1797—1869)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在一起。——第 206、210、640 页。
- 舍伐利埃，让·巴蒂斯特·阿尔丰斯 (Chevallier, Jean-Baptiste-Alphonse 1793—1879) ——法国化学家和药学家。——第 278 页。
- 圣热罗尼莫 (Saint Hieronymus 340 左右—420) ——神学家，圣经拉丁文版的译者，出生于达尔马西亚。——第 121 页。
- 圣西门，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654 页。
- 施，威廉 (Shee, William 1804—1868) ——爱尔兰法学家和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皇家法院法官 (1863—1868)。——第 466 页。
- 施特鲁斯堡，贝特尔·亨利 (Strousberg, Bethel Henry 1823—1884) ——德国大铁路承包商，1873 年破产。——第 262 页。
- 施托尔贝格，弗里德里希·列奥波特 (Stolberg, Friedrich Leopold 1750—1819) ——伯爵，德国诗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后来成为反动的浪漫主义者。——第 561 页。
- 施托尔贝格，克利斯提安 (Stolberg, Christian 1748—1821) ——德国诗人和翻译家。——第 448 页。
-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卡洛维奇 (Шторх, Андрей (Анри, Генрих) Карлович 1766—1835) ——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摹仿者。——第 197、206、389、393、399、648、710 页。
-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 (Schulze-Deitzsch, Hermann 1808—1883)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 7 页。
- 舒耳茨，威廉 (Schulz, Wilhelm 1797—1860) ——德国政论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第 409 页。
- 斯巴克斯，杰雷德 (Sparks, Jared 1789—1866) ——美国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历史教研室。——第 187 页。
-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 24、341、654 页。
- 斯卡尔培克，弗雷德里克 (Skarbek, Frédéric 1792—1866) ——伯爵，波兰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亚·斯密的追随者。——第 364、389 页。
- 斯克罗普，乔治·尤利乌斯·波利特

- (Scrope, George Julius Poulett 1797—1876)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地质学家，议会议员。—— 第 655 页。
- 斯隆，汉斯 (Sloane, Hans 1660—1753) —— 英国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从事书籍和手稿的收藏，1753 年把他的全部收藏和另外两个私人藏书库合并，创立了最大的英国国家博物馆——英国博物馆。—— 第 791 页。
-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 ——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 19、60、98、143、144、189、303、386、390、392、393、400、401、404、449、503、553、570、583、587、589、592、608、613、615、624、647、648、652、671、674、676、679、682、706、718、781、798、806、828 页。
- 斯密斯，爱德华 (Smith, Edward 1818 左右—1874) —— 英国医生，枢密院顾问和调查工人区居民饮食状况的专员，济贫委员会委员。—— 第 433、718 页。
- 斯密斯，高德文 (Smith, Goldwin 1823—1910) ——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自由党人，1871 年起旅居加拿大；政治经济学中曼彻斯特学派的拥护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抨击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但不是始终一贯的。—— 第 817 页。
- 斯尼格 (Snigge) —— 英国律师和詹姆斯一世时的法官。—— 第 790 页。
- 斯泰福，威廉 (Stafford, William 1554—1612)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 第 812 页。
- 斯特莱普，约翰 (Strype, John 1643—1737) —— 英国教士和历史学家，收集过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史料。—— 第 805 页。
- 斯特兰，威廉 (Strahan, William 1715—1785) —— 英国出版家，发行过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 第 678 页。
- 斯特普耳顿 (Stapleton) —— 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 第 659 页。
- 斯图亚特，杜格耳德 (Steward, Dugald 1753—1828) —— 苏格兰哲学家，哲学上唯心主义派别——所谓健全理智的哲学的代表人物。—— 第 356、382、399、532 页。
- 斯图亚特，詹姆斯 (Stuart, James 1775—1849) —— 英国医生和政论家，工厂视察员。—— 第 320、345、798 页。
- 斯图亚特，詹姆斯 (Stewart, James 1712—1780)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 第 39、142、165、170、203、369、391、470、608、676、709、786、798、814 页。
- 斯图亚特，詹姆斯 (Steuart, James) —— 英国将军，前者的儿子，出版过他父亲的著作。—— 第 170 页。
- 斯图亚特王朝 (Stuarts) —— 曾统治苏格兰 (1371—1714) 和英格兰 (1603—1714) 的王朝。—— 第 791 页。
-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约公元前 497—406) —— 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的作者。—— 第 152 页。

T

- 塔波尔，马丁 (Tupper, Martin 1810—1889) —— 英国诗人，写有一些空泛的劝谕性诗篇。—— 第 669 页。

- 塔波特, 查理·施鲁兹贝里公爵(Talbot, Charles, Duke of Shrewsbury 1660—1718)——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首相(1714)。——第 791 页。
- 塔克尔, 约瑟亚(Tucker, Josiah 1712—1799)——英国教士和当时的大经济学家, 他的观点是亚·斯密理论的来源之一。——第 304、677、829 页。
- 塔克特, 约翰·德贝尔(Tuckett, John Debell 死于 1864 年)——1846 年伦敦英文版《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两卷集)的作者。——第 400、789、817 页。
- 泰勒, 塞德莱(Taylor, Sedley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英国合作运动参加者, 鼓吹工人参与资本家分红的制度。——第 42—44 页。
- 坦普尔, 威廉(Temples, William 1628—1699)——英国资政家和政治活动家, 写有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著作, 重商主义者。——第 677 页。
- 汤普逊, 本杰明·朗福德伯爵(Thompson, Benjamin, Count of Rumford 1753—1814)——英国物理学家, 一度供职于巴伐利亚政府, 在英国举办过贫民习艺所, 出生于北美。——第 659、660 页。
- 汤普逊, 威廉(Thompson, William 约 178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欧文的信徒; 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第 400 页。
- 唐森, 约瑟夫(Townsend, Joseph 1739—1816)——英国教士, 地质学家和社会学家, 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 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第 391、677、709 页。
- 特里门希尔, 休·西摩尔(Tremenheere, Hugh Seymour 1804—1893)——英国官员和政论家, 曾多次参加政府的工
人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第 198、278、293 页。
- 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41—81)——罗马皇帝(79—81)。——第 435 页。
- 梯也尔, 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首相(1836、1840); 共和国总统(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484、782 页。
- 帖木儿(塔梅尔兰)(Timur (Tamerlan) 1336—1405)——中亚的一个统帅和征服者, 曾在东方创建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第 293 页。
- 帖撒罗尼迦城的安谛巴特洛斯(Antipatros of Thessalonike 公元前一世纪)——古希腊诗人。——第 447 页。
- 图克, 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追随古典政治经济学派, 李嘉图货币理论的批评者。——第 328 页。
- 托伦斯, 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所谓“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 184、195、209、444、479 页。

W

- 瓦茨, 约翰(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 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追随者, 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第 603、607 页。
- 瓦伦亭, 加布里埃尔·古斯达夫(Valentin, Gabriel Gustav 1810—1883)——德国物理学家。——第 529 页。
- 瓦特, 詹姆斯(Watt, James 1736—1819)——杰出的英国发明家, 万能蒸汽机的

- 设计者。——第 412、414、415、419、426、535 页。
- 王茂荫(1798—1865)——中国清朝官员，1853 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曾提出将官票宝钞兑现的主张。——第 146 页。
- 威德,本杰明·富兰克林(Wade, Benjamin Franklin 1800—1878)——美国政治活动家,1867 至 1869 年为美国总统,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第 12 页。
- 威德,约翰(Wade, John 1788—1875)——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272、302、679 页。
- 威尔克斯,马尔克(Wilks, Mark 1760 左右—1831)——英国殖民军官;长期驻印度,写有一些关于印度的著作。——第 396 页。
- 威尔士亲王夫人(Wales, princess of)——见亚历山德拉。
-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财政部秘书长(1853—1858);自由贸易论者,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 256、378 页。
- 威季伍德,约瑟亚(Wedgwood, Josiah 1730—1795)——英国工业家,曾改进英国制陶业。——第 297、300 页。
-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第 299、362、587、639、741、834—843 页。
- 威兰德,弗兰西斯(Wayland, Francis 1796—1865)——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科学通俗教科书的著者,美国普罗维登斯城大学校长,教士。——第 186、234 页。
- 威廉三世——见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第 321 页。
-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Baronet of Kars 1800—1883)——英国将军,1855 年克里木战争时期领导过卡尔斯的防御战。——第 144 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首相(1828—1830)。——第 144 页。
- 威斯特,爱德华(West, Edward 1782—1828)——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地租问题。——第 553、577、595、596 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 323 页。
- 维尔特,麦克斯(Wirth, Max 1822—190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第 94、256 页。
- 维科,卓万尼·巴蒂斯特(Vico, Giovanni Battista 1668—1744)——杰出的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曾试图确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 409 页。
- 维里,彼得罗(Verri, Pietro 1728—1797)——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早期批评者之一。——第 56、108、154、366 页。
- 维利尔斯,查理(Villiers, Charles 1802—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由贸易论者,议会议员。——第

- 298页。
- 维特，扬·德 (Witt, Johan de 1625—1672) ——尼德兰国家活动家，大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第677、825页。
- 维特尼，伊莱 (Whitney, Eli 1765—1825) ——美国发明家，曾发明轧棉机。——第421、429页。
- 味吉尔 (普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335、829页。
- 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 (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 ——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批评过法国的税收制度。——第161页。
- 沃尔弗，克利斯提安 (Wolff, Christian 1679—1754)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者。——第669页。
- 沃尔弗，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1846—1847年为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页。
- 沃康松，雅克·德 (Vaucanson, Jacques de 1709—1782) ——法国机械师，改进了织机的构造；灵敏的自动装置的发明者。——第419页。
- 沃森，约翰·福布斯 (Watson, John Forbes 1827—1892) ——英国医生，曾在印度任军医；写有一些关于印度农业和纺织业的著作。——第430页。
- 乌尔卡尔特，戴维 (Urquhart, David 1805—1877) ——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1847—1852年为议会议员，托利党人。——第118、402、552、800、816、817页。

X

-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顿 (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Viscount 1757—1844)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任内务大臣时(1812—1821)曾采取镇压工人运动的措施。——第469页。
- 西利，罗伯特·本顿 (Seeley, Robert Benton 1798—1886) ——英国出版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慈善家。——第796页。
- 西蒙，约翰 (Simon, John 1816—1904) ——英国医生，枢密院医官，编过《公共卫生》报告。——第438、509、510、718、721、722、729、732、747—751页。
- 西尼耳，纳骚·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251、252、255、256、293、357、445、479、530、539、596、600、654、668、780、800页。
-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 ——罗马杰出的演说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447页。
-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 ——瑞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16、177、197、263、350、587、622、633、637、638、642、643、653、696、

710, 831 页。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见狄奥多洛斯
(西西里的)。

希罗德(Herod 公元前 73—4)——犹太
国王(公元前 40—4)。——第 442 页。

席勒, 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
第 446、631、651 页。

肖莱马, 卡尔(Schorlemmer, Carl 1834
—1892)——德国大化学家, 曼彻斯特的
教授;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43 页。

辛纳图斯(鲁齐乌斯·昆克提乌斯·辛
辛纳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
natus 公元前五世纪)——罗马贵族,
执政官(公元前 460 年), 独裁者(公元
前 458 年和 439 年), 据传说, 他生活简
朴, 亲自耕种土地。——第 209 页。

休谟, 大卫(Hume, David 1711—1776)
——英国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不
可知论者;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
学家, 重商主义的反对者, 货币数量论
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第 142、143、
562、608、677、678 页。

修昔底斯(Thukydides 公元前 460 左
右—395)——古希腊最著名的历史学
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
第 244、404、405 页。

Y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
322)——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 在哲学上
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奴
隶主阶级的思想家; 按其经济观点来说
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 他最
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第 74—75、
99、103、174、187、363、447 页。

亚历山德拉(Alexandra 1844—1925)

——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之女,
1863 年嫁给威尔士亲王, 即后来的英
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第 284、288
页。

杨格, 阿瑟(Young, Arthur 1741—1820)
——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 142、
257、304、738、746 页。

耶伦顿, 安得鲁(Yarranton, Andrew
1616—约 1684)——英国工程师和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386 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
1796)——俄国女皇(1762—1796)。——
第 749 页。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 341—
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
学家, 无神论者。——第 96 页。

伊登, 弗雷德里克·摩尔顿(Eden, Fred
eric Morton 1766—1809)——英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亚·斯密的学
生。——第 272、660、675—676、739、740、
790、793、795、796、826、828 页。

伊丽莎白一世(Elisabeth I 1553—1603)
——英国女王(1558—1603)。——第
302、789、804、807、808 页。

伊索克拉特斯(Isocrates 公元前 436—
338)——古希腊作家, 写有许多抨击性
的文章。——第 406 页。

尤尔, 安得鲁(Ure, Andrew 1778—
1857)——英国化学家, 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 写有一些工业经济方面的著
作。——第 39、255、293、302、332、357、
386、388、406、407、417、443、459—461、
465、473、474、478、479、606、611、615
页。

约翰二世——见善人约翰二世。

Z

-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阿道夫 (Soetbeer, Georg Adolf 1814—1892) ——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第 31 页。
- 詹姆斯一世 (James I 1566—1625) —— 英国国王 (1603—1625)。—— 第 790、805、808 页。
- 詹诺韦西，安东尼奥 (Genovesi, Antonio 1712—1769) —— 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 第 175 页。

- 张伯伦，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 1836—1914) —— 英国国家活动家，1873—1875 年任北明翰市长，后来曾多年任英国内阁阁员，英布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帝国主义的思想家。—— 第 704 页。
-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f 1828—1906) —— 美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德国人，1852 年侨居美国。—— 第 34 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 埃卡尔特 —— 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 第 306 页。
- 安泰 —— 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立斯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 第 650 页。
- 奥德赛 —— 希腊史诗中的主人公，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 第 283 页。

B

- 柏修斯 ——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宙斯同丹娜所生的儿子，建立许多功勋，如杀死美杜莎，取走她的头。—— 第 11 页。

- 保罗 —— 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 第 677 页。
- 彼得 —— 但丁《神曲》中的人物，圣徒。—— 第 121 页。
- 布西里士 —— 古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王。—— 第 406 页。

D

- 代达罗斯 —— 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 第 447 页。
- 道勃雷 —— 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 第 100、466、660 页。

F

- 福尔土纳特 —— 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取之不尽的钱袋和一顶隐身帽。—— 第 502、711 页。
- 浮士德 —— 歌德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 第 104 页。

G

该隐——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长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第 817 页。

高布赛克——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第 646 页。

格里昂——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有三身之巨人，海格立斯夺走了他的牛，并用箭把他射死。——第 650 页。

H

哈默伦的捕鼠者——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传说中的捕鼠者曾用魔笛替哈默伦城的居民消灭了鼠患，而居民没有给以应有的报答，他为了报复，又用魔笛把全城儿童从哈默伦城引诱走了。——第 762 页。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第 465、650 页。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打铁业的保护神。——第 447、708 页。

K

卡尔勃——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的宫廷侍卫长。——第 631 页。

卡库斯——罗马神话中的吐火怪物，被海格立斯打死。——第 650 页。

快嘴桂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酒店女店主。——第 61 页。

L

鲁滨逊·克鲁索——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第 93—95 页。

M

马立托奈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一个女人。——第 103 页。

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人。——第 11 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 722 页。

摩西——据圣经传说，他是把古犹太人从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出来的先知。——第 412、652、840 页。

P

毗湿奴——印度教的最高神，居民的富裕阶层多半信仰此教。——第 655 页。

普隆涅斯——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一个狡猾多嘴的廷臣。——第 304 页。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地府之神。——第 152 页。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狄坦神之一，他从神那里盗走了火，并带给人们；宙斯令赫斐斯塔司把他钉在悬崖上，让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第 708 页。

Q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的宙斯神。——第 403、633 页。

邱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第 677 页。

S

撒巴拉——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第 633 页。

塞克洛普——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额头上长有一只眼睛。——第 282 页。

赛克斯，比耳——狄更斯小说《奥利佛尔》中的角色，强盗。——第 484 页。

桑格拉都——列萨日的小说《山悌良那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中的人物，医生，他医治一切疾病时都给病人放血和让他们喝温水。——第 778 页。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第 702 页。

圣乔治——神话中的基督教“圣徒”，降龙者。——第 43 页。

T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第 99 页。

托尔——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神，农业的保护神，手中握有大锤。——第 423 页。

X

西可尔——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第 100 页。

息息法斯——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欺骗了众神，被罚终生推滚一巨石到山

上，而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就滚回山下。“息息法斯的劳动”源出于此，意即吃力而徒劳的工作。——第 153、463 页。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第 319、750 页。

星期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第 321 页。

Y

亚伯——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次子，由于遭到长兄该隐的嫉妒而被杀害。——第 817 页。

亚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族长。——第 638 页。

亚当——据圣经传说，是上帝用泥土造的第一个人，后来犯了罪。——第 121、677、781、836 页。

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第 399 页。

耶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 289 页。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第 638 页。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第 638 页。

Z

札格纳特——印度毗湿奴神的化身。——第 311、708 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A

阿庇安《罗马内战》第1卷，载于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史》，裴·迪勒尼乌斯译，1830年斯图加特版第7册（*Appian. Römische Bürgerkriege. Erstes Buch. In: Appian's von Alexandria Römische Geschichten, übersetzt von F. Dillenius. Bändchen VII. Stuttgart, 1830.*）。——第795页。

[阿伯思诺特，约·]《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地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地主著，1773年伦敦版（[*Arbuthnot, J. An Inquiry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he size of farms. By a farmer. London, 1773.*]）。——第342、363—365、791、796页。

阿丁顿，斯·《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伦敦版（*Addington, St. An Inquiry into the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inclosing open-fields. London, 1772.*）。——第794页。

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十五卷集，

施魏格霍塞编，1802年斯特拉斯堡版第2卷（*Athenaeus. Deipnosophistarum libri quindecim. Tomus II. Edidit Schweighaeuser. Argentorati, 1802.*）。——第118、153页。

艾金，约·《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Aikin, J.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y miles round Manchester. London, 1795.*）。——第652、819、827页。

艾释黎勋爵《十小时工厂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Ashley, Lord. Ten hours' factory bill. Th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riday, March 15th, 1844. London, 1844.*）。——第442、453页。

安德森，亚·《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Anderson, A.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第1版1764年在伦敦出版。——第813、827页。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该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安德森，詹·《蜜蜂，或文学周报》1791年爱丁堡版第3卷 (*Anderson, J. The Bee, or Literary weekly intelligence. Volume III. Edinburgh, 1791.*)。——第678页。

安德森，詹·《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主要是为了发展苏格兰的农业、商业、工业和渔业。1775年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1777年爱丁堡版 (*Anderson, J. Observations on the means of exciting a spirit of national industry; chiefly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e, commerce, manufactures, and fisheries, of Scotland.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a friend. Written in the year 1775. Edinburgh, 1777.*)。——第615,798页。

奥姆斯特德，弗·罗·《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兼评各州的经济》1856年纽约版 (*Olmsted, F. L. A Journey in the seaboard slave states, with remarks on their economy. New York, 1856.*)。——第222页。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 (*Opdyke, G.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51.*)。——第186页。

奥日埃，马·《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 (*Augier, M. Du crédit public et de son histoire depuis les temp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842.*)。——第829页。

奥特斯，扎·《国民经济学》，六卷集，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4年米兰版第21—22卷 (*Ortes, G. Della economia nazionale. Libri sei.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moderna. Tomi XXI—XXII. Milano, 1804.)。——第709页。

奥特韦，约·亨·《1860年1月庭期拜尔法斯特法庭庭长约·亨·奥特韦的判决》，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附录，1860年伦敦版 (*Otway, J. H. Judgment of J. H. Otway, chairman of county sessions.—Belfast, hilary sessions, 1860. Appendix in: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0. London, 1860.*)。——第308页。

B

巴顿，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 (*Barton, J. 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society. London, 1817.*)。——第693, 739页。

巴尔本，尼·《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 (*Barbon, N. A Discourse concerning coining the new money lighter. In Answer to Mr. Lock's considerations about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London, 1696.*)。——第47—50, 149, 164, 166页。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 (*Babbage, Ch.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第384, 387, 413, 429, 444页。

[拜耳斯，约·巴·]《自由贸易的诡辩和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个律师著，1850

- 年伦敦增订第7版 ([Byles, J. B.] Sophisms of free-trade and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examined. By a barrister. Seventh edition: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London, 1850)。——第301、807页。
- 柏拉图《理想国》，载于《柏拉图全集》，拜帖尔、奥烈利、文克尔曼编，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 (*Plato. Res publica. In: Platonis opera omnia. Recognoverunt I. G. Baiterus, I. C. Orellius, A. G. Winckelmannus. Vol. XIII. Turici, 1840.*)。——第404页。
- 贝卡里亚，切·《社会经济原理》，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4年米兰版第11卷 (*Beccaria, C. Elementi di economia pubblica.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moderna. Tomo XI. Milano, 1804.*)。——第404页。
- 贝克莱，乔·《提问者。几个提交公众讨论的问题》1750年伦敦版 (*Berkley, G. The Querist, containing several queries, propos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London, 1750.*)。——第372、392页。
- 贝克曼，约·《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版第1卷 (*Beckmann, J. Bey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 Band I. Leipzig, 1786.*)。——第469页。
- 贝魁尔，康·《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 (*Pecqueur, C. Théorie nouvelle d'économie sociale et politique, ou Études sur l'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 Paris, 1842.*)。——第674、830页。
-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 (*Bellers, J. Essays about the poor, manufactures, trade, plantations, and immorality. London, 1699.*)。——第151、166、526页。
- 贝勒斯，约·《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 (*Bellers, J. Proposals for raising a college of industry of all useful trades and husbandry. London, 1696.*)。——第159、362、468、535、674页。
-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 ([Bailey, S.]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measures, and causes of value; chiefly in reference to the writings of Mr. Ricardo and his followers. By the author of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s. London, 1825)。——第78、100、586页。
- [贝利，赛·]《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并载有关于股份银行的附录》1837年伦敦版 ([Bailey, S.] Mone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value; as they affect national industry and pecuniary contracts: with a postscript on joint-stock banks. London, 1837)。——第63、670页。

比多, 日·恩·《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 第2册《生产和销售的垄断》, 1828年巴黎版(*Bidaut, J.*

N. Du monopole qui s'établit dans les arts industriels et le commerce, au moyen des grands appareils de fabrication. Deuxième livraison. Du monopole de la fabrication et de la vente. Paris, 1828.)。——第356页。

比泽, 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及其内在联系, 着重论述他著作中的哲学用语》1842年柏林版第2卷(*Biese, F. Die Philosophie des Aristoteles, in ihrem inneren Zusammenhang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philosophischen Sprachgebrauchs, aus dessen Schriften entwickelt. Band II. Berlin, 1842.*)。——第447页。

毕舍, 菲·和卢, 比·赛·《法国革命会议史, 或1789—1815年的国民会议日志》1834年巴黎版第10卷(*Buchez, Ph. et Roux, P. C.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 T. X. Paris, 1834.*)。——第810页。

边沁, 耶·《惩罚和奖赏的理论》, 厄·杜蒙编, 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Bentham, J. Théorie des peines et des récompenses. Par Et. Dumont. Troisième édition. Tome II. Paris, 1826.*)。——第669页。

波斯耳思威特, 麦·《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 两卷集, 1759年伦敦第2版(*Postlethwayt, M. Great-Britain's commercial interest explained and*

improved. In two volumes. The second edition. London, 1759.)。

——第304页。

波斯耳思威特, 麦·《第一篇绪论》, 载于麦·波斯耳思威特《工商业大辞典》1774年伦敦第4版第1卷(*Postlethwayt, M. First preliminary discourse. In: Postlethwayt, M.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The fourth edition. Vol. I. London, 1774.*)。——第305页。

波特尔, 阿·《政治经济学: 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Potter, A. Political economy: its objects, uses, and principle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1841.*)。——第655页。

伯克, 艾·《尊敬的艾德蒙·伯克就培德福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1796年伦敦版(*Burke, E. A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to a Noble Lord, on the attacks made upon him and his pension, in the House of Lords, by the Duke of Bedford, and the Earl of Lauderdale, early in the present sessions of parliament. London, 1796.*)。——第792页。

伯克, 艾·《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 原系1795年11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1800年伦敦版(*Burke, E. 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originally presented to the*

- Right Hon. William Pitt, in the month of November, 1795. London, 1800). ——第 233, 263, 359, 829 页。
- 博克斯霍恩, 马·聚·《政治原理》, 载于马·聚·博克斯霍恩《各种政治论文》1663 年阿姆斯特丹版(*Boxhorn, M. Z. Institutiones politicae. In: Boxhorn, M. Z. Varii tractatus politici. Amstelodami, 1663*)。——第 469 页。
- 布阿吉尔贝尔, 比·《法国详情》, 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 附欧·德尔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 1843 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Le détail de la France.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第 150 页。
- 布阿吉尔贝尔, 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 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 附欧·德尔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 1843 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第 161 页。
- 布坎南, 大·《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研究》1844 年爱丁堡版(*Buchanan, D. Inquiry into the taxation and commercial policy of Great Britain. Edinburgh, 1844*)。——第 146 页。
- 布坎南, 大·《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1814 年爱丁堡版(*Buchanan, D. Observations on the subjects treated of in Dr. Smith's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nburgh, 1814*)。——第 798 页。
- 布坎南, 大·(*Buchanan, D.*) 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 载于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卷集。附布坎南注释和增补本》1814 年爱丁堡版第 1 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ree volumes. With notes, and an additional volume, by D. Buchanan. Vol. I. Edinburgh, 1814*)。——第 613 页。
- 布莱基, 罗·《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 年伦敦版第 2 卷(*Blakey, 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olume II. London, 1855*)。——第 790 页。
- 布朗基, 日·阿·《工业经济教程》, 阿·布累兹编注, 1838—1839 年巴黎版(*Blanqui, J. A. Cours d'économie industrielle. Recueilli et annoté par Ad. Blaise. Paris, 1838—1839*)。——第 374 页。
- 布朗基, 日·阿·《1848 年法国的工人阶级》第 1、2 部分(*Blanqui, J. A.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pendant l'année 1848. Parties I et II. In: Petits traités publiés par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Paris, 1849*)。——第 307 页。

页。

布鲁姆，亨·《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两卷集，1803年爱丁堡版第2卷（*Brougham, H. An Inquiry into the coloni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powers. In two volumes. Vol. II. Edinburgh, 1803.*）——第828页。

[布吕克纳，约·]《动物界论》1767年来顿版（[*Brückner, J.*] *Théorie du système animal. Leide, 1767.*）——第677页。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载于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Brentano, L.*] *Wie Karl Marx citirt. In: «Concordia», 7. März 1872.*）——第39、40页。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载于1872年7月4日、1872年7月11日《协和》杂志（[*Brentano, L.*] *Wie Karl Marx sich vertheidigt. In: «Concordia», 4 Juli 1872, 11. Juli 1872.*）——第41—42页。

布罗德赫斯特，约·《政治经济学》1842年伦敦版（*Broadhurst, J.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2.*）——第69页。

布洛克，莫·《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经济学家杂志》（1872年7月号和8月号），1872年巴黎版（*Block, M. Les théoriciens du socialisme en Allemagne. Extrait du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numéros de juillet et d'août 1872). Paris, 1872.*）——第19页。

布瓦洛，埃·《巴黎的艺术和手工业的规章，订于十三世纪，并称为手工业手册》1837年巴黎版（*Boileau, E. Règlement*

sur les arts et métiers de Paris, rédigés au XIII siècle, et connus sous le nom du Livre des métiers. Paris, 1837.）——第533页。

C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Chalmers, Th.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nexion with the moral state and moral prospects of society. Second edition. Glasgow, 1832.*）——第174页。

[柴尔德，约·]《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89年伦敦版（[*Child, J.*]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rade, and that in particular of the East Indies. London, 1689.*）——第108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加·《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第一次载于1861年圣彼得堡《同时代人》杂志（*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Очерки 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о Миллю). Впервы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1861 г. в журнале «Современ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第17—18页。

D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第379页。

达菲，加·《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澳大利亚）》1862年伦敦版（*Duffy, G. The*

- Land law of Victoria (Australia). London, 1862). ——第 843 页。
- 《大不列颠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抗辩》1814 年伦敦版 (A Defence of the land-owners and farmers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14)。——第 610 页。
- 《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he size of farms) ——见 [阿伯思诺特, 约.] 《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Arbuthnot, J.] An Inquiry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he size of farms)。
- 道梅尔, 格·弗·《基督教古代的秘密》1847 年汉堡版 (Daumer, G. F. 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hums. Hamburg, 1847)。——第 319 页。
- 德·昆西, 托·《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 年爱丁堡和伦敦版 (De Quincey, Th. The Logic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 and London, 1844)。——第 434 页。
- 德·罗别尔提, 叶·《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 年汉堡版》, 载于《实证哲学。评论》杂志 1868 年 11、12 月合刊第 3 期 (De Roberty, E.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Karl Marx. Hamburg, 1867»). In: «La Philosophie positive. Revue», № 3, November-Décembre, 1868)。——第 19 页。
-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安·路·克·《思想的要素》, 第 4、5 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 年巴黎版 (*Destutt de Tracy, A. L. C. Éléments d'idéologie. IV-e et V-e parties. 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 Paris, 1826)。——第 179、186、362、364、711 页。
-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安·路·克·《政治经济学概论》1823 年巴黎版 (*Destutt de Tracy, A. L. C.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823)。——第 179 页。
- 登宁, 托·约·《工联和罢工》1860 年伦敦版 (Dunning, T. J. Trades' Unions and strikes. London, 1860)。——第 603、607—608、829 页。
- 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 尤·弗·乌尔木译, 第 1—19 卷, 1828—1840 年斯图加特版第 1、3 卷 (Diiodorus Siculus. Historische Bibliothek, übersetzt von J. F. Wurm. Bändchen I—XIX. Stuttgart, 1828—1840. Erstes Buch. Drittes Buch)。——第 163、263、377、406、560 页。
- 狄慈根, 约·《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 年汉堡版》, 载于《民主周报》1868 年第 31、34、35、36 号 (Dietzgen, J.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Karl Marx. Hamburg, 1867»). In: «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 31, 34, 35, 36, 1868)。——第 18 页。
- [笛福, 丹·] 《论公共信贷》1710 年伦敦第 3 版 ([Defoe, D.] An Essay upon publick credit. The third edition. London, 1710)。——第 161 页。

笛卡儿，勒·《正确运用理性与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论》(Descartes, R.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our bien conduire sa raison, et chercher la vérité dans les sciences)。第1版 1637年在来顿出版。——第428页。

《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The Advantages of the East-India trade to England. London, 1720)。——第355, 376, 381, 383, 386, 404, 468, 560页。

杜邦·德·奈穆尔，比·赛·《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载于《重农学派》，附录·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Dupont de Nemours, P. S. Maximes du docteur Quesnay, ou Résumé de ses principes d'économie sociale. In: 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 Daire. Partie I. Paris, 1846)。——第127页。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于欧·德尔新编《杜尔哥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1卷(Turgot.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In: Œuvres de Turgot. Nouvelle édition par M. E. Daire. Tome I. Paris, 1844)。——第204, 349, 583页。

杜克佩西奥，爱·《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生活资料、工资、人口》1855年布鲁塞尔版(Ducpetiaux, Éd. Budgets économiques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Belgique. Subsistances, salaires, population. Bruxelles, 1855)。——第735页。

杜能，约·亨·《孤立国家的农业和国民经济》，第2部第2篇《自然工资及其同利率和地租的关系》，1863年罗斯托克版(Thünen, J. H. Der isoli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 Theil II. Abtheilung II. Der naturgemäße Arbeitslohn und dessen Verhältniß zum Zinsfuß und zur Landrente. Rostock, 1863)。——第681页。

《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伦敦版(Some Thoughts 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in general,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ublick funds. London)。——第52, 60页。

E

恩格斯，弗·《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第4期(Engels, F. Die englische Zehnstundenbil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 4, 1850)。——第323, 335页。

恩格斯，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Engels, F.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icht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第268, 273, 283, 298, 438, 463—465, 487, 665, 717页。

恩格斯，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1分卷和第2分卷(Engels, F. 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

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herausgegeben von Arnold Ruge und Karl Marx. 1-ste und 2-te Lieferung. Paris, 1844). —— 第 92、173、186、696 页。

恩索尔, 乔·《各国人口的研究, 驳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1818 年伦敦版 (*Ensor, G.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opulation of nations: containing a refutation of Mr. Malthus's Essay on population. London, 1818.*)。—— 第 798 页。

F

范德林特, 杰·《货币万能, 或试论怎样才能使各阶层人民都有足够的货币》1734 年伦敦版 (*Vanderlint, J. Money answers all things; or, an Essay to make money sufficiently plentiful amongst all ranks of people. London, 1734.*)。—— 第 143、151、165、304、306、348、368 页。

菲尔登, 约·《工厂制度的祸害, 或略述工厂中残酷现象的根源》1836 年伦敦版 (*Fielden, J. The Curse of the factory system; or,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factory cruelties. London, 1836.*)。—— 第 442、452、827 页。

菲塞林, 西·《实用国民经济手册》1860—1862 年阿姆斯特丹版第 1—3 部 (*Vissering, S. Handboek van praktische staathuishoudkunde. Deelen I—III. Amsterdam, 1860—1862.*)。—— 第 550 页。

费里埃, 弗·路·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 年巴黎版 (*Ferrier, F.*

L. A. 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 Paris, 1805.)。—— 第 76 页。

丰特雷, 安·路·《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1858 年巴黎版 (*Fonteret, A. L. Hygiène physique et morale de l'ouvrier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en général et dans la ville de Lyon en particulier. Paris, 1858.*)。—— 第 402 页。

弗格森, 亚·《市民社会史》1767 年爱丁堡版 (*Ferguson, A.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Edinburgh, 1767.*)。—— 第 392、400、401 页。

弗莱塔格, 古·《德国人民生活的新状况》1862 年莱比锡版 (*Freytag, G. Neue Bilder aus dem Leben des deutschen Volkes. Leipzig, 1862.*)。—— 第 808 页。

[弗利特伍德, 威·]《行情表, 或六百年来英国的货币、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1707 年伦敦版 (*[Fleetwood, W.] Chronicon preciosum: or, an Account of english money, the price of corn, and other commodities, for the last 600 years. London, 1707.*)。—— 第 302 页。

弗利特伍德, 威·《行情表, 或六百年来英国的金银货币、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1745 年伦敦版 (*Fleetwood, W. Chronicon preciosum: or, an Account of english gold and silver money; the price of corn and other commodities, for six hundred years last past. London, 1745.*)。—— 第

- 302 页。
- 孚耳阿伯，约·《皇家工程师奥古斯丁·拉梅路斯设计的旧马拉磨的技术改革》1625 年乌尔姆版 (*Faulhaber, J. Mechanische Verbesserung einer alten Roszmühlen welche vor diesem der königl. Ingenieur Aug. Ramel-lus an Tag geben. Ulm, 1625.*)。——第 414 页。
- [福尔邦奈，弗·维·]《商业学入门》1766 年来顿新版第 2 卷 (*[Forbonnais, F. V.] Éléments du commerce. Seconde partie. Nouvelle édition. Leyde, 1766.*)。——第 109 页。
- 福塞特，亨·《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 年剑桥和伦敦版 (*Fawcett, H.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Cambridge and London, 1865.*)。——第 611、671、716 页。
- [福斯特，纳·]《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 年伦敦版 (*[Forster, N.] 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London, 1767.*)。——第 304、468、561、793 页。
- 福特斯居，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Fortescue, J. De laudibus legum Angliae*)。1537 年第 1 次发表。——第 786 页。
- 富拉顿，约·《论流通手段的调整。原理的分析，并根据这些原理提出将来在严格约定的范围内限制英国银行和其他银行机关的发行活动》1845 年伦敦增订第 2 版 (*Fullarton, J.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 be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 is proposed to restrict, within certain fixed limits, the future issues on credi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of the other banking establishmen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econd edition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London, 1845.*)。——第 148、162、165 页。
- 富兰克林，本·《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载于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 年波士顿版第 2 卷 (*Franklin, B.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In: The Works of B. Franklin. By Sparks. Volume II. Boston, 1836.*)。——第 65 页。
- 富兰克林·本·《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 年波士顿版第 2 卷 (*Franklin, B. Positions to be examined, concerning national wealth. In: The Works of B. Franklin. By Sparks. Volume II. Boston, 1836.*)。——第 187 页。
- 傅立叶，沙·《虚假的、零散的、可恶的、虚假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Fourier, Ch. La fausse industrie morcelée, répugnante, mensongère, et l'antidote, l'industrie naturelle, combinée, attrayante, vérifique, donnant quadruple produit*)。第 1 版 1835—1836 年在巴黎出版。——第 467 页。
-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Fourier, Ch.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第 1 版 1829 年在巴黎出版。——第 762 页。

G

盖斯克尔，彼·《英国的工业人口，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包括对儿童劳动的考察》1833年伦敦版 (*Gaskell, P.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its moral,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the cha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steam machinery; with an e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 London, 1833)。

——第477、486页。

哥伦布，克·《寄自牙买加的信》 (*Columbus, Ch. Brief aus Jamaica*)。——第151页。

[格莱格，罗·海·]《从工人健康和道德影响看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业的影响》1837年伦敦版 ([*Greg, R. H.] The Factory question,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and morals of those employed in factories. And the «ten hours bill», in relation to its effects upon the manufactures of England, and those of foreign countries.* London, 1837])。——第323页。

[格雷，约·]《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驳亚当·斯密博士等人的某些错误论点》1797年伦敦版 ([*Gray, J.]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llustrated, in opposition to some false doctrines of Dr. Adam Smith, and others.* London, 1797])。——第183页。

格里哥瓦尔，昂·《布鲁塞尔违警法庭上

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 (*Gregoir, H. Les typographes devant le 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Bruxelles.* Bruxelles, 1865)。——第609页。

格罗夫，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附《论连续性》，1867年伦敦第5版 (*Grove, W. R. 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 Fifth edition. Followed by a discourse on continuity.* London, 1867)。——第575页。

《各国的工业》，第2部《工艺、机器和工厂的现况概述》，1855年伦敦版 (*The Industry of nations, part II. A Survey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arts, machines,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55)。——第382、422页。

《公共经济概论，或论流通手段、农业和工业》1833年卡赖尔版 (*Public economy concentrated; or, a Connected view of currency,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Carlisle, 1833)。——第434—435页。

《关于济贫税和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建议减税和降价》，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维奇版 (*A Letter to Sir T. C. Bunbury on the poor rates, and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With some proposals for reducing both.* By a Suffolk gentleman. Ipswich, 1795)。——第791页。

《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 (*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 In a letter to Lord John Russell.* London, 1821)，——第645页。

H

哈勒,卡·路·《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1816—1820年温特图尔版第1—4卷(*Haller, C. L. 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ürlich-geselligen Zustands der Chimäre des künstlich-bürgerlichen entgegengesetz. Bände 1—4. Winterthur, 1816—1820.*)。——第428页。

哈里斯,詹·《关于幸福的对话》,载于詹·哈里斯《三篇论文集》1772年伦敦修订第3版(*Harris, J. Concerning happiness, a dialogue. In: Harris, J. Three treatises. The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corrected. London, 1772.*)。——第404页。

哈里斯,詹·《第一代马姆兹伯里伯爵。日记和通信集,包括他驻马德里宫廷、弗里德里希大帝和叶卡特林娜二世宫廷以及驻海牙公使馆的工作报告;他派往柏林、不伦瑞克和法兰西共和国的特别使团的工作报告》1845年伦敦第2版第1—4卷(*Harris, J.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his missions to the courts of Madrid, Frederick the Great, Catherine the Second, and at the Hague; and of his special missions to Berlin, Brunswick,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Volumes I—IV.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45.*)。——第404页。

哈里逊,威·《英园概述》,载于《编年史》

第1、2卷,拉·霍林舍德、威·哈里逊等第一次收集和发行,1587年伦敦版(*Harrison, W.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Chronicles, first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R. Holinshed, W. Harrison, and others. London, 1587.*)。——第786、804、812页。

哈姆,威·《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Hamm, W. Die landwirthschaftlichen Geräthe und Maschinen Englands. Zweite, umgearbeitete und bedeutend vermehrte Auflage. Braunschweig, 1856.*)。——第551页。

哈塞耳,阿·希·《揭穿了的掺假行为,或鉴别掺假食物和药品的通俗指南》1861年伦敦第2版(*Hassall, A. H. Adulterations detected or Plain instructions for the discovery of frauds in food and medicine.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61.*)。——第198、278页。

汉森,格·《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农奴制的消灭和一般说来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改变》1861年圣彼得堡版(*Hanssen, G. Die Aufhebung der Leibeigenschaft und die Umgestaltung der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 überhaupt in den Herzogthümern Schleswig und Holstein. St. Petersburg, 1861.*)。——第265页。

豪顿,约·《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关于谷物、家禽、煤、啤酒花、羊毛等的宝贵资料汇编》1727—1728年伦敦版第1—4

卷(*Houghton, J.* Husbandry and trade improv'd: being a collection of many valuable materials relating to corn, cattle, coals, hops, wool, etc. Volumes I—IV. London, 1727—1728)。——第 468 页。

豪伊特, 威·《殖民和基督教: 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 年伦敦版(*Howitt, W.* Colon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natives by the europeans in all their colonies. London, 1838)。——第 820 页。

赫顿, 查·《数学教程》(*Hutton, Ch.* A Course of mathematics)。第 1 版 1798—1801 年出版。——第 409 页。

赫胥黎, 托·亨·《初等生理学讲义》1866 年伦敦版(*Huxley, Th. H.* 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 London, 1866)。——第 529 页。

黑格尔, 乔·威·弗·《哲学全书缩写本》, 第 1 部《逻辑》, 《黑格尔全集》1840 年柏林版第 6 卷 (*Hegel, G. W. F.*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Theil I. Die Logik. Werke. Band VI. Berlin, 1840)。——第 203, 292 页。

黑格尔, 乔·威·弗·《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全集》1840 年柏林第 2 版第 8 卷 (*Hegel, G. W. 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Werke. Zweite Auflage. Band VIII. Berlin, 1840)。——第 57, 109, 191, 402, 645 页。

黑格尔, 乔·威·弗·《逻辑学》, 《黑格尔全集》1841 年柏林第 2 版第 3、4、5 卷 (*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Werke. Zweite Auflage. Bände III, IV, V. Berlin, 1841)。——第 342 页。

华德, 约·《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初期的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1843 年伦敦版(*Ward, J.* The Borough of Stoke-upon-Trent, i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London, 1843)。——第 297 页。

霍布斯, 托·《利维坦; 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 载于《托马斯·霍布斯英文著作选》, 威廉·摩耳斯沃思第一次收集和出版, 1839 年伦敦版第 3 卷 (*Hobbes, Th.*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now first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Molesworth. Vol. III. London, 1839)。——第 193, 395 页。

[霍恩, 乔·]《给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一封信, 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 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 1784 年牛津第 4 版 (*Horne, G.*] A Letter to Adam Smith LL. D. on the life, death, and philosophy of his friend David Hume. By one of the people called christians. The fourth edition. Oxford, 1784)。——第 678 页。

[霍吉斯金, 托·]《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 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 一个工人著, 1825 年伦敦版 (*Hodgskin, Th.*]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or, the Unproductiveness

of capital prov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combinations amongst journeymen. By a labourer. London, 1825). ——第 393, 630 页。
 霍吉斯金, 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 年伦敦版 (*Hodgskin, Th.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 London, 1827.*)。——第 377, 391, 587 页。
 [霍吉斯金, 托·]《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 年伦敦版 (*[Hodgskin, Th.]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 of property contrasted*). London, 1832). ——第 818 页。
 霍林舍德, 拉·《英国概述》(*Holinshed, R.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见哈里逊, 威·《英国概述》(*Harrison, W.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霍纳, 莱·《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 载于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莱·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艾·艾释华特先生、汤普逊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 年伦敦版 (*Horner, L. Letter to Mr. Senior. In: 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L.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 Ashworth, Mr. Thom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第 252 页。
 霍纳, 莱·《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

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 载于《工厂法》, 根据下院决定于 1859 年 8 月 9 日刊印 (*Horner, L. Suggestions for amending the factory acts to enable the inspectors to prevent illegal working, now become very prevalent. In: Factories regulation act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9 August 1859.*)。——第 269, 327 页。
 霍普金斯, 托·《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和人口的影响。兼论影响各国劳动阶级状况的原因》1828 年伦敦版 (*Hopkins, Th. On rent of land, and its influence on subsistence and population;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operating causes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various countries. London, 1828.*)。——第 257 页。

J

吉斯伯恩, 托·《论大不列颠上层和中层社会阶级人们的义务》, 两卷集, 1795 年伦敦第 2 版第 2 卷 (*Gisborne, Th. 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men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of society in Great Britain. The second edition. In two volumes. Vol. II. London, 1795.*)。——第 827 页。

季别尔, 尼·伊·《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 年基辅版 (*Зибер, Н. И. Теория ценности и капитала Д. Рикардо в связи с позднейшим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и разъяснениями. Киев, 1871.*)。

——第 19 页。

[加尔涅, 热·]《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

1796 年巴黎版 ([*Garnier, G.*] *Abrégé élémentair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796). ——第 605 页。

加尔涅, 热·《译者的注释》, 载于《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热·加尔涅新译本, 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1802 年巴黎版第 5 卷 (*Garnier, G. Notes du traducteur*. In: *Smith, A.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raduction nouvelle, avec des notes et observations; par G. Garnier. Tome V*. Paris, 1802). ——第 401 页。

加利阿尼, 斐·《货币论》第 1—5 篇, 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1803 年米兰版第 3—4 卷 (*Galiani, F. Della moneta. Libro I—V*.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moderna*. Tomi III—IV. Milano, 1803). ——第 91, 107, 108, 118, 175, 180, 350, 706 页。

加尼耳, 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 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学说》1821 年巴黎第 2 版第 1—2 卷 (*Ganilh, Ch. Des systèmes d'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valeur comparative de leurs doctrines, et de celle qui paraît la plus favorable aux progrès de la richesse. Seconde édition. Tomes I—II*. Paris, 1821). ——第 76, 197, 490 页。

加尼耳, 沙·《政治经济学理论》1815 年巴黎版第 1—2 卷 (*Ganilh, Ch. La théori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omes I—II. Paris, 1815). ——第 204 页。

杰科布, 威·《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 两卷集, 1831 年伦敦版 (*Jacob, W.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31). ——第 53 页。

杰科布, 威·《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惠特布雷德的一封信》1815 年伦敦版 (*Jacob, W. A Letter to S. Whitbread, being a sequel to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required by british agriculture*. London, 1815). ——第 246 页。

居利希, 古·《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 年耶拿版第 1—2 卷 (*Gülich, G.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ände I—II*. Jena, 1830). ——第 15, 822 页。

居维叶, 若·《论地球表面的灾变》, 埃费尔主编, 1863 年巴黎版 (*Cuvier, G. Discour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 la surface du globe. Rédigés par Hoefer*. Paris, 1863). ——第 562 页。

K

卡尔利, 詹·黎·《*Carli, G. R.*》为彼·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加的注释, 载于彼·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1804 年米兰版第 15 卷 (*P. Verri. 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

- ca.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moderna. Tomo XV. Miano, 1804.* ——第366页。
- 卡莱尔, 托·《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 载于《麦克米伦杂志》1863年8月伦敦和剑桥版(*Carlyle, Th. Ilias (Americana) in nuce. In: «Macmillan's magazine», August, 1863. London and Cambridge.*)。——第285页。
- [卡泽诺夫, 约·]《政治经济学大纲, 哲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1832年伦敦版([*Cazenove, J.] 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 plain and short view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 London, 1832.*]。——第224, 353, 571页。
- 卡泽诺夫, 约·(*Cazenove, J.*)为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释, 载于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 附约·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 1853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With a preface, notes, and supplementary remarks by J. Cazenove. London, 1853.*)。——第623, 654页。
- 凯尔斯, 约·埃·《奴隶劳力: 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1862年伦敦版(*Cairnes, J. E. The Slave power: its character, career and probable designs. London, 1862.*)。——第222, 296, 369页。
- 凯里, 亨·查·《论工资率: 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拉

得尔菲亚版(*Carey, H. Ch. 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 1835.*)。——第617页。

凯里, 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 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版(*Carey, H. Ch. 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 why it exists, 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 Philadelphia, 1853.*)。——第799, 817页。

凯特勒, 阿·《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 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35年巴黎版第1—2卷(*Quetelet, A. 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Tomes I-II. Paris, 1835.*)。——第359页。

坎伯尔, 乔·《现代印度: 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伦敦版(*Campbell, G.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To which is prefixed, 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 London, 1852.*)。——第396页。

康替龙, 菲·《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 适应我国商业的目前情况》1759年伦敦版(*Cantillon, Ph. The Analysis of trade, commerce, coin, bullion, banks, and foreign exchanges. Taken chiefly from a manuscript of a very*

ingenious gentleman deceas'd, and adapted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trade and commerce. London, 1759). ——第 608 页。

[康替龙, 理·]《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 译自英文, 载于《政论集》1756 年阿姆斯特丹版第 3 卷 ([*Cantillon, R.*]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Traduit de l'anglois. In: *Discours politiques. Tome III.* Amsterdam, 1756)。——第 608 页。

[考夫曼, 伊·伊·]《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 载于《欧洲通报》杂志, 1872 年版第 3 卷 ([*Kaufman, H. H.*]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олитico-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у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В журнале: «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1872, том III*)。——第 20, 23 页。

柯贝特, 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 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 年伦敦版 (*Corbet,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modes of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 or the Principles of trade and speculation explained.* London, 1841)。——第 172, 646 页。

柯普, 海·《现代化学的发展》1871—1874 年慕尼黑版 (*Kopp, H.* *Die Entwicklung der Chemie in der neueren Zeit.* München, 1871—1874)。——第 343 页。

科, 萨·德 (*Caus, S. de*)——见希罗(亚力山大里亚的)《有关风力和水力技术的书》1688 年法兰克福版 (*Heronis Alexandrini. Buch von Luftt-und Wasser-künsten.* Frankfurt, 1688)。

——第 414 页。

科贝特, 威·《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说明这次事件怎样使这两国的基本人民群众贫困和堕落。给一切明智的和公正的英国人的信》1824 年伦敦版 (*Cobbett, W.* *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Ireland; showing how that event has impoverished and degraded the main body of the people in those countries. In a series of letters, addressed to all sensible and just englishmen.* London, 1824)。——第 789 页。

科尔崩, 昂·《论职业教育》1860 年巴黎第 2 版 (*Corbon, A.* *De 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 Seconde édition. Paris, 1860)。——第 534 页。

科兰, 让·吉·《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 年巴黎版第 3 卷 (*Colins, J. G.* *L'économie politique. Source des révolutions et des utopies prétendues socialistes.* Tome III. Paris, 1857)。——第 674, 759, 841 页。

[克雷门特, 西·]《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 一个商人著, 1695 年伦敦版 (*Clement, S.* *A Discourse of the general notions of money, trade, and exchanges, as they stand in relation each to other.* By a merchant. London, 1695)。——第 108 页。

孔德, 沙·《立法论, 或谈谈使人民繁荣、衰落或停滞不前的一般规律》1837 年布鲁塞尔第 3 版 (*Comte, Ch.* *Traité de législation ou Exposition des*

lois générales, suivant lesquelles les peuples prospèrent, dépérissent, ou restent stationnaires. Troisième édition. Bruxelles, 1837)。——第 820 页。

孔狄亚克, 埃·博·《商业和政府》, 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选》, 附歌·德尔和古·莫利纳里的注释, 1847 年巴黎版第 1 卷 (*Condillac, E. B. 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In: Mélanges d'économie politique. Tome I. Commentaires et notes, par E. Daire et G. Molinari. Paris, 1847.*)。——第 181 页。

库尔塞尔-塞纳伊, 让·古·《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 或业务手册》1857 年巴黎第 2 版 (*Courcelle-Seneuil, J. G. Traité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es 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 commerciales et agricoles ou Manuel des affaires. Deuxième édition. Paris, 1857.*)。——第 260, 265 页。

魁奈, 弗·《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 载于《重农学派》, 附歌·德尔的绪论和评注, 1846 年巴黎版第 1 部 (*Quesnay, F. 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et sur les travaux des artisans. In: 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 Daire. Partie I. Paris, 1846.*)。——第 127, 356 页。

魁奈, 弗·《经济表。略论国民每年收入的分配变化情况》1758 年凡尔赛版 (*Quesnay, F. Tableau oeconomique. Remarques sur les variations de la distribution des revenus annuels*

d'une nation. Versailles, 1758).——第 648 页。

L

拉波尔德, 亚·《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作精神》1818 年巴黎版 (*Laborde, A. De l'esprit d'association dans tous les intérêts de la communauté. Paris, 1818.*)。——第 583 页。

拉马志尼, 贝·《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00 年摩地那版 (*Ramazzini, B. De morbis artificum diatriba. Mutinae, 1700.*)。——第 402 页。

拉马志尼, 贝·《论手工业者的疾病》, 译自拉丁文, 1777 年巴黎版 (*Ramazzini, B. 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artisans, traduit du latin. Paris, 1777.*)。——第 402 页。

拉姆赛, 乔·《论财富的分配》1836 年爱丁堡版 (*Ramsay, G.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dinburgh, 1836.*)。——第 184, 188, 352, 559, 622, 693 页。

拉萨尔, 斐·《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 经济的尤利安, 或者: 资本和劳动》1864 年柏林版 (*Lassalle, F.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第 7 页。

拉萨尔, 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 年柏林版第 1 卷 (*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cl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Band I. Berlin, 1858.*)。——第 124 页。

莱佛尔斯, 托·斯·《爪哇史》, 两卷集,

- 1817年伦敦版 (*Raffles, Th. S. The History of Java.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17.*)。——第397、820页。
- 莱特, 托·《论大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79年伦敦版 (*Wright, Th. A Short address to the public on the monopoly of large farms. London, 1779.*)。——第794页。
- 莱文斯顿, 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 (*Ravenstone, P. Thoughts on the funding system, and its effects. London, 1824.*)。——第470、559页。
- 赖希, 爱·《论人类的退化, 退化的原因和防治办法》1868年厄兰根版 (*Reich, E. Ueber die Entartung des Menschen, ihre Ursachen und Verhütung. Erlangen, 1868.*)。——第402页。
- [兰盖, 尼·]《民法论, 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 (*Linguet, N.] Théorie des loix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Tomes I—II. Londres, 1767.*)。——第261、319、371、676、806页。
- 兰格, 赛·《国家的贫困, 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 (*Laing, S. National distress; its causes and remedies. London, 1844.*)。——第224、706、722、740页。
- 朗切洛蒂, 塞·《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1658年威尼斯版第2部 (*Lancellotti, S. L'Hoggidi overo ge' ingegni non inferiori a' passati. Parte seconda. Venetia, 1658.*)。——第468页。
- 雷尼奥, 埃·《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
- 1855年巴黎版 (*Regnault, E. Histoir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principautés Danubiennes. Paris, 1855.*)。——第267页。
- 李比希, 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卷 (*Liebig, J.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Theil I. 7. Auflage. Braunschweig, 1862.*)。——第268、553、628页。
- 李比希, 尤·《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856年不伦瑞克版 (*Liebig, J. Ueber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Landwirtschaft. Braunschweig, 1856.*)。——第365页。
- 李嘉图, 大·《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伦敦修订第4版 (*Ricardo, D. 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 notes. The fourth edition, corrected. London, 1811.*)。——第164页。
- 李嘉图, 大·《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 (*Ricardo, D. On protection to agriculture. Fourth edition. London, 1822.*)。——第93页。
-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 (*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第97、189、212、257、425、430、432、471、473、479、629、647、666、693页。
- 李维, 梯特《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Livius, Titus. Ab urbe condita.*)。——第310页。

里德，乔·《面包业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Read, G. The History of baking trade. London, 1848*)。——第280页。

里维，莱·《论鹿林和高地农业对食物供应的关系》，载于1866年3月23日《艺术协会杂志》(*Levi, L. On deer forests and Highland agriculture in relation to the supply of food.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March 23, 1866*)。——第802页。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保·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Mercier de la Rivoire, P. P.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In: 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 Daire. Partie II. Paris, 1846*)。——第128、129、150、168、171、179、183、216页。

理查逊，本·华·《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杂志(*Richardson, B. W. Work and overwork. In: «Social Science Review». July 18, 1863*)。——第284页。

列特隆，吉·弗·《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Le Trosne, G. F. De l'intérêt social par rapport à la valeur, à la circulation, à l'industrie et au commerce intérieur et extérieur. In: 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 Daire. Partie II. Paris, 1846*)。——第49、52、109、119、131、135、139、165、180、183、186、236页。

卢阿尔·德·卡尔，皮·马·《论伪造圣物》1856年巴黎版(*Rouard de Card, P. M. De la falsification des substances sacramentelles. Paris, 1856*)。——第278页。

卢克莱修《物性论》(*Lucretius. De rerum natura*)。——第242页。

卢梭，让·雅·《论政治经济学》(*Rousseau, J. J. Discour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第一次载于《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业详解字典》1755年巴黎版第5卷(*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ome V. Paris, 1755*)。——第815页。

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Luther, M. An die Pfarrherrn wider den Wucher zu predigen. Vermanung. Wittemberg, 1540*)。——第155、218、650页。

《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敦版(*A Discourse of the necessity of encouraging mechanick industry. London, 1690*)。——第303页。

《论赋税。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1765年伦敦版(*Considerations on taxes, as they are supposed to affect the price of labour in our manufactures. In a letter to a friend. London, 1765*)。——第304页。

《论工会》1834年伦敦版 (On combination of trades. London, 1834). ——第612页。

《论国民政治经济学，或论各国间的交往对各国财富的影响》1821年伦敦版 (An Essay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 or, a View of the intercourse of countries, as influencing their wealth. London, 1821). ——第226、341页。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年伦敦版 (An Inquiry into those principles,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demand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umption, lately advocated by Mr. Malthus, from which it is concluded, that tax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unproductive consumers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wealth. London, 1821). ——第185、197、483、653、654、667页。

《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1767年伦敦版 (Two letters on the flour trade, and dearness of corn. By a person in business. London, 1767). ——第793页。

《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1753年伦敦版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aking off the bounty on corn exported. In some letters to a friend. London, 1753). ——第355页。

《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论赋税》作者

著，1770年伦敦版 (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axes, as they are supposed to affect the price of labour in our manufactures. By the author of Considerations on taxes. London, 1770). ——第259、260、304—306、407、596、658、659、675、698、804页。

《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 (An Essay on credit and the bankrupt act. London, 1707). ——第156页。罗，约·《论货币和贸易》，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附歌·德尔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1843年巴黎版 (Lau, J. Considérations sur le numéraire et le commerce.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 siècle. 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 ——第109页。

罗伯茨，乔·《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 (Roberts, G.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sou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in past centuries. London, 1856). ——第789页。

罗哈奇，罗·亨·《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 (Rohatsch, R. H. Die Krankheiten, welche verschiedenen Ständen, Altern und Geschlechtern eigenthümlich sind. 6 Bände. Ulm, 1840). ——第402页。

罗杰斯，詹姆斯·爱·撒·《从召开牛津议会

(1259 年)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 年)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 1866 年牛津版第 1—2 卷 (*Rogers, J. E. Th.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 (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 (1793). Vol. I—II. Oxford, 1866.*)。——第 738, 744, 790 页。

罗西, 佩·《政治经济学教程》, 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 年布鲁塞尔版 (*Rossi, P.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In: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第 196 页。

罗雪尔, 威·《国民经济体系》, 第 1 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 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 3 版 (*Roscher, W.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Band I: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Drit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flage. Stuttgart und Augsburg, 1858.*)。——第 110, 181, 232, 244, 360 页。

[罗伊, 亨·]《兑换理论。1844 年的银行法令》1864 年伦敦版 (*[Roy, H.] 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 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 London, 1864.*)。——第 159, 717 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卡·《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 鲁·迈耶尔博士出版, 1881 年柏林版第 1 卷 (*Rodbertus-Jagetzow, J. K. 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Herausgegeben von Dr. R. Meyer. Band I. Berlin, 1881.*)。——第 581 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卡·《给冯·

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 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 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 年柏林版 (*Rodbertus, I. 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第 581 页。

洛克, 约·《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 年), 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 四卷集, 1777 年伦敦第 8 版第 2 卷 (*Locke, J.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1691). In: The works of John Locke. In four volumes. Volume II. The eighth edition. London, 1777.*)。——第 48, 108, 144 页。

M

马尔萨斯, 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 附约翰·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 1853 年伦敦版 (*Malthus, Th. R.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With a preface, notes, and supplementary remarks by John Cazenove. London, 1853.*)。——第 623, 629, 635, 654 页。

[马尔萨斯, 托·罗·]《人口原理》1798 年伦敦版 (*[Malthus, Th.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1798.*)。——第 390, 676 页。

马尔萨斯, 托·罗·《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 年伦

教版 (*Malthus, Th. R.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 London, 1815)。——第 349、578、610 页。

马尔萨斯, 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 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杂记作了大量补充, 1836 年伦敦第 2 版 (*Malthus, Th. 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Second edition with considerable additions from the author's own manuscript and an original memoir.* London, 1836)。——第 239、635、644、653、696 页。

马考莱, 托·巴·《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英国史》1854 年伦敦第 10 版第 1 卷 (*Macaulay, Th. B.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Volume I. Tenth edition.* London, 1854)。——第 303、785 页。

马克思, 卡·《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载于《革命》杂志, 1852 年纽约版 (*Marx, K. Der 18th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In: «Die Revolution». New-York, 1852)。——第 760 页。

[马克思, 卡·]《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 年伦敦版 (*[Marx, K.]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London, 1864). ——第 40 页。

马克思, 卡·《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载于 1872 年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 (*Marx, K. An die Redaktion des «Volksstaat».* In: «Volksstaat», 7. August 1872)。——第 41 页。

马克思, 卡·《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载于 1853 年 2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Marx, K. Elections—Financial clouds—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and Slave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February 9, 1853)。——第 799 页。

[马克思, 卡·]《雇佣劳动与资本》, 载于 1849 年 4 月《新莱茵报》 (*[Marx, K.] Lohnarbeit und Kapita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April, 1849)。——第 634、674、835 页。

马克思, 卡·《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 年巴黎—布鲁塞尔版 (*Marx, K.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第 98、395、398、401、460、588、708 页。

马克思, 卡·《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 年柏林版第 1 分册 (*Marx, K.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s Heft.* Berlin, 1859)。——第 7、14、16、20、47、53、55、93、95、99、105、107、112、114—115、119、124、133、142—144、157、159、164、218、590、680 页。

马克思, 卡·《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载于 1872 年 6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

- (Marx, K. An die Redaktion des «Volksstaat». In: «Volksstaat», 1. Juni 1872). ——第 40 页。
- [马克思, 卡·和恩格斯, 弗·]《共产党宣言》1848 年伦敦版 ([Marx, K. und Engels, F.]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第 534, 832 页。
- [马克思, 卡·和恩格斯, 弗·] [Marx, K. und Engels, F.]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1850 年伦敦版)》(Th. Carlyle. Latter-Day Pamphlets. London, 1850), 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4 期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4)。——第 285 页。
- 马提诺, 哈·《政治经济学解说, 第七例。曼彻斯特的罢工(一个故事)》1832 年伦敦版 (Martineau, H. 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VII. A Manchester strike. A Tale. London, 1832)。——第 696 页。
- [马西, 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 年伦敦版 ([Massie, J.] An Essay on the governing causes of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wherein the sentiments of Sir William Petty and Mr. Locke on that head, are considered. London, 1750)。——第 562 页。
- 麦岑, 奥·《一八六六年以前普鲁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1868—1871 年柏林版第 1—4 卷 (Meitzen, A. Der Boden und die landwirth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nach dem Gebietsumfange vor 1866. Bände I—IV. Berlin, 1868—1871)。——第 265 页。
- 麦克库洛赫, 约·雷·《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 年伦敦版 (MacCulloch, J. R. 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 London, 1847)。——第 172 页。
- 麦克库洛赫, 约·雷·《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附史评、论述和作者介绍》1845 年伦敦版 (MacCulloch, J. R.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select publications in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hat science, with historical,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notices. London, 1845)。——第 164, 794 页。
- 麦克库洛赫, 约·雷·《政治经济学原理, 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述》1830 年伦敦版 (MacCulloch, J. R.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a sketch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science. London, 1830)。——第 175, 484 页。
- 麦克拉伦, 詹·《通货简史。略论最优秀的作家对该问题的看法》1858 年伦敦版 (MacLaren, J.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cy, comprising a brief review of the opinions of the most eminent writers on the subject. London, 1858)。——第 115 页。
- 麦克劳德, 亨·丹·《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通货、价格、信用和汇兑的基本

原理》1855年伦敦版第1卷(*Macleod, H. 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with 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currency; prices; credit; and exchanges. Volume I. London, 1855.*)。——第176页。

迈尔，济·《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Mayer, S. Die Sociele Frage in Wien. Studie eines «Arbeitgebers».* Wien, 1871)。——第15页。

曼，托·《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们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伦敦商人托马斯·曼著，他的儿子约翰·曼为了公共利益将本书出版，1669年伦敦版(*Mun, Th.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Or, the Ballance of our forraign trade is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 Written by Thomas Mun of Lond., merchant, and now published for the common good by his son John Mun.* London, 1669)。——第561页。

毛勒，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 G. L.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第88页。

毛勒，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3年厄兰根版第4卷(*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and IV. Erlangen, 1863)。——第265页。

梅里威耳，赫·《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2卷(*Merivale, H.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Volumes I—II. London, 1841—1842.*)。——第695, 839页。

蒙森，泰·《罗马史》1856—1857年柏林第2版第1—3卷(*Mommsen, Th. Römische Geschichte. Bände I—III.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56—1857.*)。——第190, 194页。

蒙泰，阿·阿·《关于各科历史手稿的研究》1835年巴黎版第1卷(*Monteil, A. A. Traité de matériaux manuscrits de divers genres d'histoire. Tome I. Paris, 1835.*)。——第813页。

孟德斯鸠，沙·《论法的精神》，载于《孟德斯鸠全集》1767—1769年伦敦版第2—4卷(*Montesquieu, Ch. De l'esprit des loix. In: Oeuvres de Montesquieu. Tomes II, III et IV. Londres, 1767—1769.*)。——第109, 144, 824页。

[孟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1714年伦敦版([*Mandeville, B.]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London, 1714)。——第393页。

弥勒，亚·亨·《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Müller, A. H.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Theil II. Berlin, 1809.*)。——第145页。

米拉波，奥·加·《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

2,3 和 6 卷 (*Mirabeau, H. G. De la monarchie prussienne, sous Frédéric le Grand. Tomes II, III et VI. Londres, 1788.*)。——第 785, 801, 815, 825 页。
 摩尔顿, 约·查·《劳动者》, 载于约·查·摩尔顿编《实用而科学的农业百科全书》1855 年格拉斯哥版第 2 卷 (*Morton, J. C. Labourer. In: A Cyclopedias of agriculture, practical and scientific. Edited by J. C. Morton. Vol. II. Glasgow, 1855.*)。——第 607 页。
 摩尔顿, 约·查·《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 载于 1859 年 12 月 9 日《艺术协会杂志》第 7 卷 (*Morton, J. C. On the forces used in agriculture.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Volume VII, December 9, 1859.*)。——第 413 页。
 莫尔, 托·《乌托邦》, 1516 年最初用拉丁文发表, 拉·罗宾逊译成英文, 艾·阿尔伯编, 1869 年伦敦版 (*More, Th. Utopia. Originally printed in latin, 1516.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R. Robinson. Edited by E. Arber. London, 1869.*)。——第 787, 804 页。
 莫利纳里, 古·《经济学研究》1846 年巴黎版 (*Molinari, G. Études économiques. Paris, 1846.*)。——第 463, 655, 840 页。
 默里, 休·; 威尔逊, 詹·等《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 三卷集, 1832 年爱丁堡版第 2 卷 (*Murray, H.; Wilson, J. etc.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British India, from the most remote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In three volumes. Vol. II. Edinburgh, 1832). ——第 378 页。
 墨菲, 约·尼·《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 年伦敦版 (*Murphy, J. N. Ireland industrial, political, and social. London, 1870.*)。——第 772 页。
 穆勒, 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 年伦敦版 (*Mill, J. St.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4.*)。——第 144, 658 页。
 穆勒, 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 两卷集, 1848 年伦敦版 (*Mill, J. 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48.*)。——第 144, 408, 553, 670 页。
 穆勒, 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68 年伦敦版 (*Mill, J. 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1868.*)。——第 566 页。
 穆勒, 约·斯·《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 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 (*Mill, J. St.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two volumes.*)。第 1 版 1843 年在伦敦出版。——第 647 页。
 [穆勒, 詹·]《殖民地》, 载于《英国百科全书附录》1831 年版 (*[Mill, J.] Colony.*

In: Supplement to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831). ——第224页。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自英文，1823年巴黎版(*Mill, J.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Traduits de l'anglais par Parisot. Paris, 1823.*)。——第622、626、629页。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Mill, J.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1.*)。——第176、210、391页。

N

纳瓦雷特，马·费·《1492—1504年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旅行记》，1536年哥伦布的友人比硕夫·拉斯·卡萨斯和哥伦布的儿子费尔南多根据哥伦布本人的书信和报告出版，1791年发现，1826年出版，弗·普雷塞译成德文，1890年莱比锡版(*Navarrete, M. F. Die Reisen des Christof Columbus 1492—1504. Nach seinen eigenen Briefen und Berichten veröffentlicht 1536 von Bischof Las Casas seinem Freunde und Fernando Columbus seinem Sohne. Aufgefunden 1791 und veröffentlicht 1826. In das Deutsche übertr. von F. Pressel. Leipzig 1890.*)。——第151页。

尼布尔，巴·格·《罗马史》1853年柏林版(*Niebuhr, B. G. Römische Geschichte. Berlin, 1853.*)。——第263页。

纽曼，弗·威·《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Newman, F. W.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1)。——第792、797页。

纽曼，赛·菲·《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佛和纽约版(*Newman, S. Ph.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over and New York, 1835.*)。——第182、234页。

纽纳姆《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Newnham, G. L.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before the committees of the two Houses of Parliament, on the corn laws. London, 1815.*)。——第660、661页。

[诺思，达·]《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题》1691年伦敦版([*North, D. Discourses upon trade; principally directed to the cases of the interest, coynage, clipping, increase of money. London, 1691.*])。——第141、145、154、428页。

O

欧文，罗·《评工业体系的影响，并提出改进那些对健康和道德最有害的部门的意见》1817年伦敦第2版(*Owen, R.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with hin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ose parts of it which are most injurious to health and morals. The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17.*)。——第442页。

P

帕里，查·亨·《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

必要》1816年伦敦版 (*Parry, Ch. H.*, The Question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existing corn laws, considered,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the tenantry, the landholder, and the country. London, 1816)。——第660、661、740页。

[帕里, 威·爱·] 《开辟大西洋太平洋西北航线航行日志; 航行在威廉·爱德华·帕里命令下, 1819—1820年由皇家“赫克拉”和“格赖珀”两轮进行》1821年伦敦版 ([*Parry, W. E.*] Journal of a voyage for the discovery of a north-west passage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19—20, in His Majesty's ships Hecla and Griper, under the orders of William Edward Parry. London, 1821)。——第113页。

帕尼尼, 卓·弗·《试论物品的合理价格, 货币的合理价值以及罗马人的贸易》, 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1803年米兰版第2卷 (*Pagnini, G. F.* Saggio sopra il giusto pregió delle cose, la giusta valuta della moneta e sopra il commercio dei romani.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moderna. Tomo II. Milano, 1803)。——第109页。

帕皮隆, 托·《东印度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 ([*Papillon, Th.*] The East-India-trade a most profitable trade to the Kingdom. London, 1677)。——第108页。

培恩斯, 约·《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

学、科学、机械协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篇报告》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 (*Baynes, J.* The Cotton trade. Two lectures on the above subject, delivered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Blackburn literary, scientific and mechanics' institution. Blackburn—London, 1857)。——第428页。

培根, 弗·《文明与道德论文集》1625年伦敦版 (*Bacon, F.*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al. London, 1625)。——第788页。

培根, 弗·《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 载于约·密尔顿《特洛伊人、罗马人、萨克森人统治下的不列颠》。——托·莫尔《理查三世时期的英国》。——弗·培根, 维鲁拉姆勋爵《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文转载自1719年肯尼特《英国》, 1870年伦敦版 (*Bacon, F.* The Reign of Henry VII. In: *Milton, J.* Britain under Trojan, Roman, Saxon rule.—*More, Th.* England under Richard III.—*Bacon, F.*, Lord Verulam. The Reign of Henry VII.—Verbatim reprint from *Kennet's England*, ed. 1719. London, 1870)。——第787—788页。

配第, 威·《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附〈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伦敦版 (*Petty, W.*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72. To which is added Verbum sapienti. London, 1691)。——第162、166、302、348页。

配第, 威·《货币略论(1682年)》致哈里法克斯侯爵》1695年伦敦版 (*Petty, W.* 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 money, 1682. To the Lord Marquess of Halyfax. London, 1695). ——第 119、116 页。
- 配第, 威·《赋税论》1667 年伦敦版 ([*Petty, W.*]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 ——第 57、110、142、677—678 页。
- 品托, 伊·《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 年阿姆斯特丹版 ([*Pinto, I.*]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Amsterdam, 1771). ——第 172 页。
-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 主要是评它同谷物贸易的关系》1815 年伦敦版 (Remarks on the commercial policy of Great Britain, principally as it relates to the corn trade. London, 1815). ——第 609 页。
-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 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 年伦敦版 (Observations on certain verbal disputes in political economy, particularly relating to value, and to demand and supply. London, 1821). ——第 100、231、586、657 页。
- 普莱斯, 理·《评继承支付、婚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 威·摩尔根发行, 1803 年伦敦第 6 版第 2 卷 (*Price, R.*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 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 and on the national debt. Sixth edition. By W. Morgan. Vol. II. London, 1803). ——第 739、794—795 页。

蒲鲁东, 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 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 1 卷 (*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ome I. Paris, 1846). ——第 563 页。

Q

琼斯, 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 第 1 部分; 《地租》, 1831 年伦敦版 (*Jones, R.*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n the sources of taxation, Part I. — Rent. London, 1831). ——第 365 页。

琼斯, 理·《1833 年 2 月 27 日在伦敦皇家学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座大纲》1833 年伦敦版 (*Jones, R.* An 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olitical economy, delivered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27th February, 1833. To which is added a syllabu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the wages of labor. London, 1833). ——第 693 页。

琼斯, 理·《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 年哈特福版 (*Jones, R.* Text-book of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 Hertford, 1852). ——第 342、356、371、624、644、656 页。

《圈围荒地的后果和当前肉价高昂的原因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 年伦敦版 (A Poli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sequences of enclosing waste lands,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butchers meat. London, 1785). ——第 793 页。

R

若弗卢瓦·圣伊雷尔, 埃·《对自然哲学的、综合的、历史的和生理的认识》1838年巴黎版 (*Geoffroy Saint-Hilaire, E. Notions synthétiques, historiques et physiologiques de philosophie naturelle. Paris, 1838.*)。——第814页。

S

萨德勒, 迈·托·《爱尔兰, 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年伦敦第2版 (*Sadler, M. Th. Ireland; its evils, and their remedies.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29.*)。——第771页。

萨德勒, 迈·托·《人口的规律》1830年伦敦版第1—2卷 (*Sadler, M. Th. The Law of population. Volumes I—II. London, 1830.*)。——第771页。

《萨默斯、哈里法克斯、牛津、秘书维农等人为施鲁兹贝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国王威廉、桑德兰、萨默斯等人的性格和行为》(*The Character and behaviour of King William, Sunderland, Somers etc. as represented in original letters to the duke of Shrewsbury, from Somers, Halifax, Oxford, secretary Vernon etc.*)。——第791页。

萨默斯, 罗·《苏格兰高地来信, 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版 (*Somers, R. Letters from the Highlands; or, the Famine of 1847. London, 1848.*)。——第800、801页。

萨伊, 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

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 (*Say, J. B. Lettres à M. Malthus, sur différens sujets d'économie politique, notamment sur les causes de la stagnation générale du commerce. Paris, 1820.*)。——第666—667页。

萨伊, 让·巴·《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1—2卷 (*Say, J. 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Troisième édition. Tomes I et II. Paris, 1817.*)。——第175、186、232页。

萨伊, 让·巴·《论政治经济学》1826年巴黎第5版第1卷 (*Say, J. 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Cinquième édition. Tome I. Paris, 1826.*)。——第653页。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Sextus Empiricus. Adversus mathematicos.*)。——第404页。

桑顿, 威·托·《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 (*Thornton, W. Th. 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y. London, 1846.*)。——第194、299页。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Xenophon, Cyropaedia*)。——第405页。

沙乌, 华·弗·《土地、植物和人》, 采惹译自丹麦文, 1854年莱比锡第2版 (*Schouw, J. F. Die Erde, die Pflanzen und der Mensch. Aus dem Dänischen von Zeise. Zweite Auflage. Leipzig, 1854.*)。——第563页。

舍尔比利埃, 安·《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 (*Cherbuliez, A. Richesse ou pauvreté. Exposition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e la distribution actuell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Paris, 1841).

——第 206、210、640 页。

施托尔希, 亨·《政治经济学教程, 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15 年圣彼得堡版第 1—3 卷 (*Storch, 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Tomes I—III. St.-Pétersbourg, 1815.*)。——第 197、206、399、648、710 页。

施托尔希, 亨·《政治经济学教程, 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1823 年巴黎版第 1 卷 (*Storch, 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 B. Say. Tome I. Paris, 1823.*)。——第 389、398 页。

舒耳茨, 威·《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论文》1843 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Schulz, W.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第 409 页。

斯宾诺莎, 巴·《某些学者致巴·斯宾诺莎的信和他对他的其他著作的许多解释》(*Spinoza, B. Epistolae doctorum quorundam virorum ad B. de Spinoza et auctoris responsiones; ad aliorum ejus operum elucidationem*

non parum facientes)。——第 654 页。

斯宾诺莎, 巴·《伦理学》(*Spinoza, B. Ethica*)。——第 341 页。

斯卡尔培克, 弗·《社会财富的理论。并附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1839 年巴黎第 2 版第 1 卷 (*Skarbek, F. Théori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Suivie d'une bibliographi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Seconde édition. Tome I. Paris, 1839.*)。——第 364、389 页。

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Scope.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见波特尔《政治经济学》(*Potter. Political economy*)。

斯密, 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爱·吉·威克菲尔德发行, 1835—1839 年伦敦版。大卫·布坎南发行, 1814 年爱丁堡版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E. G. Wakefield. London, 1835—1839. Ed. David Buchanan, Edinburgh, 1814.*)。——第 60、143、390、393、400—401、587、613、624、652、679、682、706、718、806 页。

斯密, 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热尔门·加尔涅的新译本, 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 1802 年巴黎版第 1 卷 (*Smith, A.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raduction nouvelle, avec des notes et observations; par Germain Garnier. Tome I. Paris, 1802.*)。——第 679 页。

斯密, 亚·《道德情操论》1759 年伦敦版 (*Smith, A.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1759). ——第 678 页。

斯[泰福], 威·, 绅士《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1581 年伦敦版 (*S[tafford], W., gentleman. A Compendious or briefe examination of certayne ordinary complaints, of divers of our country men in these our dayes. London, 1581.*)。——第 812 页。

斯特莱普, 约·《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 年第 2 版第 2 卷 (*Strype, J. Annals of the re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and other various occurrences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during Queen Elizabeth's happy reign. Second edition. Vol. II, 1725.*)。——第 805 页。

斯特兰吉, 威·《健康的七要素》1864 年伦敦版 (*Strange, W. The Seven sources of health. London, 1864.*)。——第 287 页。

斯图亚特, 杜·《政治经济学讲义》, 载于威·汉密尔顿爵士发行的《斯图亚特全集》1855 年爱丁堡版第 8 卷 (*Stewart, D.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 Stewart. Edited by Sir W. Hamilton. Vol. VIII. Edinburgh, 1855.*)。——第 356, 382, 399, 532 页。

斯图亚特, 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两卷集, 1767 年伦敦版第 1 卷 (*Stew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In two volumes. Vol. I. London, 1767.*)。——第 369, 798 页。

斯图亚特, 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三卷集, 1770 年都柏林版第 1 卷 (*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In three volumes. Vol. I. Dublin, 1770.*)。——第 203, 710, 786, 814 页。

斯图亚特, 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载于《詹·斯图亚特爵士著作集》, 由其子詹·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 六卷集, 1805 年伦敦版第 1 卷 (*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In: The Works of Sir James Steuart, collected by General Sir James Steuart, his son. In six volumes. Vol. I. London, 1805.*)。——第 170 页。

斯图亚特, 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1789 年巴黎版第 1 卷 (*Steuart, J. 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ome I. Paris, 1789.*)。——第 470 页。

T

塔克特, 约·德·《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 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两卷集, 1846 年伦敦版 (*Tucker, J. D. A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including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46.*)。——第 400, 789, 817 页。

汤普逊, 本·, 朗福德伯爵《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1796—1802 年伦敦版第 1—3 卷, 1796 年伦敦版第 1 卷 (*Thompson, B., Count of Rumford. Essays, poli-*

tical, economical, and philosophical. Vols. I—III. London, 1796—1802. Vol. I. London, 1796). — 第 659 页。

汤普逊，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 年伦敦版 (*Thompson, W.*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London, 1824)。——第 400 页。

[唐森，约·]《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著，1786 年伦敦版 ([*Townsend, J.*] 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 By a well-wisher to mankind. London, 1786)。——第 709 页。

唐森，约·《西班牙游记》1791 年伦敦版 (*Townsend, J.* Journey through Spain. London, 1791)。——第 709 页。

梯也尔，阿·《财产论》1848 年巴黎版 (*Thiers, A.* De la propriété. Paris, 1848)。——第 484 页。

《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 年爱丁堡版 (*The Currency theory reviewed; in a letter to the scottish people. By a banker in England.* Edinburgh, 1845)。——第 160 页。

图克，托·和纽马奇，威·《1848—1856 年九年中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载于《1792 年到现在的价格史》1857 年伦敦版第 5、6 卷 (*Tooke, Th.; Newmarch, W.*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In two volumes; forming the fifth

and sixth volumes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2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857)。——第 328 页。

托伦斯，罗·《论谷物外销》1815 年伦敦版 (*Torrens, R.* An 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 London, 1815)。——第 195 页。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 年伦敦版 (*Torrens, R.* An 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London, 1821)。——第 184、209 页。

托伦斯，罗·《论工资和联合》1834 年伦敦版 (*Torrens, R.* On Wages and combination. London, 1834)。——第 444 页。

W

瓦茨，约·《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1842 年曼彻斯特版 (*Watts, J.* The Facts and fic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Manchester, 1842)。——第 603 页。

瓦茨，约·《工会和罢工。机器。合作社》1865 年曼彻斯特版 (*Watts, J.* Trade societies and strikes. Machinery. Co-operative societies. Manchester, 1865)。——第 603、607 页。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 年伦敦第 3 版 (*Wade, J.*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Third edition. London, 1835)。——第 272、302、679 页。

威尔克斯，马·《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迈索尔历史初探》1810 年伦敦版第 1 卷 (*Wilks, M.* Historical sketches of the South of India, in an attempt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Mysore.

Vol. I. London, 1810). ——第 396 页。

[威克菲尔德, 爱·吉·]《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比较》, 两卷集, 1833 年伦敦版 ([*Wakefield, E. G.*] *England and America.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33). ——第 299, 639, 741, 834—842 页。

威克菲尔德, 爱·吉· (*Wakefield, E. G.*) 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 载于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威克菲尔德的注释, 六卷集, 1835 年伦敦版第 1 卷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commentary, by the author of «England and America».* In six volumes. Vol. I. London, 1835). ——第 587 页。

威克菲尔德, 爱·吉·《略论殖民艺术》 1849 年伦敦版 (*Wakefield, E. G.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London, 1849). ——第 362 页。

威兰德, 弗·《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3 年波士顿版 (*Wayland, Fr.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1843). ——第 186, 234 页。

[威斯特, 爱·]《论资本用于土地》, 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 1815 年伦敦版 ([*West, E.*]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apital to land.* By a fellow of University college of Oxford. London, 1815). ——第 595 页。

威斯特, 爱·《谷物价格和工资, 并论斯密博士、李嘉图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学说》 1826 年伦敦版 (*West, E. Price of corn and wages of labour, with observations upon Dr. Smith's, Mr. Ricardo's, and Mr. Malthus's doctrines upon those subjects.* London, 1826). ——第 595, 596 页。

维里, 彼·《政治经济学研究》, 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1804 年米兰版第 15 卷 (*Verri, P. 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moderna. Tomo XV.* Milano, 1804)。 ——第 56, 108, 154, 366 页。

维特, 杨·德·《论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西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 1662 年来顿版 (*Witt, J. de. Aanwysing der heilsame politike gronden en maximen van de Republike van Holland en West-Friesland.* Leyden, 1662). ——第 825 页。

沃森, 约·福·《在艺术协会上所作的报告》, 1860 年 4 月 17 日 (*Watson, J. F. Paper read before the Society of Arts, 17 April 1860.*)。载于《艺术协会杂志》 1860 年伦敦版第 8 卷。 ——第 430 页。

乌尔卡尔特, 戴·《家常话》 1855 年伦敦版 (*Urquhart, D. Familiar words.* London, 1855). ——第 118, 402, 552, 816, 817 页。

X

[西利, 罗·本·]《国家的危险。向立法

机关、僧侣和上层阶级及中等阶级的呼吁》1843年伦敦版([*Seeley, R. B.*] *The Perils of the nation. An Appeal to the legislature, the clergy, and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London, 1843)。——第796页。

希罗(亚历山大里亚的)《有关风力和水力技术的书,弗里德里希·孔曼迪诺·冯·乌尔宾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附萨洛蒙·德·科以及其他知名的有经验的设计师的各种磨机、水力机械和山洞工程设计》1688年法兰克福版(*Hero Alexandrinus. Buch von Lufft-und Wasser-Künsten, welche von Friederich Commandino von Urbin aus dem Griegischen in das Lateinische übersetzt... Und mit einem Anhang von allerhand Mühl-, Wasser- und Grotten-Wercken aus Salomon de Caus... such anderen berühmt-und erfahrnen Autoribus zusammen getragen...* Frankfurt 1688)。——第414页。

西尼耳,纳·威·《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Senior, N. W. Journals, conversation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Ireland. In two volumes. Vol. II.* London, 1868)。——第780、800页。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科学大纲》1836年伦敦版(*Senior, N. W. 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36)。——第256页。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莱·霍纳给西尼

耳先生的信以及艾·艾释华特先生、汤普逊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L.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 Ashworth, Mr. Thom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第252、255、445页。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威·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Senior, N. W.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irés de leçons édites et inédites de Mr. N. W. Senior par le c-te Jean Arrivabene.* Paris, 1836)。——第654页。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并附关于现行的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和纠正办法的导言》1830年伦敦版(*Senior, N. W. Three lectures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 preface on the causes and remedies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London, 1830)。——第596、600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运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Sismondi, J. C. L. Simonde de. De la richesse commerciale ou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appliqués à la législation du commerce. Tome I. Genève, 1803.*)。——第587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 (*Sismondi, J. C. L. Simonde de.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ome I. Bruxelles, 1837.*)。——第350、653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年巴黎版第1卷 (*Sismondi, J. C. 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Tome I. Paris, 1819.*)。——第177、197、622、637、638、642、643、710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2卷 (*Sismondi, J. C. 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Seconde édition. Tomes I—II. Paris, 1827.*)。——第633、831页。

《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 (*Reasons for a limited exportation of wooll. London, 1677.*)。——第627页。

肖莱马，卡·《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展》1879年伦敦版 (*Schorlemmer, C.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emistry. London, 1879.*)。——第343页。

《刑法典，或犯罪和惩罚的法典》1810年科伦版 (*Code pénal, ou code de délits et des peines. Cologne 1810.*)。——第810页。

休谟，大。《若干问题论丛》，两卷集，1764年伦敦新版 (*Hume, D. 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In two volumes. A new edition. London, 1764.*)。——第143页。

修昔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De bello Peloponnesia co libri octo.*)。——第404、405页。

Y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 (*Aristoteles. De repubblica libri VIII. In: Aristotelis opera ex recensione I. Bekkeri. Tomus X. Oxonii, 1837.*)。——第103、174、187页。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 (*Aristoteles. Ethica Nicomachea. In: Aristotelis opera ex recensione I. Bekkeri. Tomus IX. Oxonii, 1837.*)。——第74页。

杨格，阿·《政治算术。兼评大不列颠目前状况》1774年伦敦版 (*Young, A. Political arithmetic.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774.*)。——第142、257页。

杨格，阿·《爱尔兰游记。该王国目前状况概述》1780年伦敦版 (*Young, A. A Tour in Ireland; with 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at Kingdom. London, 1780.*)。——第746页。

《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 (*A Prize essay on*

the comparative merit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London, 1834). ——第 355, 472 页。

《医学百科全书；或对医术各部门有系统而完整的总的论述。第 7 部分。古典作家》1841 年巴黎版 (*Encyclopédi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 ou traité général, méthodique et complet des diverses branches de l'art de guérir. 7e div. Auteurs classiques.* Paris 1841)。——第 402 页。

伊登, 弗·摩·《贫民的状况, 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 三卷集, 1797 年伦敦版 (*Eden, F. M. The State of the Poor: or, an History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England, from the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period. In three volumes.* London, 1797)。——第 272, 659—660, 675—676, 739, 790, 793, 826 页。

伊索克拉特斯《布西里士》(*Isocratis. Busiris.*)。——第 406 页。

[伊文思, 恩·赫·]《我们的旧贵族》, 一个位高任重者著, 1879 年伦敦第 2 版 (*[Evans, N. H.] Our old nobility. By noblesse oblige.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79)。——第 792 页。

尤尔, 安·《工厂哲学; 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 年伦敦版 (*Ure, A.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5)。——第 255, 388, 406, 407, 417, 443, 459—461, 465, 473, 474, 478, 479, 606, 611, 615 页。

尤尔, 安·《工厂哲学, 或工业经济》, 在作者的参与下译出, 1836 年巴黎版第 2 卷 (*Ure, A.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Economie industrielle. Traduit sous les yeux de l'auteur. Tome II. Paris, 1836.*)。——第 332 页。

Z

詹诺韦西, 安·《市民经济学讲义》, 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1803 年米兰版第 7—9 卷 (*Genovesi, A. Lezioni di economia civile.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moderna. Tomi VII—IX. Milano, 1803.*)。——第 175 页。

张伯伦, 约瑟夫《1875 年 1 月 14 日在北明翰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载于 1875 年 1 月 15 日《曼彻斯特卫报》(*Chamberlain, Joseph. Eröffnungsrede der sanitären Konferenz, Birmingham, 14. Januar 1875.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vom 15. Jaunar 1875.*)。——第 704 页。

《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 年伦敦版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which are illustrated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present national distress.* London, 1830)。——第 578 页。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 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 年伦敦版 (*Reasons for the late increase of the poor-rates: or,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price of labour and provisions.* London, 1777)。——第 627, 738 页。

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

A

《埃森、费尔登和克特维格商会的 1862 年年度报告》1863 年埃森版 (*Jahresbericht der Handelskammer für Essen, Werden und Kettwig pro 1862. Essen, 1863.*)。——第 428 页。

《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 年每郡每省种植某些农作物的亩数和牲畜头数概况》1860 年都柏林版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Ireland. General abstracts showing the acreage under the several crops, and the number of live stock, in each county and province, for the year 1860. Dublin, 1860.*)。——第 768 页。

《爱尔兰农业统计。1866 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7 年都柏林版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Ireland. Tables showing the estimated average produce of the crops for the year 1866. Dublin, 1867.*)。——第 768 页。

D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中国人民、宗教、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著述》，卡尔·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 1852—1857 年圣彼得堡的俄文版，1858 年柏林版第 1 卷 (*Arbeiten der kaiserlich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Peking über China, sein Volk, seine Religion, seine Institutionen, sozialen Verhältnisse. Aus dem*

Russischen nach dem in St. Petersburg 1852—1857 veröffentlichten Original von Dr. Carl Abel und F. A. Mecklenburg. Erster Band, Berlin, 1858.)。——第 147 页。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 1864 年 2 月 8 日的质问》(East India Bullion).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8 February 1864)。——第 154 页。

F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维多利亚 16 和 17 年通过的第 99 章，20 和 21 年通过的第 3 章）。第 1 卷报告和附件。第 2 卷证词》1863 年伦敦版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s (16 & 17 Vict. c. 99. and 20 & 21 Vict. c. 3) relating to transportation and penal servitude. Vol. I. Report and appendix. Vol. II. Minutes of evidence. London, 1863.*)。——第 744 页。

《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 年》(*Report of the officer of health of St. Martin's-in-the-Fields. 1865.*)。——第 723 页。

《“佛来米人，前进！”协会告一切拥护真诚实现 1830 年国民大会通过的比利时宪法的人的呼吁书》1860 年布鲁塞尔版

(Manifest der maatschappij De Vlamingen Vooruit! Gerigt tot alle de voorstanders van de eerlijke en regtzinnige uitvoering der Belgische Grondwet, gestemd door het Nationaal Congres van 1830. Brussel, 1860). ——第 737 页。

G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 1856 年 4 月 15 日的质问》(Factories.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15 April 1856)。——第 475 页。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 1861 年 4 月 24 日的质问》(Factories.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24 April 1861)。——第 475 页。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 1867 年 12 月 5 日的质问》(Factories.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5 December 1867)。——第 475 页。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 1 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 1833 年 6 月 28 日刊印 (Factories inquiry commission. 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8 June 1833)。——第 309 页。

《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 1859 年 8 月 9 日刊印 (Factories regulation act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9 August

1859)。——第 269, 327 页。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第 255, 269, 434, 537 页。

—《截至 1841 年 12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42 年 [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the 31st December 1841. [London] 1842)。——第 308 页。

—《截至 1844 年 9 月 30 日为止的三个半月和 1844 年 10 月 1 日—1845 年 4 月 30 日》1845 年伦敦版 (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th September, 1844; and from 1st October, 1844, to 30th April, 1845. London, 1845)。——第 312, 314, 325, 451, 454 页。

—《截至 184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47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6. London, 1847)。——第 325 页。

—《截至 1848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48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48. London, 1848)。——第 317, 599 页。

—《截至 1848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49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8. London, 1849)。——第 256, 312, 315—323, 331, 334, 575, 600 页。

—《截至 1849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49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49.

- London, 1849). —— 第 320—323, 345 页。
- 《截至 1849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0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9. London, 1850). —— 第 311, 322 页。
- 《截至 1850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50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0. London, 1850). —— 第 324, 334 页。
- 《截至 1850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1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0. London, 1851). —— 第 319 页。
- 《截至 1852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52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2. London, 1852). —— 第 324 页。
- 《截至 1853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53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3. London, 1853). —— 第 327 页。
- 《截至 1853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4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3. London, 1854). —— 第 198, 298 页。
- 《截至 1855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55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5. London, 1855). —— 第 255 页。
- 《截至 1855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6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5. London, 1856). —— 第 298, 306, 440, 468, 574 页。
- 《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7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 —— 第 269—270, 417, 440, 455, 473, 491, 493 页。
- 《截至 1857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57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7. London, 1857). —— 第 440 页。
- 《截至 1857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7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7. London, 1857). —— 第 327, 439, 441 页。
- 《截至 1858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58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8. London, 1858). —— 第 269—270, 607, 610 页。
- 《截至 1858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8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8. London, 1858). —— 第 432, 435, 440, 455, 473 页。
- 《截至 1859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59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9. London, 1859). —— 第 604 页。
- 《截至 1859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60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9. London, 1860). —— 第 312, 335 页。
- 《截至 1860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60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0.

- London, 1860)。——第 271、298、309、327、414、455、599 页。
- 《截至 1860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60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0. London, 1860)。——第 271、604 页。
- 《截至 1861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61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1. London, 1861)。——第 270 页。
- 《截至 1861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62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1. London, 1862)。——第 325、326、333、457 页。
- 《截至 1862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63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2. London, 1863)。——第 270、328—329、333、438、445、454、456、459、491、499、526 页。
- 《截至 1863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63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3. London, 1863)。——第 329、335、466、503、599 页。
- 《截至 1863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64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3. London, 1864)。——第 270、462、468、475、501、502、599、698 页。
- 《截至 1864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1864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4. London, 1864)。——第 502 页。
- 《截至 1864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65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4. London, 1865)。——第 331、334—335 页。
- 《截至 1865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66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5. London, 1866)。——第 450、491、502、504、521—523、528、530、537 页。
- 《截至 186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67 年伦敦版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6. London, 1867)。——第 462、467、617、704、777 页。
- 《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第 10 号报告。附证词》1868 年伦敦版 (Ten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rganization and rules of trades unions and other associations, together with minutes of evidence. London, 1868)。——第 477 页。
-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s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第 11、198、402、434、436 页。
- 《第 6 号报告。1863 年。有附录》1864 年伦敦版 (Sixth Report. With appendix. 1863. London, 1864)。——第 198、299、437—438、509—510、599、719—721、746、764 页。
- 《第 3 号报告。1860 年》，根据下院决定于 1861 年 4 月 15 日刊印 (Third Report. 1860.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5 April 1861)。——

- 第 273, 274 页。
- 《第 4 号报告。1861 年。有附录》，根据下院决定于 1862 年 4 月 11 日刊印 (Fourth Report. 1861. With appendi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1 April 1862)。——第 509 页。
- 《第 7 号报告。1864 年。有附录》1865 年伦敦版 (Seventh Report. With appendix. 1864. London, 1865)。——第 114、634、722、729—732、744、747—751、758、789 页。
- 《第 8 号报告。1865 年。有附录》1866 年伦敦版 (Eighth Report. With appendix. 1865. London, 1866)。——第 508、722—728 页。
- 《关于谷物和谷物法的报告：上院委员会受命研究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 1、2 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 1814 年 11 月 23 日刊印 (Reports respecting grain, and the corn laws: viz: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from the Lords Committees,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the state of the growth, commerce, and consumption of grain, and all laws relating thereto.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3 November 1814)。——第 609 页。
- 《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1867 年伦敦版 (Correspondence with Her Majesty's missions abroad, regarding industrial questions and trades unions. London, 1867)，——第 12 页。
- 《规定工厂童工、青工和女工的劳动时间的法令。1867 年 8 月 21 日》(An Act for regulating the hours of labour for 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women employed in workshops, 21st August 1867)。——第 540 页。
- H**
-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3 年伦敦版 第 66 卷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LXVI. London, 1843)。——第 715 页。
- 1863 年伦敦版 第 170 卷 (Vol. CLXX. London, 1863)。——第 40—44、297、630 页。
- 1864 年伦敦版 第 174 卷 (Vol. CLXXIV. London, 1864)。——第 715 页。
-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 4 号报告》1860 年伦敦版 (Four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inland revenue. London, 1860)。——第 713 页。
-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 10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 (Ten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inland revenue. London, 1866)。——第 712—713、767 页。
- 《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 年伦敦版 (Royal commission on railway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London, 1867)。——第 474、615 页。
- J**
-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 年都柏林版 (Report

from poor law inspectors on the wages of agricultural labourers in Ireland. Dublin, 1870)。——第 772 页。

《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和各院的状况、纪律、课程和收入的报告》1852 年伦敦版 (Cambridge university commission. Report of 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state, discipline, studies, and revenu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of Cambridge. London, 1852)。——第 676 页。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附证词》1862 年伦敦版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with appendix of evidence. London, 1862)。——第 198, 278—280, 601 页。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 年伦敦版 (Second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an bakers. London, 1863)。——第 278 页。

K

《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 1866 年 7 月 23 日刊印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mine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3 July 1866)。——第 542 —549 页。

L

《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 (第 6 部分)》1866 年伦敦版 (Miscellaneous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Kingdom (Part VI). London, 1866)。——第 716 页。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 1832 年 8 月 8 日刊印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n the Bill to regulate the labour of children in the mills and factor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8 August 1832)。——第 310 页。

《联合王国从 1846 至 1860 年最近十五年历年简要统计一览》1861 年伦敦版第 8 卷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each of the last fifteen years, from 1846 to 1860. Number 8. London, 1861)。——第 458 页。

《联合王国从 1851 至 1865 年最近十五年历年简要统计一览》1866 年伦敦版第 13 卷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each of the last fifteen years, from 1851 to 1865. Number 13. London, 1866)。——第 458 页。

《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

1867年2月18日的征询》(Corn, grain and meal. 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18 February 1867)。——第495、496页。
 《罗得岛州和普罗维登斯殖民地的修订条例》1857年普罗维登斯版(The Revised statutes of the state of Rhode Island and Providence plantations. Providence, 1857)。——第301页。

M

《马萨诸塞州的普通法》1854年波士顿版第1卷(General Law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Volume I. Boston, 1854)。——第301页。

N

《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的1861年3月8日征询》(Agricultural labourers (Ireland). 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8 March 1861)。——第772页。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6号(Reports by Her Majesty's secretaries of embassy and legation, on the manufactures, com- mers, &c.,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reside. No. 6. London, 1863)。——第381页。

Q

《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的

总结报告》1863年爱丁堡,伦敦版(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port of proceedings at the seventh annual congress. Edinburgh, London, 1863)。——第432、529、530、540页。

S

《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The Master spinners & manufacturers' defence fund.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for the receipt and apportionment of this fund, to the central association of master spinners and manufacturers. Manchester, 1854)。——第464页。

《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一度遍及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以及随时能兑现的银行券发行管理法对该阶级的影响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1857年重新公布(Report from the secre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of the distress which has for some time prevailed among the commercial classes, and how far it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Laws for regulating the issue of bank notes payable on demand.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n appendi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8 July 1848. Reprinted 1857)。

——第 147 页。

《食物等掺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的第 1 号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 1855 年 7 月 27 日刊印 (First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adulteration of food, &c.,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7 July 1855)。——第 198、660 页。

T

《童工调查委员会 (1862 年)。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第 1—6 号)》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Report (I—VI) of the commissioners)。——第 268、331、434、466、487 页。

—《第 1 号报告》1863 年伦敦版 (First report. London, 1863)。——第 273—277、300、329、515、598、607 页。

—《第 2 号报告》1864 年伦敦版 (Second report. London, 1864)。——第 506、511—513、515、517—520、523、536、598、606 页。

—《第 3 号报告》1864 年伦敦版 (Third report. London, 1864)。——第 198、286、287、436、504、509、510、524、526 页。

—《第 4 号报告》1865 年伦敦版 (Fourth report. London, 1865)。——第 287—295、387、441、477、524、525 页。

—《第 5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 (Fifth report. London, 1866)。——第 289、436、473、497、507—509、526—

532 页。

—《第 6 号报告》1867 年伦敦版 (Sixth report. London, 1867)。——第 751、760、763—764 页。

W

《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录》，根据下院决定于 1814 年 7 月 26 日刊印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etitions relating to the corn laws of this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n appendix of account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6 July 1814)。——第 609 页。

《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索美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 年伦敦版 (The Case of our english wool. As also the Presentment of the Grand Jury of the County of Somerset thereon. Humbly offered to 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London, 1685)。——第 280 页。

X

《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佣十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令。1851 年 3 月 18 日通过》，载于《新泽西州第 75 号立法》1851 年特伦顿版 (An Act to limit the hours of labor, and to prevent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in factories under ten years of age. Approved March 18, 1851)。——第 301 页。

Y

《1848 年上院委员会》(House of Lords' committee, 1848)——见《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一度遍及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的报告》(Report from the secre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of the distress which has for some time prevailed among the commercial classes.)。——第 147 页。

《1855 年 9 月 10, 12, 13, 14 和 15 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统计会议的报告》1856 年 5 月巴黎版 (Compte rendu de la deuxième session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réuni à Paris les 10, 12, 13, 14 et 15 Septembre 1855. Paris, Mai 1856)。——第 332 页。

《186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 年伦敦版 (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London, 1863)。——第 485—486、692、705、713, 715, 743 页。

《1861 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baking trade in Ireland for 1861)。

——第 281 页。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 1857 年 7 月 30 日刊印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57)。——第 154 页。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 1858 年 7 月 1 日刊印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 July 1858)。——第 160 页。

《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第 22 号年度报告》1861 年伦敦版 (Twen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general of 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 in England. London, 1861)。——第 299—300 页。

期 刊

B

《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 1791 年第 101 号。——第 810 页。
《贝里卫报》(«Bury Guardian»), 贝里出

版, 1860 年 5 月 12 日。——第 297 页。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伦敦出版, 1863 年 4 月 17 日。——第

41 页。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 伦敦出版。——第 591 页。

—1863 年 4 月 17 日。——第 41、715 页。

—1863 年 6 月 23 日。——第 285 页。

—1867 年 1 月 7 日。——第 733—734 页。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1844 年 巴黎出版。——第 92、173、186、696 页。

G

《格拉斯哥每日邮报》(《*The Glasgow Daily Mail*》), 1849 年 4 月 25 日。——第 345 页。

《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 伦敦出版, 1866 年 1 月 13 日。——第 282 页。

《公文集。外交评论(新辑)》(《*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 (New series)*》), 伦敦出版。——第 800 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 伦敦出版, 1864 年 4 月 24 日。——第 159 页。

J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 伦敦出版。——第 741 页。

《今日》(《*To-Day*》), 伦敦出版
—1884 年 2 月第 2 号。——第 43 页。
—1884 年 3 月第 3 号。——第 43 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伦敦出版
—1845 年 3 月 29 日第 3 卷。——第 741 页。

—1848 年 4 月 15 日第 6 卷。——第 256 页。

—1851 年 7 月 19 日第 9 卷。——第 645 页。

—1860 年 1 月 21 日第 18 卷。——第 700 页。

—1866 年 6 月 2 日第 24 卷。——第 802 页。

《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巴黎出版, 1872 年 7—8 月。——第 19 页。

L

《雷诺新闻》(《*Reynold's Newspaper*》), 伦敦出版

—1866 年 1 月 21 日。——第 283 页。

—1866 年 2 月 4 日。——第 283 页。

—1867 年 1 月 20 日。——第 733 页。

M

《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 伦敦和剑桥出版, 1863 年 8 月第 8 卷。——第 285 页。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 伦敦出版, 1860 年 1 月 17 日。——第 273 页。

《孟加拉公报》(《*The Bengal Hurkaru*》), 加尔各答出版, 1861 年 7 月 22 日。——第 365 页。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莱比锡出版

—1868 年 8 月 1 日第 31 号。——第 18 页。

—1868 年 8 月 22 日第 34 号。——第 18 页。

—1868 年 8 月 29 日第 35 号。——第 18 页。

—1868年9月5日第36号。——第18页。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3年2月9日。——第799页。

O

《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圣彼得堡出版, 1872年第3卷。——第20—23页。

P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 伦敦出版。——第717页。

《旁观者》(«The Spectator»), 伦敦出版, 1866年5月26日。——第368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 伦敦出版。——1861年10月26日。——第611页。

——1863年8月15日。——第285页。

——1867年4月5日。——第735页。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 伦敦出版, 1886年11月1日。——第36页。

R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 莱比锡出版。

——1872年6月1日。——第40页。

——1872年8月7日。——第41页。

S

《社会科学评论》(«The Social Science Review»), 伦敦出版, 1863年7月18

日第2卷。——第284—285页。

《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872年4月8(20)日。——第19页。

《实证哲学。评论》(«La Philosophie positive. Revue»), 巴黎出版, 1868年11—12月第3期。——第19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第717、801页。

——1843年2月14日。——第715页。

——1861年11月5日。——第300页。

——1862年11月26日。——第233、443页。

——1863年3月24日。——第328、630—633页。

——1863年4月17日。——第40、41页。

——1863年7月2日。——第285页。

——1864年2月25日。——第518页。

——1866年底。——第659、777、778页。

——1867年初。——第658、777、778页。

——1867年1月26日。——第549页。

——1873年9月3日。——第659页。

——1883年11月29日。——第42页。

W

《韦斯明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 伦敦出版。——第78页。

X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 柏林出版。

——1872年3月7日第10号。——第39、40页。

—1872年7月4日第27号。——第41页。

—1872年7月11日第28号。——第41、42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科伦出版, 1849年4月7日第266号。——第634、835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伦敦、汉堡出版, 1850年第4期。——第323、335页。

Y

《艺术协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伦敦出版

—1859年12月9日第7卷。——第413页。

—1860年4月第8卷。——第430页。

—1866年4月第14卷。——第802页。

—1872年1月5日第20卷。——第457页。

Z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伦敦出版, 1868年1月18日。——第19页。

文学著作

A

安蒂巴特洛斯《水磨的发明》。——第447页。

奥维狄乌斯《爱经》。——第481页。

奥维狄乌斯《节令记》。——第789页。

B

巴尔扎克《高布赛克》。——第646页。

巴特勒《休迪布腊斯》。——第49页。

比彻-斯托《汤姆叔叔的小屋》。——第799页。

布瓦洛《讽刺诗集》第8篇。——第716页。

D

但丁《神曲》。——第13、121、275页。

德莱登《公鸡和狐狸》。——第270页。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第93—95、321页。

狄德罗《一七六七年的沙龙》。——第154页。

狄更斯《奥利佛尔·特威斯特奇遇记》。——第484页。

杜邦《工人之歌》。——第759—760页。

F

伏尔泰《老实人》。——第221、841页。

G

歌德《浮士德》。——第84、104、220、221、300、651、778页。

H

海涅《亨利希》。——第335页。

荷马《奥德赛》。——第283、404页。

荷马《伊利亚特》。——第 77 页。

贺雷西《诗论》。——第 744 页。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 8、
126, 296, 380, 403, 516 页。

贺雷西《抒情诗集》第 7 首。——第 780
页。

L

列萨日《山梯良那的吉尔·布拉斯奇遇
记》。——第 778 页。

S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第 99, 103,
702 页。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 304 页。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 43、
61 页。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 100 页。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 318、
319, 534, 749 页。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 152 页。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 126 页。

施托尔贝格《致自然》。——第 561 页。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 152 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335、
828—829 页。

X

席勒《钟之歌》。——第 446 页。

席勒《人质之歌》。——第 651 页。

席勒《阴谋与爱情》。——第 631 页。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四篇。——第
276 页。

* * *

圣经。——第 105, 301, 412, 638, 652, 817
页。

圣热罗尼莫《给叶夫斯托希亚的信》。——
第 121 页。

名 目 索 引

A

- 埃及——第 370—371、507—508、560—561、562 页。
- 爱尔兰——第 281—282、298、459、764—780、797、825 页。
- 奥地利——第 307 页。
- 澳洲——第 494、843 页。

B

- 半成品——第 207 页。
- 保护关税政策——第 36、618、817、819、825、826、834 页。
- 保险公司——第 230 页。
- 暴力——第 449、782、818—820、826、830 页。
并见剥夺。
- 比利时——第 36、307、332、658、735—737 页。
- 必要劳动
 - 定义——第 243、257、294 页。
 - 必要劳动和工作日——第 259 页。
 - 资本主义和徭役制条件下的必要劳动——第 264—267、350 页。
 - 剩余劳动是必要劳动的函数——第 581—582 页。
 - 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第 578—579 页。
- 辩证法——第 640 页。

- 唯心主义辩证法——第 23—24 页。
- 唯物主义辩证法——第 23—24 页。
- 矛盾——第 8、18、23—24、118—119、121—123、132—133、158、199—200、367—369、394—395、446—447、473、483—489、506—524、535、549—550、555、578—579、654、708、721—722、831—832 页。
- 对立的统一 和斗争——第 62—63、76、83—84、105、122—123、132—133、140、158、169—170、390—391、551—552、555 页。
- 量到质的转化——第 341—342、358、360—362 页。
- 否定的否定——第 832 页。
- 可能性和现实性——第 133 页。
- 必然性和偶然性——第 8、78—79、91—92、188—189、394 页。
- 原因和结果——第 694—695 页。
- 内容和形式——第 48—50、92—93、97—98、112、119—122、640 页。
- 本质和现象——第 48—50、61—62、67、71、73、75、340—341、352、587、589、590—591、593、602、624 页。
并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 剥夺
 -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第 783、785、789、792—794、816—817、830—831、842 页。

- 财政制度对小资产阶级的剥夺作用
 ——第 825 页。
- 剥夺剥削者——第 831—832 页。
- 剥削程度**——见剩余价值率。
- 伯罗奔尼撒战争——第 404 页。
- 不变资本**
- 定义——第 235—237、238—239、
 241—242、339—340、671 页。
 - 不变资本是首先由马克思制定的范
 畴——第 671 页。
 - 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
 ——第 252—253、398、424、444—
 445、446、645—646、670、684 页。
 - 不变资本是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条
 件——第 241 页。
 - 不变资本的不同部分的价值向产品
 的转移——第 212—214、229—235、
 238—240、424—425、427 页。
 - 不变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
 ——第 286 页。
 - 不变资本的支出和所推动的劳动量
 之间的依赖关系——第 696—697
 页。
 - 不变资本和资本的积累——第 662
 —668 页。
-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第 634 页。
- C**
- 财富(物质财富)**
- 源泉——第 56—57、552—553、626、
 662—663 页。
 - 物质财富的要素——第 153—154、
 191、204—210、235、663、782 页。
 - 物质财富的社会表现——第 150—
 151、153、164—165 页。
 - 物质财富的占有——第 174—175 页。
 - 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第 626 页。
- 物质财富的再生产条件——第 621
 页。
- 国民财富——第 823 页。
- 财政制度**——第 824—826 页。
- 产业资本**——见工业资本。
- 超额剩余价值**——第 353、354、446 页。
- 城市**——第 390—391、551—552、704—
 705、721—723、784 页。
- 惩治流浪者的法律**——第 802—805 页。
- 抽象**
- 抽象在分析经济形式时的意义——
 第 7—8 页。
 - 个别例子——第 179—180、188—
 189、201、555、620、637 页。
- 抽象劳动**——第 50—52、56—60、64—73、
 78—83、90、97、107、128 页。
- D**
- 达尔文主义**——第 299、379、409—410
 页。
- 大工业**——第 205—206、417—418、421
 —423、427、487、492—495、503—
 504、505—506、536—537 页。
- 大工业的历史——第 16—17、206、
 408、432—433、825—826 页。
- 大工业的意义——第 408、432—433、
 532—536 页。
- 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第 532—533
 页。
- 大工业和分工——第 530—531 页。
- 大工业对农业的影响——第 552—
 553、816—817 页。
- 大工业和国内市场——第 816—817
 页。
- 代役租**——第 54、785 页。
- 德国**——第 8—11、12、15—16、18、31、
 36、265、303、343、411、412、418。

428—429, 431, 468, 471, 507, 785,
801, 808页。

等价形式

- 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体现——第64—66, 70—72页。
- 等价形式是直接交换的形式——第70, 73, 82—84页。
- 等价形式的三个特点——第71—75页。
- 等价形式的谜——第72页。
- 等价形式和相对价值形式的对比——第62—63页。
- 等价形式的发展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第67, 70, 82—85, 106页。

地产——见土地所有权。

地租——第35, 100, 161, 265, 572, 584, 619—620, 656, 811—813页。

并见徭役、代役租。

第一国际——见国际工人协会。

东印度公司——第154, 498, 820—821页。

E

俄国——第266, 615—616, 749, 791页。

儿童劳动

- 一般评述——第406, 433, 505—507, 697, 760页。
- 剥削儿童的后果——第435—442, 514—515页。
- 儿童劳动是相对人口过剩的原因之一——第578, 697页。
- 英国的儿童劳动——第270, 286—287, 291—293, 303, 310—311, 322, 434—437, 506—515, 536—545页。
- 对儿童劳动的法律规定——第310, 318, 323—333, 434—435, 439—440, 520—521页。

F

罚款——第465—466页。

法

- 罗马法——第109, 319, 795页。
- 中世纪法——第109, 813页。
- 资产阶级的法——第102, 190—191, 199, 261—262, 320—321, 324, 328, 330, 332, 335, 435—437, 465—467, 639—643, 660页。
- 法国**——第12, 17, 18, 36, 161, 165, 300, 308, 332—333, 343, 392, 419, 431, 507, 759, 790, 805, 807, 810, 813, 815页。

法国唯物主义(十八世纪)——第109, 669页。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末)——第107, 676, 810页。

反谷物法同盟——第17页。

反雅各宾战争——第739, 819页。

非洲——第819页。

- 分工——第125—127, 193, 390—391, 392, 395, 397, 401—407, 460—463, 530—531, 684, 703—704页。
- 自然形成的分工——第95, 389—390页。

——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分工——第373, 375—376, 381—382, 383—384, 385—386, 388—397, 400, 401—405页。

——国际分工——第494—495页。

——社会分工——第55—56, 89—90, 92, 125, 126—127, 389—390, 392—393, 404—405, 487, 561页。

——地区分工——第392页。

分配

——决定分配方式的条件——第95—

- 96 页。
- 家长制农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分配——第 95 页。
- 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第 96—97 页。
- 剩余价值的分配——第 570、584、619—620 页。
- 芬尼亞杜社員**——第 780 页。
- 封建主义**
- 一般评述——第 94、95、369、371、651、783—786、818—819 页。
 - 印度的封建主义——第 656 页。
 - 英国的封建主义——第 784—787、790—791、811 页。
 - 德国的封建主义——第 801 页。
 - 法国的封建主义——第 813 页。
 - 封建主义的瓦解——第 470、783、784—787、788、791、801 页。
- 輔助材料**——第 206、229、235、621、663、682 页。
- 复本位制**——第 114—115、163—164 页。
- 复杂劳动**——第 57—58、195、223—224 页。
- 赋税**——第 618 页。
- 赋税的形式——第 161 页。
- 赋税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第 819、824—825、826 页。
- 赋税和剩余价值——第 570 页。
- 罗马帝国的赋税——第 161 页。
- 亚洲的赋税——第 161 页。
- 法国的赋税——第 161 页。
- 英国的赋税——第 789 页。
- 美国的赋税——第 842 页。
- 妇女劳动**
- 一般评述——第 433、515、517—518、578、697、760 页。
- 剥削妇女劳动的历史——第 406、432 页。
- 剥削妇女劳动的后果——第 436—437、438、441 页。
- 妇女劳动是相对人口过剩的原因之一——第 567 页。
- 工场手工业中的妇女劳动——第 505 页。
- 家庭工业中的妇女劳动——第 511—515 页。
- 英国的妇女劳动——第 436—439、506—511、515—517 页。
- 对妇女劳动的法律规定——第 312、319、323—324、326、327 页。
- G**
- 高利贷资本**——第 167、186—187、557、818—819 页。
- 个别价值**——第 221—222、352—354、445—446 页。
- 工厂**
- 一般评述——第 8—11、307、458—460、493、503—505 页。
 - 工厂内的分工——第 55、460—463 页。
 - 工厂工人——第 307、458—479、497 页。
- 工厂立法**
- 一般原理——第 8—11、267、311、323—324、327、331、332—333、334、465、527、549 页。
 - 英国的工厂立法——第 8—11、267、300、306—335、465—466、536—543 页。
 - 法国的工厂立法——第 306、308、332—333 页。
 - 比利时的工厂立法——第 307 页。

工场手工业

- 工场手工业的实质——第35、358、373、383—384、386—389、469—470、816—817页。
 - 工场手工业的起点——第398、408页。
 - 工场手工业产生的方式——第373—376、402—403、406、814—816、819页。
 - 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第398—407页。
 - 工场手工业的基本形式——第379—389页。
 - 工场手工业和分工——第373、375—376、381—382、383—384、385—386、388—397、400—406、415—416、417—418页。
 - 工场手工业和机器的使用——第379、386—387、414—415、419—420页。
 - 工场手工业和劳动生产率——第378—379页。
 - 工场手工业工人，局部工人——第374—389、393—395、398—403、407、419、460页。
 - 工场手工业是工厂的起点——第419、826页。
- 工联**——第282、607、612、702页。
- 工人阶级**
-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状况——第198、333—334、464—465、472—474、497、499、556、627—630、633—634、664—665、677—678、681、725—728、731—732、805—807页。
 -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之间的竞争——第597、600、697—698、702页。
 - 工人是资本家最必需的生产资料

- 第627、681、835页。
 - 工人的再生产——第193—194、234—235、242—243、626—630、633—634、637页。
 - 工人的个人消费——第627—629页。
 - 工人的生产消费——第627—629页。并见无产阶级，农业工人。
- 工人阶级的斗争**——第17、18、313—314、611—612页。
- 争取缩短工作日——第198、262、281、300、313—314、324、327、331—332、334—335、448—449页。
 - 争取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第311、313—314、323—324、434页。
 - 宪章运动——第312、314、316页。
 - 工人反对使用机器——第468—469、473页。
 - 工人阶级的愤怒和组织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长——第717、831页。
 - 英国工厂工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特殊功绩——第332页。
 - 农业工人的斗争——第282、551—552页。
-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一般原理）**——第677—678、681、715—716页。
- 绝对贫困化——第472、528—529、534、552、657—661、674、675—676、677—678、701—702、707—708、721—722、831页。
 - 相对贫困化——第673—675、707—708、721—722页。
 - 并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生活资料的掺假。
- 工人运动**——见工人阶级的斗争。
- 工业革命（十八世纪）**——第330—331、409—415、419—423、469、520—521

页。

工业周期

- 一般评述——第 24—25、36—37、497—498、524—525、677—681、694—695、699、733 页。
- 1825 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工业周期发展的开始——第 16—17、36—37 页。
- 周期阶段的更替和劳动者的状况——第 497—502、680、694、717、732—736 页。
- 英国工业的周期发展——第 497—500、502、733 页。

工业资本（产业资本）

- 一般评述——第 177、186、829—832 页。
- 工业资本的产生——第 783—784、818—829 页。
- 货币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第 177、188—189、211—224、342—344、366—367、819、822—826、839—842 页。
- 工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第 343、685—690、822—826、830—832、842 页。

工艺学——见技术和工艺学。

- 工资——第 193—199、210、585—593、613、658、679 页。
- 定义——第 589 页。
- 工资水平的国民差异——第 194、613—618 页。
- 工资和资本的趋势——第 658 页。
- 工资的限度——第 196、679—680 页。
- 工资和资本积累——第 673、679—680 页。
- 工资和工业周期——第 699 页。
- 工资和工作日——第 590—591、599

—602 页。

- 工资和商品价格——第 600—601 页。
- 工资的法律“调节”——第 806—810 页。
并见名义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实际工资。

工作日

- 工作日的组成部分——第 578、581—582、583、590—591 页。
- 工作日的最高界限——第 259—260、398 页。
- 工作日的长度和剩余价值量——第 567—568、600—601 页。
- 工作日和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节约——第 356、527—529 页。
- 工作日和劳动的强化——第 448—453、572—573、606 页。
- 对工作日的强制限制——第 267、300—301、307—314、316—317、324—325、334—335、448—449、599 页。
- 资本力图突破工作日的道德极限和纯粹身体的极限——第 295、299—300、307—308、310—311、314—315、319、321—322、323—324、330—331、445—448 页。
- 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第 198、255、262、281、300、308、313—314、331—335、448—449 页。
- 工作日和工资——第 599—602 页。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作日——第 578—579 页。
- 公社——第 94—95、105—106 页。
- 印度公社——第 55、94—95、106、371、395—397 页。
- 多瑞河各公国的公社——第 265、390 页。

- 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第 105—106 页。
- 公有地的圈围——第 792—796 页。
- 公有地圈围法——第 792—793 页。
- 共产主义——第 95—96、649 页。
- 所有制形式——第 95—96、832 页。
- 分配——第 95—96 页。
- 劳动条件和劳动组织——第 95—96、698 页。
- 必要劳动——第 578—579 页。
- 物质技术基础——第 431、649 页。
- 共产主义和个人的发展——第 530、535—537、649 页。
- 古代世界(古希腊罗马)——第 74、96、98—99、109、117、156、174、190、194、222、319、371、386、404、560、795 页。
- 谷物法(英国)——第 312—314、323、498、499、502、741—742、780 页。
- 股份公司——第 343、371、688、823—824 页。
- 固定资本——第 671 页。
- 雇佣劳动
- 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第 193、644 页。
 - 在工人收入水平不同的情况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 607—608 页。
- “光荣革命”(1688—1689 年)——第 391 页。
- 贵族——第 17、653、739、741、742、777—778、792、842—843 页。
- 国际工人协会——第 40、334 页。
- 国家(剥削社会的)
- 资本的工具——第 300—301、316—317、343、401、675、710、806—810、819 页。
 -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第 265—267、300—302、307—330、333、537—543、547—550、617—618 页。并见工厂法。
- 国内市场——第 772、814—817 页。
- 国债——第 822—826 页。
- ## H
- 行会制度——第 342、358、377、397、402—403、783、818、819 页。
- 荷兰——第 300、303、412、419、431、508、562、805、819—822、824—825 页。
- 化学——第 34、203、204、206、342—343、664 页。
- 汇率——第 166 页。
- 货币
- 货币的定义——第 7—8、72、75、85、108、110、128、149、153、158、167、175—176、786 页。
 - 货币的历史——第 106—108、110、117—118、144—146、150、151、152、160—161 页。
 -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第 112—122、128、137—138 页。
 - 货币作为价格标准——第 116—117、118 页。
 -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第 134—149 页。
 - 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第 150—154 页。
 -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第 155—162 页。
 - 世界货币——第 163—166 页。
 - 纸币——第 146—149 页。
 - 信用货币——第 146、160 页。
 - 货币流通——第 134—149、154、158、159—160、161—162 页。
 - 货币转化为资本——第 167—200、

- 219—221、341—342、619、626、641—642、782 页。
 ——工资的货币形式所造成的幻觉——第 585—591、622—623 页。
 ——货币的拜物教性质——第 111 页。
 并见一般等价物，金，铸币。
货币数量论——第 143—144 页。
货币危机——第 158 页。
货币主义——第 99—100 页。

J**机器**

- 一般评述——第 379、409—411、422—423、506 页。
 ——机器的历史——第 386—387、410—415、419—420、422 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第 408、421—422、424、445—446、452、468、819—820 页。
 ——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第 230—231、424—425 页。
 ——机器使用的界限——第 430—431 页。
 ——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后果——第 430—467、471—474、475—479、483—484、487、497、506、701、708 页。
 ——机器的生产效率的计量——第 428—429 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第 441—442 页。
 ——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第 229—231、443—444、632、663—664、666—667 页。
 ——机器和社会产品的结构——第 487—488 页。
 ——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之间的区别——第 415—419 页。
 ——自动化的机器体系——第 418—419、473—474、477 页。
 ——工人反对使用机器——第 468—469、473 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机器的使用——第 431 页。
基础和上层建筑——第 8—11、94、98—99、102、529—531、533—534、649、675—676 页。
计件工资——第 603—612 页。
 ——一般评述——第 604—605、608、613 页。
 ——计件工资形式的不合理——第 605 页。
 ——计件工资的历史——第 609 页。
 ——计件工资是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日的手段——第 605—610 页。
 ——计件工资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的手段——第 608 页。
 ——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第 603—605、607 页。
 ——计件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第 610—612 页。
 ——计件工资和工人的个人差别——第 607—608 页。
计时工资——第 594—602 页。
 ——一般评述——第 594—595、603—605、607、775 页。
 ——确定计时工资产量的条件——第 595、599、613—614 页。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第 596—597 页。
 ——计时工资对资本家的好处——第 597 页。
技术和工艺学（一般原理）——第 409—410、533、664、670、688、693 页。
济贫法（英国）——第 472、498、710、739、

- 748、790 页。
- 家庭和氏族**——第 94—95、96、389—390、536—537 页。
- 家庭劳动**
- 家庭劳动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领域——第 331、380—381、510—517、518—519、525、536—537、549、557、772 页。
 - 工人的性质和状况——第 380—381 页。
 - 劳动报酬制度——第 606、735、772 页。
 - 工厂对家庭劳动的影响——第 505—506、519、537 页。
 - 工厂立法对家庭劳动的影响——第 549—550 页。
- 价格（一般原理）**——第 113、114、117—122、123、125—126、127、136—138、179—180、183—186、188、196、216 页。
- 价值**
- 定义——第 50—52、58—59、64—65、78—79、100、585 页。
 - 价值是社会关系——第 61、72、100 页。
 - 价值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一般的形式——第 98 页。
 - 价值和交换价值——第 48—52、75 页。
 - 价值和使用价值——第 59—60、228 页。
 - 价值量的规定——第 52—54、58—59、78—79、120、212、585 页。
 - 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第 53—54、59—60、664—665 页。
- 并见个别价值，交换价值，相对价值
- 形式，等价形式。
- 价值规律**——第 91—92、120、188、340、354、394、586、614、640、641 页。
- 价值形式**——第 62、74、175、666 页。
- 价值形式的两极——第 62—63、83—85 页。
 - 价值形式随着交换的发展而发展——第 81 页。
 - 简单的价值形式——第 62、75—76、81—82、86、113 页。
 - 总和的价值形式——第 77、113 页。
 - 一般价值形式——第 80—83、104、113、127 页。
 - 价值的货币形式——第 62、86—87、92—93、112—166、666 页。
 - 并见交换价值，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
- 简单劳动**——第 57—58、223—224 页。
- 简单再生产**
- 实质——第 621—622、624—627、636—637、642、644 页。
 - 简单再生产同扩大再生产的区别——第 642 页。
 - 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生产——第 626—628 页。
 - 简单再生产和可变资本——第 624—625 页。
 - 简单再生产和剩余价值——第 624—625 页。
- 交换**
- 交换是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必要条件——第 54、89—90 页。
 - 直接的产品交换——第 105—106、131—133 页。
 - 公社之间的交换——第 105—106、107、389—390 页。
 - 交换和货币的产生——第 123 页。

- 交换价值**——第48—52、54—55、61—62、75、98—100、105、106、121、123、179、182、193页。
- 交易所**——第158、217、813、823—824页。
- 节约**
- 生产资料的节约——第210、213、222、361—363、366、425—426、449、467、506—507、509、578—579、684、831页。
 - 劳动的节约——第222、356、578—579、775页。
- 借贷资本**——第177、187页。
- 借债**——第824—825页。
- 金(和银)**
- 金银作为货币商品——第86—87、107—108、117—118、128、150—151页。
 - 金银的特殊的自然属性——第107—108页。
 - 金银的使用价值的二重化——第108页。
 - 金银的价值——第108—109、135—138页。
 - 金银同时执行货币的职能——第114—115页。
 - 金和银的价值比例——第114、163—164页。
 - 金的价值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金作为货币的职能的影响——第116、136—138页。
 - 金的权力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而增长——第151、152页。
- 禁止结社法**——第498、807—808、809页。
- 经济危机**——第16—17、24—25、36—37、142、175、269、733页。
- 实质和原因——第132—133、158—159、233、646页。
-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条件——第132—133页。
- 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第158—159页。
- 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第597、706、717、732—737页。
- 竞争**——第300、352、354、383、394、431、497、600—602、649—650、664、686页。
- 具体劳动**——第50、56—57、59—60、61、72—73、79—80、221、225—227、234页。
- 绝对剩余价值**
- 定义——第350页。
 -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294—295、344、557—558页。
 -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区别——第558页。
- K**
- 科学**——第26、34—35、204、668—669页。
- 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和作用**——第423、464、505、533、551、664、684、708页。
- 科学的资本主义占有**——第400、424、668—669、831页。
并见化学。
- 科学的术语**——第34—35、243、649页。
- 可变资本**
- 定义——第234—239、240—241、249、336、339—340、446、480、622—623、647、673、690页。
 - 可变资本是首先由马克思制定的范畴——第671页。
 - 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

- 第 242—244、249、398、**582**、
647、670、673、684、690—691 页。
- 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必要条件——
第 241—242 页。
- 预付可变资本量和剩余价值量之间
的依赖关系——第 336—341 页。
- 可变资本量和工人人数——第 336—
342、689—690、806 页。
- 部分农村居民的生存资料转化为可
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第 806、814
页。
- 可变资本和资本的积累——第 696—
698、793—794 页。
- 克兰**——第 797—799、801 页。
- 空想社会主义**——第 93、112—113、332、
529—530、550、654 页。
- 扩大再生产**
- 实质——第 637、642、649—650、**656**、
873—674、679 页。
- 扩大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区别——
第 642 页。
- 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的扩大再生产——
第 656 页。
- 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第 673—
674、681 页。
- 不变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第 663—
664 页。
- 扩大再生产和劳动剥削程度——第
681 页。
- 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第 687—
688 页。
- L**
- 劳动(一般原理)**——第 54—58、82、201—
210、220—223、228—229、344、
587、591—592、621、665—666 页。
- 劳动的强化**——第 378、448—457、572—
573、704 页。
- 劳动对象**——第 202—207、225、229、231、
351、555—556、662 页。
- 劳动工具**——第 391、403、410—411 页。
- 一般评述——第 204、221—223 页。
- 劳动工具是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第 378—379 页。
- 劳动工具参加价值的形成过程——
第 424—432 页。
- 劳动后备军**——见相对人口过剩。
- 劳动货币**——第 112—113 页。
- 劳动基金**——第 623—624、668—671、
673 页。
- 劳动力**
- 定义——第 190、196—199、**228**—
229、242、567、627—629、647、662—
663、668—669 页。
- 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条件——第
190、191—192、196—199、370、639、
679—680 页。
- 劳动力的价值——第 193—194、199、
234—235、240—243、258、295—296、
336、348、351、388—389、433—434、
567、571、575—576、613、658、679、
736、809 页。
-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第 199、210、
370、567 页。
-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
第 190、210、219、259—261、398—
399、567、591—592、632、641 页。
- 劳动力便宜的限度——第 196、388—
389、515、658 页。
- 劳动力的再生产——第 195—196、
234—235、242—243、462—463、626—
630、633—634、637、674、679 页。
- 劳动生产率**
- 一般原理——第 59—60、350、370、

- 560、614、663—665、682—684、707—708 页。
- 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条件—第 53、362—363、366、370—372、378—379、560、576、578—579、614、684 页。
-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商品价值的影响—第 52—53、59—60、227、355、664—665 页。
-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劳动力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的影响—第 350、569 页。
- 劳动生产率是资本积累的因素—第 663—665、682、685 页。
- 劳动市场**
- 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第 189—193、549—550、784 页。
- 劳动市场和工业周期—第 549—550、699 页。
- “自由殖民地”的劳动市场—第 838—839、841—843 页。
- 劳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第 334—335、344、367—368、557—558、681、805—806、838 页。
- 劳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第 367—369、557—559、806 页。
- 劳动资料**—第 202—208、229—230、367、463—464、657、683、684 页。
- 劳动资料的有形损耗**—第 207—208、231、443、663—664、666—667 页。
- 劳动资料的无形损耗**—第 443—444、632、663—664 页。
- 劳工法**—第 300—302、609、806—810 页。
- 利润**—第 35、173—175、241、572、584、619—620、700、829 页。
- 利息**—第 584、619—620、645、654 页。
- 流动资本**—第 671 页。
- 普德分子**—第 469 页。
- 罗马(古代)**—第 98—99、117、156、161、185、263、319、386、399、629、783、795 页。
- M**
- 马尔萨斯主义**—第 185、390—391、553、578、676—677、695—696、709—710、770、771、776 页。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 一般评述—第 19—24、26 页。
- 方法论的个别应用—第 7—8、14、47—48、54—55、57—58、61—62、92—93、99、167、187、192 页。
- 并见抽象、辩证法。
- 贸易**—见商业。
- 美国**—第 11—12、263—264、285、301、333、421、431、433、462、486、495、504、551、630、780、821、824、828、833、837、841—842 页。
- 美国独立战争**—第 11 页。
- 美国南北战争**—第 11、319、323、333、462、474、475、630、842 页。
- 名义工资**—第 594—596、614 页。
- 墨西哥**—第 191、222、821 页。
- N**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第 202、464、529、555—556 页。
- 农村**—第 299、390—391、551—552、704—705、749、758—759、815—817 页。
- 农民**—第 54、94、303、371 页。
-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农民的剥夺—第 784—801、825、828—829 页。
- 中世纪的农民—第 54 页。
- 徭役农民—第 264—266、623—

- 624 页。
- 随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第 816 页。
- 欧洲各国的臣属农民——第 785 页。
- 十五世纪英国的独立农民——第 811—812 页。
- 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独立农民——第 790—791 页。
- 十六世纪末的俄国农民——第 791 页。
- 农民战争(德国)**——第 265 页。
- 农奴制**
- 生产关系——第 94—95、590—591、623—624、782、783、784—785 页。
 - 剩余劳动形式的特殊性——第 590—591、623—624 页。
 - 英国的农奴制——第 784—786、780—791 页。
 - 意大利的农奴制——第 784 页。
 - 俄国的农奴制——第 791 页。
 - 多瑙河各公国的农奴制——第 264—265 页。
- 农业**——第 470—471、551—553、662、664、704—705、738、741—743、759、774—776、780、816—817 页。
- 农业工人**
- 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第 282、303、551—553、610、660、704—705、718—720、738—763、771—780、784—785、809、811—812 页。
 - 农业工人的阶级斗争——第 552 页。
- 奴隶贸易**——第 296—297、486、820、827—828 页。
- 奴隶制**
- 一般原理——第 107、222、244、263—264、296、371、559、590—591、593、678、774 页。
 - 古罗马的奴隶制——第 319、629 页。
 - 爪哇的奴隶制——第 820 页。
 - 美洲的奴隶制——第 191、263—264、296—297、319、333、827—828 页。
- O**
- 欧洲**——第 785 页。
- P**
- 贫民习艺所(英国)**——第 306—307、718 页。
- 平等(资产阶级的)**——第 180—181、190、199、324、334—335、409、436、639—640 页。
- 平均利润**——第 690、700 页。
- 葡萄牙**——第 819 页。
- 普法战争(1870—1871 年)**——第 165 页。
- Q**
- 启蒙运动者(十八世纪)**——第 109、669 页。
- R**
- 人(作为社会生产力)**——第 56—57、88、201—202、208、228—229、362—363、409—410、555、662—663 页。
- 人口规律**——第 692 页。
- 人类的原始状态**——第 94—95、201—204、389—390、559—560、674 页。
- 日本**——第 161、785 页。
- 瑞典**——第 792 页。
- 瑞士**——第 36 页。
- S**
- 三十年战争**——第 801、808 页。
- 商品**
- 一般原理——第 7—8、47—48、54、

- 86—88, 89—90, 99页。
- 商品的二重性——第 47—50, 61, 75, 90, 105, 123, 133, 211 页。
- 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第 54—60, 90—91, 97 页。
- 产品变为商品的条件和前提——第 54—56, 61, 76, 88—91, 104—106, 192 页。
- 商品的价值——第 48—54, 59—60, 61, 64—65, 72, 75, 78—79, 99, 120, 212, 228, 585, 664—665 页。
-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第 87—89, 91—92, 99—100 页。
- 商品的历史性质——第 76, 90—91, 92—93, 98 页。
并见商品流通, 商品生产。
- 商品拜物教**——第 87—90, 681 页。
——定义——第 89, 99—100 页。
——商品拜物教的前提——第 88—90 页。
——理解商品拜物教的必要条件——第 92 页。
——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第 97 页。
——局部表现——第 99—100 页。
- 商品流通**——第 150, 151, 155—156, 165—166, 167—175, 182—186, 188, 192, 220, 639—640 页。
——商品流通和商品的形态变化——第 123—124, 126—131 页。
——简单商品交换——第 177—180 页。
——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区别——第 131—133 页。
——买和卖的同一性——第 132—133 页。
——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第 167—168, 390—391 页。
——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第 134—136, 140, 154, 155, 159—160 页。
- 商品生产**——第 54—56, 167, 223, 389, 684—685 页。
——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第 61, 76, 88—91, 104—106, 192 页。
——不同的生产方式中的商品生产——第 133, 192 页。
——简单商品生产——第 192 页。
——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第 75, 211—224, 390—391, 643—644, 684—685 页。
——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的相同性和区别——第 133 页。
——商品生产的自发性和矛盾性——第 124—128 页。
——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
义占有规律——第 639—645 页。
- 商品市场**——第 168 页。
并见国内市场, 世界市场, 劳动市场。
- 商品学**——第 48 页。
- 商人资本**——第 167, 177, 186—187, 397, 818—819 页。
并见商业资本。
- 商业**——第 169—172, 182 页。
——物物交换——第 110, 193 页。
——零售商业——第 160 页。
——世界贸易——第 163—166, 167, 637, 820—821, 822 页。
——商业和商业活动账目——第 160 页。
——奴隶贸易——第 296—297, 827—828 页。
——商业和工业——第 822 页。
- 商业利润**——第 619—620 页。
- 商业战争**——第 819, 822, 826 页。
- 商业资本**——第 172, 177, 186—187, 557 页。
并见商人资本。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定义——第 52—53, 88, 236, 360, 605

- 页。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实体——第 52—53、59、88、212、221—222、352—353 页。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竞争——第 383 页。
- 社会经济形态**
-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性质——第 12 页。
- 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分工——第 397 页。
- 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简单再生和扩大再生产——第 656 页。
- 剩余劳动形式是对抗性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第 244、263—264 页。
- 资本主义关系是陈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灭亡的产物——第 192—193 页。
- 劳动资料对于研究已经消失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意义——第 204 页。
- 劳动资料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第 204 页。
- 社会主义**——见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革命**——第 18、37、535、550—552、831—832 页。
- 神圣同盟**——第 17 页。
- 生产(一般评述)**——第 201—209、358、394—395、555—556、587、621—623、830 页。
并见再生产。
- 生产的积累**——第 365、398、684、721—722 页。
- 生产方式**——见社会经济形态。
- 生产费用**——第 365、381、382、431、451—452、589 页。
- 生产关系**——第 131—132、675—676 页。
——古代世界的生产关系——第 96—97、190 页。
- 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第 371、829 页。
- 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第 94—95、161、371、784—785、829 页。
-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第 92—93、98—99、111、190—191、307—308、334—335、367—372、465、533—534、587、602、677—678、708—709、782—783、827—832、834 页。
- 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第 95—97、832 页。
-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 626—628、673—674、681 页。
- 生产过剩的危机**——见经济危机。
-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第 343、371、685—691、823—824、831—832、842 页。
- 生产劳动**
- 简单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第 205、232、555—556 页。
- 重农学派对生产劳动的看法——第 556—557 页。
-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第 205、555—556、645—647 页。
- 生产力**
- 生产力的要素——第 201—210、398—399、552、627 页。
- 劳动资料对于判定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第 204 页。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第 533—534、552、579、708—709 页。
并见生产资料,人。
- 生产资料**——第 345、351、360—361、770 页。
——定义和组成——第 191、204—210、235、663、782 页。
- 生产资料是活劳动的物质因素和形成新产品的物质要素——第 202—

- 208、232—233、344、621 页。
- 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第 230—232 页。
- 生产资料和价值形成过程——第 211 —216、229—236、641、664—665 页。
- 生产资料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和材料——第 344、555 页。
- 生产资料是劳动生产力的因素——第 53、665、682—683 页。
- 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第 192、344、782、835 页。
- 生产资料发展的社会桎梏——第 831 页。
- 生活资料的掺假**——第 198、277—278、660 页。
- 剩余产品**——第 35、257、636—638、656、677、693、769—770 页。
- 剩余价值**——第 175—177、622 页。
- 定义——第 172、234—235、238、239、243—244 页。
- 剩余价值的产生——第 187—188、234、240—241、445—446、636—637、653 页。
- 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的庸俗理论——第 180—186、216—219、232、234、244、250、251—256、570、649—656、666—668 页。
- 剩余价值是剥削社会的经济形态的特征——第 243—244 页。
-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决定目的——第 173—177、211、216—222、243、257、260、264、330、368、445—446、555—556、649—650、678—679 页。
- 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第 567—568 页。
- 剩余价值率——第 242、244—245、257、259、336—340、446、558—559、572、580—584、657、663、668 页。
- 剩余价值量——第 336—340、446、663、668 页。
- 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第 35、100、173—174、244、263—267、556、572、584、619—620、645—648、654、656、769—770、829 页。
-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第 635—638、642—648、708 页。
- 并见绝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
- 剩余价值率**
- 定义——第 242、244、582 页。
-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第 580—584 页。
- 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第 245 页。
- 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条件——第 244、657、663 页。
-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第 336—341 页。
- 剩余劳动**
- 定义——第 243—244、257、581—582、681 页。
- 剩余劳动是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第 244、263—267 页。
- 榨取剩余劳动的条件、手段和方法——第 275—276、353—355、388—389、557—563、663 页。
- 剩余劳动量的规定——第 347—350 页。
- 剩余劳动的早期形式——第 264—265、557 页。
- 剩余劳动是利润的源泉——第 602 页。
- 资本主义制度下缩短剩余劳动的极

- 限——第 679—680 页。
- 什一税——第 54、94、246 页。
- 实际工资——第 577、614 页。
- 失业——见相对人口过剩。
- 使用价值——第 48、50—52、55—56、59—60、61、103—106、174、179、181—182、205—208、213、218、220—221、233—234、636 页。
-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第 108 页。
-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第 190、196—202、210、219、222、359—360 页。
- 使用价值和价值——第 48、59—60、220—221、228—230、232—233、236—237 页。
- 世界市场——第 144、163—165、167、264、392、421、497、499、614、659、711、717、784、818、831 页。
- 氏族和家庭——第 94—95、96、389—390、536—537 页。
- 手工业生产——第 331、358、371、374—389、395—397、402—403、419—420、462—463、493、510—517、518—519、537、549 页。
- 私人劳动——第 55、73、82—83、89—92、112、133 页。
- 所有制
- 公社所有制——第 94—95、371、395—397、785、792—793 页。
 - 建立在生产者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第 95、784—786、829—830、832—833、843 页。
 - 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第 210、640—642、721—722、781—783、788、790—791、829—833、843 页。
 - 公有制——第 829、832 页。
 - 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第 95—96、832 页。
- 并见土地所有权。
- T**
- 体力劳动——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 通货学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 680 页。
- 同一性——第 132—133、640 页。
- 统计学(资产阶级的)——第 302 页。
- 投机——第 171—172、217、236、299、651、733、823—824、842 页。
- 土地**
- 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第 202—203、668—669 页。
- 劳动资料——第 203—204 页。
- 一切财富的源泉——第 57、552—553、662—663 页。
- 土地肥力
- 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第 560、576、682 页。
 - 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土地肥力的掠夺——第 267、295、552—553 页。
- 土地肥力遵循“规律”——第 552—553 页。
- 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 地产)——第 12、17、99、167、404、619—620、653、739—741、778—780、785、788、811—812、814 页。
- 土耳其——第 161、508 页。
- 托拉斯——第 688 页。
- W**
-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 8—12、98、204、330—331、409—410、533—534、535、649、669、675—676 页。
- 乌得勒支和谈——第 827 页。
- 无产阶级
- 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

- 史作用——第 18, 831—832 页。
-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扩大
 - 第 497—498, 552, 673—675, 677, 684, 758—759, 831—832 页。
- “无产者”这个定义的经济含义——第 674 页。
- 流氓无产阶级——第 706 页。
 - 并见工人阶级的斗争,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工人阶级, 农业工人。
- 无产阶级专政**——第 18, 535, 831—832 页。

X

- 西班牙**——第 36, 562, 819, 827—828 页。
- 希腊(古代)**——第 74, 98—99 页。
- 宪章运动**——第 312, 314, 316 页。
- 相对价值形式**
 - 实质——第 63—67 页。
 - 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第 67 页。
 - 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对相对价值量的影响——第 67—69 页。
 -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第 62—63, 67, 70, 82—85, 106 页。
- 相对人口过剩**——第 597 页。
 - 实质和原因——第 298—299, 471, 494, 578, 691—693, 694—695, 697—698, 838 页。
 - 相对人口过剩的形式——第 703—707 页。
 - 相对人口过剩的作用——第 494, 535, 692—698, 700—702 页。
 - 相对人口过剩和工业周期的阶段——第 694—695, 699, 702 页。
- 相对剩余价值**
 - 概念——第 350 页。
 -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第

- 349, 352—353, 357, 449—450, 557, 558 页。
- 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第 557—558 页。
-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劳动的技术过程的影响——第 557 页。
- 相对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力——第 350, 449—450 页。
- 相对剩余价值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对比——第 353—354, 356, 557 页。
- 相对剩余价值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第 403 页。
- 消费**
 - 个人消费——第 208, 627—629, 670 页。
 - 生产消费——第 208, 222, 233—234, 359—361, 627—629, 646—647 页。
 - 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消费——第 208—211, 627—629, 645—647 页。
-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第 102, 105, 644 页。
- 协作**
 - 定义——第 362, 426, 830 页。
 - 协作的起点——第 366, 371, 398 页。
 - 协作的意义和对个体劳动形式的优越性——第 362—367 页。
 - 决定协作规模的因素——第 366—367 页。
 - 协作发展的结果——第 366—367, 399 页。
 - 协作的初期形式——第 371 页。
 - 简单协作——第 372, 398—399, 400, 423 页。
 - 资本主义协作——第 371—372, 373, 556, 684 页。
 - 对大规模协作下的劳动过程进行社

- 会调节的必要性——第 367—368、
465 页。
- 协作是农业中大革命的因素——第
470—471 页。
- 信贷(信用)**
- 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第 155、158、
160—162、651、686—687 页。
- 信用货币——第 146、160、823—824
页。
- 公共信用——第 822—825 页。
- 国际信用——第 824 页。
- 古罗马的信贷——第 156 页。
- 中世纪的信贷——第 156、158 页。
- 信贷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因素——
第 822—824 页。
-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信贷——第
197—199、686—688、693、694 页。
- 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第 197—
199、566 页。
- 需要救济的贫民(需要救济的赤贫)——**
第 472、705—707、717—718、758—
759、789 页。
- Y**
- 鸦片战争——第 819 页。**
- 雅典(古代)——第 99、404 页。**
- 亚洲——第 161、185、370—371、397、493
页。**
- 徭役——第 94、264—267、590、623—624
页。**
- 1848—1849 年革命——第 15—16、17、
316、332—333 页。**
- 一般等价物——第 83—87、104、106—
108、110、124—125 页。**
- 伊朗——第 562 页。**
- 意大利——第 36、507、562、784 页。**
- 银行——第 147、158、163—164、165、166、**
823—824 页。
- 银行券——第 146、159、160 页。**
- 印度——第 55、97、150—151、154—155、
365、371、395、419、429、472、494、
562、656、819、820—822 页。**
- 英国**
- 一般评述——第 8、11、16—18、36—
37、267—268、307—308、313—314、
331—332、411、414、417、711 页。
- 资本的原始积累——第 471、784—
813、818—829 页。
- 货币系统和银行系统——第 115、117—
118、163、823—824 页。
- 工业——第 268、307—308、331—
332、414、474—476、497—502、510—
515 页。
- 城市——第 723—728 页。
- 农业和土地关系——第 471、738、741—
743、748—751、784—785、790—
791、811—813、816—817 页。
- 对外贸易——第 494—499、503、819—
页。
- 奴隶贸易——第 827—828 页。
- 资本输出——第 671 页。
- 殖民制度——第 562、819—823、825—
826 页。
- 人口——第 485—486、488—489、691—
692、711—712 页。
- 劳动者状况——第 198、267—293、
307—330、433—441、448、449—457、
472、497—502、510—519、630—634、
657—661、717—718、721—780、807—
808 页。
- 工人运动——第 198、308、313—314、
316、324、331—333、468—469 页。
- 立法——第 266、267—268、300—
302、307—332、465、536—543、549—

- 550、739、789—790、791、802—810
页。
-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 ——第
788、790—791、817页。
- 语言** ——第 91 页。
- 原料** ——第 203、206、207、229、398 页。
- 运输** ——第 421、494、525—526、820—821
页。
- Z**
- 再生产** ——第 161、621、656、664—665
页。
- 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的特点 ——
第 621—622、694—695、708 页。
-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 第 161、619、
626—628、633—634、637、674、681、
782 页。
- 劳动力的再生产 —— 第 193—194、
234—235、242—243、351、388—389、
626—630、633—634、637、673—675、
679 页。
- 不同经济部门中再生产的特点 ——
第 662、664 页。
并见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
- 徭役** ——第 191 页。
- 折衷主义** ——第 144 页。
- 政治经济学**
-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 —— 第 404、676
—678 页。
-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 第 7—8、12
页。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
第 7—8、14、19—24、26、47—48、54—
55、57—58、61—62、92—93、99、167、
187、192 页。
-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评述
—— 第 16、17—18、669—671、676—
678、694、833—834 页。
- 直接的社会劳动** —— 第 73、95—96、112
—113 页。
- 殖民** —— 第 833—843 页。
- 殖民制度** —— 第 494、562、819—824、825
—826 页。
- 中国** —— 第 88、146—147、151、419、819、
820 页。
- 中世纪** —— 第 94—95、156、158、342、358、
371、377、397、428、470、557、783、813、
818、822 页。
- 种族** —— 第 377 页。
- 重农学派** —— 第 100、186、216、355—
356、556—557、583、648、834 页。
- 重商主义** —— 第 76、98、99—100、164、
177、564 页。
- 铸币** —— 第 144—149、160 页。
- 资本**
- 定义 —— 第 173、177、186、260、294
—296、299、343—344、626、731—
732、829、834 页。
- 资本的历史 —— 第 167—168、186—
189、191—194、209、367、560、818—
819、823—825、829—831 页。
- 资本的总公式及其矛盾 —— 第 167
—189 页。
- 资本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
—— 第 693—694、700—701 页。
- 资本的运动和矛盾 —— 第 367—
371、483、506、549—550、619、703—
704 页。
- 资本和工资 —— 第 657—663 页。
- 使用的资本和消费的资本 —— 第
666—667 页。
- 资本的技术构成** —— 第 672、675—676、
683—686、688—689 页。
- 资本的价值构成** —— 第 672、683—684 页。

- 资本的有机构成**——第 339—340、485、492、672、683—684、690—692、694、806 页。
- 资本的原始积累**
- 一般评述——第 624、685、781—784、843 页。
 - 原始积累的因素和要素——第 782—784、788、806、819、822—824、825—826、827—832 页。
 - 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迫驱逐——第 470、784—801、836—837 页。
 - 地主对公有地的掠夺——第 792—796 页。
 - 对资本的原始积累方法的一般评述——第 801、818—820、827—829、842 页。
-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第 557 页。
- 经济实质——第 368 页。
 -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的内含量和外延量——第 677—678 页。
 -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的表现——第 242—247、580—584、658、663 页。
 -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第 524 页。
- 资本积累**——第 343、371、523、549、685—689、822 页。
并见**资本积累**。
- 资本积累**
- 一般评述——第 635、637—638、642—644、649—652、673、675—676、677、678—679、681、685—686、708—709、721—722 页。
 - 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源泉和因素——第 620、637、639、656—658、661、663—666、682、687 页。
 - 资本积累的结果和后果——第 685—686、689—691、692—693、697、708 页。
 - 农业中的资本积累——第 662 页。
 - 资本积累和工人阶级的状况——第 661、673—675、677—680、690—693、697—698、708、721—722 页。
 - 资本积累和商品生产的规律——第 642—643 页。
 -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第 829—832 页。
并见**资本积累**。
- 《资本论》(卡·马克思著)**
- 对象和方法——第 7—8、12、14、19—24、26、47—48、57—58、92—93、98、99、110—111、167、187、192、707 页。
 - 对工人阶级的意义——第 36 页。
 - 资产阶级对《资本论》的态度——第 18 页。
 - 外国译本——第 8、19、26、29、30、33—34、38 页。
 - 《资本论》的历史——第 7、14—15、18—19、29、30—31、34、38 页。
- 资本输出**——第 671、838 页。
-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第 675—676、678—681、689—691、701—702、707、708、717、721—722、726—727、759—760 页。
并见**劳动的强化，资本积累，相对人口过剩，需要救济的贫民**。
-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一般原理)**——第 7—8、352、354、639—642、644、649—650、678—679、700—701、705—706、707、805—806 页。
-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第 199、394、395、524、549、579 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一般评述——第 16、18、47、75、98、

- 111、120—121、162、166、186—187、
191—194、199—200、223—224、243、
295、334—335、355—357、368—370、
462—464、533—534、536—537、555
—556、579、582、592—593、643、678
—679、682、684—685、690、696—
697、721—722、831—832、836—837
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目的—
第 173—176、211、216—222、243、
257、260、330、342、368、555—556、
649—650、652、678—679、682 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和前提—
—第 167、192—193、358、371—
372、390—391、626、685、782、783、
830—831、842 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和矛盾—
—第 8、18、24—25、132—133、199
—200、323—324、367—369、394—
395、446—447、471、483—484、487—
489、555、579、708、721—722、831—
832 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主义—
第 783 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
—第 371—372、551—552 页。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暂时性—
—第 12、16、35、533—534、535、
640、649、831—832 页。
-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 一般评述—第 16、98、99、479、483
—484、587—589、592、593、618、671、
676—678 页。
-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某些经济范畴和过程的分析的特点—第
- 35、60、97、98、164、169—170、189、
193、231、340—341、386、393、400—
401、425、556—557、563—564、568—
572、587—589、645—648、652—653、
657—658、666、669、674、682、692—
693 页。
-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第 17—
18、75—76、171—172、175、179、184、
209、211、216—219、338、479—489、
617—618、644—645、667—671、680、
835—836 页。
- 一般评述—第 69、98、133、180—
181、200、341、587—588、589、699—
702、781—782 页。
-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第 180—186、216—
219、232、234、244、250、251—256、
570、649—656、666—668 页。
并见马尔萨斯主义。
- 自然(创造产品和资本物质要素的第一因素)**
—第 201—204、208—209、413—
415、424、552—555、662—663、664—
页。
- 自然经济**—第 94—95、150、816 页。
- 自由(资产阶级的)**—第 190、192、193、
199、409、436、591、639—640、810—
页。
- 自由贸易派**—第 17、76、200、268、285、
312—314、323、326、527、741、817 页。
- 宗教**—第 89、96—98、294、410、676—
678、681、813 页。
- 宗教改革**—第 789—791 页。
- 综合技术学校**—第 535 页。
- 租地农场主**—第 784—785、792—793、
811—814、818 页。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重 量

1 吨 (Ton 英国)	= 20 噩	1016.050 公斤
1 噩 (Hundredweight 英国)	= 112 磅	50.802 公斤
1 噩 (Hundredweight 美国)	= 100 磅	45.360 公斤
1 夸特 (Quarter)	= 28 磅	12.700 公斤
1 斤 (Stone)	= 14 磅	6.350 公斤
1 磅 (Pound)	= 16 盎斯	453.592 克
1 盎斯 (Ounce)		28.349 克
金药衡		
1 磅 (Troy pound)	= 12 盎斯	372.242 克
1 盎斯 (Troy ounce)		31.103 克
1 克冷 (Grain)		0.065 克

长 度

1 哩 (Mile)	= 5280 呎	1609.329 米
1 码 (Yard 英国)	= 3 呎	91.439 厘米
1 码 (Elle 德国)		66.690 厘米
1 呎 (Foot)	= 12 寸	30.480 厘米
1 寸 (Inch)		2.540 厘米

面 积

1 英亩 (Acre)	= 4 路得	6.0703 市亩
		40.47 公亩
		4047.0 平方米
1 路得 (Rood)		1011.7 平方米
1 公亩 (Are)		100.0 平方米
1 摩尔根 (Morgen)		2523.0 平方米

容 量

1 蒲式耳 (Bushel)	= 8 加仑	36.349 升
1 加仑 (Gallon)	= 8 品脱	4.544 升
1 品脱 (Pint)		0.569 升

货 币

1 镑(英国金币)	= 20 先令
1 先令(英国银币)	= 12 便士
1 便士(英国铜币)	= 4 法寻
1 法寻(英国铜币)	= 1/4 便士
1 基尼(英国金币)	= 21 先令
1 索维林(英国金币)	= 1 镑
1 法郎(法国铸币)	= 100 生丁
1 利弗尔(法国银币)	= 1 法郎
1 生丁(法国辅币)	= 1/100 法郎
1 塔勒(德国银币)	= 3 马克
1 马克(德国银币)	= 100 分尼
1 格罗申(德国银币)	= 12 分尼
1 分尼(德国铜币)	= 1/100 马克
古尔登(德国和荷兰金币)	
德拉马(希腊银币)	
瑞斯(葡萄牙铸币)	
马拉维第(西班牙金币)	
杜卡特(欧洲金币, 起源于意大利)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1975

作者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页数 = 984

S S 号 = 10536191

出版日期 = 1975年06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跋

法文版序言

法文版跋

第三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第二章 交换过程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第六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

第八章 工作日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第十一章 协作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

的变化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第六篇 工资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

工资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

注释

人名索引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名目索引